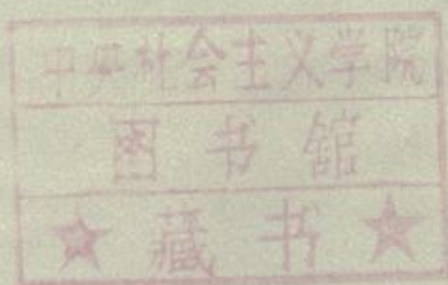


#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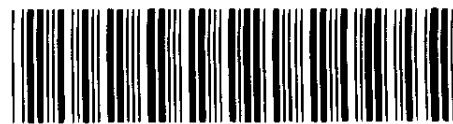
以西方的观点专门研究西欧的政治和社会

〔美〕戴维·奥尔布赖特 编



商务印书馆

D 354



\*200045021\*

54919

2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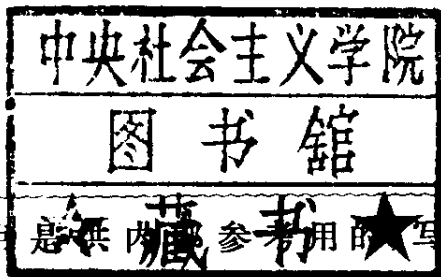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

以西方的观点专门研究  
西欧的政治和社会

[美] 戴维·奥尔布赖特 编

方廷钰 沈一民 译



本书是馆藏参考书★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 出版说明

本书编者系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的高级编辑戴维·奥尔布赖特。1976年，在他的主持下，一些研究人员就西欧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于1979年写成本书。

本书由九篇独立的文章加导言共十篇组成。作者九人。导言部分概述西欧各国共产党在国内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一至八篇分别研究了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情况，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芬兰和英国的，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三国即瑞典、挪威、丹麦和附近的冰岛的共产党的状况，并简略地介绍了六十年代以后新成立的或从原有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新党的情况。导言部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共产党，如瑞士、比利时、卢森堡、圣马力诺、荷兰、马耳他、奥地利、西柏林的共产党的情况也作了一定的叙述。

本书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内容包括党的成立的历史背景、党员构成、党员人数的消长、领导人的更迭及其背景、党的团结与分裂、与其他左翼政党的联合和分离、历年选举的成败及其原因、过去和现在的重大政策、对国际重大事件和集团的观点等等。本书还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前途作了一些预测。

对西欧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实践，对本书作者的观点，我们应该本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立场来加以研究和评价。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本书为研究西欧共产主义提供了不少资料，故予译印，供读者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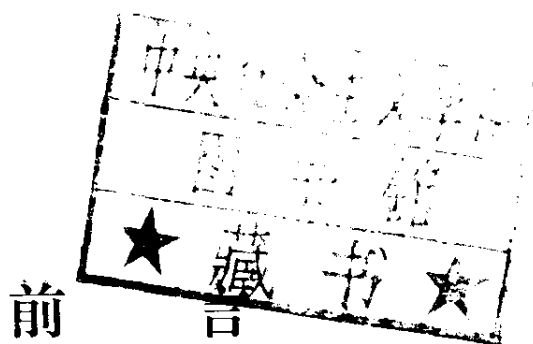
*David E. Albright*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79

根据美国博尔德西方观点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 目 录

前言·····	1
本书各篇作者简介·····	3
导言·····	戴维·E. 奥尔布赖特 5
一、意大利：意共的影响不断增长·····	贾科莫·萨尼 44
二、法国：法国共产党的演变·····	威廉·J. 戴维肖弗 91
三、西班牙：西班牙共产党与佛朗哥以后的时代 ·····	欧塞比奥·穆哈尔—莱翁 130
四、葡萄牙：葡萄牙共产党和葡萄牙革命 ·····	欧塞比奥·穆哈尔—莱翁 169
五、希腊：非西方式背景的共产主义 ·····	季米特里·基齐基斯 206
六、芬兰：芬兰共产党与选举政治·····	约翰·H. 霍吉森 239
七、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斗争 ·····	特龙德·吉尔伯格 263
八、大不列颠：对英国共产党来说，革命还是渐进主义 ·····	戴维·林恩·普赖斯 313
九、欧洲共产主义的挑战·····	克文·德夫林 326
人名译名对照表·····	360



编这本书的缘起相当简单。当七十年代我在《共产主义问题》编辑部工作时，深信需要一本全面考察西欧共产主义复杂现象的书。因此，当弗雷德·普雷格在1976年末首次提出要编这样一本书时，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立刻开始邀集一批撰稿人。

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实际上经过一番曲折过程。编辑这样一本书的困难在于人们以往对西欧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党几乎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更难办的是，自从打算编这本书以后，形势的发展不但更加突出这项工作的必要性，而且发展速度之快，使人难以作出最新的估计。撰稿人遇到这些困难，又加上我这个编辑紧逼着催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态度，如果我不加以称赞的话，就太疏忽了。

本书若干篇章使用了《共产主义问题》上发表过的一些材料，主要是关于意大利、葡萄牙、希腊、芬兰和各党之间关系的那几章。但是，为适合本书的需要，所有材料都经过修改和补充。

除了本书撰稿人外，还有其他许多人为本书的出版作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如我已经提到的弗雷德·普雷格促使我担负起这项任务，还以无限的耐心等待本书最后出版。罗纳德·蒂尔斯基、埃里克·威伦兹、皮奥·尤利厄西、琼·巴思·厄本、罗伯特·普特南和乔尔金·拉斯马森在许多问题上提供宝贵意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几年，曾和亚历山大·达林一起学习，他帮助我形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金伯利·约翰逊—史密斯在百忙中为我编好的许多章节并重新打

字,她的丈夫詹姆斯·史密斯在本书完成过程,以始终如一的好脾气和谅解态度,把我的负担都加在他和她的身上。

戴维·E.奥尔布赖特

## 本书各篇作者简介

戴维·E. 奥尔布赖特 是《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的高级编辑。他曾为许多杂志和专题论丛写过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政治与对外政策的文章。此外, 他已编成《非洲共产主义》一书, 即将出版, 同时他是行将问世的《求爱的窘境: 苏联、中国和加纳》一书的作者。

威廉·J. 戴维肖弗 是普雷斯科克岛市缅因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他专门研究法国政治, 尤其是法国共产党。而且, 他还曾在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

克文·德夫林 是慕尼黑自由欧洲电台政治分析员。他发表过大量有关欧洲共产党的报告, 现在他正参加一个集体研究的项目, 准备出版一本定名为《帝国和意识形态》的书。

特龙德·吉尔伯格 是帕克公园,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出生在挪威, 他专门研究西欧和东欧的政治, 尤其是北欧各国和罗马尼亚。他关于北欧国家的著作有《苏联共产党和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 挪威现状》等。

约翰·H. 霍奇森 是锡拉丘兹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他曾写过关于苏联和芬兰的内容广泛的文章。在他关于芬兰的著作中有《芬兰的共产主义: 历史和解释》与《逃往俄国: 奥托·W. 库西南的



政治传记》。

季米特里·基齐基斯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出生于雅典，在索邦受教育，他曾是好几个欧洲著名学术中心的接受奖学金的研究生。他的著作有《宣传与国际政治的影响——1919—1920 希腊和她向巴黎和会的请求》等

欧塞比奥·M. 穆哈尔—莱翁是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政治学的博士候选人。他曾为几家杂志和专题论丛写过关于伊比利亚政治的文章，1977年在马德里研究西班牙共产党。

戴维·林恩·普赖斯是以英国问题为主的顾问和政治分析家。他发表过关于中东的主题广泛的著作，但多年来也密切注意英国共产党的活动。有关后一个题材的文章发表在诸如斯坦福大学胡佛学会出版的关于战争、革命与和平的《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这类刊物上。

贾科莫·萨尼是哥伦布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出生在意大利，曾写过大量有关意大利政治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文章。他特别致力于分析群众政治。

# 导 言

戴维·E.奥尔布赖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里，西方分析家普遍认为西欧共产主义基本上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大。他们虽然承认西欧党力图利用本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有几个国家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仍然把这些党看成仅仅具有狭隘的表面上民族性而已。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党是执行莫斯科意志的工具，顽固地破坏西欧各国现存制度的各方面，并且执意不肯与当地社会和政治相结合。<sup>①</sup>

然而，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日益分化的迹象，尤其是中苏分歧引起的混乱，促使上述看法的转变。大多数分析家现在要设法估价这些西欧党对于苏联党有多大程度的独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在欧洲范围出现的多元化的程度如何。<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看法含蓄地暗示对一种原来观点的重新肯定，因为早就有过广泛传布的信念，即西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组带的松散，可能意味着西欧党回头向左翼社会民主党发展。一位欧洲形势的权威观察家甚至预言说：“今后五年，不当权的共产党除了名义上与两次大战间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不同外，毫无疑问实质与它们完全一样，尽管他们可能不必担心，1961年以后出现的

---

① 例如见马里奥·艾瑞迪，琼-马里·多米纳奇，奥尔多·加罗斯西：《西欧共产主义》，纽约1951年；弗兰克·博凯瑞：《欧洲共产主义》纽约兄弟公司，1953年。

② 有代表性的见解，见亚历山大·达林，乔纳森·哈里斯与格·霍内特合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变化》，纽约1963年；威廉·格里菲思编：《欧洲共产主义》，两卷，马萨诸塞1964—1966年。

斯大林主义亲中国派会变成巨大的党派。”<sup>①</sup>

以上两种看法在已往几年里不问其价值如何，近来的形势发展表明两者都没有恰当地反映出西欧共产主义的真实面貌。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紧张，但是根本不能肯定，这两个党正在演变为社会民主党。虽然两者都打算保持广大群众的支持，意共甚至还扩大它的群众基础。两党似乎在向参加本国政府迈进。确实意共虽然在内阁中没有代表，自从1976年8月以来，它对意大利国家政策，发挥了实质性的影响。因为至少它在议会里的间接支持，对政府的组成与存在具有至为重要的作用。在国家面临的紧要问题上，它有一定发言权。另一方面，与苏联共产党密切联系，并不妨碍有些西欧党在本国内部取得重大成功。例如，忠实于苏联的葡共，在1975年4月葡萄牙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得近13%的选票，在1974—1975年的内阁中持有许多职位。虽然因为牵涉到1975年11月份发生的流产政变，削弱了葡共的地位，但是它显示出依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76年议会选举中它赢得15%的选票，1976年又巩固了对葡萄牙工人运动的领导。

总之，对西欧共产主义问题需要有新的看法。本书的意图就在于满足这个需要。<sup>②</sup> 本书通过西欧共产党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中

---

① R. V. 伯克斯编：《共产主义的未来》中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变质》一文，底特律1968年，第238页。其他著名评论家的同样说法，见理查德·洛温撒尔：《世界共产主义：世俗信仰的瓦解》，纽约1964年，第267页；威廉·格里菲思：《1965年的欧洲共产主义》，载于《欧洲共产主义》第2卷，第7、25页。

② 在这个问题较早做过同样努力的有罗纳德·蒂尔斯基：《1920—1972年法国共产主义》，纽约1974年；唐纳德·布莱克纳和西德尼·塔罗合编：《法国和意大利共产主义》，新泽西1976年。如同题目指明那样，这些文章只讨论法、意共产主义。尼尔·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伦敦1975年，其中有许多有用资料，可是它仅仅叙述各党情况及其观点，没有谈到这些党与它们四周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

所发挥的作用,对它进行分析。<sup>①</sup> 本书用八个章节分析比较重要和比较非正统的那些党,最后一章探索各党与它们国内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党之间关系的影响。导言试图提供总的概念,<sup>②</sup> 为以下各章的分析建立一个大概的框架。在导言中还将简要提到不在以后各章节中讨论的一些党派。<sup>③</sup>

首先必须知道,共产党在其活动的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取决于若干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是社会和政体的实际情况为党提供的各种机会。这些机会来自各种不同的因素,但主要应考虑的是国内客观社会和经济情况,以及人民群众对这些情况的态度;本国的政治历史和传统;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布局;和各派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态度。第二个因素是党本身所具有的形象,和力图在别人心目中造成的印象。尽管对苏联和苏共的态度是决定党自身象形的条件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个,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条件。此外如本民族的激进传统和某一领导人的个人历史,也都是决定象形的条件。最后,还有党的策略问题。策略是在党对付大量紧急问题时产生的。党应该向哪一部分社会力量做工作?党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参加议会政治?参加议会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党应该联合哪些政治力量,目的何在?党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参加政府?等等。

因为这些因素中包含许多可变因素,因为这些可变因素的不

---

① 为了不发生任何误解,必须澄清“作用”一词在这个地方和整本书中的含义。首先说明,这个词基本上是形容性质的,并不是指结构机能分析学派所规定的维持政府所必要的规则。其次这个词的含义指党与制度的能动关系,而不是指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关系。最后它意指复杂的现实,意味着几种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机能类型的混合,如反主流文化的机能和执政党的机能。

② 本书探讨的目标,我曾把西欧地区限于欧洲大陆上非共产主义国家和与欧洲关系密切的一些岛屿。从东北部芬兰以反时针方向到东南部的希腊。应该注意的是,这个限定与1967年和1976年欧洲共产主义会议不完全一致,因为这个会议邀请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而大多数分析家的看法,这两个国家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中东,不应属于西欧。当然,如同季米特里·基齐基斯在本书论希腊共产主义运动那章提出那样,似乎可以把对希腊的分析包括在内。

同而产生的具体情况也就随着千变万化，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每个西欧共产党在各自政治制度里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因之，凡是能够有意义地普及到整个地区的党的作用，大部分与形成这些作用的因素有关。就是此种普及化，值得我们首先加以注意。

## 机 会

考虑到西欧共产党所遇到的机会产生于各种不同的条件，让我们简短地查看一下从一个地方看来为最中肯条件所产生的影响。总的说来，西欧各国的民族和语言特性给共产党加以利用的机会不多，因为大多数国家在这两点上有很大的—致性。但是，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的国家：比利时、英国、马耳他、西班牙和瑞士。在比利时，佛兰芒人占总人口 55%；操法语的瓦龙人占 33%；混血儿或其他种族的人占 12%。在英国，虽然 83% 的英国人是英格兰血统，但是 9% 是苏格兰血统，5% 是威尔士血统，3% 是爱尔兰血统。马耳他居民的种族十分复杂，包括阿拉伯人、西西里人、诺尔曼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虽然西班牙居民中 70% 以上讲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但是其余部分的人操各地方言。具体地说，17% 讲卡塔兰语；7% 讲加利西亚语；2% 讲巴斯克语。在瑞士当地居民中，有 74% 德国人，20% 法国人，10% 意大利人，1% 的人说罗曼语，还有 1% 为“其他”。①\*

在这些特殊国家里，马耳他人种最杂，但对该岛的政治来说，这一点并无多大影响，而瑞士长期实行联邦政府，允许每一民族在其集中的地区享受高度的自治权。可是，其他三国在近些年来，那

---

① 见《1977年7月全国基本情报知识手册》（华盛顿中央情报局1977年8月）。这个文件是一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半年刊物。可向国会图书馆文件分发计划处查阅。

\* 百分比有误。——译者

些感到自己在中央政府中没有足够的代表的民族日益强烈要求区域自治。在比利时,这种呼声主要来自佛兰芒人;在英国和西班牙则来自少数民族。此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抵触情绪,使决心改造现存政治制度的政党中的不满现状的团体,增加了潜在的吸引力。

宗教上的不同也没有为许多共产党提供作为政治资本的根据。当然,大多数共产党在企图利用这种机会时,因为他们强烈主张无神论,要碰到许多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有少数西欧国家里,宗教冲突已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即使是潜在的)。除西德、英国、荷兰和瑞士以外,每一国家都只有一个宗教团体享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西德、荷兰和瑞士,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当地居民中有大致相等的教徒,而在英国,新教徒占支配地位,天主教构成强有力的少数。<sup>①</sup>只有在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在政治上的关键时刻,宗教作用才真正地、隐约地显示出来,即使在这种时刻,宗教问题还是和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

社会职业地位本来是共产党可以利用主要机会,如今在整个地区,其重要性越来越小。许多西欧社会一直在职业地位上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经济发展的步伐把分隔的鸿沟填平了许多,因为经济飞速发展促使这个地区社会地位的急速变动。这种变动的最突出的证据就是从事农业劳动力的百分比剧烈下降。战前资料有案可稽的十三个国家中,战争结束以来农业劳动力下降低于10%的只有英国,英国下降6%,这个数字反映出早在战前英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已经很少。至于其余各国下降的比例,比利时为12%,芬兰为37%。<sup>②</sup>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从体力工作到非体力工

① 同上页注。

② 1945年前的资料,见联合国《1948年统计年鉴》,纽约1949年,第240—251页。资料都是绝对数字,由本人算出百分比。1970年资料(即最后数字),见世界银行《1976世界年报》,巴尔的摩1976年。

作变动的数字，进一步说明社会正处于不断变动的情景。虽然上边的数字比起八个国家在战后年份里农民转为工人或白领职业的资料来，既不够全面又有点过时，那个资料指明变动率从1963—1964意大利的17.1%到1950年瑞典的27.4%。<sup>①</sup>

从另一方面看，经济条件似乎提供了许多良好的机会，在对这个问题估价时，必须把北欧，即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与南欧，即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区分开来。

北欧各国，除了爱尔兰和地处边缘的冰岛以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了高水平的工业化，恢复了战争破坏以后，这些国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又经历了重大的经济发展。结果是到七十年代中期，除了奥地利、英国、冰岛和爱尔兰外，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都达到5000—6000美元。奥地利和冰岛大约4500美元；英国3500美元多一点。只有爱尔兰数字相当低，只有2000美元出点头。<sup>②</sup>重要的是，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已经缩小。的确，有证据表明除西德外这个地区所有国家，比起其他地区经济发达的国家来，收入的分配比较平等。<sup>③</sup>最后，北欧地区许多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里建立福利国家，那些福利较落后的国家也很快采取有效措施，旨在救济处在经济上困难的人们。凡此种种，其目的都在于缩小这个地区的经济差距，或者至少能起缓和作用。事实上，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在北欧地区，有关经济上的不满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和工业化对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有害影响和福利国家的沉重负担。<sup>④</sup>

---

① 见沃·康纳：《社会主义、政治和平等》，纽约即将出版，第四章的数据的介绍和讨论。各国包括丹麦、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和西德。大部分研究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进行的。

② 联合国《1976统计年鉴》，纽约1977年，第691页。

③ 见马·索耶：《经济展望》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收入的分配”，巴黎1976年7月，第16—17页。

④ 见本书有关章节和每年出版的《世界政治手册》，由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出版。

地中海沿岸欧洲部分，情况完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几个国家刚刚开始工业化，其余国家只有局部或有限的一点工业。虽然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可是到七十年代中期，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仍然没有超出 1000—2500 美元。只有法国超过 5500 美元，达到北欧的水平。<sup>①</sup>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贫富悬殊的情况虽然有一定程度缩小，但是几乎到处仍然十分严重。法国、西班牙也许还有希腊，贫富鸿沟分外明显。<sup>②</sup> 政府没有重大的计划来改善处于经济阶梯最低级人们的景况，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有些国家富人逃税，遗产税收得低，给有钱人种种好处，使这些分裂更加扩大，因为这些情况意味着政府从所得税抽来的收入中，白领和产业工人负担了大部分份额。<sup>③</sup>

尽管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基本经济形势有所不同，但在七十年代中期两个地区经历了共同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加剧了整个西欧潜在的经济冲突。痛苦的原因是落在西欧头上的重大经济衰退——当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遇到同样的衰退——而经济衰退是跟着 1973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和随后产油国决定将原油价提高三倍来到的。根据各国官方数字，除希腊、马耳他、挪威、西班牙和瑞典外，所有西欧国家在 1975 年都出现负数的增长率。虽然每个国家在 1976 年实际上恢复增长率的正值，但是英国、芬兰、冰岛、

---

① 联合国《1976 统计年鉴》，第 691 页。

② 索耶：《收入分配》，第 16—17 页。

③ 见本书有关章节。萨比诺·阿奎维瓦与马里奥·桑图西奥：《意大利社会结构》，科罗拉多 1976 年。杰奎琳·格雷平、斯坦利·迈斯勒、吉姆·霍格兰的文章，见《华盛顿邮报》1977 年 7 月 17 日、8 月 24 日、10 月 23 日。雅典议会上希腊反对党领袖声明和政府的回答，1977 年 12 月 25 日，据“国外广播新闻节目”《每日报告：西欧》，华盛顿 1977 年 12 月 28 日。西班牙总理阿多尔福·苏亚雷斯在 1978 年 2 月 4 日报告，1978 年 2 月 5 日西班牙马德里电台报导，据“国外广播新闻节目”《每日报告：西欧》，1978 年 2 月 9 日。



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经济，依然是一片萧条景象，增长率不到2%。<sup>①</sup>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和失业达到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1975年消费品价格上涨的百分数，从西德的6%到冰岛惊人的48.9%。<sup>②</sup>从此以后，只有象瑞士、西德、英国和冰岛几个国家曾经在降低物价上升率上取得某些进展，大多数国家只能维持原状，或者眼睁睁看其飞腾，束手无策。<sup>③</sup>至于失业问题，只有卢森堡、瑞士、挪威和瑞典在1975年末失业率低于2%，而葡萄牙的失业率达到15%，居于首位。同时，大多数国家在1976年基本上保持同上年一样的数字，有的还要上升一点。只有丹麦、西德、希腊、马耳他和瑞典失业数字总算勉强地降下一点。<sup>④</sup>

西欧各国之间政治历史和传统，可以看得出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对共产党来说，既是有利条件，又起遏制作用。在好些国家里，某一阶层居民或某一地区居民具有激进的传统，这些传统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共产党的吸引。最有力的例子就是芬兰、瑞典和挪威的遥远北边“荒野”部分，冰岛东海岸和北海岸的小渔村，葡萄牙南部阿连特约农村，和意大利中部的农村地区。另外也很重要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传统。<sup>⑤</sup>

① 见联合国《1975年世界经济概览》附录第70页；《国际经济概览》，《纽约时报》，1976年1月30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77年7月。

② 《1975年世界经济概览》附录第71页。

③ 见本书有关章节；《纽约时报：国际经济概览》，1977年1月30日；《纽约时报》，1978年1月21日；《华盛顿邮报》，1977年7月16日，8月24日，10月16日，11月27日，12月20日和1978年1月13日；理查德·斯塔爾编：《1977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斯坦福1977年。

④ 联合国《每月统计公报》，纽约1977年12月；《1977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

⑤ 例如，见本书有关章节；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蒂尔斯基：《1920—1972法国共产党》；西·塔罗：《意大利和法国共产主义：适应和变化》，见布莱克默与塔罗：《意大利和法国共产主义》，第575—640页；《意大利共产主义社会学》（巴黎1974年）；罗·菲尔兹：《葡萄牙革命和武装力量运动》，纽约1976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各期，胡佛学会出版社。

新近发生的关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争论，总的说来为共产党增加了争取居民中非宗教主义者支持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在某些虔诚的教徒中得到支持。这个因素在法国影响最大，因为在法国还能感觉到传统反教权主义的残留痕迹。这种争论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对梵蒂冈飞地的存在和天主教会公然支持基督教民主党有反应，提出政教分离的要求。也许更加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宗教信仰不妨碍激进的政治观点。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出现同样的趋势。天主教会过去一向与独裁者佛朗哥和萨拉查—卡埃塔诺政权有密切的关系，这点对局势的形成有重大关系，使人们在关于宗教信仰和左派政治的共存性方面改变态度，起了实质性的作用，特别在西班牙，情况尤其明显。<sup>①</sup>

虽然今天所有西欧国家都有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一些国家中已经根深蒂固，但在另外几个国家里却并非如此，根基的深浅对本国共产党的机会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北部与欧洲地中海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区别。除了西德和冰岛之外（德国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有一段法西斯统治时期；冰岛在1944年才取得独立。），北欧各国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享受着代议制。而且有些国家实行代议制政治已有好几百年。这种代议制，一般说来能解决社会的要求和需要。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已经建立福利国家；其他地方所施行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即使不是全面，也占很大的比例。此种情况，显然限制北欧共产党可以利用的机会。

在欧洲地中海地区，民主制度实行得比较迟，而且缺乏北欧那

---

<sup>①</sup> 例如见本书有关章节；塔罗：《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主义》；《意大利共产主义社会学》；菲尔兹：《葡萄牙革命》；欧·穆哈尔—莱昂：《西班牙共产党国内国际的发展》，见《缓和时代的欧洲共产主义》，鲁多夫·特凯斯编，纽约，即将出版。

种正统性。西班牙和葡萄牙经过几十年的独裁统治，还只有在七十年代中期才实行代议制政府。希腊经历了一段军人独裁之后，1974年才恢复文官统治；无论如何，在过去五十年内，希腊经过两次长时间的军人控制，三年外国军队占领和长时间的内战。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可是在在此之前，它经过二十年法西斯统治。而且意大利战后，政府不稳定，行政机构在处理紧急问题时效率不高。马耳他从1947年实现自治，到1964年才独立，因此谈不上具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政治传统。即使就法国来说，它有强大的民主传统，可是在1958年戴高乐执政以前，吃尽了内阁不断更迭的苦头，而六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问题上，差一点爆发内战。凡此种种为南欧各国共产党提供许多潜在的机会。

所有西欧各国政治力量的庞大阵容限制各国共产党可能想做的事情，但是受到限制的程度决非每个地方都一模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时期，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在所在国里获得多数选票或多数议席。确实，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甚至没有一个共产党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或议席。（意大利共产党在1976年意大利选举中，获得34%的选票，在630个议席中得到227席。）<sup>①</sup>同时，大多数西欧国家不只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实行了多党制政治制度。<sup>②</sup>只有奥地利、英国、希腊、西德和西柏林、爱尔兰和马耳他在战后年代里，曾经由一二个非共产党的党派控制本国政治，而这种现象在希腊、西德和爱尔兰也是偶而发生的。这种西欧国家中普

<sup>①</sup> 西欧共产党竞选情况的资料，见本书有关章节；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第21—28页；《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年刊《共产党组织的世界力量》，美国国务院出版至1973年止；半年刊《全国基本情报知识手册》；国外广播节目《每日报告：西欧》，1976年6月22日和24日；霍华德·彭尼曼编：《1976年意大利议会选举投票情况》，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78年；《世界报》，巴黎1977年2月17日，4月1日，5月27日，1978年3月14日；《经济学家》，伦敦1977年6月25日；《纽约时报》，1978年3月20日。

<sup>②</sup> 所有参考资料与上条注释相同，除去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一书。

遍出现的政治力量分散的情况，为共产党提供了活动的余地。

各国共产党享受的活动余地，其程度是不一样的。从政治力量的全部阵营来看，近年来意大利的形势为意大利共产党提供了任何共产党都比不上的广阔活动余地。意共已成为意大利政界两个大党之一，这两个党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席位，如果不与其他小党联合，或它们相互合作，就不能控制政府。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形势也提供了充分活动的机会（比意大利也许小一点）。芬兰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圣马力诺共产党都是本国四大政党之一。<sup>①</sup> 在芬兰的所有政党，许多年来政治力量大致相等。以往，法国和圣马力诺各政党的力量相差悬殊，一直到1978年3月法国选举以后，那里才出现大体上与芬兰相类似的情况。事实上，法国四个政党比起芬兰四党来，如今更加牢牢地结合在一起。<sup>②</sup> 圣马力诺各党派的力量在1978年初相差还是很大，共产党的力量据第二位。冰岛人民联盟、葡萄牙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在本国都是四大政党之一，冰岛和西班牙据第三位，葡萄牙名列第四。可是所有三党与名列前茅的政党比起来，力量上还落后很多。其他地方，总的政治力量为当地共产党提供的值得重视的机会还相当有限。

决定各国共产党活动余地的，也许更重要的是该党所在具体环境中左派的地位和组成。在整个战后年代，只有在奥地利、芬兰、法兰西、西柏林、英国、马耳他、挪威、葡萄牙、圣马力诺和瑞典各国，中左派政治力量，从获得选票份额来看，或以议会席位来看，或从两者一起来看，在任何时候都占有优势。如果单看从1968到1978十年的情况，那末上列名单只能包括奥地利、西柏林、法国、英

---

① 值得注意的是，芬共通过它控制的叫作芬兰人民民主联盟的联合阵线参加竞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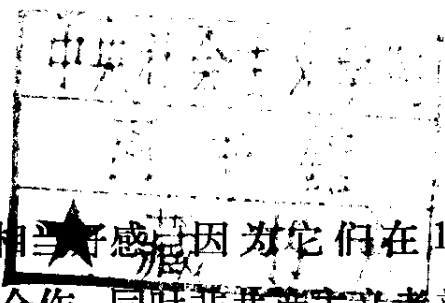
② 法国四党关系的破裂是选举中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引起的。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1978年3月14日《世界报》。决定议席的第二轮投票，各党得票相差很大，法共列第四位，见1978年3月20日《纽约时报》。

国、马耳他、葡萄牙和瑞典。在大多数情况下，左派的优势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即使在最近时期也是如此。西柏林是个例外，它在整个战后年代里一直是左派掌权。在左派掌权的时期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主要的政治力量是非共产党的社会党或工党。芬兰共产党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力量压倒本国竞争者，法国共产党在1978年前，一直占有同样的优势。至于其他共产党，只有葡萄牙共产党和圣马力诺共产党才能对社会党或工党的雄厚力量提出有力的挑战。

虽然左派在其他地方一直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上述西欧各国的共产党没有一个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而且，意大利共产党和冰岛人民联盟是上述各国中仅有的两个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部时期都是左派中的佼佼者。这两个党已经有二十多年保持这种优越的地位。在其他各国，多是社会党或工党占优势；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另外的非共产党左翼党派有时只占第二和第三位地位。近来，在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只有西班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和卢森堡共产党接近于超过其他各党成为本国主要非共产主义的对手的有力的竞争者。

若干年来，非共产主义政治力量的态度，给予西欧共产党可利用机会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sup>①</sup>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

<sup>①</sup> 关于非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对西欧共产党在历史上和在当代的态度，见本书有关章节；蒂尔斯基：《1920—1972年法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76年1、2月号，第20—47页，《1976年法国共产主义》；布莱克默和塔罗：《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唐·布莱克默：《差异中的统一：意大利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坎布里奇1968年；西·塔罗：《意大利南部农民共产主义》，纽黑文1967年；鲁·马里迪斯：《转变中的法国政治：戴高乐以后的年代》，坎布里奇1975年；弗·邦：《法国共产主义》，巴黎1969年；弗·威尔逊：《1963—1969年法国民左翼：趋向现代政党制度》，加利福尼亚1971年；《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74年5—6月号，达·塔斯奇斯：《瑞典共产党独特的任务》，第36—44页；佩·黑格：《挪威分裂的阵线》，见《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76年5、6月号，第49—53页；A.厄普顿编：《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的共产主义》，纽约1973年；理·科内尔：《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见《眺望》，伦敦1975年秋，第107—120页；沃·肯德尔：《英国共产党》，见《眺望》1974年冬，第118—131页；《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世界政治手册》。



非共产主义政治团体对共产党有相当好感，因为它们 1941—1945 年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共同合作，同时非共产主义者普遍认为，大多数共产党在战争的年代里成功地集积了力量。结果是共产党人在十个国家里——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挪威和圣马力诺——参加战后第一届政府。只有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独裁和极端反共政府掌权，共产党人成为被放逐者。

1947—1948 年冷战开始，总的情况发生急剧的变化。东欧出现一大批共产党接管的政权，特别是 1948 年捷克的政变，和共产党在许多西欧国家挑起的内部的争执，引起非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意图的疑惧。1953 年斯大林去世前在东欧发生的大叫大嚷的审判，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的叛乱，和苏联对匈牙利起义的血腥镇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感觉。在这种气氛中，大多数西欧共产党陷入了孤立境地，就不足为奇了。

只有冰岛、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共产党的情况比较好。虽然冰岛党不得不在 1947 年成为反对党，但是它保持着全国性政党的充分的信誉，在 1956 年受邀请作为次要的伙伴参加中左联合政府，这是由于它的纲领不受苏联的影响，成功地与苏共保持一定距离的结果。这个联合政府执政到 1958 年。在圣马力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一直掌权到 1957 年，即使在下台后几年中社会主义者还和共产党人团结在一起。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在 1947 年退出政府，还是与社会党结成联盟参加 1948 年议会竞选。在以后的几次选举中，社会党人虽然独自提出候选人，但是他们继续在全国范围里尊重统一行动的协议，一直到 1957 年。1957 年以后，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合作仍然是国内许多地区地方一级的惯例。

六十年代出现了新的情况，最终产生非常复杂的形势。随着

中苏冲突的加剧，日益明显地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分裂。此外，许多西欧共产党以提出新的路线，来表示维护其独立自主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另外也有一批党满足于走原有的道路。西欧非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对此种发展中的事态，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不但国与国之间不同，而且一个国家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也有区别。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个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好几个共产党，而非共产党人往往对国内这些党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

虽然西欧非共产党左派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远非一致，许多国家左派里有一部分人士表示愿意设法至少与占有优势的共产党在当地范围内进行某种方式的合作。这一部分人在某些国家里仅仅是与左派政党有关系的个人；在另外一些国家里，他们在政治组织里处于领导地位。此外，他们想象中的合作，在程度上也是有巨大差别的。

芬兰、意大利、圣马力诺和法国非共产党左派的态度，也许给予共产党最大的机会。在这几个国家里的社会党主张在全国联合政府中包括共产党。在法国，左翼激进分子与社会党人抱同样的态度。但是，法国的局势在1978年选举后可能变得动荡不定。社会党人把议会选举中的失败，公开归咎于法共在选举前对他们的攻击，至少有一部分左翼激进党人，对法共的希望完全幻灭，再也不愿与它结成同盟。

可是在另外几个地方也有值得一提的机会。在冰岛，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分子的组织，在七十年代早期主张建立包括人民联盟在内的联合政府。瑞典社会民主党从1970年执政起，到1976年下台，曾多次在议会中请求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的支持。在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69年赞成在全国第二大城市——阿尔泽特河畔埃施——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市联合政府。虽然这个行动激起197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分裂，但至少有一部分社会党

人继续支持此种做法。在挪威，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工党中持不同政见者主张与共产党成立 1973 年议会选举的竞选联盟，随后它们又说服挪共参加它们打算成立的单一政党。七十年代中期，瑞士社会民主党曾经表示愿意与瑞士劳动党或瑞士进步组织中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特定几个州的竞选。在希腊，两个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进取党和社会主义道路运动——在 1977 年 11 月议会选举前，表示希望与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和民主左联党进行联合竞选。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和他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建议组织“民主力量”统一战线，它将包括希腊共产主义运动的三个派别——希共国外派、希共国内派和民主左联党——和中间派的一些反对党。在爱尔兰，新芬党(Sinn Fein)的马克思主义派（它主张南北爱尔兰立即统一）鼓励爱尔兰共产党与它密切合作。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同意与丹麦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实行几种方式的相互协作。奥地利社会主义党和英国工党的有些党员坚持认为，应该与奥共和英共联合行动，尽管他们的党反对这种做法。

另外有两件特殊性质的事情值得注意，在葡萄牙与西班牙在七十年代后期建立议会民主制以前，这两个国家的非共产主义反对派——主要由左派团体组成，也包括几个中间派力量——把葡共和西共看作是反对两国独裁统治的潜在的同盟军。在葡萄牙 1974 年 4 月军事政变后最初阶段，它们给予新成立临时政府中的葡共代表以巨大支持。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民主制度的成功使这种态度失去存在的理由，却把其他种种考虑放在首位，因此葡共和西共所能利用的机会就大大下降了。

可以预料，西欧的中间和右翼力量，大体上说来对本国共产党的怀疑要比对左派的怀疑多得多，它们以后提供给共产党施展活动的余地也要比给予左派的小得多。但是并非说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在冰岛，进步党在七十年代早期，认为人民联盟有资格参加中



左派的联合政府。在芬兰,象中央党(原来叫农民党)这样的政党赞成芬共(精确地说是芬共人民民主联盟)加入执政的联合政府。在意大利,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待意共,新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虽然天主教民主党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们也乐于接受议会中意共的支持,借以组成受他们控制的少数派内阁。在希腊,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的基督教民主党表示,希望在1977年11月议会选举中,与希共国内派和民主左联党结成联盟;此外,K.卡拉曼利斯总理和他的右翼新民主党明确表示愿与希共国内派和统一民主左翼党合作的意向。

### 自我鉴定

为这个地区的毛主义党和托洛茨基党确定身份是非常简单的。<sup>①</sup>几乎每个西欧国家现在都有这两种类型的政党,随着六十年代早期极左派的分裂,许多国家存在着几个这样的党派。有几个这样的组织是若干年来在不同的时期从国内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有的是重新组织起来的。不论是怎样出现的,这些党的关键性任务是持久革命。在它们看来,议会和选举活动可能有利于宣传,而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地必须依靠暴力手段。更重要的是,它们认为苏共为了自私的民族利益,已经背叛世界革命事业,它们指责苏联所强调的在国际共运的堡垒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sup>①</sup> 下面章节要讨论关于自我鉴定的问题,其资料可见本书各章节;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蒂尔斯基:《1920—1972年法国共产主义》;蒂尔斯基:《1976年法国共产主义》;布莱克默和塔罗:《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彭尼曼:《选举中的意大利》;海·蒂默曼:《意大利共产党人》(巴里1974年);《共产主义问题》1975年3、4月号,第43—55页;E.穆哈尔—莱翁:《七十年代西班牙共产主义》,载于《共产主义问题》,1975年3—4月,第43—55页;作者同上,《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外的的发展》;厄普顿:《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的共产主义》;科内尔:《英国共产党》,第118—131页;年刊《共产党组织的世界力量》;年刊《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世界马克思主义回顾》和《情报手册》(见《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布拉格版,多伦多英文版);国外广播节目《每日报告:西欧》;自由欧洲研究电台(慕尼黑)关于西欧共产党背景材料报告。

指责苏联所签署的和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因此，它们找寻别的导师以发泄革命激情。托洛茨基分子重弹托洛茨基的教导：当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突破时，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保卫这个国家免遭反革命势力的复辟，而世界革命的胜利的利益必须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虽然毛主义者认识到当前西欧的政治局势与毛泽东开始掌权和他统治中国时所碰到的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可是他们把毛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的主要保卫者；由此他们把自己和毛的全球革命想象联在一起。这两种派别依旧严守列宁关于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先进分子党的理论要求，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可是，说到纪律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行动常常与他们的“原则”立场不符。

至于其他共产党，大体上说来它们的任务相当复杂。例如在国际问题上，它们觉得应该决定：完全与苏共割断关系；还是一方面坚持独立的权利，同时仍与苏共保持兄弟般的联系，或者接受苏共在世界共运中的最高地位。关于国内问题，它们必须评价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特点，决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本国是否适用，如果它们认为苏联模式不适用，把它丢弃，那末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适合的。

因为解决此种进退两难的答案不止一端，难怪会出现多种多样的派别。在1978年初，这些党派里的最大一派可以称之为“正统共产主义”。这一派目前包括奥地利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丹麦共产党、西德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sup>①</sup>、卢森堡共产党、马耳他共产党<sup>②</sup>、葡萄牙共产党、瑞士共产党和西柏林共产党。它似乎还

<sup>①</sup> 在战后大部分年代里，北爱尔兰仍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南爱尔兰共和国有单独共产党组织。但1970年两党合并为一个党。

<sup>②</sup> 根据可能得到的关于该党的情况是：马耳他共产党在1970年成立，但只有书记P.阿吉乌斯似乎是唯一公开活动的人物。1972年，他被选为书记，兼任岛上唯一大型农业组织农民合作社社长。见1973年编《共产党组织的世界力量》第25期年报（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1973年7月）。

包括希腊最大政党（希共国外派）和英国的少数党（新共产党）<sup>①</sup>、冰岛社会主义者组织、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和瑞典工人共产党。这五个国家的非毛主义和非托洛茨基主义的共产主义力量之间，若干年来争吵不已，终于引起正式决裂，建立各自的全国性政党。

所有上述政党不但与苏共和大多数执政共产党保持联系，而且尊奉苏联是国际共运的领导。不过，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和瑞士共产党并不是一直遵照严正的苏联路线的。例如它们全都谴责1968年华沙条约国对捷克的人侵，虽然奥地利和丹麦两党后来又从这个非正统的立场退了回去，奥共是在1970年受到“自治论”分子的强迫才改变立场的。比利时党几年来也表示比莫斯科更愿意同中国人和解的倾向。

至于国内问题，所有这些党如今都谈论要走“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并且同意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取得政权是各国现存条件下最好的办法。但是依照苏联对这个问题总的理论，它们不敢排除最终依靠武力的原则。它们同意莫斯科提出的观点，是不是实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根据最终分析“反革命”力量的态度和反应才能作出决定。同时，所有这些党都清楚地表示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当它们认为从长期看来不可避免的革命来到时，这种模式可以作为模仿的对象，虽然比利时党于1978年初开始批判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但是所有这些党都同意关于党的结构和工作方法的列宁主义准则。

尽管这些党基本上有亲苏倾向，但是把它们看作仅仅是苏共的代理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论它们的选择受到什么样的约束，这些党在决定它的属性时，有十分清楚的、受过锻炼的、有意识的选择能力。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党与党内外不同政见者进行的宗派斗争，证明它们能够选择不同于他们今天所设计的那种形象。至

---

<sup>①</sup> 这个党在1977年7月间成立，见《晨星报》（伦敦），1971年7月18日。

于为什么它们现在不这样做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包括这样的考虑：它们基层党员的态度，它们国内全体选民的态度，它们在各自政治环境中所碰到的竞争的性质，它们与苏联的全球力量相联合而产生的国内政治力量。最主要一点是，它们在决定本身属性时，要权衡这些问题利益关系，他们不会凭白无故屈服于压力之下。

其余六个党可能称之为“自主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一类。这六个党是法共，意共，圣马力诺共产党，占优势的英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圣马力诺共产党实际上是意共的一个分支，为叙述方便起见，可以说成五个党。

这些党都有两个自我意识：第一，虽然它们相信与兄弟党联合是有价值的，可是它们认为在决定有关自己的事务时，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容其他党派干预，特别不许苏共的干涉。第二，它们否定从苏联经验中吸取普遍模式的任何企图，它们把自己看成是把马列主义概念与本国政治和社会相结合的创造性运用者。这五党中，并非全体党员都同意这种立场，因为每个党里边都有小宗派。可是此种立场确实反映党内大多数人，特别是领导阶层的看法。

在其他问题上，五个党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看法上的差别。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公开地尽最大努力摆脱与苏共的联系，虽然它尽量避免与莫斯科正式破裂。党的发言人，著名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曾经公开谈到苏联没有民主，并把东方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他们社会主义的概念作比较。但法共和意共在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郑重。两党都谴责莫斯科压迫持不同政见者，可是两者在批评中使用的语言都经过精心选择，没有一个肯对苏联现政权的过错作全盘的审查。英国共产党和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持中间的态度，前者稍近于西班牙的立场，而后者倾向于法、意

两党的姿态。

至于外交政策方面，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清楚地显示较之英国和瑞典党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例如意共长期支持意大利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新近又提出在华沙条约的军队没有相应的减少以前，反对意大利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共主张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同时指出，如果欧洲分成两个集团的情况未变，西共不反对美国在西班牙的基地。法共对德斯坦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离开戴高乐主义的企图表示惋惜，狠狠地责备莫斯科对于这些“背离”行为所采取的亲切态度。但是，应该强调的是，这五个党的外交政策立场与苏共没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所有这些党都认为自己在发展列宁主义传统——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表面上必须这样——，但瑞典党似乎最急于对列宁遗教作“进步”的解释。确实，它1967年通过的党章，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它的战斗性，这引起维护强硬路线的党员的疑惧，认为它很快就会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但是随后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激进的整顿，阻止党性进一步受腐蚀。1977年春季亲苏派分裂出去，这个行动将对局势产生何种影响，甚至到1978年初尚不清楚。比较起来，法国党对党内生活的主张，依旧与斯大林主义的准则无甚差别。西班牙党和意大利党的观点——尤其是前者——似乎趋向瑞典党继续统一体(continuum)的主张，而英国党的观点则接近法国。

在国内政治方面，西班牙共产党表示愿以最大努力执行以西方自由传统和悠久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路线，虽然它对未来多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包含着为非社会主义者划定政治权利的明确界限。毫无疑问，西共需要别人相信它的“民主”信念，使它在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可以合法地参加政治活动，固然此种考虑使它作出此种姿态，但是至少西共书记的声明和行动，不能完全被

看成策略性的或机会主义的。意大利党热情地探讨西共这方面的做法,瑞典党也紧跟在后。产生这种情况的第一种原因是,它们所持的态度是二十多年对事物的看法逐渐发展的结果;第二,这种看法的开端至少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发生了。法国和英国两党对待这种做法的优点,迄今毫不热情。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两党都干脆表示反对。

冰岛人民联盟和两个小党(希共国内派和希腊民主左联党)可以归纳于“民族共产主义者”。三党全与苏共没有正式联系,全都不参加1976年6月欧洲共产党会议,虽然冰岛党曾经派“观察员”参加过以往几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会。对冰岛党和希腊民主左联党来说,此种袖手旁观的态度清楚表明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希共国内派则出于更加复杂的考虑。这个党只有和诸如意共和西共少数几个党有联系,可能希望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这种承认与苏共有关联,是世界共运所必要的;但莫斯科对两个东正教共产党看法不同,把希共国外派当作希腊唯一合法的共产党,而看起来似乎根本不打算改变这种立场。在此种环境下,希共国内派做出一付“民族”姿态,就有非常之必要了,这样做同时又能避免混淆希共国内派与国外派之间对国内问题上的界线。在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人民联盟、希共国内派和希腊民主左联党都显出纯正的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就冰岛党来说,它大事声张地支持二百英里捕鱼限制区,是最明显的事例;就希腊各党来说,它们建议组织“民族团结政府”,来对付许多希腊人认为的土耳其近年来造成了威胁,也表示得相当明白。

人们可能想象得到,这三党的国内“民族道路”颇有区别。从根本上说,差异在冰岛党和希腊两党之间。冰岛党说自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结成的左派联盟,它一直坚持这个基本姿态。这个党事实上是个竞选联合战线,虽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许多人的观

点骨子里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这个联盟里的共产党对联盟承担的义务,使得共产党必须接受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的合作,争取达到执政的目的。虽然这个党主张工业和其他主要经济事业为国家所有,但是总的说来它降低马列主义理论中集体主义的因素;同时它很关注有关日常生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虽然希腊民主左联党至少在外表上很象冰岛人民联盟,可是这个党和希共国内派比冰岛党保持着较多的列宁主义格调,虽则这两个希腊党在它们的声明中,都强调“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这一方面。两党似乎都选择希腊“西方化”,即仿效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共产党人不久前建立的榜样。这三个党之中,希腊两党得到许多理性的鼓舞。虽则两党在1974年议会选举中与希共国外派联合成统一左翼联盟(这是允许共产党人以其本身名义而不是以竞选组织候选人的名义公开参加竞选的战后第一次投票),但是它们在1977年11月选举中却各自提出纲领分别竞选。它们与两个小小的社会民主党和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结成联盟,叫作进步和左派力量联盟。还有,这两个党现在鼓吹与保守的新民主党(即首相卡拉曼利斯的党)相联合,建立他们所说的“民族团结政府”。

五个党——荷兰共产党、挪威共产党、意大利无产阶级联合党和无产阶级民主党、和瑞士进步组织——的性质非常特异,很难把它们归类。从1964年到1975年的十多年来,荷兰党严厉地谴责苏共领导为修正主义者,坚持走自己的自决道路。为保持其自主姿态,它几乎不同任何共产党(包括苏共)接触,同时对苏联各种作为痛加批判——从苏联愿意接受与西方搞有限的缓和,到莫斯科驱逐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任尼琴。但是,它在许多紧要的外交政策上的态度,却与苏联所作的一模一样。譬如,它鼓吹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荷兰中立化,还竭力促使它的国家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因为这个组织是由“垄断资本主义”控制的。在关

于国内事务上,它建议组织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的联盟,作为建立“真正进步的”政府的第一步,只有建成这样的政府才能促使国家走上自己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这个党紧紧守住列宁关于党的组织和工作方法的教导。它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在政治联盟或联合中保持本身独立完整的原则。

从1975年开始,荷共开始或多或少修改它的自我形象。虽然它并不放弃其自主权,但是它表示要改变与苏共完全对立的态度。的确,它现在强调它们都是总体中的一份子。依照这个道理,它降低了对苏联政策批评的调子,建立与苏共的正常关系,还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1976年6月欧洲共产党会议。此种观点的转变对国内事务方面的影响,还一点也看不出来。虽然这个党避免对苏联国内政策加以讥评,但是它坚持在决定自己内部事务时以荷兰的具体情况为首要基础。

可是,现在出现了严重问题,很难说上述这种修改能不能坚持下去。在1977年全国议会选举中,党遭到重大挫折,它的得票数从上次选举的4.5%,下降为1.73%,它在议会中的席位相应从七席减少到二席。<sup>①</sup>

这次失败引起荷共党内的激动,有些人认为党的民族主义姿态的削弱与这次失败有很大的关系。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挪威共产党坚定地保护依照本身最大利益的估价来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拒绝把苏联当作国际共运的领袖。在有关外交政策的具体问题上,它尖锐地批评苏联强迫某些党在中苏争论中站到它的一方和苏联入侵捷克。在它的立场与苏联的立场一致的问题上(譬如反对挪威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此种类似性只说明它们看法相同,并非受苏联的影响。

在国内政治方面,挪共的观点近年来有重大的改变。在六十

<sup>①</sup> 见《世界报》,1977年5月27日。



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个党越来越采取“修正主义”的姿态,展开与国内非共产主义左翼的交往,虽则它保持在党的组织上全面实行列宁主义的模式。经过1975年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正在领导党的“修正主义”力量,被剥夺权力,他们中许多人脱离这个党。就这样,挪共在国内政治路线上,现在又回到正统道路,同时重申党内生活的原则。这就是说,它牢牢坚持把苏联模式作为挪威将来的先例,而且坚守列宁主义党的准则。

意大利无产阶级联合党成立于1972年,1977年从它的队伍里分裂出去一批人,使它成为现在的模样。这个党最早成立时原是由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解散后的一部分人,和出版《宣言》有关的一些人联合组织起来的,后者在1969年攻击意共“修正主义”政策,被意共开除出去。一开始,这个组织就是不稳定的党派联盟,到1977年极大部分原来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的那部分人,又分裂出去,留下来的大多是《宣言》派的人。

因为党员的激进态度,无产阶级联合党采取好斗的政治路线。虽然它参加议会活动,在意大利议会里有四个席位,但是它绝对怀疑通过和平议会道路掌握政权的现实性。由于这个理由,它既批评意共,也批评苏联。此外,它表现高度的民族主义倾向,避免各种国际联系,虽则它的外交政策态度——就其所表示的范围——总是与苏联的外交政策相一致。就它明确表示要努力争取建立的一种社会形态来说,这种社会酷似苏联的现实,而不是意共同意的多元化的模式。大致说来,这个党象是某些个人和团体联合起来的宽松的集体那样在工作,几乎没有正式的机构,组织上的内聚力来自《宣言》和议会核心小组。

意大利无产阶级民主党在1977年方才成立。可是它的成员多有长期的革命历史,而这些成员的历史对于党目前的形象很起作用。基本上,这个党里有两部分人,即原来意大利无产阶级联

合党的维托里奥·福阿派和工人先锋党。前者最初属意大利社会主义党，随后加入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这个统一社会主义党是在1963年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与中间派天主教民主党人组织联合政府时分裂出来的。1972年7月无产阶级统一社会主义党解散后，大部分党员参加“自主主义、修正主义”的意大利共产党，有一部分人回到意大利社会主义党里去，而其余的人——主要是福阿和他的追随者——与《宣言》派携手联合，组成无产阶级联合党。1977年，福阿和他的支持者离开无产阶级联合党，与工人先锋党相接合，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党。工人先锋党由一批托洛茨基主义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在1968年建立，是无产阶级联合党在1976年议会选举时建立左派联盟的一个伙伴。

象无产阶级联合党一样，无产阶级民主党鼓吹战斗精神。虽然它进行竞选，甚至在议会里有两个席位，但是它对于使用和平议会的手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此它谴责意共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制造幻想。总的说来，无产阶级民主党有意把它的精力用于国内事务。它所明确表示的外交政策上立场，和苏联极为相似。但是在表面上看不出它和国外的党派有什么联系。从它号召“真正的民主”看来，它希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控制的社会，不会给其他社会阶层有活动的余地。同时，它赞成工人的自治。至于党的内部生活，由于它组织构成上的复杂性，使它反对严肃的等级制度和高度的纪律性。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民主党在意大利的某些地区工人运动中确实有相当坚强的党的组织。

瑞士进步组织也是新近才成立的，它的名称明显地说明它对自己的期望。它是在1972年一次地方性州县团体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在这些团体中历史最长的成立于1968年。这些团体成员主要是青年，他们不满瑞士正统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它过份小心翼翼而又十分刻板。他们鼓吹战斗姿态，虽然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反

对过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可能性。

自从它成立以来,这个党几乎完全集中力量于本地、地区和国内的问题(按照这个次序)。除非必要,否则不过问对外政策问题。而在对外交问题提出见解时,基本上附和苏联的立场,可是它与苏共没有联系,更没有正式的隶属关系。而且,它既不同意也不责备那些“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共产党,尤其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党的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政策。它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策略,只和那些衰老的,上层机构臃肿的党有关。

依照把重点放在当地环境的方针,这个党保持着以几个特定的城市和州县为基地的、团体间相当松弛的并列组织系统。它没有真正全国性的结构或机构。同时,它准备对政府施加全国范围的压力,要求制订某种至少它认为“进步”的方案。

最后的一个党,芬兰共产党,正处在一个到处闹分裂的时刻,正经历着明显的宗派主义的痛苦。自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控制这个党的人虽然赞成与苏共保持亲密关系,但坚决主张制订和执行自己的政策。它不但批评莫斯科在国际上的某些行动,特别是1968年华沙条约国入侵捷克,而且它也在国内政治方面制定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具体地说——除了其他问题外——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多元化,同时希望在“民主集中制”上多强调“民主”,少强调“集中”。但是,在党内尚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持着正统的共产主义倾向。这一部分人承认苏联是国际共运的领袖,虽然它接受通过和平道路取得政权是当前芬兰唯一可行的选择,可是它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也是芬兰最终必须采取的方式。

## 策 略

政治策略的制订要求西欧共产党对一大堆特殊问题提出自己

的意见，而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是应该走什么道路去取得政权。所有共产党都负有彻底改造本国的社会和政体的责任。但是要实行此种改造，党必须用某种办法取得政权。因此，怎样取得政权成为主要关键。第二个问题应该与谁联合。现阶段没有一个共产党有足够力量单独执政。所以每一个党必须决定在战斗中采取“光荣的孤立”呢，还是寻求同盟？如果需要同盟，它就得找出它欢喜的同盟者，同时订立合作的条件。

在这两个概括性的问题上，西欧共产党在1978年初表现出参差不一的立场。<sup>①</sup>在关于取得政权问题上，毛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认为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法，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愿放弃政权，因此必须用武力来夺取。这些党之所以参加议会政治活动，其目的在散布革命思想，激发人民革命热情。虽然各党之间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全都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其中只有少数党派认为，目前情况适合进行暴力行动。这些少数党派中有一部分人提出革命突变的先决条件已经存在；另外一些人则固执地认为，恐怖行动有助于创造这种先决条件。抱此种主张的团体主要的有西班牙阿斯卡蒂苏纳的欧斯卡迪巴斯克分离派，五月反法西斯抵抗组织；葡萄牙的无产阶级党改组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党——革命党人

---

<sup>①</sup> 随后的分析见本书有关章节；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布莱克默和塔罗：《法国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蒂尔斯基：《1920—1972年法国共产主义》；蒂尔斯基：《1976年法国共产主义》；让·卡纳伯：《法国共产党人的新政策？》，见《外事》1977年1月号，第280—294页；蒂默曼：《意大利共产党》；彭尼曼：《选举中的意大利》；布莱克默：《意大利共产主义：七十年代的战略》，见《共产主义问题》1972年5—6月号，第41—56页；S. 塞雷：《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问题》，见《外事》1976年7月号，第691—707页；穆哈尔—莱昂：《七十年代西班牙共产主义》和《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外的的发展》；厄普顿：《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的共产主义》；科内尔：《斯堪的纳维亚的共产主义》；塔斯奇斯：《瑞典共产党的独特任务》；肯德尔：《英国共产党》；《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和它的《新闻简报》；年刊《国际共产主义事务知识手册》；《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力量》1973年版；近年国外广播节目《每日报告：西欧》；《自由欧洲研究广播》中有关西欧共产党背景材料报告。特别是皮·哈斯纳的报告。

旅；意大利的红色旅，无产阶级武装核心；和德国的斯巴达克同盟，第二次六月运动，革命小组。大多数毛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看法与上述不同，他们认为群众尚未充分觉醒，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们的主要努力的方向在于提高群众的觉悟。

其余各党都接受可能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的看法，它们知道在目前西欧形势下，议会道路是达到目的的可靠的方法。但是在这之外，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正统共产党坚持议会道路仅仅是西欧当前条件下最为可取的办法，并非唯一可行的办法。倘若“资产阶级”拒绝贯彻民主程序，想方设法阻止共产党人取得政权，这些党认为，那时候“反暴力”的行动可能是必要的。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议会道路是借以保持全部选择权利的两面下赌注的办法。

一般说来，那些闹独立性的党，如荷兰共产党、挪威共产党、意大利无产阶级联合党和无产阶级民主党以及瑞士进步组织都采取上述正统共产党的立场。但是其中意大利和瑞士三党要比荷兰和挪威两党和其他正统共产党表现出比较烈强的好斗倾向。就是说，它们比另一些对议会道路的最终功效似乎更少信心。

六个“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包括圣马力诺党），三个“民族主义共产党”和至少还有一个患“分裂症”的芬兰党内的多数派正式同意：在西欧，议会道路是取得政权的正统道路。同时，一旦取得政权，其所采取的立场会对它们产生怎样的约束力，这一点上它们的观点分歧很大。在这个问题上法共持有极端的立场。虽然它口头上接受可以由社会主义力量和非社会主义力量轮流执政，可是它又强调采取迅速行动使“革命”不可逆转的重要性。而且，一旦“革命”不能逆转，它必然会大大限制非社会主义力量活动的自由。总之，它预示很快就要剥夺政治自由。

意大利党提出了另一个极端的非常明确的声明。意共从阿连

德总统统治下的智利吸取教训，它坚决认为，仅仅从数字上的多数取得政权，不足以保证“革命”的不可逆转性。只有在大多数群众都同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人心所向的时候，才能确保“革命”的成果。要达到这样的社会一致，要求有一种渐进主义的态度，要以更大的努力建立信心。根据这种观点，这个党不但明确地接受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轮流掌权的原则，而且鼓吹社会主义政党与非社会主义政党在政府中合作。此外，它还同意在获得权力以后长期保持民主政治权利不受遏制的必要。这样做，它虽然无疑会遭到暂时失去政权的难受，但是它认为这样的局面比国家日益两极分化，或许因此产生“反革命”政变的情况要好得多。

应该指出，两党在关于走向社会主义方法上的分歧，并不一定涉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两者都预期本国社会和政治生活将出现重大改组，有迹象说明，两者都相信最终至少将限制国民中的某些分子的政治权利。只是两国的限制比较起来其程度相差如何，目前尚不清楚。主要由于意大利党主张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长期的过渡时期，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十分含糊。

总的说来，其他共产党似乎赞同意共的主张，不赞同法共的主张。英共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也许是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分享政权的机会非常渺茫的缘故。但是，其他党对它们的见解表示得清清楚楚。真的，“民族共产主义”冰岛党和“患分裂症”的芬兰党近几年来以具体的行动表示它们的观点：参加政府的多数，在失去政权时，成为反对党。

在同盟问题上，有几个党采取“有原则”的宗派主义立场。就是说，他们不企求与任何派系协商，宁愿独自单干，走独自的道路。抱这种态度的包括毛主义组织和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以及奥地利、英国和瑞典的正统党，也可能包括马耳他和西班牙的正统组织。但是直到1978年初，没有足够的消息使我们能对最后两个党作出

明确的判断。

虽然大多数毛主义和托洛茨基组织不愿与人协作，宁可“光荣孤立”，但是它们中有少数团体表示愿意彼此协作，或者甚至愿意与持有极左观点的其他组织协作。例如，两个法国托洛茨基党——工人斗争党和共产主义同盟——合力参加法国 1973 年议会选举的竞选。此种合作的基础在于对革命总目标的一致，而这点反过来对组成适合的同盟起限制作用。总之这些组织与那些不抱同样信念的党派进行合作不感兴趣。

意大利两个和瑞士一个闹独立性的党在缔结同盟上抱有非常特别的见解。自从意大利无产阶级联合党和无产阶级民主党在 1977 年成为如今这个样子以来，两党都坚持无产阶级联合党的母党所批准的路线，虽然这个深受分裂之苦的无产阶级联合党似乎比无产阶级民主党承担更强烈的义务。母党主张左派广泛的联盟，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党在内，但是它与意共和社会主义党在目标和策略上一直意见分歧。因此，在全国范围上联合党基本上与其他极左翼分子密切合作。例如，在 1976 年议会选举上它与三个这种团体进行联合。但是，1975 年以后，联合党曾与意共和社会主义党在组织某几个地方左派政府时进行合作。瑞士进步组织实行同样的“二级”的方针。

其余各党，大部分主张与除毛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外的所有国内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在某种情况下，其范围仅指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包括三个党，甚至还要更多些。主张这样联合的共产党有：丹麦、西德、西柏林、希腊、冰岛、卢森堡、葡萄牙和瑞士的正统共产党；英国、西班牙和瑞典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和闹独立性的挪威党。但是，应该注意的是，1977 年英国党和瑞典党的分裂，使分裂出去的党组织实际上不大愿意与新的正统团体以及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团体进行密

切合作。此外，西班牙“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出于纯粹策略上原因，表示愿意与非社会主义中心的一部分党派以及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团体，在许多事务上进行协作。

这许多共产党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下合作。虽则它们明明知道“社会主义”的定义，各党解释不同，但是它们相信，存在着共同目标的充份基础，足以制订出至少在短时期内可以作为统一行动基础的纲领。它们宁愿提出别的党一定会接受的最低标准，不愿在协作条件上讨价还价，看起来它们似乎希望把别的党派吸引过来，不乐意去迎合别的党派。

比利时正统共产党、闹独立性的荷兰党和法国“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支持左派联合，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除了毛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外，全都可以接收，但是这三个党对于怎样才是合意的协作者这个问题上，看法有所不同。虽然三党都提出包括本国的社会主义党或者工党，但是比利时和荷兰党要在同盟者之间包括不同的非社会主义力量，其范围要比法国的主张更为广泛。比利时党希望联合国内保守的天主教党中的左翼分子；荷兰则集中力量联合如左翼激进党人这种左翼世俗团体。

这三个党看问题都使用法国的观点，即合作的目的在于建立“先进的民主制”。这种说法暗示要实行经济、社会和政体方面重大的结构改革。但是并不意味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承认这条改革路线，成为参加联盟的基础。但是这三个党都知道，参加联盟的党派之间，观点差距颇大，因之对于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必然有不同的意见，它们已经表示愿意谈判协商一个眼前采用的改革纲领，并表示只要这个纲领在开始时不遇到挫折，肯定能继续进行下去，打开将来前进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法共特别坚持此种附带条款。在这一点尽管坚持得很固执，但这几个党提出的协作的总的



条件,比起要求单一的“社会主义”联盟的那几个党提出的条件,要宽松得多。

害“分裂症”的芬兰党和冰岛的“民族共产主义”党选择某些形式的中左联合。它们都不准毛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参加联盟,两者都竭力宣扬联盟是左派的结合。可是在联盟的成分上,两者在许多地方似乎都相当讲究实际。确实,芬兰党曾几次与各种党派联合,组织过政府。

这两党的情况是,由共产党人制订的合作条件有点左倾,但也并没有提到要进行全面的机构改革。事实上,它们一般只做特定的具体的事务,不涉及总的全面的纲领。这两党在组织联盟时所持的态度,确实非常接近于高度的实用主义。

意大利和圣马力诺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与希腊的“民族共产主义”党同意“民族联合”。在意大利,包括六个“宪法范围里”的“反法西斯”党派——共产党、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和共和党。当然,在这些党派中以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最为重要。在圣马力诺,协作也包括除了极左和极右派之外的所有党派,虽然极左和极右分子似乎不多。同样,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也是联盟的主力。在希腊,情况稍为复杂。希共国内派和民主左联党主张“民族联合”,它们实际上在1977年11月议会投票时,与两个较小的社会民主党和一个小小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组成竞选联盟。它们似乎非常希望与总理卡拉曼利斯领导的保守的新民主党建立合作关系。的确,它们和正统共产党在绝大部分问题上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论,而且它们还因为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指责它们向卡拉曼利斯和他的支持者阿谀奉迎,和它争吵。

如果这四个党希望联合起来结成同盟,需要在应付某些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的根本步调上取得一致。谈到意大利和圣马力

诺的情况，这两国必须解决近年来由于现代化的影响在两国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如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国家机关办事缺乏效率，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的问题。至于希腊，最紧要的问题是自从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以来两国间持久的冲突。看来，这些党提出的联合条件，是它们提出的最低要求。

### 各党作用的比较

如本文开始时已经指出，统观西欧共产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机会、自我鉴定和策略，相差很大，所以每一个党在其各自的政治制度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独特的。虽然，人们在各党所起作用的某些方面，看出有点共同的地方或一般的模式。各党作用的大小就要看党对其本国的特定的政治制度机能所作的贡献和党在那个政治制度中所发挥的影响。<sup>①</sup>

关于前者（即所作的贡献）可以断定的是，今天几乎所有的党——除了毛主义和托洛茨基组织依靠暴力行动外——都是根据本国政治制度的法律行事的。<sup>②</sup> 接受合法的地位，在现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以公开的努力进行政治工作——不管这个党对现制度有什么样的长远意图——，所有这些无疑有助于加强下面主张的份量：“这个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它不很严厉也不很暴虐，没有必要把它全部摧毁。”随着近几年议会民主遍及整个西欧，散布在各处的

---

<sup>①</sup> 随后的讨论引自本书有关章节；布莱克默和塔罗：《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蒂尔斯基：《1920—1972年法国共产主义》；蒂尔斯基：《1976年法国共产主义》；厄普顿：《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的共产主义》；科内尔：《斯堪的纳维亚的共产主义》；塔斯基奇：《瑞典共产党的独特任务》；黑格：《挪威分裂的阵线》；肯德尔：《英国共产党》；近年国外广播节目《每日报告：西欧》；《国际共产党事务年报》。

<sup>②</sup> 以下几段分析的概念梗概，我应感谢乔·拉沃。见他的《法国共产党、国家和革命：对党的政策、通讯和民众文化的分析》。此文在布莱克默和塔罗：《法国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第88—139页。我和拉沃不一样，我不争辩说列举对特定政治制度的贡献是“极端需要”的。我相信不以贡献的记录作判断，也可能谈到这些贡献。

非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绝大多数都具有这样社会地位,进行这样的工作。

当然,这些党作为其本国制度下的合法团体,其程度是有区别的。譬如说,那些毛主义党和托洛茨基党,它们主张暴力,即使眼前并没有施行暴力,它们没有象那些认为通过议会道路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正统共产党和闹独立性共产党那样合法的力量。由于同样原因,正统的和闹独立性的共产党比起那些同意议会道路是西欧走向社会主义唯一真正道路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各党来,所展施的影响又要少得多。自从六十年代以后,应该强调的是,后面两种类型党的数量,有显著的增加。

第二,大多数共产党至少在其本国的一部分民众中起“讲坛”作用。冰岛的“民族共产主义”党,意大利、法国和圣马力诺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和葡萄牙正统共产党,在本国议会中都有一定数量的代表,不辞辛苦地保护它们全体选民的利益。此外,希腊的“民族共产主义”党,西班牙和瑞典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意大利、荷兰和瑞士的闹独立性的党,比利时、希腊、卢森堡、丹麦和瑞士的正统共产党,和不多几个毛主义和托洛茨基团体,在它们本国的议会里有少数代表;他们也满怀热情为支持他们的选民说话。奥地利和西德的正统共产党在全国议会里没有代表,但是在本国一些市议会里控制着几个席位。这些席位使两党至少有机会在有关地方事务上作为居民中一部分人的发言人。英国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虽然没有任何政府代表,但通过它在某些职工会中的有力地位,确实发挥一定的“讲坛”作用。至于其他各党,它们的活动与群众基础之间的联系如此无力,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只有闹独立性的挪威党,西德、英国、冰岛、爱尔兰、马耳他和西班牙的正统共产党,以及极大多数毛主义和托洛茨基团体。

第三，所有共产党都激烈批判本国的政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有助于保证对制度的原则作不断的检查，并产生压力去改正不足和不均的地方。但是有几个党在这种“反对派”任务中所发挥的效果比其他一些党的大，例如，许多年来，意大利、法国、圣马力诺、冰岛和芬兰占优势地位的共产党是它们本国政治制度的首要批评者（不管它们有没有负有某种形式的政府责任），而它们在当地政治范围中的影响，引起别人注意它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仅足以削弱它们在群众中的号召力。虽然法共在1978年3月选举中失去作为批评者的突出地位，但是它在批评力量方面仍保持稍次于社会党的地位。葡萄牙建立议会民主制后，那里的正统共产党终于参加了担任主要批评的特别团体。西班牙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渴望得到同样的地位，但是1977年6月四十一年来第一次全国选举的结果，粉碎了它在这方面的希望。成为次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而社会主义工人党一直自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党，使用革命的词藻。所有其他党只能在政治舞台的边线外发挥它们或多或少的作用。它们或者在其他激进力量面前相形见绌，或者缺乏充份的政治分量来使别人聆听自己的意见。

在影响方面，现在西欧共产党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数字最大，它们工作在本国政治制度的边缘上，对政治只有微小的影响。这些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政治，它们施加影响的办法如暗杀国内政治人物，在市议会里发动为工人争取更多住房的运动，鼓动重建高等教育机构等等。这一部分政党包括所有毛主义党和托洛茨基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西德、西柏林、英国、希腊、冰岛、爱尔兰、马耳他、瑞典和瑞士的正统共产党，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的闹独立性共产党，瑞典“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和希腊“民族共产主义”党。也许同样重要的是，上述这一部分党（除瑞典“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外）已有许多年了——或者从成立时起

——就是这个样子。

第二种类型的党缺乏充分的群众基础，以致没有真正的政治影响，但是因为它在某些社会和政治机构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对国内政治还能起一定作用。在1978年初，这种类型的党包括英国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和卢森堡的正统党。可是从1970年到1976年，它还包括瑞典的“自主主义的、修正主义”党。英国党因为它在工会中的力量所以属于这一类型。它的领导人在近年来工会与政府的对抗中，表现十分突出。卢森堡党的力量基础在工会和市一级政府里。譬如，它的一位书记处成员是全国第二大城市阿尔泽特河畔埃施的市长。瑞典“自主主义的、修正主义”共产党在当权的社会民主党1976年议会选举失败以前，有六年之久在议会里在政府和较保守的反对党之间保持权力平衡。在1973—1976期间，社会民主党依靠共产党选票的情况达到高峰。

第三种类型的党在全国政治舞台中心发挥作用，有助于形成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动力。所有这些党得到相当数量的群众的支持，而此种支持使它们在议会里有相当数量的席位。这些党还在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机构里起作用，如在工会、居民区和职业组织、地方和市政府里等等。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实行与国内政治界的其他力量联合（至少曾经联合过）借以扩大全面影响。在1978年初，这个类型的党包括冰岛的“民族共产主义”党，法国、西班牙和圣马力诺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和葡萄牙的正统共产党。在1976年前，它还包括意大利“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在最近几年中，有时候也包括芬兰的“患分裂症的”党。

最后一个类型的党对于政府政策的制订有直接发言权，虽然它还谈不上有控制政府不受挑战的地位。如在1978年初，意大利的“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给天主教民主党非常关键性的支持，使其能以少数派组成政府，在政府提出重要问题时，都和它商议；虽

则它没有参加政府，也没有担负正式的政府职务。芬兰党的情况有点不同，它在内阁中有职位，还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小伙伴。目前这个类型还只有意、芬两党。但是在七十年代初，冰岛的“民族共产主义”党也属于这个类型，如果追溯到五十年代后期，现在圣马力诺的“自主主义的、修正主义”党也一度有条件列入这个范围。

在上述分析中，有两方面值得特别重视。首先是，这些党所有各种贡献，和上面提到所有影响，均以民主议会政治制度的存在为前提。就是此种制度能够提供机会让本国共产党公开活动，它同时建立“竞赛的规则”，对于这种“规则”，每个党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应。这种党的作用与民主议会制度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产生几个重要的必然的结果。一方面，说欧洲共产主义具有何种明确的形式——或用新近流行的名词 Eurocommunism（欧共）——是重大的曲解。今天使西欧共产主义与其他许多形式共产主义有所差别的是它的特殊政治环境，和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对有关各党的影响。此种环境与影响不仅仅在西欧各国存在。人们可以在其他国家，譬如说日本和委内瑞拉发现经历上和作用上与欧洲共产主义相类似的共产党。由于同样原因，有几个西欧国家，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缺乏牢固的民主议会统治传统，这些国家现存的政治制度，很难说是明确的“欧洲”搏动的旁支。另一方面，任何西欧国家民主议会制度的消失，几乎不可避免地使那里共产党的作用发生深刻的变化。至于变化将是什么性质，当然要完全根据新出现制度的性质。

其次，虽然这些共产党的系统的贡献和影响已经在变化，尤其在最近几年里，但这种变化的性质是逐步的和逐渐增加的，并不急速和显著。例如，在整个战后期间，没有一个党对本国政治制度的态度，从主张实行暴力转变为严格遵守法律，或者反之。同样，也没有一个党在短短几年中，从默默无闻的境地一下子成了声望卓

著,受到普遍拥护的党;至少在以往二十年内更没有一个党遭到声誉突然堕地的命运。

## 展 望

到这里,上述各节已经多多少少对现存西欧政治制度进行了探讨。现在转过来扼要思考一下,各共产党在本国政治制度里所起作用的远景。有必要了解当今这些国家的制度并不全是很稳固的。的确,有几个国家,民主制度还建立不久,在本国的土壤里扎根不深。加之,在不少国家里有确切证据,出现了政治动荡分化的社会基础,而这种情况反过来能促使那里政府努力改良国内的政治制度。<sup>①</sup>如果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发生重大的制度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定剧烈地改变共产党在那些特殊制度中的作用。当然,共产党的新作用的性质将根据出现的政治制度的形式而变更。

这种发展会不会出现,主要要看西欧各国非共产党力量对面临的具体形势作出怎样的反应,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共产党似乎不会自己着手去根本改变当地政治制度的性质。虽然意大利“自主主义、修正主义”党已经在决定政府政策上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甚至在今后几年内可能进入内阁,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总阵容对激进的倡议有巨大的抑制能力。除了共产党以外,别的左派力量薄弱,而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中间和右派力量仍旧相当强大。冰岛的情况也差不多。芬兰的左派较之意大利和冰岛具有大得多的影响,社会民主党处于优势地位,而它们把中间党派看作主要的

---

<sup>①</sup> 产生政治改组的社会基础问题,已有几个全国民意研究文件。关于这种资料的有趣描述,可参考罗·英格尔哈特:《欧洲无声革命:工业化后社会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变化》,见《美国政治科学周报》,1971年12月,第991—1017页;罗·英格尔哈特更详细的著作:《无声革命:西方公众中变化着的价值和政治风格》,普林斯顿1977年。但是应该指出英格尔哈特的结论所暗示的,比资料本身所表明更悲观。

协作者。法国的左派在 1978 年 3 月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以少数票之差,未能参加联合政府,而在第二轮投票中远不能得到议会多数席位。此外,法共不但在选举中把左派第一大党的地位输给社会党,而且与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党人在选举前几个月中争吵不休,使人怀疑它有没有能力与这些非共产党力量保持长期联合。的确,有几个左翼激进党人已经在 1978 年 3 月下旬表示转向中间派的意向。在葡萄牙,左派掌握大部分议席,但是,社会党已经反对与正统的葡共合作,它首先愿意成立少数派内阁,其次宁愿与中间派社会民主中央党联合。西班牙 1977 年 6 月选举中,左派只得到少数选票,少数议席,而西共在选票和议席上都远远落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后面。至于其他共产党,国内的形势更难使它们获得单独进行重大制度改变的机会。

西欧政治制度不会出现意义深长的改革,这个地区共产党的作用仍旧是对社会作某些改良,但是此种改良大概符合最近二三十年来盛行的模式。也就是说,此种改良的性质将是细微的逐步的。



## 一、意大利：意共的影响不断增长\*

贾科莫·萨尼

1975年6月：意大利共产党在全国性省区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绩。1976年6月：议会选举，共产党议员名额增加了48人，共产党参议员名额增加了23人。<sup>①</sup>1976年8月：在对新政府信任问题进行表决时，共产党议员弃权，从而使安德雷奥蒂领导的天民党人少数派政府得以就职。1977年7月：经过数月的谈判，意共与天民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和自由党，就一项有限的政策纲领签订协议。1977年9月：约有三万名加入激进左翼组织的青年，高喊着与意共公然为敌的口号，在意大利共产主义的“橱窗”——波洛尼亚城的街道上举行游行。<sup>②</sup>

---

\* 本文的部分研究是在1976—77学年，依靠古根海姆研究金进行的。阿尔贝托·马拉迪和焦万尼·萨托里等同事为作者提供了1975年意大利选举的调查报告，哥伦布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政治研测实验室和电子计算机中心也提供了协助，《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允许我复制《意共处在开始阶段》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1976年11—12月，第27—51页）中的图表，谨在此一并感谢。

① 这些数字包括列入意共名单参加竞选的独立候选人所获得的席位。

② 这次游行是意共与一些激进左翼组织之间对峙的延续。1977年3月，激进左翼分子已在该城发动过猛烈的示威运动。示威者指责意共与警方勾结镇压运动；意共则严厉谴责参与抢劫和政治暴力行为的人。有关激进左派对三月事件的解释，请查阅集体编写的《1977年3月的波洛尼亚》，维罗纳城1977年。关于意共如何估计三月事件及由这次“运动”所提出的各项问题，请看安杰利·博拉菲和保洛·法朗基合写的《武装斗争的党》；恩利哥·门杜尼的《学生与民主》；以及《波洛尼亚市长雷纳托·赞盖里访问记》，——以上均见于《再生》周刊（罗马），1977年3月18日。也请阅伦佐·因贝尼的《危险在哪里？》以及比亚焦·德·乔万尼：《对新的政治鼓动者的探讨》，载《再生》周刊1977年3月25日，法比奥·穆西的《波洛尼亚会议上的各种意见和言论》以及伦佐·因贝尼：《市民和共产党人既得到教训又提供教训》，《再生》周刊，1977年9月30日。

1978年1月：意共指出，在对关键性问题进行表决时，将不再用弃权的办法间接支持安德雷奥蒂政府，至使后者辞职。1978年3月：意共与天民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组成仍然是由安德雷奥蒂为首的天民党少数派新政府达成协议，从而成为正式的议会多数派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标志着近年来意大利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兴盛时期。意共党内发生的变化以及外界对意共的态度，不仅在意大利并且也在国外引起了观察者和政治家们的注意。这样意大利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实验，其意义可能远远超出政治舞台的界限。甚至可能影响其它方面的发展，影响国际上的力量对比。

由于政治形势捉摸不定、动荡多变，因此对当前发生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对未来的前景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推测。有些人认为，意共党内的变化和意共在政府事务中的新作用是一种正面的发展，将会加强民主左翼力量，并有益于意大利社会；另一些人认为，最近几年来的发展情况标志着一种危险的转折点，是政治力量改组的开始，将会威胁意大利民主的生存；而又有一些人则认为意共的战略和表现过于随和迁就，这意味着意共放弃了它过去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虽然持不同政见的评论家们就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十分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分析大多涉及到三个重要的相互有关的方面：(1)在七十年代中期，人民对意共的支持增加了，随之出现了各种因素；(2)经过三十年来不间断的对立之后，促使意共支持天民党政府的统战战略和具体的条件；(3)意共在意大利左翼力量内部的作用发生变化，在这支左翼队伍中，各派力量崛起向意共的传统统治地位进行挑战。

本章将专谈问题的这三个重要方面，介绍意共在群众中的发展，并且通过近十年来对意大利社会和文化发生影响的广泛变化

来解释这种发展。接着将探讨意共所制定和执行的“历史性妥协战略”，并从意共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一角度来检验“历史性妥协战略”的效果。最后还将简略地考察近来的变化给意共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困难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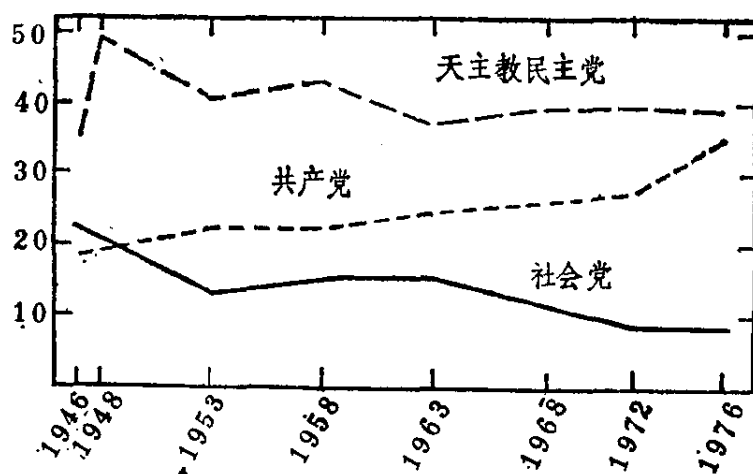


图1 1946—76年意大利三大政党选民数字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1946—72年的数字，根据马里奥·卡恰利和阿尔贝托·斯普雷阿非科合编的《一个正在经受考验的政治制度》，波洛尼亚1975年，第61页，表7。1976年的数字，根据意大利报刊发表的选举结果，见《晚邮报》，米兰1976年6月23日。图中各点表示1946年立宪议会选举和以后各届下院选举中各党所获选票总数的百分比。各次选举中选民享有最广泛的参政权。1948年，意共和社会党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得总票数的31%。1968年，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统一社会党的名义联合，获14.5%的选票。

### 发展的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意大利恢复民主政治生活时，意共曾经是继天民党和社会党之后的第三大党，在1946年6月2日选举立宪会议的普选中，得到18.9%的选票(见图1)。然而，党的势力在意大利的不同地区有很大的不同(见图2)。一般说来，党的势力在中部地区，尤其在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和托斯卡纳，远远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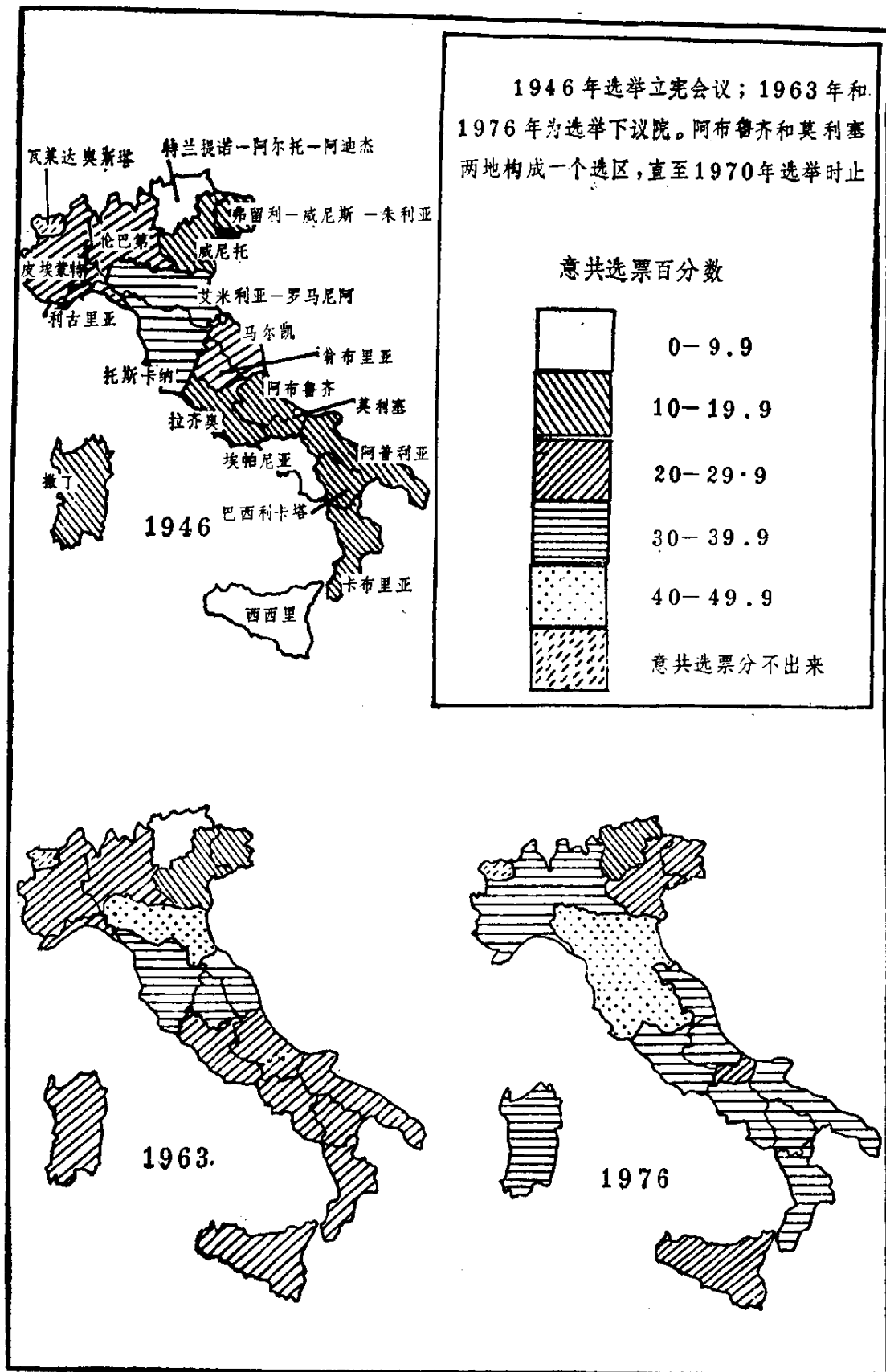


图 2 1946、1963 和 1976 年意大利共产党的选民数字\*

于东北部和南部，而在西北部的工业化地区则处于中间状态。随后的三十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6年6月20日的议会选举中，意共得到了全民选票的34.4%（见图1）。此外，意共还在各地区得到重大的发展、巩固，扩大了原有的据点，并成功地渗入到其他地区（见图2）。虽然力量分布仍有某种不均匀的状况，但是相互之间的悬殊比前几年明显地减少了。选民基础的扩大，使意共今天在地方政治领域的很多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包括七个省以及所有的大城市（都灵、米兰、威尼斯、波洛尼亚、热那亚、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三十五个省以及无数个小的行政区。<sup>①</sup>

对意共选民力量的增长模式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得出下列结论。第一，意共力量的增长是一个稳步渐进的过程（图1）。到七十年代中期的选举为止，意共的基础一直是发展得较慢，未见任何突然的扩张。这种全面性的增长表现为一系列在选举中逐渐出现的微小增加，而不是猛然的激增，随后又被急促的衰落所抵消。诚然，在某些地区，意共偶而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一般说来遇到的挫折并不大，嗣后在下届选举中又得到了补偿。<sup>②</sup>

第二，意共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了自己的根据地。特别是在党的势力起初较弱的地区，发展尤为明显，如（图1）。在南部和东北部发展较快，获得的选票为原先的两倍甚至三倍。与此同时，它在原先的根据地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如1976年在艾米利亚—罗马尼阿，意共得到大多数选票，占48.5%，在托斯卡纳得到47.5%，在翁布里亚得到47.3%。

---

<sup>①</sup> 关于1975年地区、省、行政区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中的变化，详情请见《1976年意共年鉴》，罗马，1976年1月，178—181页。

<sup>②</sup> 分析接连几届的区级选举结果，可以看出1946—1976年期间，连续失败两次的只有三个地区：利古里亚（1946—1953，1953—1958），巴西利卡塔（1963—1968，1968—1972）以及西西里（1963—1968，1968—1972）。

表 1 1946—76 年意共地区选民数的增长

地 区	1946 年和 1976 年意 共选票百分数的差别	增长率(百分数)
西 北		
皮埃蒙特	+14.6	70.2
利古里亚	+10.7	37.7
伦巴第	+11.5	57.2
东 北		
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	+5.1	63.0
威尼托	+10.1	73.7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	+13.4	101.5
中 部		
艾米利亚—罗马尼阿	+11.0	29.3
马尔凯	+18.1	83.0
托斯卡纳	+13.9	41.4
翁布里亚	+19.3	68.9
南 部		
拉齐奥	+21.8	154.6
坎伯尼亚	+24.9	336.5
阿布鲁齐—莫利塞 <sup>a</sup>	+23.0	227.7
普利亚	+17.0	115.6
巴西利卡塔	+20.3	156.0
卡拉布里亚	+20.8	170.5
西西里	+19.6	248.1
撒 丁	+23.1	184.8

a 1976 年阿布鲁齐和莫利塞已分成两个选区，但在 1946 年时，是一个选区。本表为便于分析起见，仍作一个选区处理。

资料来源：作者的统计系根据乔尔焦·加里编的《意大利选民态度》，波洛尼亚 1968 年，第 334 页；以及主要根据《再生》周刊(罗马)，1976 年 6 月 2 日，第 8 页中发表的 1976 年 6 月选举结果的正式报告。

第三，意共的发展并不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正如帕尔米

奥·陶里亚蒂在战后不久提出“新党”<sup>①</sup>战略时所预见的那样，意共成功地得到了广大社会阶层的选民的支持。虽然对意共选民的社会成份进行准确的估计是有困难的，但是根据调查和总的情况来看，意共拥有极其广泛支持者。主要是在较贫苦的社会阶层，在那些按照传统观念认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其他社会阶层，即“白领”工人、教员、店主、手工艺工人中间，等等。<sup>②</sup>意共所得的选票数也是很高的。这样，从其支持者的社会成分来看，意共的形象跟意大利的另一大党——天民党就相差无几了。而意共的形象跟作为整体的选民是十分接近的（见图 3）。1944 年，陶里亚蒂曾极力主张意共不仅在工人中吸收党员，还应到“农民、广大知识份子……自由职业者、技术员、职员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七十年代中期，意共在取得选票上的胜利之后，这一目标看来是接近实现了。<sup>③</sup>今

① 关于意共在战后时期策略的讨论，见西德尼·塔罗：《意大利南部的农民社会主义》，纽黑文 1967 年；唐纳德·布莱克默：《统一与分歧：意大利共产主义与世界共产主义》，坎布里奇 1968 年；同著者：《意大利共产主义：七十年代的战略》，载《共产主义问题》，1972 年 5—6 月，第 41—56 页；同著者：《战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连续性和变化》，载《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唐纳德·布莱克默和锡德尼·塔罗合编，普林斯顿 1975 年，第 21—68 页；以及朱塞佩·马玛雷拉：《意大利共产党 1945—1975 年》，佛罗伦萨 1976 年。

② 关于意共基本选民和社会成分的分析，见马特·多甘：《选民的社会阶层》，载《意大利的各届选举和政治态度》，阿尔贝托·斯普雷阿菲科和约瑟夫·拉帕隆巴拉合编，米兰 1963 年；劳伦斯·E. 黑兹利格：《意大利政治冲突的宗教基础和阶级基础》，载《美国社会学报》，1970 年 1 月，第 496—511 页；塞缪尔·巴恩斯：《意大利：从选民态度看宗教和阶级》，载《选举态度：对比手册》，理查·罗斯主编，纽约 1974 年；保罗·西洛克斯·拉比尼：《论社会阶级》，巴里 1975 年；乔尔焦·加利：《从不完善的两党制到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波洛尼亚 1975 年，利维奥·马伊坦：《意大利社会阶级的动力》，罗马 1975 年；贾科莫·萨尼：《群众对党的战略的反应：意大利选民与共产党》，载《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布莱克默和塔罗合编，第 456—503 页。

③ 引自陶里亚蒂 1944 年 10 月 3 日在佛罗伦萨的讲演《在目前形势下党的任务》，载《马克思主义评论》，罗马，第 5—6 期，1963 年 9—12 月，第 336 页。意共最近委托米兰的民意研究所进行调查，证实了图 3 所介绍的总的情况。见基亚拉·塞巴斯蒂阿尼：《一个心怀不满而政治上成熟的国家》，载《再生》周刊，1977 年 5 月 13 日，第 6—7 页。

天,从意共拥有的党员来看,与其说意共是“工人阶级政党”,不如说它是“全民党”,或象西德尼·塔罗最近所建议的“人民党”。<sup>①</sup>

最后,意共的发展是与社会党的逐渐衰退同时发生的(见图1)。战后初期,这两个左翼政党的力量大体上是相等的,社会党人还略为领先。1948年两党搞人民阵线失败,到1953年就分别争夺全国选票的胜利,结果共产党遥遥领先。十年之后,意共的选票数约为社会党的两倍,到了1972年,比数成为三比一,意共领先。1976年,意共的优势更加上升,比数成为34.4%比9%多一些。

当然这两个相反的趋势并不能被解释为意共的发展完全是由于社会党选民转变态度的结果。这种转变确实是有的,但正如我们将要分析的那样,左翼力量内部的转变仅仅是意共成功的因素之一。这里的要害是由于意共逐渐发展、社会党却日益衰落,这样意共便成了意大利左翼的主导力量,成为许多进步选民的聚结点,他们希望实行社会经济改革而又觉得除了这个有生命力的和现实存在的意共之外别无其他政党可以依赖了。

上面已经提及,1976年选票中意共获得的票数远远超过前几届选举中的票数,较1972年议会选举多350万票,在选票总数中意共增加了7.2%。因此,人们想知道,七十年代中期,选民的反应是否标志着意共从此脱离了过去的模式。为了看清这个问题,必须考察导致这种全面结果的各种因素。本文作者已在其他场合对这类因素进行过细致的分析,<sup>②</sup>下面作一概况的介绍。

---

<sup>①</sup> 关于意共被称为“人民党”的问题,见西德尼·塔罗:《危机和过渡阶段之间的意大利政党制度》(1976年9月2—5日在芝加哥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大会关于意大利政策的会议小组上发表的论文)。意共评论员对于用“全民”来称谓意共表示不满,但又强调意共确实得到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见切尔索·吉尼:《六月十五日的地震》,米兰1976年,第270—271页;以及同著者在《变革中的意大利》,(罗马1977年)中发表的评论。

<sup>②</sup> 贾科莫·萨尼:《七十年代的选举:地震或演变》,载《意大利政治科学杂志》,波洛尼亚1976年,第6卷第2期。该文英语摘要载《意大利共产主义的群众基础:趋势与展望》,见《意大利与欧洲共产主义》,焦万尼·萨托里和奥斯汀·兰尼合编,华盛顿待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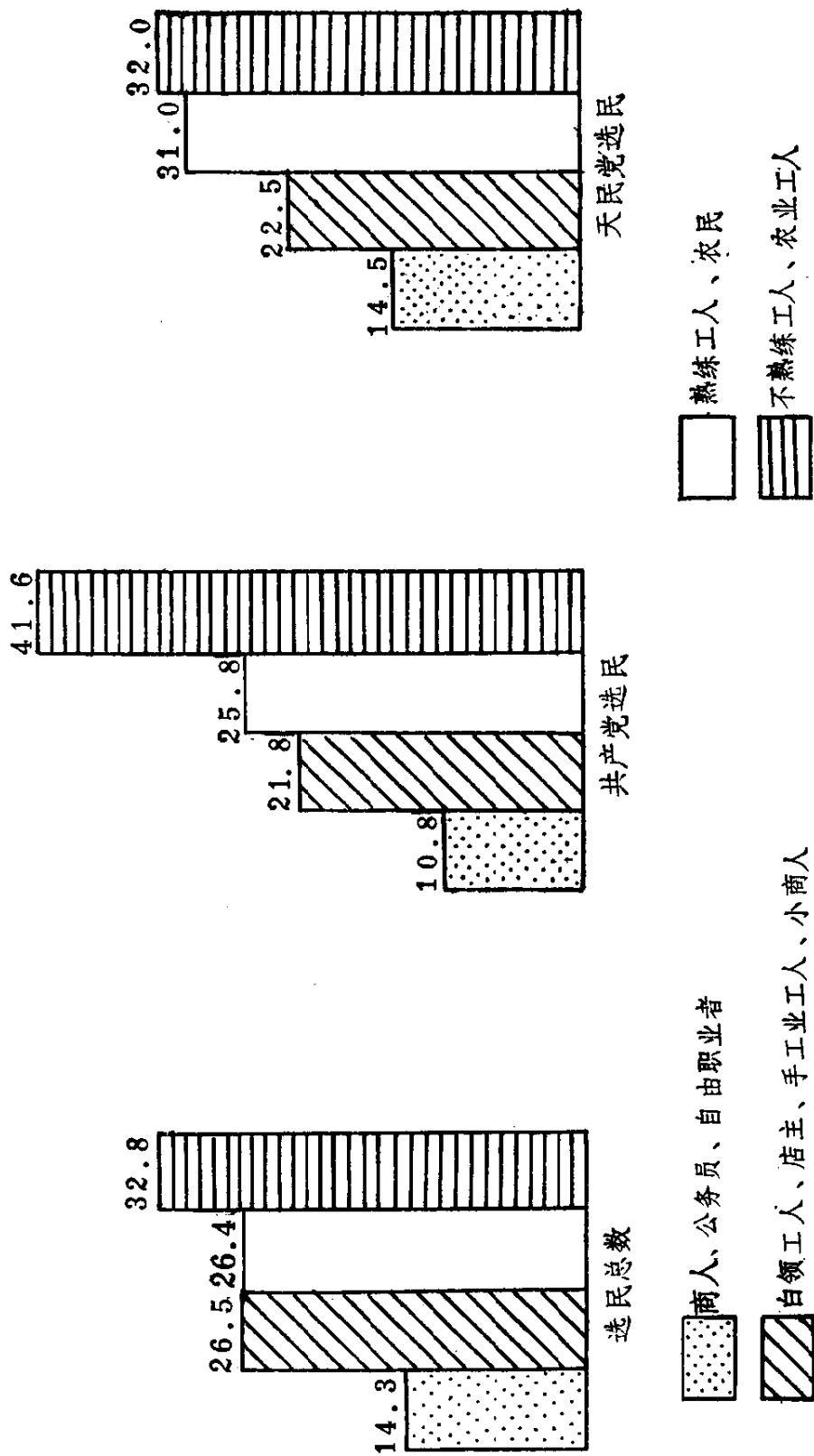


图 3 1975 年意大利选民的社会成分(百分数)

资料来源: 根据焦万尼·萨托里和阿尔贝托·马拉迪向著者提供的 1975 年度调查材料。著者将被询问者按其本人的职业或户主的职业分别归入各社会阶层。

在前两届的议会选举之间，有七股选民力量，选民的总数约550万人，其中三股力量是年满18岁的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女。同一期间，有200多万去世的年老选民，其名字已从选民册中勾去。这样，选民成分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选民总数明显增长，大体为过去的两倍。年青一代和老一代之间对政党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如果将这个因素也加以考虑，那么选民成分的这种转变就十分自然了。青年选民对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同情远较五十多岁的选民为普遍。当然，这就意味着选民成分的转变对各个政党的影响并不是等同的。有些政党在新的选票中获得了较之其他政党数目为多，而老一代选民中去世的人数并没有使这些政党丧失很多票数。意共正是这种转变的主要受益者，票数增加了150万，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数字。意共所得的总票数为350万。因此还必须解释这200万选票的来由。调查材料和选举结果本身说明，这200万中有一半是原先信奉中右翼政党的选民，而另一半则是左翼力量内部发生变化的结果，即从社会党和其他的左翼小党转向共产党。<sup>①</sup>这样，在总票数中意共增加了7.2%，其中3.2%应该归因于选民成分的变化，2%归因于中间选民态度的转变。另外，2%则是由于左翼力量内部的转变。简而言之，即使没有这些转变所产生有益的影响，意共的力量也必然会增强的，但就成绩而言，不会象现在这样可观了。

经过进一步的更详尽的调查之后，以上的估计还可能需作某些修整，但是从总的方面说，看来不会有重大的变化。近年来意共力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选民的高度稳定，意共有能力将大量青年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并对中间选民和天主教选民

---

<sup>①</sup> 1972年至1976年间，有一些政治组织解散了(如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劳工政治运动)，另一些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民主党，激进党)成立了，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左翼内部选票情况的变化。

有吸引力。最后,这两种因素促成了1976年选举中出现的崭新局面。<sup>①</sup>中间选民和天主教选民的转变,由于意共近几年来一直表现出新的面貌,所以是很容易理解的。

### 反共力量的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共在非共产党选民中的形象是消极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也许是因为意共没有真正想实行代议制民主政府,不管口头上如何宣称,意共的民主概念与西方传统是大相径庭的。意共之所以承认民主纲领,那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手法,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深刻的信念。人们担心,一旦意共执政,它就会改变社会制度(或者如焦万尼·萨托里所说,意共“将同时改变制度,改造人民。”)。<sup>②</sup>这种担心由于意共与国际共运特别是与苏联的密切联系而更为加强了。过去意共与苏联关系的密切,一般被认为意味着屈从于莫斯科的意志,并要对意大利社会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一般模式。由于这必将是一种革命的、暴力式的改进,所以更增添了人们的恐惧和怀疑,特别在那些对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的对峙和暴力尚记忆犹新的人们中间,这种恐惧怀疑感,尤其剧烈。除此之外,意共的消极形象,对不同阶层的选民还程度不同地产生着影响。这种消极形象就是:(1)意共的反教权主义(它与所有共产党国家一样都限制宗教自由),(2)意共的经济改组和重新分配的计划,不明言地对私有财产有所威胁。最后是意共拥有强大的组织、

<sup>①</sup> 注重意共选票中的新成分,固然是重要的,但同样也不应忽视意共传统支持者所作的贡献。如果没有那些早在前几届选举中就已投意共票的选民们的高度忠诚,那么七十年代中期的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选举结果和调查材料的分析证明,意共选民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1975和1976年未投意共的票。关于这点,请看《意大利共产党的群众基础》,见表5。

<sup>②</sup> 焦万尼·萨托里:《欧洲的政党:两极化多中心体系的实例》,载《政党与政治的发展》,约瑟夫·拉帕隆巴拉和迈伦·魏纳编,普林斯顿1966年,第137—176页。

能干的领导,众多的忠诚党员,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实践的信念以及内部意见的一致——这一切都使意共成为一部强而有力的、运转灵活的机器,在其对手心目中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劲敌。

正如本书作者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说明过的那样,意共的这种“一人多面”的形象,反映了意大利共和政体前二十年内各党派之间所发生的争辩、论战和对峙。<sup>①</sup>简而言之,这是过去历史的反响:1945—46年的政治暴力行为,1948年运动期间人民阵线的反教权主义的立场,斯大林时期苏联恐怖政策,苏联对匈、捷的侵犯等等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强大的反共势力,持续了几乎近25年之久,终于到七十年代初,群众对意共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右翼选民中,已经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意共存有疑虑了。此外,不同阶层的选民反对意共,本来是有各种背景的。<sup>②</sup>因此,反共的势力虽然不能说全面崩溃,但是已经远不象往昔那样强大了。最近的迹象和凭印象所得到的认识表明,反共势力的衰落趋势,在七十年代中期日益加剧,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逐渐减弱,至少在某些选民阶层中是这种情况。

现在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这种迹象,并且注意群众态度的转变往往落后于优秀分子和关心政治的公众中人数较少的阶层之间所流传的思想和信念。而广大的选民,则是不明情况,受不到宣传工具的影响,因此对各政党的看法改变缓慢。

以往人们对意共反感是由于意共对宗教采取敌视态度,然而在近十五年来,公众中认为共产主义与天主教是水火不相容的人,越来越少了(见图4)。这种下降的趋势,反映了意大利社会的世

---

① 贾科莫·萨尼:《群众对政治力量调整的制约:意大利反现存制度的政党的观念》,载《美国政治科学学报》第6卷,1976年,第1—31页。

② 关于本点的证明可见拙文《群众对党的战略的反应》,第488页,表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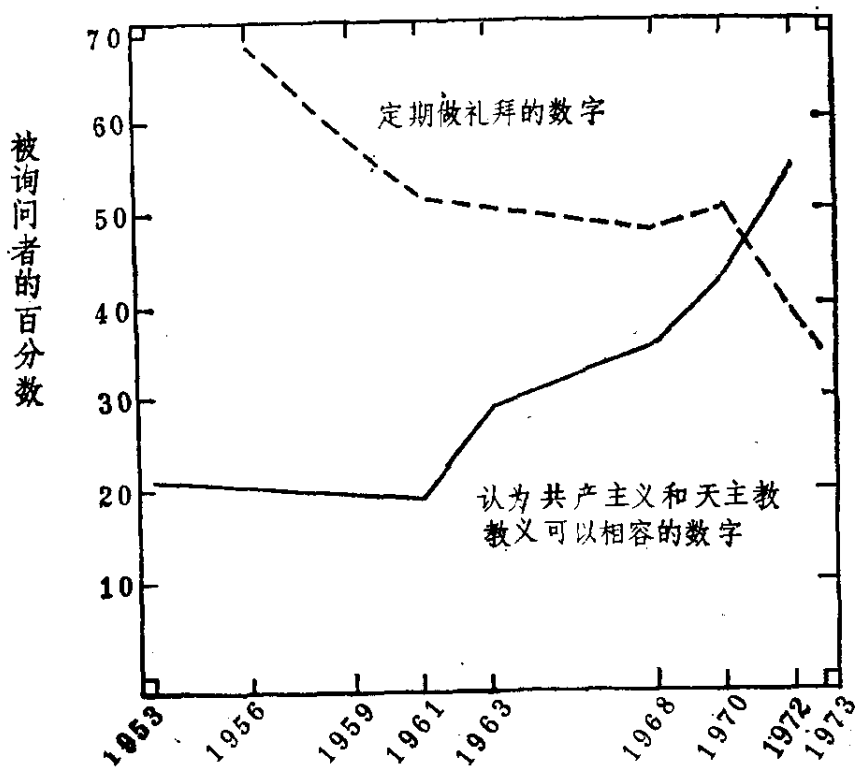


图4 过宗教生活和认为共产主义和天主教教义可以相容的趋势

资料来源:定期做礼拜者的数字根据《多克萨通报》(米兰)和《民意研究》(米兰)的调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锡德尼·韦尔巴所作的1959年调查以及著者和塞缪尔·巴恩斯所作的1968—72年调查。关于“相容性”问题的资料,根据《多克萨通报》以及著者和塞缪尔·巴恩斯的1972年调查。图中实线上各点为被询问者回答“是”的人数的百分比,当时提的问题是:“能否同时当好共产党员和天主教徒?”

俗化过程,“教权主义”的衰落本身也可作为意大利社会趋向世俗化的一个旁证。天主教选民很不愿意在政治事务中接受教会的领导。有理由相信这种趋势在近几年会变得更加突出。1974年关于离婚问题的全民表决前的那场运动中,涌现出了一群持不同政见的天主教知识分子。据不完全可靠的估计,有一些天主教徒,在全面表决中的投票,是反对教会和天民党的指导路线的,但是从全面表决前的运动期间收集到的调查资料来看,足有30%的天民

党选民是投票赞成离婚法的。<sup>①</sup> 在 1975 年地区选举和 1976 年议会选举时,宗教界对意共的抵触情绪继续减弱,从而造成的影响更难估计。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6 年的议会选举中,几个著名的天主教徒,其名字出现在共产党候选名单中,尽管他们后来是作为独立议员当选的。这些人声称,1976 年转向意共的选民的主体是天主教徒,这种说法可能是有些夸张,<sup>②</sup> 他们本人的候选资格以及天主教选民转向意共,这一确凿的事实本身,就明白地表示了天主教传统的削弱,教会越来越没有能力将天主教群众的选票从左翼政党引开。<sup>③</sup> 意共形象中其他一些消极因素,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根据 1975 年末向一部分意大利选民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认为意共的性质是“革命”的,占被调查的非共产党选民的近一半左右;其他被调查的选民不是没有明确的意见(占 20%),就是认为即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无补于事。此外,在同一次调查中被询问的非共产党选民中,认为意共是“不民主”的,仅占 47% 的人数。反对用“不民主”来指称意共的,占 25%,而其余的人则不表态。<sup>④</sup> 这样的调查结果,意义尤为重要,因为它并不是那些早已转向意共的选民所作的回答,而是当时(1975 年)仍然愿意选其他党派的选民所作的回答。这种现象说明共产党的形象在改进中,不仅在已

---

① 根据民意研究所的资料,约有 30% 的天民党选民是反对撤销离婚法的,见《民意研究》(米兰),1974 年 5—6 月。

② 见拉涅罗·拉·瓦莱:《天主教徒选民的转变》,载《再生》周刊,1976 年 6 月 25 日,第 4 页。

③ 关于天主教各派别之间若干意见分歧问题的讨论,请见阿尔图罗·帕里西:《意大利天主教徒内部纷争的社会宗教特点》,载《磨坊》杂志(波洛尼亚)第 20 卷,1971 年,第 637—657 页;同著者:《全民表决和天主教问题:结局的开始》,波洛尼亚 1974 年。关于教会在 1976 年选举中的作用的估价,见阿尔图罗·帕里西和贾法朗哥·帕斯基诺:《6 月 20 日:政治结构和政治态度》,载《意大利选票的连续性和变化》,阿尔图罗·帕里西和贾法朗哥·帕斯基诺合编,波洛尼亚 1977 年,第 11—66 页。

④ 见我的《意共新形象与意大利选民》中表 6,7,载《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唐纳德·布莱克默和西德尼·塔罗合编,米兰 1976 年。

经改变信仰的人们中间，就是在其他广大选民阶层中也是如此。

从其他研究所得到的补充材料中也证实了意共的形象在群众中逐渐有了改变。1970年，民意研究所的采访对象中，有45%的人认为，“共产党人仍然是对我们的自由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跟他们是无法达成协议的”；到了1974年该所进行另一次民意测验时，被问者中只有25%的人，是这样的看法。<sup>①</sup>1972年到1974年，原先的反对意共与天民党之间实行“历史性妥协”、反对共产党人与

表 2 1967 至 1976 年间意共形象的变化

	1967	1974	1975	1976
共产党人				
		(百分数 <sup>a</sup> )		
“是正直的”	22	28	29	45
“有许多好思想”	21	34	45	60
“是可以亲近的”	15	24	27	34
“是反对暴力的”	16	26	31	43
“是有能力的”	-b	43	44	65
“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	32	39	54	-b
“是合乎潮流的”	23	41	46	-b
“是团结的”	60	56	59	-b
“是维护我们这样的人的”	29	39	45	-b

a: 表中数字表示全国范围内典型调查中被询问者同意这些看法的百分数。

b: 当时未提此问题

资料来源:《多克萨通报》(米兰),1976年9月1日。

天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趋势,急剧下降。与此同时,1972年到1975年之间,在是否同情意共的问题上,人们的敌对程度也有所减弱。<sup>②</sup>最后,近来的调查表明公众越来越愿意用“有能力”、“有能力

① 调查结论见民意研究所公报《民意研究》,1975年,第1—2期。

② 萨尼:《意共新形象与意大利选民》中图8,9。

维持秩序”、“正直”等正面词眼来形容意共。<sup>①</sup>1976年9月,米兰的多克萨研究所公布了1967年至1976年进行的调查数字,很好地总结了选民们对意共看法的改变过程。<sup>②</sup>如表2所示,1967年到

**表 3 1976年意大利人民关于各党对维护自由的态度的看法**

(百分数<sup>a</sup>)

意大利各政党

	意共	社会党	社会民主党	共和党	天民党	自由党	社会运动
是要保卫自由的	39	62	56	56	60	48	12
是要限制自由的	45	18	20	11	25	25	66
不知道,不答复	16	20	24	33	15	27	22
总 数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a 表内数字为全国范围典型调查结果的百分数

资料来源:《多克萨通报》(米兰),1976年9月1日。

**表 4 意大利人民对 1977 年夏季意大利六大政党  
达成“1977 年 7 月协议”的评价**

(百分数<sup>a</sup>)

	天民党选民	共产党选民	典型调查部分
协议的结果将			
“肯定是积极的”	20.2	27.6	20.5
“可能是积极的”	40.7	47.9	43.1
“可能是消极的”	23.4	12.2	19.0
“肯定是消极的”	12.9	9.8	14.0
其他回答,不答复,不知道	2.8	2.5	3.4

a 表内数字为全国范围典型调查中被询问者的百分数。

资料来源:《讨论》(罗马),1977年8月8日。

<sup>①</sup> 阿尔贝托·马拉迪和焦万尼·萨托里于1975年共同研究表明,许多中间选民认为意共具备这些正面性质。马拉迪和萨托里亲自将研究结果提供给著者使用。

<sup>②</sup> 《多克萨通报》中发表的资料,1976年9月1日。



1976年,共产党的形象在民意测验项目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有了全面的改进。只是在党内团结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倒退现象(这将在后面详谈)。因为有许多被询问者,不作任何答复。所以研究这些调查结果时,必须十分谨慎;不过,看来还是能够证实其他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的。并且与其他各党尤其是天民党在群众中威信降低相比,意共形象的改进,尤其显得突出。

从上述简短的分析中能否得出结论说意共经过长期斗争,已经能够为意大利广大社会阶层所接受了呢?到七十年代末期,意大利选民将会对意共另眼相看,将会发现意共与四十年代末期大不一样,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原先的保留看法,并不是一扫而光了,原先在与意共互相靠拢的问题上构成巨大障碍的抵触戒备心理并未完全消失。意共的消极形象中,最不易为人们所忘却的也许是它保卫自由的态度。意大利各大政党中,只有新法西斯党所得的信任低于意共(见表3)。其他的顾虑就是怕共产党人执政以后可能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崩溃,没收私人财产,对所有的工业实行国有化。<sup>①</sup>总之,尽管群众对意共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选民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意共仍有戒心。

群众对意共的态度既有逐步转变的一面,又有保留疑虑的一面。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是1977年夏季所收集到的材料了。那是在六大政党就有限的政府纲领达成协议之后不久。<sup>②</sup>当选民们被要求对该协议发表意见并对协议可能为国家带来什么后果作出估计的时候,他们的答复,如表4所示。虽然调查结果的数据本身不足以说明人们对意共究竟抱什么态度。但是,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选民的答复,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心向意共,因

---

① 见《民意研究》,1975年第1—2期。

② 根据天民党委托民意研究所进行的调查。某些初步的调查结果已见于《讨论》(罗马),1977年8月8日,第2页。

为意共在这广大的“非正式的联盟”中，代表着当前形势中的新事物。正如人们可以见到的，天民党选民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历来是对共产主义抱有敌意的，但仍然对上面这种安排，表现出积极的或多少是属于积极的反应。无疑，人民群众中调查结果的这种转变，在几年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同样的调查材料，也表明在天民党选民内部，仍有相当可观的人，对于过去仍然是耿耿于怀，并对天民党公然接受意共的支持，不甚赞同。

这样，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民众的态度是转变了，而且在未来的年月里，很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过去的态度并未全然改变。<sup>①</sup>再说，近年来呈现出的趋势会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这点也不可小看。象当前这种过渡阶段，对于政治实体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很容易受到各种外界事件或事态发展的影响的。

### 意共的合法化

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有了这样巨大的改变，即使没有全部改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一个政党是一种复杂的、非均一的社会现象，又因为社会对一个政党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许多个人“看法”的集合，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不过，看来造成群众对意共态度转变的有四种因素：

首先，无疑地最近几年来，共产党领袖们的发言和党所采取的立场与过去大不相同。早在决定对安德雷奥蒂政府信任投票表示弃权之前，意共就一直在逐渐缓和它对历届天民党政府的关系。意共减弱了反对教权主义的论战，致力于同天主教徒先后就离婚问题和堕胎法达成妥协。意共反复地强调自己独立于苏联，明确表

---

<sup>①</sup> 这个结论从最近的另一些调查材料中又得到证实。见《再生》周刊，1977年5月13日，第6—7页。

示承认“多中心主义”、基本自由和个人权利。它再三消除社会上的非党人士在经济计划、社会改革和私人财产等问题上的顾虑，并一直在采取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它不再反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乃至参加西方“阵营”。<sup>①</sup>

密切注视着意大利发展动态的学者们也许会说，这些步骤并不是真正的创新，意共基本上一直是沿着由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指引的道路前进的。但近年来的声明远比以往的明确。除此之外，还必须看到，与以往的艰深难懂的文件相比，意共最近所发表的一些声明是很不相同的，如贝林格在苏共第二十五届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他与法共的乔治·马歇和西共的圣地亚哥·卡里略分别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发表的声明，他在欧洲共产党柏林大会讲坛上发表的声明等。换句话说，意共首次利用新闻工具所广泛报导的事件来影响广大听众。这种努力本身就与过去做法不同。

第二个新情况就是新闻宣传机构的态度及其向广大群众所传递的政治信息的内容，与过去不同了。在最近举行的一次意大利形势辩论会上，政治家焦万尼·萨托里指出，对意共目前的态度估计，部分地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他大胆地表示，观察家的变化比党本身的变化更大。<sup>②</sup>人们尽可以对萨托里的结论持不同意见，

<sup>①</sup> 报界曾广泛报导意共对许多问题改变了立场。关于七十年代中期，党的路线的全面情况，见恩里科·贝林格在1975年3月18—23日在罗马举行的意共第14届大会上的报告。该报告刊登在《意大利共产党第14届大会文件》（罗马1975年），第15—76页。关于意共在1976年6月的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上的正式立场，见塞季奥·塞雷：《柏林会议》，载《再生》周刊，1976年7月9日，第1页。并参阅安东尼奥·鲁比：《论争背后的柏林》，载《再生》周刊，1976年7月30日，第9页。关于意共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见唐纳德·布莱克默：《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策略》，载于《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国际作用》，唐纳德·布莱克默和安尼·克里格尔合编，坎布里奇1975年。关于历年来意共路线的变化，见马玛雷拉：《意大利共产党》。关于意共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及解决方案，见文件《中期计划建议》，罗马1977年。

<sup>②</sup> 焦万尼·萨托里：《两极化多中心体系的探讨》，载《意大利实例》，法比奥·卢卡·卡瓦扎和斯蒂芬·葛劳巴德合编，米兰：1974年，第210页。

但是他的基本观点强调,社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关于政党、政治家的信息,强调了各种渠道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个政党虽然可以强行改变自己的政策,但是如果通过报导政治消息的渠道向听众传递的信息不能反映外界的变化,那么要求公众发觉党的态度中的变化,就将是不现实的。就这点而论,应该指出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意大利的新闻工具,大多是控制在工业集团或天民党手中;<sup>①</sup>而且由政府控制的广播、电视网和报界中的一大部分所描绘的意共的总的形象是消极的。多年来,意共虽然也建立了自己十分强大的宣传网,<sup>②</sup>但是意共的机关报和各种报刊,通俗杂志或高级学术刊物,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原来已经就同情共产党的人。这样,非共产党选民很大程度上是与意共宣传网相脱离的。这些人既然听不到有利于对意共形成良好印象的消息,因而就受不到影响。<sup>③</sup>

不过最近几年来,尤其是六十年代末期以来,这种情况有了重大的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如评论家,电台、电视台和大报社的新闻记者,对意共表示同情的态度。工会控制的记者委员会、印刷工人委员会也加强了自己的、对付编辑和出版商的力量,从而对文章和书刊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使有关意共的报导,日益扩大,在那些以往对意共消息置之不理的刊物中,现在也能见到采访意共领袖的报导了。同时,意共及其领袖在电台和电视台露面的机会也较以往为多。总之,消除了许多偏见,代之以中立的态度,有时甚

---

① 研究报刊的专著有伊尼亚齐奥·魏斯:《宣传政策》,(米兰 1961 年);保罗·穆里阿尔迪:《战后的意大利报刊》,巴里 1973 年;维托里奥·卡佩基和马利诺·利沃尔西:《意大利的日报》,米兰 1971 年;加埃塔诺·富萨罗利:《意大利报纸》,帕尔马 1974 年;瓦莱里奥·卡斯德罗诺沃和尼科拉·特朗法利亚合编:《意大利新资本主义报刊》,巴里 1976 年。

② 《意共和天民党的社会存在》,波洛尼亚 1968 年;乔尔焦·加利和阿尔丰索·普朗迪合著《意大利人参与政治的新模式》,纽黑文 1970 年。

③ 贾科莫·萨尼:《政治交流的渠道和选民的方向》,载《意大利政治科学杂志》第 2 期,1974 年,第 371—386 页。

至是积极的态度。<sup>①</sup>

以上的说法并不意味着群众之所以改变了对意共的看法，单纯是由于新闻机构采取了新的态度。因为报纸的发行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电台和电视网所能影响的也只是一部分选民。同时，新闻工具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促成群众突然改选共产党，不如说对群众本身业已表现出的政治倾向起加强和渗透作用。不论怎样，通过新闻渠道所传播的意共的形象，确实已经起到作用，使群众改变了对意共的看法。

造成群众改变对意共看法的第三个新情况是政治、社会、宗教各界的非共产党的杰出人物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社会党选民和中间选民，至少是十分了解各党之间的对话的人，他们对意共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从而促使社会党和天民党的领袖对共产党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那些人来说，党的领袖所采取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是各种指令、解释、阐述、乃至预料未来事件的根据。政治、社会、宗教各界的许多杰出人物，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对意共怀着敌意，采取根本对立的态度，近来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态度，这个事实是无容置疑的。如，社会党就要求意共更多地承担政府中的职责，天民党提出了“面对面交谈”，即与意共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设想，教士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对共产党的敌意也大为减弱；商业界人士也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意愿，要与意共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对话。

人们很可能认为，由于意共提出各种倡议，增加其自身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自然而然地使各界人士采取了上面所讲的新姿态。然而，无论非共产党的杰出人物还是共产党杰出人物，事实上对于

<sup>①</sup> 卢卡·帕沃利尼谈及新闻界的转变时提到要“前进”，要“更客观的报导”，见《新闻与民主》，载《再生》周刊，1976年8月27日。关于新闻界态度转变的其他例证和不同政治观察家的谈论，见《全景》，米兰1976年，第488期，以及彼得·兰格：《意大利共产主义该如何办？》，载《外交政策》，1975冬—1976年，第224—240页。

意共 1975—1976 年的成功都采取了温和的立场。无论怎样,问题的实质是非共产党杰出人物愿意与意共对话,这将加速共产党在群众中合法化的过程。如果说,过去非共产党杰出人物对共产党所抱的态度、所发表的各种声明,曾经加强了群众对意共的猜疑情绪,那么现在这种猜疑情绪已经减弱了。<sup>①</sup>

造成意共形象改变的最后一个新情况是选民中发生的变化,也就是所谓政治听众的变化。这种变化促进人们接受新的思想,反过来又减弱了以往的政治号召力。这里不可能详细谈论过去二十年中意大利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变化的政治意义(这类变化,部分地是由于“经济奇迹”造成的),但是,就这些变化作一些简单的评论,还是可以办到的。首先,选民的成分曾经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曾经经历过四十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剧烈的政治对抗和论战的选民,现在有一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更重要的是,1975 年选民的 60%,已经加到 1946 年以来的选民名册中去,七十年代中期首次参加过民主选举的许多人,在斯大林去世时尚未出生,其他人当时也很年轻,他们都记不得苏联对匈牙利的侵略和柏林墙的建筑经过,这一层选民头脑里所能回忆起的政治印象与老一辈人是很不相同的。到了 1978 年共产党对青年人来说已经不再是曾经使他们的父辈谈虎色变的、颠覆性的反教权力量了。当初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曾经对参加社会活动的青年发生作用的政治宣传,对于在越南战争期间政治上达到法定年龄的青年来说,已经是不发生效用的了。<sup>②</sup>

同时,也要看到意大利社会现代化给社会带来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教育程度的提高,国内居民大规模迁移,日益发展的城市建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见社会党知识分子领袖朱塞佩·坦布拉诺的谈论,载《周报》(米兰),1977 年 9 月。

<sup>②</sup> 关于意大利青年价值观念的研究,见卡洛·图利奥·阿尔坦:《难以对付的价值观念》。

设，所有这些现象使个人跟他所熟悉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纽带受到了冲击，使他们放眼去接受新的政治号召。同样，人们普遍感到社会不平等，日益盼望有一个十分繁荣的阶段，这就必然增强了那些提出建成一个合理公平的社会的政治势力的号召力，特别是因为这些政治力量的形象至今为止还不曾发生因为言行不一而受到损害的事。

最后，由于天主教在政治事务中的传统势力持续衰退，现实主义的倾向增强了，定期做弥撒和奉行宗教戒律的人，越来越少了。即使在继续过宗教生活的人当中，许多人在政治事务中也不再追随教士们的命令了。过去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天主教会组织，现在已经大为减弱，或者很不灵活。教士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正在衰退。

总而言之，过去十年来意大利社会中的许多趋势，以及上面所谈到的各种因素，为改变群众对意共的看法，从而采取新的政治态度，创造了有利的气候。最后还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中间选民的不断变化，主要是对意共有利，而对社会党或其他左派政党不利。简单地说，意共有许多政治资本，这一点连意共的敌人都是无法否认的。意共在它参加政权的各个城市、省区内成绩突出。它拥有能干的领导人物和众多的忠诚党员。它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它建立了并且维持和扩展了一个强大而有效的组织网，这个组织网，因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有重要作用。党的领导是高质量的。象其他政党中出现的分裂主义使党的领导瘫痪或者相互抵消力量的现象，至今在意共领导层中未曾发现。此外，群众对意共的猜疑情绪反而使它更加重视自身的力量、团结、效率和忠诚。因此，意共被认为是具有民主性的，并且在苏联面前保持独立自主，忠诚于本国的基本自由，忠诚于按照多中心主义的民主原则，凡是对意共抱有这样看法而深信不疑的人，他们投共产党的票而不投社会党的票，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

## “历史性妥协”的战略

1976年，意共在选举中获胜，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姑且不谈。总之意共对这次胜利的解释是，党从七十年代早期采取了正确的战略的结果，意共领导认为：广大党员群众赞成它提出的战略，这种战略吸引了新的选民，加强了党的力量。从议会席位分配角度来看，意共现在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比过去要大得多。由来已久的要把党变成一个执政党的呼声，看来越来越切实可行了。由于选举所造成的各派政治力量趋于平衡，天民党活动余地很小；相反，意共却有很好的机会向其历来的对手施加压力，要他们采取措施，实现意共领导自1973年以来就提出的大联合：“历史性妥协”。

在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别的口号象“历史性妥协”这样引起如此众多的评论、论战和辩论。不出所料，对于意共以“历史性妥协”命名的建议，众说纷云。对于有些人来说，“历史性妥协”无非就是改头换面的“向左派开放”，而这正是意共历来的主张；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有些人认为“历史性妥协”的实现之日，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胜利之时；另一些人则认为，意共提出“历史性妥协”最终地表明：意共已经决心对现成的社会制度采取一种随和态度，放弃了原先要对意大利社会进行强制性改造的目标。这里不可能逐个分析人们所提出的不同的解释，因为目前辩论还在进行之中。但是为了探讨当前形势和未来的展望，有必要简单地研究一下意共领袖制订其战略的理论依据，以及其他杰出的政治人物对意共这种战略的反应。“历史性妥协”这个词最早见于1973年秋天贝林格为党的周刊《再生》所写的三篇文章中。<sup>①</sup>但是这个建议的主要内容在意共领袖早期的声

<sup>①</sup> 贝林格：《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的想法》，该文收入由安东尼奥·塔托主编的言论和文件集中，载《共产主义问题》，罗马1975年，第2卷，第609—639页。



明和文件中，特别是1972年3月第十三届的党代会的文件中，就已经提出来了。贝林格本人就强调指出，他的这个建议与意共多年来的总方针之间的一致性，而意共的总方针又是可以追溯到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理论著作。

1973年贝林格关于“历史性妥协”所发表的论点，其中心内容是：为了取得胜利，共产党人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战略——也就是必须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条件、本国的历史、国内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国际环境。资本主义世界的左翼运动在改造社会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国内外强大的客观因素，就很可能要遭到严重的失败。四十年代的希腊和最近的智利就是例证。<sup>①</sup> 为了实现重大的改变，不能通过将社会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形成对立的政治力量来实现。相反，要想实现巨大的改变，只有通过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群众党派的联合来实现。在意大利，进步的无产阶级往往是人民中的少数。在工人阶级及其对手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中间阶层，他们的支持对于共产党人要实现改造社会是至关重要的。<sup>②</sup> 因此，意共应该力求促进这些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一致利益，也就是说，它所实现的改革既能够改善工人阶级的地位而又不伤害中间阶层的地位。<sup>③</sup> 这里必须十分注意“社会改造的先后缓急和时间性……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经济崩溃，而主要是为了保证从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新制度这一关键时期，使经济的有效性不受损害。”<sup>④</sup>

贝林格继续谈到：社会各阶层的联合必须有代表广大群众的各派政治力量的参加才能实现。天民党虽然与资产阶级有各种联系，并且对社会主义制度采取敌对立场，但是它毕竟是在中间阶层

① 《共产主义问题》，罗马1975年，第2卷，第618—619页。

② 同上，第629页。

③ 同上，第631页。

④ 同上，第632页。

乃至在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中具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因此，尽管天民党有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性质，但是一定不能被排除在意共所追求的新的有效的社会集团之外。谁想要排挤天民党，谁就是鼓励天民党内部的保守分子促使天民党及该党代表的中间阶层脱离工人阶级运动。<sup>①</sup>最后这将使意大利分为两个集团，形成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从而为维护民主制度带来严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左翼政党取得议会中 51% 的席位，也不可能设想左派政府在掌权后能够生存并发展下去。<sup>②</sup>因此必然的结论就是：由于国内所存在的各种严重的问题，加之反动集团所构成的威胁始终存在，由于有必要开辟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和民主进步的道路，所以需要强调在代表大多数意大利人民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达成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sup>③</sup>

贝林格的文章发表之后，党内外展开了一场辩论，又提出了关于党的战略和其他问题：意共与天主教势力的联合是否会排除其他政党？答复是否定的，因为意共历来认为社会党人是一切联合中的基本成份，象其他“民主力量”（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起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sup>④</sup>

有人批评说，“历史性妥协”这种战略实际上是意共原封不动地容忍了天民党的全部缺点和模棱两可的态度以及它对左翼力量的敌对情绪。针对这种指责，贝林格的答复是：“历史性妥协”并不意味着意共放弃批评天民党的权力，相反，意共将运用批评来促进天民党内部人民民主和反法西斯主义力量的壮大，孤立天民党内

---

① 《共产主义问题》，罗马 1975 年，第 2 卷，第 636 页。

② 同上，第 633 页。

③ 同上，第 638—639 页。

④ 恩利科·贝林格：《争取学校和教育的改革，争取意大利的复兴》，1973 年 10 月 27 日在波洛尼亚的演讲，同上，第 647 页。

的反动分子。<sup>①</sup>在这方面，贝林格坚持认为，新左翼组织所叫喊的要求工人阶级联合反对天民党的口号，只是徒有革命的外衣，实际上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分裂主义的立场。按照贝林格的说法，采取这样的立场，只会给企图利用意大利社会严重分裂的国内外势力以可乘之机。<sup>②</sup>

意共与天主教力量的联合，将对意共与教会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对于这一点，当时的议论是意共是决不可能与教会联合的，但是，与此同时意共也不得不承认教会在意大利所起的作用以及人们离不开教会的情况。因此，意共遵循的方针将是避免“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天民党与非天民党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因为一旦发生这种分裂，将给国家，尤其给工人阶级运动带来悲剧性的后果。<sup>③</sup>

“历史性妥协”与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意共领导认为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缘故，已经不可能盼望意大利在短期之内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将社会主义因素”引入社会的一般职能中去。<sup>④</sup>这个任务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某些社会经济改革，既然得到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各派政治力量的支持，就必然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去改造“生产关系，财富分配，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sup>⑤</sup>

“历史性妥协”对于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于意大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地位将产生什么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意共论点的前提是继续执行缓和政策，减少欧洲两大政治

---

① 《共产主义问题》，罗马 1975 年，第 2 卷，第 657—658 页。

② 同上，第 648, 643 页。

③ 同上，第 656—657 页。

④ 1974 年 12 月 10—12 日，贝林格为筹备意共第十四届大会向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载《共产主义问题》，罗马 1975 年，第 2 卷，第 868 页。

⑤ 同上。

军事集团之间的严重对立，使有关各国获得更多的独立自主的权力。然而，由于两大集团毕竟依然存在，并由于限制军备谈判的进展取决于保持军事力量的对等，因此，要求个别国家单方面脱离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是不现实的。<sup>①</sup>在这种形势下，意共也就不再反对意大利继续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尽管它坚持认为意大利在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时，必须做持久的努力来改善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直至最终废除任何军事联盟。同样，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问题，意共领导人表示，“意大利当然不能离开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有必要实行机构民主化，也有必要削弱共同体内部的全国性和多国性大财团的力量。”<sup>②</sup>

最后针对有人(包括意共主席路易季·隆哥)对“妥协”这个字眼的意见，贝林格说，“妥协”这个词不一定是贬义的。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并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某些历史性的关键情况下，实行“妥协”还可能带来革命的后果。<sup>③</sup>他认为，无论如何，“历史性妥协”不能成为一种狭隘的契约或分享权利和分赃的手段，而应该是人民民主力量就国家未来的重大问题达成互相谅解、取得一致的结果。<sup>④</sup>

贝林格公开宣称希望对意共的建议展开一场辩论，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各派政治家和杰出人物所提出的观点中，最常见的是以下几种：第一、意共和天民党的基本哲学原则和世界观是互相对立、水火不容的。<sup>⑤</sup>第二、两大政党以及中间政治力量(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实际上会排除反

---

① 《共产主义问题》，罗马 1975 年，第 2 卷，第 877 页。

② 同上，第 879 页。

③ 同上，第 626—627 页。

④ 同上，第 649 页。

⑤ 见朱塞佩·德·罗萨在谈论“历史性妥协”时所说的“自杀行动”，见《自由书林》(Biblioteca della liberta)，都灵 1974 年 7—8 月，第 38—42 页。

对政府的民主而合法的在野党派，这将对国家未来的多元化民主带来严重后果。<sup>①</sup> 第三、意共认为“历史性妥协”将会使意大利社会朝社会主义方向改变，这种想法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估计。那些认为国家发生危机的责任主要应归咎于天民党的人，他们的看法是：如果不摧毁天民党赖以建立本身权力的国家机构，就不足以使国家腐朽的过程中断，也就是说，如果不建立由左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来完全取代由天民党控制的政府，那么国家日益腐朽的过程是不能中止的。<sup>②</sup> 对于这些和其他一些观察家们来说，“历史性妥协”带有“进化论”的味道，其目的是要有两大政党来进行合作。<sup>③</sup> 第四、意共的这个建议将会改变国际上现有的力量对比，因此不会受到美国和苏联的欢迎，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两个国家是愿意保持欧洲分裂成两个势力范围的现状的。至少就近期来说，意共这个建议的可行性是成问题的。按照某些评论家的说法，天民党一旦与意共联合，它就必然会遭遇丢失一大部分中间选民的危险；同样，意共如果与天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话，也会使很多共产党员感到震惊，乃至使他们感觉精神上受到一种创伤，虽然意共遇风险的可能性要比天民党小些。<sup>④</sup> 最后，如果将来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骚乱的话，意共将承担以保证国家生存的主要责任，但意共如果不采用强硬措施，就很可能无法恢复社会安定并复兴国民经济。焦万尼·萨托里预计到这种后果，他写道：天民党不愿意丢失自己的权力，意共不愿意丢失自己的灵魂（要不然就是让斯

① 见尼科拉·马泰乌奇：《拯救自由民主的模式》，同上，第65—66页。

② 这是一群知识分子提出的中心论点。他们为了促进采取“左的抉择”，成立了一个协会。该协会1975年4月18—19日在米兰召开的大会的报告，已收入马西莫·泰奥多里编的《左右的抉择》，米兰1975年。

③ 见贾法朗科·帕斯基诺：《新进化论和协议式民主之间的意大利政治制度》，载《磨坊》杂志，1973年7—8月；同著者：《调和与秩序》，载《自由书林》，1974年7—8月，第81—85页。

④ 乔万纳·津科内：《使人焦虑的多数》，载《自由书林》，1974年7—8月，第

大林主义的灵魂死灰复燃);99%的意大利人不愿意丢失他们手中还剩下的任何东西。<sup>①</sup>

## 过渡阶段

关于“历史性妥协”的含义所进行的辩论以及关于由此引起的意大利政治制度中的变化的讨论,大多是推测性的和理论性的,因为在1974年,尽管意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意共在意大利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未改变。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当时仍然属于反对派力量,甚至在1975年6月的城市选举之后,虽然意共在国内许多地区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控制了一些大城市,但是它在全国范围内所起的作用并未根本地改变,在1975年获得胜利之后,意共固然在政治舞台上突出了自己的地位,对今后作用的前景已不象过去那样遥远了。但是仍有许多“假设”的成分。

不过,到了1976年1月,当意大利社会党退出中左派联盟之后,事情就清楚了。过去的结盟已经行不通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正在形成之中,1976年议会选举的结果,终于使关于意共的作用的讨论,从是否可能的抽象领域中解脱出来,变成了各党之间进行谈判的具体现实。

关于1976年选举以后的事件,早已有了各种广泛的报导,这里不必重复了。社会党人坚决地拒绝支持按照过去的中左派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他们坚决要求共产党在更大的程度上参加执政。而共产党人们坚持认为,必须经过一个包括意共在内的广泛的联合政府才能解决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和世界经济衰退给意大利带来的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虽然选举的结果并不象某些观察家们所作的消极的预言那样,但是天民党不愉快地发现了自己的

---

118—121页。

① 同上,第98页。

活动余地缩小了许多。事后出现了一种方案，就是由季乌利奥·安德雷奥蒂领导组成天民党少数派内阁。这种做法当然是朝不保夕的，因为正如当时的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它“缺少一个信任”的基础。<sup>①</sup>可是，它毕竟是合乎人们口味的，尽管不完全令人满意。社会党人成功地（至少是取得了间接的成功）让意共参与执政，而天民党人能够表明自己没有违背竞选誓言，那就是不接受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最后，意共能够声称，它至少起到了可能与自己的力量相称的政治作用了。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在议会中发言时，多少有点洋洋自得地总结说：“现在谁都知道，如果我们投反对票，那么政府就会立刻垮台。”<sup>②</sup>

1976年夏天所发生的事情，标志着意共所取得的胜利，这点是毫无异议的。被选出而尚未上任的总理公开地向共产党咨询；共产党人在议会所采取的行动，对于政府的生死存亡起着关键作用，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最重要的是天民党总理对于意共的选票没有当作不需要或不必要而加以拒绝。意共多年来追求走出冷宫的目标，这时已经达到。诚然，各党之间的谈判，没有能够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意共领袖在评论和声明中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但是从党的角度来看，这肯定无疑地是标志着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力求取得“更高的地位。”<sup>③</sup>

1977年春各党之间进行了漫长而复杂的谈判，自此之后，党的崭新的作用加强了。谈判的结果是1977年7月就政策问题达成了有限的协议，并由安德雷奥蒂政府执行。这个协议当然算不得是重大的突破，它既未引起内阁的改组，又未将意共的弃权正式转化为通过信任案。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具有重

---

① 安德雷奥蒂于1976年8月4日在议会发言中用了这种说法。

② 《团结报》，1976年8月11日，第12页。

③ 这是意共评论文中的原话。见《再生》周刊，1976年8月20日，第3页。

大的象征意义,从而明显地标志着意共的又一次胜利。<sup>①</sup>

然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终于在1978年3月来到了。1978年初,社会党和共和党坚持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内阁,坚持达数周之久,意共入阁便于政府处理急待解决的经济问题和恐怖活动,此后,意共撤回了它对天民党少数派政府的间接支持。于是安德雷奥蒂提出辞呈。嗣后举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意共成为议会多数派的一部分,支持由安德雷奥蒂为首的重新组成的天民党少数派内阁。由五个党共同通过的纲领中也包括了许多符合人们希望,尤其是符合共产党人希望的改革方案,如结束意大利警察的军事身分(这样能使警察组成工会),并提高间接税以便筹措资金发展工业。<sup>②</sup>

意共在1976—1978年的进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这使意共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能起积极作用。首先,意共朝着完全合法的目标又有了进展。非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人物向意共咨询、与它商议并达成协议,这种事实本身就削弱了历来所谓的共产党是“反制度”政党的论点,从而有助于在中间选民的心目中消除种种猜疑和抵触情绪,那些情绪本来是反共倾向的实质所在。正如一位重要的社会党知识分子最近所说的那样:

如果说天民党人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如果说他们与意共共同作出重要决议,如果说他们与共产党人组成议会的多数派,如果说这一切都确实发生了,那么,天民党就不能再向意大利人民说意共是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极权主义的政党了。恰恰相反,实际结果将是意大利人会将意共看成与其他政党一样,是一个可以参加政府的政党。而这种结果对共

---

① 埃马努埃莱·马卡卢索:《群众的作用和团结》,见《再生》周刊,1977年7月22日。1977年7月协议中未涉及外交政策问题;但是,六大政党支持安德雷奥蒂内阁,于1977年秋签署了一项关于外交政策的共同声明。见《晚邮报》,1977年10月19日和1977年12月3日。

② 见《晚邮报》,1978年3月8—13日。



产党来说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sup>①</sup>

意共在政治生活中承担起新的作用，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共产党人取得了很多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权的位置。皮耶特罗·英格劳，意共的一位头面人物，承担了下议院主席这个很有威望的职务。在上、下两院中的共产党议员，主管着许多重要的委员会。由于意共在地方上取得进展，意共的官员掌管了许多公共机构，如医院、公共交通运输机构、住房建筑机构，以及其他重要的市政机关。<sup>②</sup>最后，意共也开始得到了有重要政治性质的职务，如掌管银行之类的财政机构，并在政府控制的电台和电视网里担负重任。<sup>③</sup>

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这类进展是早就该实现的了，共产党人的地位虽然变了，但是这种成绩对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就算如此吧，我们认为这些成绩对意共扩大其控制的势力网，肯定是发生了作用的。

同样，按本作者的意见，意共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增强了，这是1976—78年的进展所取得的第三方面的成就。一些观察家可能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不错，自1976年以来，意共内部是出现过紧张形势的，其中的一部分加上来自外界的批评，确实是以针锋相对的概念为基础的，即认为对于政府的各项政策，意共施加的影响是十分不力的。批评者指出落实政策的步伐很慢，甚至是政策没有落实。还指出共产党人所支持的措施，至少暂时还没有使工人阶级受益。由于批评者认为意共本来是可以起到很大的

<sup>①</sup> 朱塞佩·坦布拉诺的话，见《周报》1977年9月21日，第17页。坦布拉诺的主张，见1977年11月7日《晚邮报》头版大字标题《天民党人与共产党人意见一致》。

<sup>②</sup> 关于三大政党（天民党、意共、社会党）对这类重要职务的分配，见《讨论》，1977年9月19日，第2页。

<sup>③</sup> 意共过去曾经批判分享官职的原则，今天又公然接受，这种变化于1977年夏秋两季引起了意共党内以及意共与党外诋毁者之间的论战。见1977年10月21日《晚邮报》，第1页。

作用的,所以上面的估计,应该说是消极和悲观色彩的。虽然这些批评家觉得,意共没有作出足够的成绩,但是这种看法不能说明意共的势力没有增长。不可否认的是,1976—78年间,在多数重大的政策问题上,政府是跟意共商议的;有关立法的各种提案,其他政党也是力图事先估计意共的反应相机行事;至于各种政治要职的任命工作也是一概与共产党领袖协商之后作出决定。意共参与执政过程的这些实例,评论家们也许还感到不满足,但是它们肯定无疑地是标志着意共已经脱离了过去的模式。过去的协商和协议比现在少得多了,而且又是在“无形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sup>①</sup>

意共作用发生变化的第四种后果,涉及到意共对内阁乃至对天民党的态度。评论家认为,意共的态度过于随和,它在跟传统的对手进行论战时的调子也有所降低;在其他方面,一般都认为意共的行动是“负责任的”。意共的态度反映出它与维护目前的阵线有关。意共认为目前的阵线较之以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这不意味着共产党人不再寻求“更进一步”的解决办法,而是说明他们行动谨慎的态度,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倘若采取强硬的姿态,就很可能危害最近取得的成就。意共领袖们知道,天民党内的有些人对意共最近几年所取得的进展是不高兴的。意共当然不想为这些人提供攻击意共的弹药,相反意共的领导,希望支持天民党内某些成员,由于这些人的行动谨慎(即使有时不是甘心情愿的),才使局面开始向左转。<sup>②</sup>

这样的谨慎的策略十分符合于意共的“历史性妥协”的总战略,虽然社会党人和其他势力对共产党人的地位加强感到不愉快。天民党人依然是意共努力争取的主要目标,从意共的角度来看,既

<sup>①</sup> 关于各党在不同舞台上的态度,最近有一篇全面的分析,见朱塞佩·迪·帕尔马:《监督而不统治》,伯克利 1977 年。

<sup>②</sup> 意共领袖最近的一些声明中证实了这种形势。见埃马努埃莱·马卡卢索:《左派、天民党及诸类问题》。载《再生》周刊,1977 年 10 月 28 日,第 1—2 页。

然目标是要与广大天主教徒进行长期的合作，那就必须避免跟代表这类群众的政党进行对抗。这种方针至少是意共在实行经济紧缩措施、“租金公平”法、改变节制雇用劳动者生活费用上涨的条例等等问题上，之所以采取谨慎态度的部分思想基础。

意共新作用的最后一种后果就是，它现在不能把政府的行动完全归咎于别的政党了，也不能把政府的无所作为归咎于别的政党了，这种形势正是社会党人梦寐以求的。<sup>①</sup>最近，天民党人也开始看到这种形势的好处了。

由于意共在全国范围内参与政府还是新近的事，又由于群众态度的转变是缓慢的，到现在为止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还不太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共的影响很可能是会增长的。诚然，意共领袖会辩论说，他们已经取得了某些进步，加上问题本来又是十分复杂的，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会辩解说，延误、效率低、成绩有限等等，主要应由意共的伙伴负责，因为他们态度勉强，这应该由社会上的保守势力负责；因为他们千方百计地减慢改革的步伐。<sup>②</sup>很难预见，意共的这类辩解是否会发生作用，是否会防止人民群众对意共的支持受到侵蚀。但是，很清楚的是意共在1976—78年所起的新作用已经酿成了进退两难的紧张局面，这是它过去在野时所没有的局面，下面就谈谈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 意共与左翼

就某些方面而论，意共在七十年代末期所面临的形势与四十年代中期是相近的，因为意共在这两个时期所作的声明，呈现出惊

---

<sup>①</sup> 意大利社会党坚持正式接收意共参与政府，其用意是要让共产党人跟其他政党共同承认人民对紧缩措施的不满情绪。1976—1977年新闻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社会党人无意再单独“摇树让意共拣苹果”。

<sup>②</sup> 见杰拉尔多·基亚罗蒙泰访问记，载《再生》周刊，1977年11月11日。

人的相似之处。意共最近的形象：“战斗的统治党”，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1944年，陶里亚蒂就提出这种概念了。<sup>①</sup>

陶里亚蒂认为，共产党为了真的发挥作用，既要在上层活动，就是说参加政府并在其中起引导作用，又要扎根于群众，也就是说，组织群众由下而上地施加压力。这种上下夹攻，将使意共的机会大为增加。陶里亚蒂说：“我们参加政府，同时也保留批评政府行动的权力。一旦政府的行动不符合我们的纲领、人民的需要或群众的要求，我们就有权批评。”<sup>②</sup>

但是，正如陶里亚蒂本人所承认的，采取这样的态度的同时，也会带来紧张局势。意共参与政府之后，就自然给政府加上了向群众解释为什么采取某些政策，为什么不采取另一些政策的责任。显然，要想到群众中去要求他们耐心等待，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要想把政府的缺点归咎于别人也不是容易的。<sup>③</sup>

当然，四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形势有着某些根本的相似的结构。因为意共在这两个时期，都曾经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四十年代是采用了陶里亚蒂的“新党”战略，七十年代是采用了贝林格的“历史性妥协”的战略。在这两个时期，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意共不得不在论战中降低调子，把过去的对手当做政府中的伙伴来对待。在这两个时期，工人阶级都希望并要求迅速实现改革。<sup>④</sup>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都不得不与其

<sup>①</sup> 陶里亚蒂曾在一系列演讲中提出了“新党”的概念，如在《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那不勒斯1944年4月；《为了意大利的自由，为了创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罗马1944年7月9日；《走向民主》，罗马1944年9月；《目前形势下党的任务》，佛罗伦萨1944年10月。1945年全国解放后，这些演讲曾由意共分别以单行本发行。下面引用的话也摘自那些小册子。1963—64年，《马克思主义评论》（罗马）不仅重印了这些演讲，还重印了陶里亚蒂四十年代中所作的其他许多演讲。

<sup>②</sup> 陶里亚蒂：《目前形势下党的任务》，第30页。

<sup>③</sup> 陶里亚蒂：《走向民主》，第18页。

<sup>④</sup> 关于战后初期意大利群众的各种期望，见朱塞佩·马玛雷拉：《法西斯后的意大利》，波洛尼亚1970年，重点阅读第93—99页。

他力量分享权力，这就限制了它原来能够实现的目标。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都把国际上的势力均衡看成是一种限制性的关键的因素。<sup>①</sup>

**表 5 1977 年夏季意大利选民关于如何组成联合政府的设想**  
(百分数<sup>a</sup>)

组阁方式	支持意共的选民	支持天民党的选民
安德雷奥蒂总统的内阁，成分不变	0.7	29.0
天民党少数派内阁包括经意共同选出的身分独立的各部部长	14.3	34.1
新内阁，由意共、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天民党和自由党的代表组成	41.3	21.5
左派内阁(意共和社会党)有可能向其他政党开放，但不包括天民党	34.6	1.6
无答复、其他答复，不知道	6.0	13.8

a 表中数字为全国范围典型调查中被询问者的百分数。

资料来源:《讨论》,1977年8月8日。

因此,七十年代后期,党和群众之间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局势是不足为奇的。尽管意共力图在承担新的责任时,克制自己不抱过分乐观的态度,但是,显然在追随意共的广大群众中存在着一种失望和焦急的情绪。这一点,意共的领袖们也公开承认过。<sup>②</sup> 同样,

① “历史性妥协”与国际形势之间有紧密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贝林格的著名文章《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的想法》中多次提到的国际形势得到证实。关于国际形势与意共的国内策略的讨论,见唐纳德·布莱克默:《团结与分歧:意大利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世界》。

② 见1977年3月14—16日卢乔·利贝尔蒂尼在意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该文已收入《共产党人与青年问题》,罗马1977年,第43—48页。

在党的干部中对改革进展缓慢以及意共的新作用没有产生重大的切实效果,也明显地表示出不安的情绪。<sup>①</sup>群众的不安情绪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有多大范围和影响,这一切虽然很难做出估计,但是在七十年代后五年内,意共所推行的战略明显地使党群关系复杂化了。这一点跟早些时候相同。

这种情况十分显然地也在党内造成紧张局势。首先,党的领导看来很难说服一般党员接受新的路线。意共多数选民对于“历史性妥协”这条路线虽然抱支持态度,但不能说意见完全一致。最近所作的调查表明:部分意共选民亦不是完全支持党所采取的新的姿态的。<sup>②</sup>表5就表明大约有一分之一的意共选民于77年夏季主张建立一个将天民党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这个方案显然不是党的领导所希望的。意共选民中对党的领袖所希望进行的改组持怀疑态度并感到不安的人,他们也许届时会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但是观点的转变不会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是意共的一般党员对天民党还有残余的敌对情绪。在七十年代中期,意共的同情者中,对天民党很少抱有好感的。那时候意共选民中大多数人认为,天民党是腐朽不堪、无能、衰老、保守、由教会控制的势力(见表6)。由于对天民党抱这样的看法,所以意共基层党员中对于跟天民党达成协议进行联合,抱很大的怀疑态度,这也是不足为怪的。<sup>③</sup>

意共党员群众对天民党持有这样的消极的看法,部分地反映了过去在两党之间进行的论战和政治斗争。多少年来意共一直在指责天民党腐朽、舞弊、无能,而这类指责至今还有深刻影响。但是,意共群众的这种态度,部分地也是由于意共在这个过渡时期采

① 《再生》周刊,1977年11月11日,第3页。

② 关于事后进行的讨论过程中未涉及的其他例证,见本章表4及1977年11月7日《多克萨公报》表5—1,第198页。

③ 还应该补充一点,天民党选民对意共也持有程度上大体相当的否定看法。

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所造成的。天民党虽然不再是意共的对手了,但是毕竟还没有成为意共的伙伴。因此,需要对天民党不时地加以批评,施加压力,推动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不宜再象过去那样对天民党进行正面的攻击了。意共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国内危机的看法。意共的声明,一般都坚定地认为危机应该由天民党负主要责任,然而意共又把天民党说成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能够与意共一起将意大利从困境中摆脱出来。<sup>①</sup>这种党的领导阶层的自相矛盾的表现,自然使群众增长某些洞察力并采取消极的态度。

表 6 1975 年意大利共产党选民对天主教民主党的看法

(百分数)

	是	否	无意见、无答复
天民党			
“是有钱有势人的党”	69.1	15.7	15.2
“是教士们的党”	76.7	7.1	16.1
“是老朽的党”	78.6	9.9	11.6
“是进步的党”	13.0	66.9	20.1
“是有效的党”	11.9	74.3	13.8
“是正直的党”	7.6	75.7	16.7

资料来源:根据焦万尼·萨托里和阿尔贝托·马拉迪所作的 1975 年度调查。当时被询问的共产党员共 658 人。

意共领导难以说服其一般党员接受党的新路线,除此之外,在某些坚定的党员中间,对意共的政策也出现了不满情绪。虽然认为意共的新作用将意味着黄金时代的到来的只是极为个别的党员,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对意共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抱很大的期望。这种

<sup>①</sup> 见保罗·弗朗基:《资产阶级与普通百姓》,载《再生》周刊,1977年10月14日,第9—10页。

情况今天依然存在。从很大程度上讲,正因为意共过去长期以来的声明和做法,使群众至今还抱有这样的期望。当意共还处于在野的地位时,它指责政府执行错误的政策,使国家贫穷落后,战后长年积累起来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意共的指责往往是言之有理的,它认为一旦意共对事件的进程能够施加影响,那么形势就会改变。确实,由于意共被排挤在政权之外,处于在野党的地位,并且出于竞选运动的需要,所以,意共对于其他政党,采取一味谴责、提出种种要求的做法,对选民则隐含地或明确地许下各种诺言。这些并不是想说明目前的各种要求期望,都是由于意共过去的声明和做法所引起的,因为有许多要求期望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的,而另一些则是由于其他政党的做法所引起的;但是,意共强调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指出并且夸大人民群众对于政治制度不满情绪,在这些方面,意共确实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上面所说的失望和幻灭的感觉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范围又有多大?这些是很难估计的。但是确实有迹象表明近年来群众越来越希望实现改革,并且确信这种改革必须是彻底的。七十年代头五年内,群众对政治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选民中认为意大利社会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使形势转变,持这种看法的人是越来越多了。<sup>①</sup>意共在1976年进行了一次调查,表明选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要求采取剧烈的改革措施。<sup>②</sup>这种迹象表明,意共党员中

---

<sup>①</sup> 1971年5月对一部分选民进行典型调查,其中17.5%同意认为意大利政治制度彻底错了的看法,到197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4.6%。见《民意研究》第1—2期,1975年第35页。1977年多克萨研究所询问的人中有47%认为,只有彻底改变社会政治制度才能解决意大利最重要的问题。见《多克萨公报》,1977年11月7日,第192页。

<sup>②</sup> 根据这次调查,被询问者中有71%对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持否定看法;45%认为需要进行“深刻的改革”;29%觉得现在的制度彻底错了,需要全盘改变。见基亚拉·塞巴斯蒂阿尼的报告:《一个心怀不满而政治上成熟的民族》,载《再生》周刊,1977年5月13日,第7页。



有相当一部分人目前有严重的失望和幻灭的情绪。

**表 7 1977 年夏季支持左翼政党的意大利青年关于如何实行改革  
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看法**

(百分数)

改革方式	支持极左派的	支持激进党的	支持意共的	支持社会党的
逐步的	14.0	34.7	49.2	55.8
激进的	64.0	57.1	47.4	39.1
革命	22.0	6.1	2.3	0.0
其他答复, 或无答复	0.0	2.0	1.1	2.2

**资料来源:** 根据《多克萨公报》, 1977 年 9 月 12 日, 第 122 页的评论和表 10.2, 该材料系 1977 年夏季对意大利青年进行全国性调查结果的一部分。

意共的领导当然清楚在期望和现实之间隐藏着各种危险。<sup>①</sup> 由于党充满自信并密切注视着社会的各种动力, 也由于党拥有广泛而有效的组织网, 否则也很难作别的预料。党的领导对于这些危险的顾虑, 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特别关心党在青年中的声望。<sup>②</sup> 意共在 1977 年春天和秋天还组织了许多专门的集会讨论青年问题, 这些集会揭示了青年问题上的广泛的前景。<sup>③</sup>

意共领导之所以关心青年们的政治态度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首先, 年轻一代的选民在七十年代中期对于意共在竞选运动的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 务必不要丢失青年们的支持, 这样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并取得更大的进步。<sup>④</sup> 意共知道一部分

<sup>①</sup> 意共领袖的声明中告诫党的支持者不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 至少就近期而言, “党员们不应存有幻想”, 准备“经历痛苦的过程”, 等等。

<sup>②</sup> 1977 年 3 月 14—16 日, 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在目前国内危机下共产党人对青年人生活条件所应承担的任务和活动”。该全会会议录见于《共产党人和青年问题》。

<sup>③</sup> 1977 年 10 月 7—9 日, 意共在罗马葛兰西研究院就青年问题举行了专题讨论会。

<sup>④</sup> 有关的讨论, 见贾科莫·萨尼:《意大利共产主义的群众基础》。

左翼青年是可能受极左派影响的。1973年3月，意共管辖下的波洛尼亚发生学生暴乱，数月后左翼青年举行群众性的示威运动，这些证明左翼青年是会受极左派影响的。虽然党的干部指责说暴力行动是由一小撮闹事者挑起的，但是相当数量的学生公开攻击意共的政策。这种场面显然使意共感到烦恼。最后，意大利青年深受失业和社会混乱之苦，其程度较老一辈人犹过之而无不及。

1977年夏，多克萨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表明：意共对青年们态度的顾虑是有根据的。虽然这些调查材料并不是专门用于说明青年们对意共的不满情绪的，但是确实证明，在年轻一代中，有许多人对意大利当前的形势是不满意的，并对将来感到忧虑。<sup>①</sup>同一次调查也表明了，许多青年认为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解决意大利社会的各种问题。这种观点在同情左翼各党的人们之中尤为鲜明。表7分析了这一部分青年的状况。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引出两个与本文讨论有关的结论。首先，意共采取的方针，如果过于温和，长此下去可能会使相当一部分支持者对意共采取疏远态度。此外，由于激进左派（激进党和极左派）支持者目前的政治方向，意共要重新吸引这一部分人是很少有希望的。由于激进左派当前的规模很小，所以上述的形势本身，在目前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无疑，到一定的时候，是会变成严重的问题的。因为激进左派的组织能赢得青年和未来选民的同情，而在全体选民中赢得的支持就稍逊一筹。对于1976年选举进行评论的人，大多数认为确实是这样的情况，<sup>②</sup>而最近所作的调查又证实了这种看法。表8所示，从1977年夏季对青年选民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左翼青年倾向于哪个党派，由于各种技术上的原因，表8的分析只能作为

① 主要的调查结果，见于《多克萨公报》，1977年9月12日。

② 关于1976年选举的分析，见阿尔图罗·帕里西和贾法朗科·帕斯基诺合编的《意大利选举的连续性和变化》，波洛尼亚1977年；霍华德·彭尼曼编：《意大利人在投票：1976年的议会选票》，华盛顿1978年。

一种试探性的估计,而不能算作客观现实的精确反映。不过,这些数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如果激进的左翼分子在左派青年中继续扩大自己的力量,那么意共就可能面临来自左翼的严重挑衅。

**表 8 1977 年夏季左翼青年选民支持各政党的情况**

(百分数)

极左组织	11.7
激进党	10.7
共产党	57.2
社会党	20.4

资料来源:根据《多克萨通报》,1977年9月12日,经本书作者重新计算。

因此,七十年代意共丧失了战后二十五年来在政治舞台上对极左分子的控制,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七十年代里,有好几个政治党派诞生了,它们与意共争夺左翼力量的垄断地位。这些新的激进的组织,缺乏任何群众基础,在议会和地方政权中<sup>①</sup>只享有

**表 9 1977 年夏季左翼青年对极左派行动和思想的态度**

(百分数)

赞成极左派的 行动和思想	激进党		共产党		社会党	
	行动	思想	行动	思想	行动	思想
一贯	8.2	22.4	1.5	4.9	2.1	4.2
经常	10.2	24.5	3.8	10.9	3.2	12.6
有时	22.4	24.5	10.9	26.3	8.4	25.3
从未	53.1	26.5	76.7	48.5	80.0	51.6
无答复、其他答复	6.1	2.0	7.1	9.4	6.3	6.3

资料来源:《多克萨公报》,1977年9月12日,第151页。

<sup>①</sup>“无产阶级民主党”是一个左派组织的联合团体,在国民议会里有六个席位,激进党有四个席位。其他几个激进左翼组织在议会里没有席位。

极少的代表权。它们的内部又有着严重的分歧。但是，它们毕竟是政治实体，它们的影响远远超过它们的人数。它们用左的言论来攻击意共，使意共难以对付。

现在还看不出这些组织是否能得到同情左翼的人的支持。1977年夏季，多克萨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意大利青年的绝大多数对于极左派组织所采取的不正统的暴力行动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对这些党派的思想却不是持明显的谴责态度。事实上，正如表9所示，同情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左翼激进组织的思想和立场有时候至少是抱着赞同的态度的。虽然要想根据这些情况对将来的选举结果做任何推断是不明智的，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意共如果继续执行现有的策略，就有可能丧失一部分同情激进派的选民的支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自己的群众基础。

## 国际方面

十分有趣的是，一直到1978年初，意共力量在国内的壮大并没有引起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紧张化，这一点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早在意大利组成一个并不排斥共产党的内阁之前，意大利和莫斯科的关系已经呈现紧张局势了，意共声称自己有独立自主地制定“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力。贝林格甚至提出，这种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意大利继续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才行得通。<sup>①</sup>根据这种看法，意共不仅表示愿意让意大利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并且还希望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此外，意大利共产党人越来越频繁地

<sup>①</sup> 1976年7月，贝林格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我觉得因为意大利并不属于华沙条约，……我们就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毫无拘束地走上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我要意大利不离开北大西洋公约，还因为是……我觉得在这一边安全些。”见贾恩保罗·潘萨的采访记，载《晚邮报》，1976年7月15日。

批评苏联和东欧，特别是在公民权力和个人自由等问题上。因为意共想借此强调“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以消除群众中对意共的猜疑情绪。<sup>①</sup> 意共所采取的这种首先关心本身利益的做法激怒了苏联的领导人，这也是人们早就料到的。

意共在政府事务中担负越来越多的职务，这也使不谐和的可能性更为扩大了。意共虽然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并没有达到进入内阁的目的。因此它要采取一些措施以显示自己不受苏联的操纵，以此来提高自己在天民党选民中的威信。从意共的党员成份来看，这样的发展是很可能的。例如，根据新闻界报导的意共领导的声明来看，大部分的党员和基层干部是在 1968 年以后入党的，<sup>②</sup> 意共领导人和党员中年轻一代人对“苏联神话”并不怀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也不象老一辈党员那样受到过去传统的束缚，因此在与苏联对峙的问题上没有顾虑。意共明确地表示要与天民党人实现“大联合”，面对这种“异端邪说”，莫斯科本来是应该作出强烈的反应的。

然而，直到 1978 年初，莫斯科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总的说来，苏联对于意共在政府事务中影响越来越大的这个事实是有积极反应的。诚然，莫斯科于 1977 年 6 月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中所发表的观点，发起的攻击，<sup>③</sup> 可以被看成是对意共的一次警告，告诫它不要利用在意大利不断扩大影响的形势来建立由“社会党人统治的”西欧各国所组成的反苏集团。不过，莫斯科避免从正面攻击意共所担负的政府责任。而意共也尽可能做到既贯彻自己的路线，又不对苏联进行不必要的刺激。这种态度在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

---

① 见《再生》周刊，1976 年 7 月 2 日，第 17 页。

② 见《晚邮报》，1976 年 9 月 30 日。

③ 攻击的原文，见《新时代》（莫斯科），第 26 期，1977 年 6 月，第 9—13 页。

国家》一书所引起的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意共并没有坚决果断地站在保卫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一边，而是力图充当调和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既要保卫西共制定自己路线的权力，又要避免对卡里略的一切论点表示赞同。<sup>①</sup>

迄今为止，意共和苏联之间还没有出现别的僵持局面，但是新的紧张关系仍然是会发生的。人们尽可以摆出各种情况，说明紧张关系将会出现，但是据笔者本人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并不在于意共会扩大它与莫斯科的距离，而在于将出现的各种问题会迫使意共采取与苏联相对立的立场。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共也知道，若与苏联发生彻底决裂，将会影响意共在别国共产党前的威望，也会影响其在本党广大党员中的威信。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显然是不会贸然行事，以免造成不愉快的后果。<sup>②</sup>正因为如此，意共与苏共公开决裂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展 望

如上所述，七十年代中期的进展使意共的力量大为增加，并扩大了共产党人在意大利政治制度中的作用。但是，也同样地造成了党内的紧张关系，为党的领袖造成了困难。

如果意共回到在野党的地位，那么以上这些问题大部分都会自行消失的。党内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希望出现这样情况的，而且事实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这将造成沉重的损失——特别是因为它会引起人们对意共所奉行的“历史性妥协”产生怀疑，

---

<sup>①</sup> 见贾恩·卡洛·帕耶塔在意共中央委员会的发言。帕耶塔曾在苏联谴责卡里略后率领意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见《团结报》1977年7月22日的报道。

<sup>②</sup> 一位名叫阿尔贝尔托·雅科维耶洛的共产党记者对苏联作了批评。见他与《团结报》编辑卢卡·帕沃利尼于1976年交换的意见，雅科维耶洛论证说，意共应该无所顾虑地改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即使会引起与苏联的反对，也在所不惜。而帕沃利尼则主张与一切共产党国家保持“友谊”。见《晚邮报》，1976年9月30日。

而这个方针，意共已经是坚持了多年了。正如贝林格于1977年10月在意共中央委员会一次集会上指出的那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意味着是一个倒退，而并不能解决党所面临的困难。<sup>①</sup>因此，意共采取这样的路线，其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新的选举看来也不会彻底改变各党之间的力量对比。1977年春季地方选举的结果表明，意共在选举中可能会有所起伏，<sup>②</sup>但是，既不会出现崩溃，也不会发生巨大的跃进。

综上所述，1976年开始执行的意大利政府的“过渡”阶段，很可能是要继续发展下去的，尽管在短时期内将继续存在一些不稳定和模棱两可的情况。

---

① 新闻界曾经广泛报道贝林格的发言。见《晚邮报》1977年10月24日。

② 1977年4月17日在少数地区举行地方性选举，意共在一些地区情况顺利，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损失相当严重。

## 二、法国：法国共产党的演变

威廉·J.戴维肖弗

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使法国共产党面临着相当不利的政治环境。现在法共不得不在新宪法下进行活动，这部宪法不仅大大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尤其加强了总统的潜在作用，而且，由于恢复一个选区在立法机关只有一名代表的规定，这就使法共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名额立即大幅度地减少了——从596个议席中的150席，下降至578个议席中的10席。<sup>①</sup>此外，自1947年共产党部长被逐出拉马迪埃政府以来，法共觉得自己一直处在政治上受歧视的地位，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它想改变目前的局面，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它又得不到其他左派丝毫信任。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以后，法共就象在共产国际时期那样（即1943年前）表现出一味屈从于莫斯科的外交政策的需要。

1962年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前的一段时期中，对法共来说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它在改变它的处境方面有所作为。在这个时刻，社会党领导人居伊·莫勒发挥了他的关键性作用，他把激进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一个临时的选举联盟，旨

---

<sup>①</sup> 《政治年鉴》，巴黎1958年，第145页。如果再研究一下其它统计数字，便可看出恢复在第三共和国大部份时间中实施的投票程序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根据第五共和国的选举法——下边将作进一步的讨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自动当选；其它候选人则进入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以多数票当选。）法共虽然得全部选票的20.5%，但是在国民议会里它只得1.7%的议席。如果按照第四共和国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共产党人可以得到88席而不是10席。见J.M.科特雷与人合著的《1936—1960年法国选举法和代表制的不平等》，巴黎1960年，第372页。原文引自威廉·萨弗朗：《法国政治形态》，纽约1977年，第111—112页。



在反对戴高乐派的规定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宪法修正案，以及削弱戴高乐派在国民议会里的表决力量。

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中设法扩大与当时的左派联盟(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共和派大会党人)的合作。1968年2月，共产党人甚至和以弗朗索瓦·密特朗为首的左派联盟签署了一份共同宣言，声称他们决心要使法国摆脱戴高乐总统独揽大权的局面，使国家恢复更加严格的议会制政府。<sup>①</sup>

如果在行动方面超越了文件的内容，那就意味着逾越了反对戴高乐主义的“纯粹防御性联盟”的范畴了。然而精确地说，从很早以来，法共心中似乎早已抱有这种想法，虽然它决心采取这一步骤是在196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同年早些时候莫里斯·多列士去世以后。早在1961年初，共产党号召社会党和它们联合起来，在法国“建设社会主义”。<sup>②</sup>1962年国民议会选举以后不久，法共紧跟这一创议，极力主张制定一个政府的共同纲领。<sup>③</sup>多列士去世之前，他已经提到：“唯一政党”的观点——即法共是使法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政治力量——是错误的斯大林主义。<sup>④</sup>到十七次党代会时，很明显，法共认为要有一个政府共同纲领作为过渡政权的基础，这个政权的经济改革计划只是使法国开

---

① 见《法国共产党与民主和社会党左派联盟的宣言》(1968年2月24日)，载《共产主义手册》，巴黎1968年3月，第3期，第19—35页。虽然文件中也反映出两党在某些领域里的分歧，但总的看来，它阐述了修改宪法的基础，后来在1972年，把这点也写进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政府共同纲领中。关于其它方面，宣言要求取消宪法第16条，因为该条赋予总统任意使用应变权的特权；要求实行在立法合约的基础上，由国民议会授权政府的体制；宣言还要求，如果由于各政党联合组成的政府发生分裂而使立法合约无法贯彻时，国民议会则自动解散。

② 《第十六次党代会决议》(圣德尼，1961年5月11—14日)，载于《共产主义手册》，1961年6—7月，第6—7合刊。

③ 《人道报》，巴黎1962年12月6日，第1页。

④ 莫里斯·多列士：《中央委员会上的闭幕词，1963年5月8—10日》，载《人道报》，1963年5月14日，第5页。

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它将成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桥梁”,在这次大会上,法共使用“真正的民主”这个词汇,以此来表明它心目中存在那一种类型的政权。四年以后,它又以更为惹人注目的精心构思的方式重申了它的战略。这一回,它把过渡性质的政府描绘成具有“先进民主”特点的政权。<sup>①</sup>就是由于法共持有这个观点,才有可能于1972年6月27月订立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府共同纲领。<sup>②</sup>

共同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人试图在法国的政治制度下,获得政府职权的策略,纲领文件可以说是法共领导在整整十年里所作“总体设计”的顶点。可是社会党人最后终于得到法共的让步,特别是公开表态,抨击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作用的苏联观点。这些,如多列士或其它深受共产国际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传统影响的领导人继续在法共领导岗位上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本章一开始要讨论的是:就政府共同纲领方面与社会党人进行一系列意见交换中的某几点。法共领导阶层中压倒的多数坚决走上使党越来越远离屈从于莫斯科的路线,而对莫斯科的屈从是法共过去历史的主要特点。这个决定产生于社会党和共产党达成谅解的迫切愿望,只有双方谅解才能使两党密切合作,夺取对政府的控制权,然后使法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法共承认与社会党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法共也认识到,为

---

<sup>①</sup> 见法共《争取先进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法国:中央委员会马恩河畔香比尼宣言,1968年12月5—6日》,巴黎1969年。

<sup>②</sup> 虽然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党单独制定了共同纲领的条款,但是在纲领制订后不久,左翼激进党也在文件上签了字。这个党是从激进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当时激进社会党的领导人是让-雅克·塞尔旺-施雷贝。分裂的原因在于对共同纲领问题的争论,即激进党是否属于左派的一部份,它是否应该和让·勒卡纳的支持者们一起参加中左联盟。罗贝尔·法布尔成为左翼激进党的主要发言人。

了促成合作，就必须抓住某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法共试图提出这些问题是它的进步和与社会党人联盟态度严肃的证据。

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先进的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明显差别在哪里？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第二，在这样一个政权里，法共的作用与它充当革命先锋队的传统主张能一致到何种程度？第三，上述问题的答案对于调和无产阶级专政教条与实施与社会党人共同统治的政治谅解的实际要求的努力有何种影响？对在这些事情上法共态度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发现法共怎样在政府共同纲领问题上与社会党人成功地达成协议，而且对于法共此后的行动（它的行动过去曾使许多观察家吃惊）也看得更加清楚了。

### “先进的民主”的概念

如果想了解法共对“先进民主”的解释以及理解其策略的内在含义，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法共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看法。早在1966年，在舒瓦齐勒罗瓦召开的讨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共产党大会上，法共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论点。在这个时候，法共中央委员会经济部对马克思的“资本过度积累”的概念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也成为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出新的分析的出发点，保尔·博卡拉是经济部开展这项工作的发言人。<sup>①</sup>

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相一致，博卡拉认为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资本的过剩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即总的剩余价值不如使用的资本增长得快。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倾向规律”便开始起作用了。博卡拉在论述马克思分析这个规律的“内部矛盾”问题时，表现出了他对这个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的不同看

---

<sup>①</sup> 保尔·博卡拉：《资本过度积累与公众为生产筹措资金》见保尔·博卡拉：《对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危机与结局的研究》，巴黎1974年第2版，第41—69页。

法。<sup>①</sup>博卡拉论述说，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反倾向性”在起作用，这些“反倾向性”周期性地提供“解决办法”，阻碍利润率下降。为了对这些解决办法作一般性的说明，博卡拉采用了“贬值”这样一个词，把它看成与“过度积累”相对立，他认为此种对立与马克思自己描述的关于“利润率下降倾向规律”中在起作用的反倾向是一致的。

根据博卡拉的观点，“贬值”指的是总的社会资本中的某一部分被迫放弃对有限剩余价值的要求，这种有限剩余价值在任何时候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能够得到的。于是，这一部分社会资本只能被迫在降低利润、无利润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进行活动。这一情况反过来使得现存资本的其余部分能够获得标准的利润率。就这样，积累的过程继续进行下去。根据经典的资本主义理论，博卡拉认为因市场危机而引起的周期性衰退才是“贬值”的原因。这种衰退造成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各种组成部分的贬值。在此种情况下，市场上的盲目力量，在历史上促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准利润率周期性地得到恢复，直到新一轮过度积累再一次威胁利润率为止。

博卡拉坚持说，经济越发展，资本过度积累导致剧烈的长期衰退趋势就越严重。根据他分析得出的结果，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为顶点的一系列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的景象。此外，每一次连续的危机都以资本的结构性的贬值为结果，促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加。最后的这个现象，据说正好解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

正如博卡拉及后来的其他法共资料说明那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一个公有经济部门，它的

---

<sup>①</sup> 关于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开展》一节，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9—296页。

任务不仅帮助稳定经济，而且为属于垄断组织的私人资本保持标准利润率，从而促使垄断组织不断地积累资本。<sup>①</sup>按照这种观点，通过在两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时，利用垄断集团的定价政策，剩余价值实际上从公有经济部门转移到垄断集团那里去。离博卡拉最初论述过度积累理论约五年以后，法共中央委员会经济部出版了一部两卷本教科书，该书写道：

政府承担提供(部分亏本地)铁路、航空和海上运输费用的资金，政府也为几乎全部基础研究和部分实用研究和发展提供资金。目前正是政府同意在主要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包括冶金和航空工业，化学和电子工业，军备和海军建设。正是政府通过财政扣除和加速摊提等复杂的制度，鼓励自行筹集资金和鼓励固定投资。

由于政府亏本投资，由于这些投资不要利润或者仅仅是使公有资本获得低于平均率的利润，政府把在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内获得的巨额利润中的大部分给予垄断集团。<sup>②</sup>

法共的分析还指出，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垄断企业在战后漫长时期内的积累(这段时间有政府的资助)进入了超积累的新阶段。因此为了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借以恢复标准利润率的问题又一次出现了。<sup>③</sup>据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宁可依靠通货膨胀的紧急措施，而不愿再度听凭私人资本再次大幅度的贬值(即固定资本贬值)。那就是说，它直接减少付给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或者，用马克

<sup>①</sup> 就法国来说，这个公有的经济部门将包含由人民阵线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所形成的公有资本。

<sup>②</sup> 法共经济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巴黎1976年第2版，第1卷，第40—41页。一份法共研究报告曾试图指出，在1969年，国有企业占法国全部活动资本20%，但是它获得的利润只占总利润2.4%。报告坚决认为，如果这些企业只要获得法国其它企业所要求的平均利润，它们的利润本来也会达到300亿法郎。读者从这里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钱已经被用来补贴垄断企业的利润了。见亨利·塞热：《国有企业》，巴黎1975年，第148页。

<sup>③</sup> 见保尔·博卡拉：《加速通货膨胀，过度积累和岁入政策》，载巴黎《经济与政治》月刊第262期，1976年5月，第5—27页。

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加强剥削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书指出，“在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垄断资本价值的扩大，只有通过通货膨胀。在利润率方面，只要有什么因素使垄断集团所需要的价值发生下跌，都成为通货膨胀和加强资本主义剥削的理由和托辞。<sup>①</sup>

法共继续说，群众的购买力缩小，对货物的销售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国家垄断资本为抵消资本超积累所作出的努力会造成“停滞膨胀”——长期的高度通货膨胀伴随着低消费和高失业。从1967年突然发生这种现象的病症，法共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在那时开始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批判了通过市场经济扩大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方法，给它绘出一幅慢性停滞膨胀的图画，描写出标志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危机的情景。从这个观点出发，法共的理论家们一方面变得越加重视理论研究，但同时又更加关心政策。

依照马克思的理论，法共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不断扩大生产力，积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种固定资本的不断积累，反过来促使货币资本的进一步扩大。法共继续争辩说，这样一种过程抑制了人力劳动部分的自我发展。然而法共认为，在自动化时代，象目前法国存在的那样高度发达工业社会的条件已经改变了生产率的首要必需条件。法共宣称，在自动化时代中(法共报纸把它称为“科学工艺革命”)生产率已经越来越成为高水平工艺技术的职能，尤其是越来越依靠有效地应用此种工艺的工人技能的全面发展。可是在这里，法共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满足自动化

<sup>①</sup> 法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卷，第420页。另见菲利普·扎里菲昂：《通货膨胀与货币危机》，巴黎1975年，第162—169页。法共关于研究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工人工资问题的研究报告，见亨利·诺洛：《从现代的苦难到平平常常的苦难》，载于《经济与政治》月刊，第251—253期，1975年6—8月，第184—188页。

的需要，因为它是建立于依靠缩减人力开支、追求利润和增加积累这样一种逻辑概念上的。<sup>①</sup>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辩证法观点出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工作母机发展为根本的工业革命一定要让位给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的科学工艺革命。<sup>②</sup>

那末法共建议采取什么正确的措施才能解决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呢？就象博卡拉提出的那样：

今后，问题在于抛弃资本积累和利润这一主要目的。在尚未抑制私人的积累和利润以前，问题在于把积累和利润降为一个从属的成分，使它们的相对比重随着关键的工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实行渐进的国有化而不断降低。这些国有化结合工人和民主力量对政府的管理和改造，为不同于资本积累和利润为目的的政府干预提供了条件。这样为满足各种不同类型劳动者需要的目的方能达到。<sup>③</sup>

为了突出此种陈述中的重点，新经济逻辑这一个词在党的文件中已经使用得相当广泛。这样的逻辑需要双重前提：首先，“人生生产的目的是为他自己，而不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利润和积累”；其次，在科技革命开始的时候，为人，为劳动力的投资，已经成为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sup>④</sup>法共认为一旦这些必要条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被接受的话，不但由于资本贬值而引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将容易地得到解决，而且在生产方面注意力也会立即集

① 例如，见法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卷，第131—142页；见帕特里斯·格雷弗：《人民的需要和政府的资助》，载《经济和政治》月刊，第258期，1976年1月，第45—58页。

② 保尔·博卡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资本的超积累和贬值的情况以及这个理论运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详细说明”见博卡拉：《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第313—314页。

③ 保尔·博卡拉：《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建立先进的民主的某些意见》，见博卡拉：《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第327页。重点符号原有。

④ 马克·迪皮伊：《国有化哪些集团？为什么？怎么做？》，巴黎1974年，第99—100页。

中于人类劳动的自我发展。如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那么在法国由于解决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也就会开始根绝“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矛盾的技术基础。”<sup>①</sup> 在经典的马克思术语中，这意味着体力和脑力劳动间的区别将开始消灭。因此，法共宣称：法国面临着“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sup>②</sup>

确切地说，新经济逻辑的两个前题有赖于先进的民主政权。因此，法共历来把这样一个政权设想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sup>③</sup> 的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坚持说，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先进民主政权的首要目的：

把资本主义设法变成可忍受的资本主义不是我们的目标，尤其不是先进民主的目标（所有改良主义政策都枉费心机地企图这么办）。恰恰相反，问题是要建立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新关系，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必需和可能（通过国有化，最重要的是通过一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sup>④</sup>

总而言之，先进的民主政权使用上面提到的方式直接对付超积累问题，来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动正面的进攻。这个政权在概念上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人民阵线和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党联合政府制不同，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开始向社会主义立即过渡的经济模式。

但是要建立先进民主政权必须把关键性的大量投资资本，从资本积累的逻辑中摆脱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共坚持认为，

---

① 见保尔·博卡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和在先进民主中的作用》，载于博卡拉：《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第359—389页。

② 法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卷，第185—190页。关于法共研究这个问题的技术经济方面的考虑，见莫里斯·德凯洛：《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式，理论随笔》，巴黎1973年。

③ 见《法国共产党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南泰勒，1970年2月4—8日）第19节。载于《共产主义手册》第2—3期，1970年2—3月，第433页。

④ 法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2卷，第415页。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有化是必不可少的。在 1972 年与社会党人签署共同纲领的谈判时，共产党领导大大地缩减它原来设想的国有化范围，共同纲领确实要求把仍属于私人所有的银行、保险和信贷机构实行国有化，国有化范围还包括如下工业“集团”：达索、罗塞—于拉夫、罗恩—普朗克、法兰西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托姆森—布朗特、奥内威尔—布尔、佩希内—于吉内—居尔芒、圣·戈班—邦—阿—穆松和通用电气公司。<sup>①</sup> 根据共产党的统计，这些企业加上现有的国营企业，将会使国营企业在全国工业投资中的比重高达 50% 以上。

但是根据法共的观点，这个最低限度仅仅是一个起点，一个出发点，因为在与垄断资本积累作斗争的过程中，为了使新经济逻辑能够占上风，先进的民主政权必须不断加强它施加于其它经济部门的影响。正如一位共产党作者指出的那样：“先进民主革命进程是不可逆转的：革命进程必须一直扩展，直到社会主义；或者失败了，恢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我们谈到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所使用‘阶段’这个词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阶段。”<sup>②</sup> 因为保证最低限度的新经济逻辑的第一批国有化，不足以建立社会主义，所以必将要求进一步的国有化。

按照共产党的观点，推动前进的政治支持力量，来自通过新经济逻辑实行的第一批“经济结构改革”的结果。把主观上的政治力量和客观上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以推进新经济逻辑，达到成熟的社会主义，这才是隐藏在先进民主背后的全部思想实质。此外，根据法共看事物的方式，有可能实现这种联合，因而在政治上为开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sup>①</sup> 见法共：《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府共同纲领，1972 年 6 月 27 日》，由乔治·马歇作的前言，巴黎 1972 年，第 115—116 页。

<sup>②</sup> 帕特里斯·格雷弗：《论先进的民主》（在巴黎联盟会议上的讲话），载于《经济与政治》月刊，第 188 期，1970 年 3 月，第 23 页。

因此,先进民主的观念体现着革命的战略。在1970年举行的法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全面地制定了这一战略。乔治·马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

在采取反垄断的措施中,先进民主仍旧不能抑制人剥削人的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将会逐渐地和有计划地削弱垄断企业的力量;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它将会使工人阶级的权威及其政治影响得到加强;它将有助于孤立反动派,把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它将为法国绝大多数人宣布他们赞成法国走向社会主义创造最好的条件。<sup>①</sup>

马歇在1976年对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个意见:“如果人们自己,如果人民大众自己不主张改变的话,什么也改变不了。共产党人越是只满足于等待资本主义的消灭,越是只在指望陈腐的制度和政策存在的条件下会产生危机的话,那么其后果对于劳动人民和国家来说都是越加有害的。”然后,在谈到法共政策的时候,他总结说:“然而人们越来越被迫意识到:为了使法国摆脱危机,为了使每个人的命运得到明显持久的改善,为了使法国产生新的跃进,一个真正的全面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在政策、政权和社会方面都要改变。”<sup>②</sup>

总之,法共明确地表明,“经济结构改革”远不是“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可以承受的制度”,它的目的是要立即实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过渡。在关于先进民主政权的问题上,法共始终认为它要起革命先锋队的作用,我们只要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整个问题便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在发挥其先锋队作用的时候,法共一方面使人民大众认识到实行新经济逻辑的必要性,另一

---

<sup>①</sup> 乔治·马歇:《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南泰勒1970年2月4—8日)》,载于《共产主义手册》,第2—3期,1970年2—3月,第61页。

<sup>②</sup> 乔治·马歇:《法国的社会主义》,在第二十二次党代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圣德尼,1976年2月2—8日,载《共产主义手册》,第2—3期,1976年2—3月,第31、32页。

方面它说，只要达成政治上的联合，它保证法国可以逐步走向社会主义。

新经济逻辑的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需的经济上的具体措施，它填补了某些理论上的空白，因为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以来，没有一个西欧共产党曾经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应该予以注意。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整个时期中，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政治术语，也就是以各共产党的政治盟主地位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填补这个空白的效用，因为它认识到共产党政治盟主权原则是社会主义绝对必要的东西，它将是与社会党讨论政府共同纲领时最主要的一点。如果共产党在这个原则上作出让步，正式声明放弃一党制的观点，那末法共在社会主义基础的理论概念上将需要作出重大的修改。先进民主的新经济逻辑便于放弃一党制的概念。因而，法共可以宣称，它放弃一党制的概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妥协，丝毫不是表示它放弃作为革命先锋队的任务。事实上，它更可以这样说：它和社会党建立的政治协作越密切，就越有必要使它发挥革命先锋队的作

### 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谈判

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谈判的进展，显然，共产党只有放弃其一党制的概念，才能使社会党满意。放弃一党的原则必须包含这样的内容，即在法国的政治制度中，也要放弃控制其它党派的意图，包括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党派在内。但是共产党则倾向于把作为统治伙伴的社会党的政治权利与反对党的政治权利区别开来。

很早以前，共产党人对他们所提出的以“权利和义务均等”为基础与社会党共同执政的建议的含义，提供一个合理的可以接受的解释。例如，在瓦尔德克·罗歇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他写道：“他

们(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将会仔细地制订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他们将以讨论和有益的妥协来取代冲突。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不可能达成协议。那末,按照民主原则由多数决定,少数应服从多数。”<sup>①</sup>

可是在关于反对党的权利问题至少在更迭的可能性问题上,共产党的态度相当顽固。这种更迭指的是非社会主义政党通过投票箱取代社会主义政党。在1970年早些时候,在两党经过了几个月的讨论以后,在发表的一个文件中对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份结算表”记录了两党在许多领域里的协议,可是它表明在更迭问题上仍旧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文件中有一处地方,社会党坚持说,“如果国家以自由的意志表明它不再信任多数党,那末多数党就应该交出政权,在野继续斗争。”<sup>②</sup>另一方面,共产党宣称,“共产党认为,受到大多数人民支持而存在的民主政权,将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当作它的主要任务,而劳动人民将给予这个政权以更多的信任,这将使它不断得到加强。”<sup>③</sup>即使共产党答应尊重人民选举的裁决,但是这一声明根本没有直接提到更迭的问题,因此,人们对共产党将如何估量“劳动人民”的“信任”,产生疑虑。

因此,我们从“第一份结算表”中可以看出,在关于更迭的问题上,两党没有取得协议。共产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它可能持有不包括更迭在内的阶级的民主观念,此种情况两党在红色“马克思主义思想周”公开交流意见的最后阶段,用更加直截了当的语言提出来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后法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当社会党丹尼斯·塞佩德提出更迭的问题时,弗朗索瓦·比尤代表共产党代表团说道:“一旦结束了

<sup>①</sup> 瓦尔德克·罗歇:《法共的前途》,巴黎1970年,第123页。

<sup>②</sup> 《法国社会党、共产党关于政治上一致的基本条件的会谈的第一份结算表》,载《社会党公报》第165期,1970年12月23日。

<sup>③</sup> 同上。

资本主义政权以后,必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再要求解释,我认为,这将是一张不可能恢复资本主义政权的单程票。”<sup>①</sup>后来比尤又说,他认为更迭的概念是一个错误的论点,因为这是要社会主义走回头路。<sup>②</sup>然而,他也的确认为,如果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能够同意,一旦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终止资本主义替代它的问题,那末在先进民主的过渡时期,仍有可能讨论更迭问题。

这个意见,即在先进民主过渡阶段中的更迭问题已公开讨论,终于使两党避免在意识形态方面陷入僵局,于1972年达成了共同纲领的协议。尽管在与共产党人讨论更迭问题时,社会党的许多领导人并不愿意区别先进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权,此种区别在1971年6月塞纳河畔埃皮内“社会党团结大会”上以微弱多数通过的动议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次大会选出以弗朗索瓦·密特朗为首的党的新领导。<sup>③</sup>在三个月讨论和妥协后产生的共同纲领,也遵循同一方针。在共产党人一次情况介绍中,马歇特别指出:共同纲领的目标在于建立先进民主政权,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后来纲领文件写道:

普遍、直接和秘密投票选举的正规组织使人民得能表达他们的意志:当选者应做些什么,政府应怎样管理。多数党和反对党一般都应尊重普选所表示的裁决。

倘若全国不再信任多数党,这个党必须交出政权,再次处于反对党地位进行奋斗。但是民主政权是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存在的,它把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作为首要任务,因此一定将得到他们更加积极的信

---

① 马克思主义思想周(1971年4月22—29日),《巴黎公社一百年后法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巴黎1971年,第115页。

② 同上书,第126页。

③ 见《多数通过的动议》,塞纳河畔埃皮内,1971年6月11—13日,载《社会主义简报》,1971年6月15日,第275期,第1页。

任而加强。<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段文字反映出共产党与社会党在“第一份结算表”中见解的分歧，勉强拼凑在一个看法里。

共产党在包含着社会党对更迭问题的清楚解释的文件上签了字，这一事实确实值得注意。尽管更迭的运用仍旧限于先进民主过渡政权。而且，在提到问题的一段文字中，共产党人仍然表现出令人注目的意向，即他们不承认更迭会导致“进步”政府下台。

文件后面部分谈到政治上反对党的权利时，共产党没有把先进民主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1973年出版的流传甚广的马歇的一本书中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对我们有利或者不利，我们都尊重由普遍、直接、秘密和按比例投票作出的裁决。譬如说，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在没有法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承担或进行法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呢？”<sup>②</sup>同书另一节里马歇还说：

我曾经指出，在我们工作的任何阶段，我们意在尊重全部自由。其中自然包括结社自由。因之它当然也指政党成立和活动的自由，包括反对党在内。在社会主义法国，少数党的权利将受到严格尊重。只要它们根据民主规则和法律范围进行活动。反对党由于具有与其它团体同样的自由，由于在所有选举中都实行比例代表制，这样，它们聚集新的多数的权利就能得到保证。<sup>③</sup>

1976年第二十二届党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在提到这个问题时说：“在建设新社会的每一阶段，赞成普遍投票将是继续进行改革的条件。所有政党必须尊重普选的裁决。按比例投票使所有政治组织，不论在朝在野，得到符合它实际影响的代表权，保证少数

---

① 法共：《共同纲领》，第149页。

② 乔治·马歇：《民主挑战》，巴黎1973年，第116—117页。

③ 同上书，第129—130页。也可参看《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共同声明》，载《人道报》，1975年11月18日，第1、3页。

党的权利不受损害。”<sup>①</sup>1977年3月，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发表联合公报说：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要求人们为民主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迈进作出更大的努力。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决心在政治和社会力量多元化的条件下工作，遵守所提出的保证，发展所有个人和集体的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示威自由、人们在国内外流动自由、组织工会自由、工会的独立性、罢工权利、私人生活不受侵犯、尊重普选、执政党民主更迭的前景、宗教自由、文化自由，表示哲学、文化和艺术不同思潮的自由。<sup>②</sup>

但是近在1971年弗朗索瓦·比尤还在说，社会主义是单程票。倘若更迭意味着“确实建成”的社会主义向后倒退的话，那末共产党尊重“更迭”原则的决心，到底怎样坚定尚属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当然选择增加“先进民主阶段”的办法，借以避免碰到社会主义下的“更迭”问题。人们可以读一读第二十二届党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从中可看出它在努力为这种出路打基础。决议谈到共同纲领的更新是“把民主推进一步”，接着断言：“实际上，法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赢得民主的所有阶段，都是沿着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许多里程碑，它将足以使法国人民正确选择未来。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将尊重人民的裁决。”<sup>③</sup>但是如果法国人在“确实建成”社会主义以后，表示希望退回去，那时候共产党将执行什么样的最终政治行动路线，仍属未知之数。这个问题在法共政治局本身，也许还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

但是，目前这个党的领导在民主问题上主要关心的是党在人

---

① 《共产党人要为法国做的事》(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圣德尼，1976年2月4—8日，载《共产主义手册》第2—3期，1976年2—3月，第376页。

② 全文见美国对外广播新闻处：《每日报导：西欧》，华盛顿，1977年3月4日，第N1—2页。重点符号另加。

③ 《共产党人要为法国做的事》，第378页。重点符号另加。

民中的形象。党的领导人清楚地懂得，不论从保持与社会党的同盟，或者有助于吸收使共同纲领合伙人取得执政的足够的选票来说，党在未来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机会，主要地依靠对民主承担责任的表白。这种理解在马歇对二十二届党代表大会所下的命令，要求在党的纲领中删去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sup>①</sup> 得到令人瞩目的证明。事实上，自 1970 年以后党的官方文件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句已经几乎完全绝迹。1975 年法共甚至拟订了“有关自由宣言的宪法草案建议”，希望通过公众辩论，把这段文字印在现有法国宪法之前作为序言。<sup>②</sup>

意味深长的是，法共感到它被迫把自己扮演成民主自由保护者而登上了国际舞台。中央委员会委员皮埃尔·朱坎（他是“草案建议”起草者之一）于 1976 年 10 月 21 日在巴黎互助会堂参加一个由一伙数学家发起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抗议对六个持不同政见者的虐待，其中两个是苏联公民，一个是捷克公民。尽管朱坎竭力想把苏联与捷克共产党政府同作为另外抗议目标的三个拉美政府区分开来，但他完全代表法共在会上说道：“因此我们不接受，不论在苏联或者在捷克，出现了公民因为表示他们的观点而遭受迫害、监禁或拘留的做法。我们永远不会接受，不论在哪个国家可以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使用蹂躏人权的手段。”<sup>③</sup>

苏联政府马上在塔斯社公报中作出反应，公报说：“苏联舆论难以理解法共代表怎么会具有此种恶劣的想法。”它又说，“此种做法只能支持绝对仇视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敌人。”<sup>④</sup> 最使

<sup>①</sup> 见乔治·马歇：《法国的社会主义》，第 44—51 页。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不用“无产阶级专政”字眼，而用“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

<sup>②</sup> 见法共：《自由生活：一个自由宣言的建议，提请法国人民讨论》，乔治·马歇写导言，巴黎 1975 年。

<sup>③</sup> 朱坎谈话的原文转载于《共产主义手册》，第 11 期，1976 年 10 月，第 124—126 页。

<sup>④</sup> 见《世界报》，1976 年 10 月 21—27 日，第 5 页。



苏联官员恼怒的是法共选择这个特殊会议提出反对政治迫害的抗议,这样就让人们可以推论:苏联政治自由的状况原来与乌拉圭、玻利维亚和最令人憎厌的智利一模一样。

当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一个最主要的抗议目标)最后被释出狱,同时驱逐出国时,法共政治局尖锐谴责此种不是“监狱”就是“放逐”的做法。<sup>①</sup>它还辛辣地反驳早些时候塔斯社的公报,它指出,真正尊重“思想斗争”的原则,就应该“避免让阶级敌人毫不迟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比作法西斯国家的暴行。”然后它直截了当地表明,它对国内影响也与对国外影响一样重视。它又说,布科夫斯基事件突出地表明了“法共二十二届党代表大会规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法国人民以民主的方法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要建设具有法国特色的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

紧接着这次双方交锋之后,很快出现第二件事情,捷克政府开始镇压“七七宪章”的签字者。<sup>②</sup>《人道报》评论说:“根据《红色权利报》报导,捷克当局认为‘七七宪章’签字者的行为系受反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指使,对他们提出控诉。法国共产党人对此无法掩饰他们的惊诧。”评论继续说:“我们(法共)不能允许那种做法,暗示在社会主义里一切不同的意见都有罪,不准谈论,或者一说出来就要予以镇压。法国共产党人无条件谴责,这种打击个人或集体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的权利和自由的做法。他们宣称这种‘打击’与社会主义理想是格格不入的。”<sup>③</sup>

<sup>①</sup> 它的声明发表于1976年12月7日,载《共产主义手册》,第1期,1977年1月,第124页。

<sup>②</sup> 七七宪章是由捷克一些知识分子和国内其他社会阶层人民签字的宣言。要求政府尊重捷克宪法和197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规定的政治和个人权利。

<sup>③</sup> 《人道报》,1977年1月25日,转载于《共产主义手册》,第3期,1977年3月,第120页。

法共也没有让七七宪章问题到此为止。当四个杰出的捷克公民(其中三人签名于七七宪章)被判长期徒刑时,《人道报》宣称,捷克当局“不能指望”法国共产党人赞同“违背正义的行为,不论被定罪者的政治观点如何”。文章详细地以下面的语气阐明它的立场:“不论哪个国家或哪个党,更不管什么虚伪的国际团结都不能使我们接受此种在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对正义讽刺的行为。我们不得不说:破坏捷克国家声誉最严重的,不是不满的知识分子在海外散播声明,而是在他们本国遭受的待遇。”<sup>①</sup>文章然后继续对苏联进行间接的攻击:“就我们来说,我们不会忘记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在邪恶、专横和破坏社会主义合法性面前,我们不同意保持缄默。”<sup>②</sup>

法共打算批判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合法性”标准达到什么程度,尚待观察,但是党的领导现在确实认识到,他们在国内的信誉与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件是难以隔绝的。法共对不同政见者的权利越是采取使一般人能接受的姿态,当然就有可能使它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真正义务上的矛盾越大。

总之,法共已修改它的革命教条,以适应法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实际。在适应过程中,它有分量地调整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它表白对民主承担义务,尽管它批评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合法性,但是,它在七十年代后期对国内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她过去看法的继续。第一,法共保持基本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来到,它是历史发展的较高阶段。这个信仰显然来自它对法国的“先进民主”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概念。从这个信仰来看,必须记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各“阶段”不能够或者至少不应该逆转,因为这些阶段反映历史本

---

① 《人道报》,1977年10月19日,第1页。

② 同上。

身的逻辑,不以区区的议会多数而转移。

第二,法共推进历史的明确目标,即通过先进民主的不同阶段,使法国进入社会主义。它继续坚持列宁主义者所说,党是革命先锋队的观念和列宁主义所主张的党的组织原则。法共自定的革命先锋队任务是否能与西方民主基本价值真正并行不悖,尤其是由于这些价值包含关键性的更迭问题,还是个真正的疑问。

### 外交政策展望

虽然在共产党与社会党讨论政府共同纲领时国内问题占重要地位,但外交政策也同样是讨论的一个方面。法共在这方面的基本关心点清楚地写在党的共同纲领原始草案上。草案文件说:

民主法国将完全由自己决定其制度、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我国人民把国家推向经济和政治民主,然后推向社会主义的事业,根据由其自身选择的方式和手段行事,不许任何外国干涉、施加压力和报复破坏。<sup>①</sup>

在这个总纲之内,共产党支持普遍裁军,主张法国立刻放弃核打击力量,同时号召完成全欧集体安全的安排。<sup>②</sup>由于考虑到后一点,左派新政府应采取“使法国退出大西洋公约的措施。”因为它是一个美国控制下怀有侵略目的的政治军事组织。<sup>③</sup>

正如纲领草案所证明,从法国的观点看来,先进民主政府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和其他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国;但是法共近些时候来申明,它拥有制订自己的路线而不受莫斯科干预的权利,法共有时候——特别在华沙条约国 1968 年入侵捷克时——批评苏联

<sup>①</sup> 法共《改变路线:普遍团结的民主政府的纲领》,乔治·马歇写导言,巴黎,1971年,第220页。

<sup>②</sup> 同上,第221—223页。

<sup>③</sup> 同上,第222页。

政策是为了以显示其独立性。这段历史加上上面引用过的总的宣言,足以使社会党感到满意。由此可见,共同纲领大部分符合刚才概略提到的共产党的观点。但也有明显不同之处,在共同纲领上规定,大西洋联盟的解散要以华沙条约同时解散为条件。<sup>①</sup>

法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缩减美国在西欧的存在。必须注意,法共的外交政策正好符合苏联的战略目的。同时,法共夺取政权的努力,使苏联与美国作超级大国交易时更加复杂化。

如果把后一点记住,那末我们对党内制订外交政策的政治局委员让·卡纳帕于1975年4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就更能理解了。卡纳帕在谈到“1975年和平共处和阶级斗争”主题时说:

和平共处的发展会暴露出几个真正的问题。我们相信,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必须以全体共产党的共同原则为基础逐个解决。各党的团结,它们的共同行动必然不可分割地相互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方针作任何改变,不允许以各国间和平共处的名义,改变我们的方针,因为它将不利于我们正在领导的反对大资本的强国以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sup>②</sup>

他使用更尖锐的语言断然声称:“存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对抗,是无法缩小的对抗。不可避免地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即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告终。和平共处一点也不能结束此种对抗。它只是一种框架,对抗在框架中展开着。”<sup>③</sup>

这个报告在法国共产党报纸上引起一场紧张的宣传运动,宣扬这个报告论点的正确性,指出赫尔辛基最后决议所描绘的缓和

<sup>①</sup> 见法共《共同纲领》,第174页。

<sup>②</sup> 让·卡纳帕:《1975年的和平共处与阶级斗争》(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巴黎1975年4月14—15日,载《共产主义手册》,第7—8期,1975年7—8月,第80页。

<sup>③</sup> 同上,第10期,1975年10月,第85页。

对法共没有意义,当然对其他任何人也没有意义。事实上,法共有意警告美国和苏联:法共“极度警惕,不容对和平共处的解释断章取义,把缓和运用的范围从维持国土‘原状’展伸到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现实中去。”<sup>①</sup>

就西方而言,法共报纸接二连三地引载美国官员关于共产党参加西欧政府的否定性的谈话,认为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破坏,法共认为民族自决与缓和以及赫尔辛基协议有至关重要的关系。<sup>②</sup>与此同时,法共发动反对德斯坦领导下法国“滑向大西洋主义”的运动,即反对法国加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sup>③</sup>以美国官方对共产党参加西欧政府持否定态度和所谓法国“滑向大西洋主义”为理由,法共指出,以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政府为首的“神圣同盟”已经在大西洋国家中重新形成。

当上述四国政府的领导人于1976年6月26—27日在波多黎各会议上达成协议:如果意大利最近选举形势表明意共能参加政府的话,就撤销对意大利的经济援助。这一下,反对四个西方政府的呼喊声大大升级。当决议新闻一泄漏,法共政治局立刻发表下列声明:

这个决定形成令人难以接受的对意大利内政的干涉,它企图对人民恫吓。意大利人民和法国人民一样,他们渴望用民主方式实现符合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并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个决定是新的证据,证实聚集在大西洋集团保护伞下的大资产阶级,有意向人民的民主选择作出挑

---

① 见雅克·德尼:《赫尔辛基会议的成功:行动的阶段和起点》,载《共产主义手册》,第10期,1975年10月,第74—88页。同见马丹·韦莱:《今天的和平共处与阶级斗争》,载同上书,第7—8期,1975年7—8月,第71—85页。

② 例如,见雅克·德尼:《福特和基辛格的有限主权论》,载于《法国新闻》(巴黎)第1560期,1975年10月7日,第19—21页。

③ 例如,见热拉尔·斯特雷夫:《法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事实上的再次侵入》,载于《共产主义手册》第4期,1976年4月,第78—88页。

战,抗拒普选的裁决,嘲弄国家的主权。”<sup>①</sup>

但是如果说法共以此企图阻拦美国及其他三个西欧伙伴团结一气保卫西欧政治现状的话,它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信息传递给莫斯科。卡纳帕的报告清楚地激励苏联和东欧政府,要正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实际上,这些话就是要它们不可允许美国和其它的大西洋伙伴以为缓和就包括在西欧维持政治及领土的现状之中。<sup>②</sup>为了强调这一点,此一时期法共强烈支持葡萄牙共产党,后者由于竭力采取僵硬的革命路线而受到意共和西共的批评——虽然法共领导并不完全同意葡共的做法。<sup>③</sup>

在1975年10月拟议中的欧洲共产党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卡纳帕又一次谈到这个题目。他坚决认为:和平共处不意味保持国内政治现状,而当前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客观地把进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造,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放到了议事日程上。”此外,他又说,循着这条路线的“社会进步”,不能认为“完全脱离缓和与和平共处的发展。”<sup>④</sup>

法共确实对1976年6月29—30日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最后文件的措辞感到满意,特别是序言第三段到会议批准的决议这一部分。<sup>⑤</sup>但是法共领导仍然关注缓和

---

① 《法共政治局声明》,巴黎1976年7月20日,载于《人道报》1976年7月21日,第1页。

② 法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大使在1974年法国总统选举时访问爱丽舍宫一事,感到特别恼火。法共领导把这次拜访,看作苏联支持法国社会和政治现状的直接标志。对这次插曲恼怒的程度可以从下边事实来衡量:大约二年以后,马歇在对记者谈话时又一次提起此事。见《人道报》,1976年4月30日,第8页。

③ 例如,见刚由里斯本回来法国代表团的声明。出处同上。1975年8月18日,第2页;马歇的评论见《世界报》,1975年8月20日,第3页。

④ 《卡纳帕在柏林会议中的讲话》,载于《法国新闻》,第1562期,1975年10月20日,第20页。

⑤ 见《争取欧洲的和平、安全、合作与社会进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通过的文件)柏林,1976年6月29—30日,载《人道报》1976年7月3日,第4—5页。

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这一点在马歇对会议的演说中有明显的表现:

和平共处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资本主义党之间的关系中,产生新的问题。首先是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正确思想;然后要竭尽所能尽快结束垄断资本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有些人使用大部分国家工具继续与政府搞好合作关系(获得相当成功);另一些人正以可以使用的每一种方法与这些政权进行斗争。这是正常的,没有矛盾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以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名义进行活动,破坏我们所领导的反对大资本权力、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利益。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比我们关心工人阶级和人民更高的责任。<sup>①</sup>

恐怕某些外国可能采取行动反对有共产党任部长的左派政府,这种考虑使法共改变初衷,在1977年5月11日赞同运用部署在各处的打击力量。根据中央委员会路易·巴约的长篇报告说,共产党决定,鉴于法国常规武装的现状,总抑制力量(左派政府能在国内外获得的全部政治和军事支持)在目前必须包括核抑制力量在内,才能保卫共产党—社会党政府对抗外部侵略。<sup>②</sup>同时法共支持以普遍核裁军为基础的未来的国防政策。

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注意到:法共领导根本不把党在和平共处与阶级斗争关系上的僵硬方针(1975年起经常出现在法共报纸上)看作与它近几年来蓄意培植的民主形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这两种观点并存在加斯东·普利索尼埃于1976年2月在苏共二十五届代表大会的法共“颂词”里。<sup>③</sup>马歇在东柏林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也有同样的内容。一方面,法共领导人着重

---

① 《一个有深刻意义进展的时期》,欧洲共产党会议上马歇的讲话,柏林,1976年6月30日,载于《人道报》,1976年7月1日,第2页。

② 见路易·巴约:《左派取得政权的政策》,载于《共产主义手册》,第7—8期,1977年7—8月,第14—23页。

③ 《真理报》,莫斯科,1976年2月29日,第8页。

指出法国社会主义尊重的各种自由（其中有包括民主更迭可能性的普选），强调政党（包括反对党在内）存在和活动的权利；<sup>①</sup>另一方面，他坚决主张：

在最强大国家控制的把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和平共处不能视为与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现状相一致。相反，我们号召法国劳动者在世界上现存力量的新关系中，在适合欧洲形势特点的缓和中找到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更大信心。<sup>②</sup>

有些观察家把这种情况看法共领导集团内部互助竞争，使党的政策出现矛盾的迹象。但更可能是反映了法共对同一个策略目标需要两个不同政策的认识。这个策略目标是：掌握政权，而后运用它推动国家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此外，法共似乎相信：在其他民主制度的工业化国家内，那里的共产党在应付客观形势时也产生同样的政策要求。例如，法共领导在接受“欧洲共产主义”（该党领导认为这个名字不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因之有局限性）这个名称时态度十分明确，因为它觉察到，有关诸党已经理解到有必要采取同样态度来对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而这种危机在它们本国范围内都已出现。<sup>③</sup>

### 共同纲领的影响

法共签订共同纲领的长远目标至少是为分享统治权奠定坚实基础，但文件本身有一节目的宣言，用以在法国选民中为左派争得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产生一些效果。彻底地分析它对法国政治动力的影响将远离本文研究的范围，但是在这里作两个方面的观察是合适的。

① 《人道报》，1976年7月1日，第2页。

② 同上。

③ 这点见雅克·德尼从东柏林欧洲共产党会议回来时的谈话：《多种多样的道路》，载于《法国新闻》第1600期，1976年7月12日，第9页。



首先，纲领的经济条款规定比国家化项目具有更迫切和更实际的性质，它有一个从1973年起特定的时间要求，当时通货膨胀和失业成为法国选民越来越严重关切的事情。这些经济条款中有几条较为重要，值得专门一题。如最初所写的那样，共同纲领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从45小时减为40小时，不降低工资；规定每月最低收入为一千法郎。<sup>①</sup>（六年后这个数字提高为2400法郎。）<sup>②</sup> 纲领还建议退休年龄男子降低为60岁，妇女降低为55岁，年金为本人十年最高工资平均数的75%。<sup>③</sup> 根据文件所说，较短的工作周、较早的退休年龄，加上经济发展的新手段，将能促进就业，而就业是一个“首要的目标”。此外，纲领允许以立法来禁止任意解雇，允许劳动者对企业委员会有追索权。<sup>④</sup> 最后纲领宣称：“稳定物价”是作为法国政府的左翼联盟“最重要的目标”，纲领说：“把关键性的工业和金融系统国有化”将发挥“在反通货膨胀斗争中的主要作用。”<sup>⑤</sup>

法国公众的日益要求实施上述种种办法的愿望，已记载入几次民意测验中。例如索弗勒斯在1975年举行的调查表示，经过三年时间消费品价格上升约33%后，相当多的公众觉得法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危机”，更多的人相信这场危机远远没有过去。<sup>⑥</sup> 虽然民意测验表明：令人奇怪的是，人民并不认为左派政府胜过吉斯卡政府，能改进现状，但测验的确揭示一种趋势：有一部分人希望有更积极的政府作出努力去对付经济形势。例如：有77%的应答者认为降低退休年龄有助于改善经济情况（18%的人反对）；

---

① 法共：《共同纲领》，第53、55页。

② 见下一节的讨论。

③ 法共：《共同纲领》，第55页。

④ 同上，第57页。

⑤ 同上，第133页。

⑥ 巴黎民意测验所（索弗勒斯）第1260号，1975年9月1—7日，第38—39页。

64%的人(12%反对)对公共建设的看法与纲领一致;43%的人(30%反对)相信把银行国有化有助于改善经济状况;45%的人(36%反对)为同样理由支持大企业国有化。<sup>①</sup>

其次,左派选民在共同纲领签订后显著增加,虽则增加选民中大部分拥护社会党。在1973年国民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得票19.2%,比1967年由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共和团体大会组成的左翼联盟得的票还要多。在共产党名下获得选票21.4%。1976年3月第一轮县级选举结果,社会党得票上升为26.5%。此外,从这些选举中看出社会党选票向“全国化”不断扩展的趋势,也就是社会党的选民在地理分布上更加平衡。虽然共产党的票数增加没有象社会党那样引人注目,但法共确实分得22.8%的选票。《世界报》政治分析人雷蒙·巴里翁引用内政部统计数字指出,整个左翼在县级选举中得票达56.5%。<sup>②</sup>虽然第二年市级选举中左翼联盟得票的结果略有下降,但选票仍在51%以上。共产党和社会党获胜的人口在三万以上的城市增加57个(其中共产党22个,社会党35个)。总之,反对党控制了221个三万以上人口城市中的159个,其中共产党和社会党占153个。<sup>③</sup>

虽则投票增加大部分归诸社会党,然而那些增加的投票人究竟支持整个左翼联盟呢,还是只给社会党,则尚未分晓。这个问题的答案特别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左翼联盟是否有发动足够投票支持者获得政权的能力。

把1967年与1973年的立法选举和1974年的总统选举中左翼得票情况作细致比较,使两位法国分析家得出结论:即他们称之

---

① 同上,第39页。

② 《世界报》,1976年3月4—10日,第1页。

③ 同上,1977年3月17—23日,第1页。

为“社会中间主义”的力量逐渐衰落。<sup>①</sup>所谓“社会中间主义”是指一些人的倾向，他们在第一轮投票中投社会党和温和中间分子的票，只有当他们够能抑制戴高乐派的政治力量又不至于帮助共产党的时候，才在第二轮中支持左翼。（根据第五共和国选举法：候选人必须在第一轮投票中得到绝对多数，方能自动当选；否则就得进行第二轮投票。通常总有80—85%地区要进行二轮选举。一般在这个选举中会缔结选举同盟。政治上有最密切关系的政党相互议定支持他们候选人中在第一轮得票最多的人，让其余候选人放弃竞选。在这种典型的做法中，第二轮投票多是左右两翼之间的“二轮选票决斗”。1962年以来一向如此。）这些投票人（指社会中间主义者）实际上成为选举中的“第三力量”。根据分析者的看法，法国政治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逐步把这种“社会中间主义者”从左翼（疑为右翼之误。——译者）支持者中分离开来，而共同纲领的签订，在1973年立法选举和翌年总统选举中加强这种趋势。因之，分析者认为：非共产党投票人支持左翼联盟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定型。

但是本文完成在1976年县级选举社会党人得到新的更突出的成功之前，这些选举表明，上边所提到的趋势，如果不逆转的话，至少可以缓和下来。马克罗特斯特民意测验所在选举后对“社会党新投票人”的调查分析，对这点有特别意义。例如，调查表明在这群投票人中——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投社会党的票；大部分人过去从未投过票——有33%的人对社会党与共产党联盟表示遗憾，46%的人赞成联盟，21%的人不表示可否。更有意义的是，只有5%的人主要由于社会党加入左翼联盟的缘故，才投该党的票。调查还表明，大约有29%的社会党新选民，选择并不很坚决，中右派

---

<sup>①</sup> 见伊丽莎白·迪普瓦里埃和弗朗索瓦·普拉托纳：《社会中间主义衰落的新阶段》，载于《法国政治科学杂志》，巴黎1974年12月，第1173—1204页。

把他们吸引出左翼联盟,并不十分困难。<sup>①</sup>

新近法国民意测验所从1977年4月26日到5月3日为《巴黎竞赛》举行的投票调查,提出几个有关这个问题的新资料。这次调查的用意在于专门了解政治反对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的态度。调查对象包括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投票人。调查结果只有45%的回答者认为法共近来所采取的态度(特别强调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和对苏联政府的批评)表示这个党的主义已有“深刻的转变”。其他回答者中29%(包括33%社会党投票人)相信共产党所反映的态度是“策略性的表面转变”。26%未表示意见。<sup>②</sup>另一方面,有69%的回答者主张分配几个政府部长职位给共产党人,只有8%的人反对共产党人任部长,23%的人对此不置可否。<sup>③</sup>同样,61%的回答者认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能够组成持久的政府,24%的人相信这样的政府长不了,15%的人不作回答。<sup>④</sup>人们能根据这次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在社会党投票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共产党还有怀疑,但大多数人大概不会反对左翼联盟。

### 法国共产党和1978年的选举

1978年国民议会选举即将来到之际,根据1976年和1977年县、市选举中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情况看来,左派联盟的政治前景总的说来似乎希望很大。但是1978年选举中左翼的胜利,却有赖两个相互有关的条件的实现。第一,左翼联盟不得不依靠大量新的社会党选举人。他们中不少人对共同纲领作出保证的经济

<sup>①</sup> 巴黎民意测验所(马克罗特斯特),第1296号,1976年5月10—16日,第31页。

<sup>②</sup> 法国民意测验所(巴黎竞赛),第1460号,1977年5月20日,第68页。

<sup>③</sup> 同上,第69页。但是当提到特定的12个部时,人民支持让共产党人担任哪一些部长,各阶层区别很大。有趣的是,人民最不愿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有三个部:内政、外交和国防。

<sup>④</sup> 同上。

改良比对法国经济的结构变革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二，左翼联盟潜在的支持者不得不继续把这个联盟看作稳定政府的政治核心。早在1977年5月，当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党人开始“更新”共同纲领时，就有出现越来越多问题的不祥迹象。威胁上述两个条件的实现。

基本上，这些问题是由于法共对待左翼联盟的全面态度才产生的。正如本文已经指明的那样，共产党提出先进民主的概念，把它专门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议会手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模式。因为这种过渡需要和社会党人结成政治联盟并大大改进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所以就促使它放弃一党制的观念，最终使党对法国现存民主制度的公开态度有惊人的转变。然而，法共比往常更不动摇地坚持：它必须发挥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同时坚决认为，“法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施展直接影响的能力密切相关。”<sup>①</sup>

党必须在“群众运动中发挥直接影响”的这种观念，形成党对待“左翼联盟”其他成员的态度。例如，马歇第一次向法共中央委员会要求批准原来的共同纲领时（这篇讲话到1975年才发表），他说，“今天使社会党显得生气勃勃的思想意识一直是改良主义的；基本上，它完全违背科学社会主义。”<sup>②</sup>1974年总统选举后，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开始出现公开提到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思潮。1976年马歇向二十二届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估价左翼联盟的前途，他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

“左翼联盟实际上并不象一张契约，简单地在上边签字就足以保证它的实行；它是“持久的斗争”。这里有两个相互有关的原因：第一因为

---

① 见《共产党人为法国的要求》第384—385页。

② 乔治·马歇：《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2年6月29日），见《团结就是斗争》，艾蒂安·法戎编，巴黎1975年，第109页。

资产阶级决不会听命于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联盟,而是以它所能做到的所有手段,不断地进行斗争,其目的在摧毁左派联盟。第二,如果没有社会党内部的响应这个压力是无法维持下去。”<sup>①</sup>

因此,“以斗争求团结”的口号成了共产党人评论联盟时的口头禅。

必须认识到这种态度背后不仅有一种权力考虑,而且也有实质性的关心。法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联盟伙伴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同他们是不一致的。例如,社会党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上,有他们自己的原则。这些原则和共产党的与过度积累理论相联系的政策设想大相径庭。因此,共产党人懂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到他们的观点在联盟中占压倒优势是至为重要的。法共不得不和他们的伙伴进行斗争以达到这个目的。

在1978年国民议会选举前这段时期内产生的难题,主要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对于最低限度国有化的看法分歧,左翼政府必须首先进行多大程度的国有化才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中长期以来最关紧要的,较之大多数观察家所想象的还要严重。在七十年代早期为制订政府共同纲领进行讨论时,就在国有化问题上,两党发生剧烈的斗争,虽然他们以最后文件所列的九大企业为国有化的目标,才得到妥协(比共产党原先想象的要少得多)。<sup>②</sup>此外,法共似乎把国有化问题看作社会党与它合作有无诚意的关键性的考验。法共总书记马歇在原来的共同纲领上签字后就在中央委员会讲话中宣称:“最后,国有化问题的讨论几乎发生真正的对抗。这不偶然。这实际上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是判断有无决心进行真正变革的试金石,是与大资本的政策

---

<sup>①</sup> 《适合法国的社会主义》,乔治·马歇在二十二届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圣德尼1976年2月4—8日,见《共产主义手册》第2—3期,1976年2—3月,第57页。重点符号后加。

<sup>②</sup> 据乔治·马歇说,社会党人原先准备把九个企业中的四个收归国有。见《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巴黎,1972年6月29日,第104页。

和统治宣告决裂的问题，是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sup>①</sup>

总之，早在1974年，共产党人就断言，列入共同纲领的九大企业实行国有化，不足以推动国营经济越过能保证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低界限。他们列举诸如失业人数的增加，通货膨胀率提高，能源危机等现象。因此，他们要求，在为1978年准备国民议会选举时，更新共同纲领国有化的条款。随着选举日益临近，他们在这个问题的态度越加坚决。

关于更新共同纲领这些条款问题，法共要求几乎占法国全部钢铁和冶炼生产的四个企业要国有化（德南—诺德—伊斯特—隆维、马兰—旺迪尔、昂潘—施奈德、希埃尔斯—夏蒂隆），而且包括珀若—雪铁龙和法国石油公司—法国精炼总公司在内。<sup>②</sup>原来的共同纲领中关于国有化规定的标准为这些外加的六家康采恩国有化提供几点谈得过去的理由。如“资本积累的重要中心”，这些公司“靠国家基金而生存”；它们“控制着对国民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企业部门”。<sup>③</sup>

共产党所说的是一揽子国有化，这种国有化将把1,262,900个产业工人（占总数15.6%），324,000个银行和金融部门的雇员并入国营经济。这些国有化企业加上早些时候实行国营的企业，使公有经济占有32.8%的产业工人，占全国投资额的半数，至少控制75%的研究经费。<sup>④</sup>但是只有把所有15家企业当作工业“集团”

<sup>①</sup> 同上，第102页。

<sup>②</sup> 在1972年，共产党打算把所有这些工业再加上若干其他工业全包括在国有化的名单中。关于当时共产党心目中企业的清单及其经济运行的细账，见阿历克西·库森：《几个大型私营工业集团的资料》，载于《经济与政治》第215期，1972年6月，第115—126页。

<sup>③</sup> 见法共：《共同纲领》，第114页。实际上，共同纲领要求国家购买在钢铁和冶炼工业的大多数股份，但是共产党人从未觉得这种方式将给国家以它所需要的控制模式。

<sup>④</sup> 罗热·布兰和阿尼塞·波尔：《可以实行国有化的企业》，载于《经济和政治》第274期，1977年5月，第28—29页。

对待,才能达到上述的百分比,就是说国有化要实施到这15家“母公司”所掌握的51%或更多的股权的“分支企业”(子公司)。<sup>①</sup>这样一来,共产党要把分散的他们认为属于15家“母公司”的1,450个企业全都国有化。

社会党人拒绝接受共产党这个建议,他们只同意在钢铁冶炼工业外,国家在珀若一雪铁龙占有多数股票。此外,他们坚持对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只限于母公司已经握有股权98%的那些企业。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他们最后把227个子公司列入国有化范围。远远少于共产党的要求,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法共作过某些让步。<sup>②</sup>

临近1977年夏天,更新共同纲领的谈判形成对峙的局面,甚至九月“最高级会议”也解决不了僵局。虽然讨论的失败还有其他意见的分歧,但共产党人认为国有化的分歧是最关紧要的一个。在紧随着成功的“最高级会议”之后召开的共产党会议上,马歇对这个问题提出共产党的看法。他首先谈到“国有化最低限度”是“与社会党争论的根源”,以后他说:

人们必须了解,经过计算在共同纲领中首先提出729个国有化企业时,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这不是自尊心、固执或坚持一种我也不知道的教条的问题。这确实比较简单,这是因为达不到这个共同纲领规定的界限,共同纲领的全部工作注定将在今后失败。为什么?因为大资本就将进入,犹如狼入羊栏一般。

当1972年通过共同纲领时,我们曾为此而斗争。为了取得协议,我们同意把国有化工业集团的数目,减少到九个。当时我们还说——我重复一遍——这是保证你们等待着的社会政策成功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

---

① “集团”这个词的最先提出,见法共:《共同纲领》,第116页。

② 他们同意暂缓对珀若一雪铁龙和法国石油公司—法国精炼总公司实行国有化,对279个银行和金融企业的分支单位免于立即国有化。同时,他们拒绝放弃最低限度的基本观念。根据他们计算,单是对属于9个母公司的729个企业实行国有化,就有50万工人和5%的国家企业投资。见《人道报》,1977年9月27日,第2页。



此外，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年更新共同纲领时我们又提出对冶炼、法国石油公司和珀若—雪铁龙实行国有化的原因，因为这些关键部门里出现了新的情况。<sup>①</sup>

但是，并非单单因为国有化问题，引起法共把这个争执看得如此郑重。而是由于最低限度问题已经在共产党思想中与其他政治上的考虑联在一起。从民意测验所得的结果表明，社会党将在未来选举中取得惊人的成绩这个可能性，使法共日益关切，倘若社会党与左翼激进党真的象民意调查所说将得到 30% 的选票的话，法共想在左翼中追求优势的选举力量将遭受重大的挫折，因为它很难希望得票超出 20% 很多。加之它将在当权的联盟中，处于次等伙伴的地位。<sup>②</sup>

当然在签订共同纲领时，共产党人已经知道，他们是在左翼之内冒着失掉相对政治力量的危险，他们担心社会党人从共产党那里直接夺走选票。<sup>③</sup>同时，法共领导人似乎相信，社会党选票的增加，对于实现左翼新的多数是至关紧要的。总之，法共要在最近将来，赢得 30% 或更多的选票的远景是暗淡的。如果它要争取达到这个目的，而同时社会党选票并不相应提高，社会党可能会抛弃它，即使社会党组织上还留在左翼联盟里面，几乎必定有大部分社会党投票人会背叛社会党。所以共产党领导人所希望的，很可能是两党以相对平衡的比例增加选举力量。

当局势开始出现法共似乎将在事实上处在从属于社会党的地位时，共产党人将奉行双重行动路线：第一，他们企图分得较多的

---

① 见《人道报》，1977年9月29日，第4页。重点符号原有。

② 因为在法国选举制度规定的每地区选一个代表的情况下，第二轮选举联盟的作用十分重大。以共产党人为一方和以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党人为另一方之间得票百分比的差距，肯定将大大影响国民议会议席的分配。

③ 见马歇：《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2年6月29日），第118页。

部长职位,提出部长名额应按得票比例分配,不能按传统习惯按国民议会代表席位分配。第二——与我们的分析直接有关——,他们将比以往更加强硬地要求增加国有化的单位。由于出现社会党在左翼联盟政府中力量增大的前景,共产党人感觉到在进行选举之前,就国有化问题有与社会党人摊牌的极端必要。

马歇在解释更新共同纲领谈判失败的原因时说,共产党人仍旧认为左翼联盟是建立先进民主政权的工具,它最后转过来实现“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但是最有启发性的是,他又一次提到左翼联盟又要进行一场“持久的艰巨斗争”的话题。<sup>①</sup>事实上,最低限度问题在接近1978年3月12日国民议会首轮投票时,依旧没有解决。

此种形势使左翼联盟的政治地位前途难卜。共同纲领签字党的一个主要希望是:由于它向投票人提供在明确的立法契约基础上可以选择的政府,它同时体现典型的共和主义和信奉社会主义的原则,因而使左翼得票增加。但是左翼联盟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基础,对左翼中第二轮选举联盟的确切意图甚至也会产生疑问。(如同我们已经指出,法国两轮选举制度,在第二轮选举时对选举联盟有利。同时因为建立第二轮选举联盟已是普遍的行动,每一个政党都认识到与其他政党取得谅解是必要的。否则这个党就要很快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共产党一开始就肯定表示愿与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党人缔结第二轮选举联盟,不管共同纲领的情况如何。)

3月12日第一轮选举结果报告最终使事情有了分晓。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象民意测验预测的28%的选票,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党人加起来得票只占24.7%(社会党22.6%,左翼激进党

---

<sup>①</sup> 见《人道报》,1977年9月29日,第4页。

2.1%)。① 共产党人得票 20.5%。虽然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党人赢得的票数比 1973 年两党共同所得足足增加 4.1%，但这个成绩未能使两党象所希望那样对法共占优势。所以共产党人不论在得票总数或者他们预测能得到的议会代表席方面，不再如同第一轮选举结果报告发表前所想象的那样处于不利地位。加之，左翼能不能占压倒多数问题尚未肯定。左翼在第二轮投票中，加上极左派和其他反当权的多数派的形形色色派别的票数，共得票 49.7%，而当权多数派所得票数占 48.4%。

第一轮投票结果报告发布那天，共产党、社会党和左翼激进党的领导人又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三党全体同意，必须要有共同纲领最后条文正式协议的某些证据，借以促使尚未决定的投票人相信，左翼联盟是紧密团结的，足以有效地管理国家。会谈发表“共同宣言”，它说：

左翼各党郑重声明，它们愿竭尽所能，实现达到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左翼共同政府为目标共同多数。

根据此种精神，一旦国家信任它们，它们将保证以 1972 年共同纲领已达到的成就和在 1977 年进行工作过程中已经同意的建议为起点，继续协商，以求澄清纲领内容，使之成为左翼联盟政府受信托执行的立法契约。②

然后宣言转而谈论福利措施的某些细节，这些已经由左翼联盟一致同意。其中有几条是原来共同纲领已有的，而其他几条则说明，去年夏天修订共同纲领讨论以后继续争论的问题业已解决。③

---

① 投票统计见《世界报》，1978 年 3 月 15 日，第 13 页报导的内政部统计数字。在第一轮投票前，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党人同意以两党中的一个党派出的一个代表竞选。只有用这种方式，左翼激进党（由于它们得票的百分比极小，1973 年不足 2%）才有希望在一些地区第二轮投票中代表左翼在国民议会的席位。在 1973 年，这两个党在第一轮选举时以左翼社会主义和民主联盟的共同名义竞选。

② 见《世界报》，1978 年 3 月 15 日，第 7 页。

③ 在宣言的这一部分，共产党在有一点上觉得特别满意，即提出每月最低工资 2400 法郎。

虽然宣言特别提出“〔左翼联盟政府的〕组成，将尊重普选的意志”，核心问题是到底会谈决定对共产党提出必须以各党所得总票数比例分配部长的要求作出多大让步。第二天马歇接见记者时指出，共产党希望以第一轮选票数字作为各党决定部长人数的基础，但是弗朗索瓦·密特朗表示要以第二轮的票数为准。按照后者的办法，就可能减少共产党的内阁席位。<sup>①</sup>

但是最重要的是，宣言看不出最低限度问题（即国有化问题）已经解决的迹象。但宣言保证各党在第二轮选举中，倘若左翼联盟在国民议会赢得多数的话，立即恢复认真讨论国有化的规模，以便载入立法契约。但是马歇清楚表示，即使法共同意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磋商，也必须等到第二轮选举结果报告出来之后，该党仍旧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尽管运用了这些策略，左翼联盟在第二轮选举中并未取得更多的支持。当权的多数党得到选票 50.7%，反对党得票 49.3%。<sup>②</sup> 在最后分配议会席位时——491 席中的 423 席经过第二轮选票才产生——当权党联盟得 290 席，左翼联盟得 200 席（社会党 104 席，共产党 86 席，左翼激进党 10 席）。反对党所得席位确实比 1973 年总数增加 17 席，但当权党联盟保持了满意的多数。<sup>③</sup> 根据民意预测所产生的希望来说，1978 年立法选举的结果，是左翼联盟明确的政治挫折。

## 展 望

那末 1977—1978 年的发展，在未来几年里，对法共在法国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法共对

<sup>①</sup> 见《世界报》，1978 年 3 月 16 日，第 8 页。

<sup>②</sup> 选票统计见《世界报》的报导，1978 年 3 月 21 日，第 2 页。

<sup>③</sup> 《世界报》，1978 年 3 月 21 日，第 1 页。反对派有 201 个代表，其中一个代表不属于左翼联盟。

左翼联盟的作用如何,这个问题到 1978 年春季尚未解决。

可以想象,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对 1978 年选举结果所作的估价,可能使两党在打算列入政府共同纲领中国有化最低限度问题上近来的意见的分歧更加扩大。社会党方面不得不衡量继续保持联盟可能产生的几种弊端。这主要与选举形势有关。

首先,出现中间派对社会党人提出严重的挑战。社会党未能得到民意测验所预料的投票人支持的明显原因,无疑是未来几个月中仔细分析的主题。很可能,“社会党新投票人”,即它们潜在的支持者,构成大量未曾实现的社会党选票,这些投票人完全有可能由于左翼联盟内部政治不调和而不知所措;许多人也许还认为,他们的经济要求能由目前当权多数派处得到满足。<sup>①</sup> 这批人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投给了法国民主联盟。作为中间派的选举联盟(共和党,即吉斯卡共和党;社会民主中心,即让·勒卡纳组织;激进党,由让-雅克·塞尔旺-施雷贝为首的正统激进团体)法国民主联盟得票 21.4%,就这样使其成为与戴高乐派、社会党和共产党有同等地位的政治力量。因为表示出力量,法国民主联盟如今成为对社会党有吸引力的非戴高乐派的可抉择的对象,招徕左翼的投票人,这些投票人对于投法共同盟者的票顾虑重重。

此外,社会党人必须考虑左翼激进党人的态度。在第二轮投票结果公布后,左翼激进党领袖罗贝尔·法布尔宣布他从签署共同纲领所承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sup>②</sup> 他的意思是否愿意废弃与共产党的联盟尚不清楚。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社会党人不得不对此种形势加以深思。左翼激进党所控制的选票比例不论怎样微小,这个百分比在非共产党左派的政治力量中还是重要因素,因为

---

<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人们可回忆前面提到 1976 年民意测验。在那个调查中,有 29% 社会党新投票人态度是犹豫的,可以想象他们会被从人从左翼联盟拉出去。

<sup>②</sup> 《世界报》,1978 年 3 月 21 日,第 8 页。

左翼激进党人在与共产党进行初选竞赛时曾与社会党组成第一轮选举同盟。

至于法共，它必须考虑到社会党目前已取代自己成为左翼中出色的选举力量。当然，共产党本身的选举力量在1978年选举中保持相当完整，较之1973年水平仅降低百分之一。但是如果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左翼向中间派扩展选举力量，愿意接受与社会党保持大致同等的选举力量，那末说共产党愿意忍受使它的选票保持不动，而让社会党的选票扶摇直上的局面，这是大可怀疑的。所以法共可能选择集中力量增进选举力量的方法，借以加强在左翼中的政治份量。即使为此加剧它与社会党的紧张和引起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也在所不惜。

可是，联盟的解散决不是唯一可能性。社会党在考虑继续参加左翼联盟的消极作用以后，它的领导人也可能依旧得出结论说：总的看来，社会党留在联盟内比抛弃联盟能得到更多的选民的支持。由于同样原因，共产党领导人可能决定：作为至少取得一份政权的手段，除了左翼联盟外，法共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这种考虑将占优势，尽管要蒙受不利。

两党不论采取何种方针，重要的是牢记它们会根据选举需要以及政策目的作出它们的选择。这对共产党尤其是这样，因为在以后与社会党就载入政府共同纲领国有化最低限度的谈判中，法共掌握的选举力量将直接影响它担任“革命先锋队”的职能。

倘若左翼联盟中同床异梦，法共在法国政治制度中的作用肯定与它近几年中的情况相同。但是，倘若联盟完全分裂，法共将再度成为政治改革中的基本阻碍力量，而不是重要的催化剂。

### 三、西班牙：西班牙共产党与 佛朗哥以后的时代

欧塞比奥·穆哈尔—莱翁

1977年6月，经过四十年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西班牙终于进入了佛朗哥以后的时代，西班牙公民可以在自由选举中投票了。议会选举具有多方面历史意义，它也标志着西班牙共产党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1939年以来，西班牙共产党的活动被视为非法，在那段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它的党员在国外的要比国内的多，但是在这一段时期中，西班牙共产党以非官方的类似工会运动的工人委员会为中心，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基地，而且，在1977年前的二十年中，它也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反对派组织了。<sup>①</sup>共产党人

---

① 由于缺乏资料，所以对西共的力量及其地区分布不可能提供一分详细的报告。在1976年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共产党领导提出，至该年年底，党员数要达到30万人的目标，可是即使到1977年年底，恐怕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1976年11月，负责马德里地区党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维克多·迪亚斯·卡迪埃尔在答西共党报《工人世界》问时，他宣称该省有一万名党员（1977年4月西共取得合法地位前，《工人世界》一直在巴黎出版，后来才在马德里出版）。1977年4月，马德里省党代会结束时，宣布该省党员为18000人。现在看来这个数字扩大了。1977年3月，巴塞罗拿第二次党代会上的一份报告（《巴塞罗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无日期，第22页）表明，1976年11月底，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即从前的独立的卡塔兰共产党组织）的党员数不足3000人，1977年2月为4600人，到三月份将近5500人。1978年的资料表明西班牙共产党的党员数大约为20万人，地区分类表明，在卡塔兰地区的省份中和安达卢西亚有四万名党员，在马德里有三万多名党员，在阿斯图里亚斯和萨拉戈萨有一万名党员。见《一六日报》（马德里），1978年4月21日。

在写本文的时候，我们对于目前西共的党员成分若明若暗，因为迄今为止，西共尚

度过了严峻的地下活动时期，他们具有制定适应国内情况的政策的能力，他们也具有相当强的宣传能力，尤其在1968年发生了侵略捷克的事件以后，他们和苏联的距离拉大了，这一切似乎都说明，西共将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下，在西班牙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1977年6月的选举结果表明，这种估计过于乐观了一些。诚然，在全国范围内，共产党人的得票数占9.2%，获得160万张选票（足够使他们成为占全国第三位的选举力量），可是，在这次竞争中，以在职的首相阿多尔福·苏亚雷斯为首的民主中间派联盟（得票占34%）和以费利佩·贡萨雷斯为首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得票占29%）是明显的胜利者。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成绩远不如二次大战以来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的成绩，也不能与葡萄牙共产党人的成绩相比，葡共在1976年4月的选举中得票占15%。西共在加利西亚和充满斗争的巴斯克地区都没有代表当选，要不是卡塔兰党组织和安达卢西亚共产党候选人的出色工作，西共本来真的会一败涂地的。<sup>①</sup>

对于这个结果，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释。某些观察家强调指出，直到选举前两个月，西共才获得合法地位，在这短短的几星期中，它当然无法战胜四十年来敌对的反共宣传所造成的影响，它也来不及去肃清1936至1939年内战时期无情的战略所造成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投票进行时的选举法本身的问题。苏亚雷斯政府显然制定了一个歧视左派的选举法。虽然选举法声称要建立按比例的代表制度，而事实上，它却完全代表了国内比较保

---

未透露它的总的内情。当我们注意西共九大代表的社会成分（一个公认靠不住的晴雨表）时，我们发现，代表中工人和雇员占53.8%，专业人员和其它被称之为知识界力量者占31.7%，剩余的差不多为比例相等的农民、个体劳动者和企业主。见《国家报》（马德里），1978年4月23日。

<sup>①</sup> 详细情况请见我的《对1977年西共在西班牙选举中表现的分析》，载于《西班牙的选举》，霍华德·彭尼曼编（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研究所，1978年）。



守的农业地区的利益，<sup>①</sup>有11个省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50%，结果只选出参众两院的代表198名，可是其余分布在37个省内的50%的合法选民却选出了359名代表。在别的方面选举法也歧视左派，它不仅把选举年龄限制在21岁以上（这样，从选民名单上勾销了200万青年人的选举资格，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支持反对派的），而且选举法还为50万以上的移民工人参加选举设置障碍，而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人本来是有权参加投票的。此外，西共决定在竞选运动中，把抨击的矛头主要针对人民联盟中的佛朗哥派人士，而不针对苏亚雷斯，这一作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西共的这一举动肯定有助于挫败极保守的人民联盟，但是它也使许多活动分子和赞同者振奋起来，社会党人以毫不妥协地反对佛朗哥主义的身分出现在选民面前，它不仅反对人民联盟，而且也反对象苏亚雷斯这样富有诱惑力的改良主义者，因此社会党就从中大大地占了便宜。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分析还远远不够完善，因为分析家们显然没有认识到，1977年6月共产党人遭受的挫折恰恰反映了胡安·卡洛斯国王和阿多尔福·苏亚雷斯首相的成功，他们在法朗西斯科·佛朗哥死后的一年里没有让西共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由于共产党人无法动员起必要的力量在过去的佛朗哥时代和未来的民主时代之间强行划下一条鸿沟，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利用他们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力量。结果就由阿多尔福·苏亚雷斯来扮演下面的角色：在佛朗哥遗留下来的法律和国家机构内完成改革任务，而且事实上，他也履行了与旧政权决裂的使命。

---

<sup>①</sup> 关于实际数字，见恩里克·库列尔和哈维尔·加尔西亚：《区域性的代表制》，载于《胜利报》（马德里），1977年6月4日。

本章将探讨这些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文章将着重研究 1973 至 1977 年的过渡时期中,政府、共产党人和其它在野党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为了分析上的方便起见,我们将把这个关键性的重要时期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3 年 12 月到 1975 年 11 月,也就是从刺杀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莱科开始至佛朗哥去世为止。在这一时期中,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成了一个称为民主政务会的反对派阵线,政务会扬言它将推翻当时的政权。结果,这一策略没有奏效:一方面政务会没有把广大的反对派力量都吸收进去;另一方面当时佛朗哥政权的地位还没有恶化到足以使激进的变革成为行得通的政治抉择,这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第二阶段从 1975 年 11 月至 1976 年 7 月。这个阶段恰好是胡安·卡洛斯立宪政府时期,共产党人经过努力终于把反对派进一步团结起来了。然而这个新的反对派联盟——民主协调委员会——中的某些组织,在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的问题上意见极不一致,而且矛盾重重;结果当然就不能形成统一的行动。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从 1976 年 7 月阿多尔福·苏亚雷斯辞去首相职务到举行大选为止。这时,苏亚雷斯在反对党内部精心策划了分裂活动,结果把共产党人强行改变权力平衡的企图挫败了。在苏亚雷斯执政期间,政府实行了退却,他是在有条不紊的情况下组织退却的。

## 序 幕

早在元首死前两年,也就是 1973 年 12 月,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莱科被刺前,佛朗哥以后时代的权力之争已经开始了。由巴斯克地区恐怖主义者的民族和自由组织(ETA)发动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暴力行动,敲响了佛朗哥政权的丧钟。

尽管长期以来,象共产党那样的反对派组织一贯开展着反独

裁斗争,但是它们也认为独裁政权不可能一下子垮台。四十年代,独裁政权彻底粉碎了反对派发动的游击战运动,而且,1945年轴心国战败后,它也经历了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的考验。最近,它又顶住了卷土重来的强有力的罢工浪潮。1973年晚些时候,它充分显示出它有能力把政权长久维持下去。

卡雷罗·布莱科被刺事件发生以后,局面完全改观了。布莱科不仅是挂名的国家元首和佛朗哥的心腹,而且这位年迈的领袖要他承担保证国家制度永远不变的义务。卡雷罗·布莱科被刺身死,这件事意味着西班牙的政治棋盘上消失了一枚关键性的棋子。西班牙政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持这种看法,1974年2月,甚至极右派分子,卡雷罗·布莱科的继承者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保证说,他要建立一个“全国政治联盟”,并使政治制度全面自由化。

他的演说使许多温和的反对派产生了希望,可是没有多久,这些幻想又破灭了。在阿里亚斯发表演说后仅仅几个星期,政府便企图流放比尔鲍主教,因为他在布道时,提出了争取巴斯克的民权问题,政府又决定要处决巴塞罗纳的无政府主义者普伊格·安蒂奇。这些事件充分表明,新任总理难以摆脱他在担任内政部长时所养成的习惯和背景。1974年初,反对派们尽管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在心理上已作好充分准备,而对阿里亚斯政权毫不畏惧。当时,这些羽毛未丰的组织据说分属于四个派系。

费利佩·贡萨雷斯领导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民社会党和一些正在发展的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社会党派别都包括在社会党人之内。早在西班牙内战前和内战时期,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就是西班牙左派的主要组织。内战冲突结束后的二十年内,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经受住了独裁政权对它的迫害(在这一时期中,全国委员会里至少有六名成员被政府逮捕,1953年,该党总书记托马斯·辛

特诺·西埃拉在警方手中不明不白地死去)<sup>①</sup>。到六十年代初，它已经丧失了它的大部分号召力。该党在被驱逐出境的领袖罗多尔福·洛皮斯的领导下，日益脱离西班牙正在发生的现实变化，而且事实逐渐证明，它已经不能把西班牙新一代团结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旗帜下了。于是，形形色色的派别组织产生了，他们都希望自己在西班牙的政治领域里，在历史性的社会主义空间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丧失其影响力的一个例证。例如，国内社会党（即后来的人民社会党）就属于这种情况，它的领导人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大学教授恩里克·铁尔诺·加尔万。其它社会党组织也随之产生，尤其在加泰罗西亚，加利西亚，巴斯克农村地区，阿拉贡和安达卢西亚，不过，这些组织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西班牙社会民主联盟的出现，它的领导人是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和安东尼奥·加尔西亚·洛佩斯，该党主张西班牙社会主义的轴心应该从雅各宾传统转向社会民主主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洛皮斯流亡领导集团的窒息性控制下，变得软弱无能了，直到1972年10月，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国内的活动分子（最著名的有帕布洛·卡斯特拉诺斯，费利佩·贡萨雷斯）才掌握了该党的领导权。<sup>②</sup>这时，洛皮斯也建立了一个竞争的派别，以谋求社会党国际对它的唯一的承认。他的努力（铁尔诺·加尔万对此嘲笑说）失败了，1973年社会党国际把它的祝福赐与了与贡萨雷斯有联系的年轻的领袖们。这一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德、瑞典随之向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提供了道

---

① 萨维尔·图塞尔：《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民主反对派》，巴塞罗拿1977年，第263页。

② 拉蒙·乔：《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马德里1976年，第215—217页。关于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参见执委会在1974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国际关系”部分，载于《执委会在十三大上的工作报告》，1974年10月，第4—9页。

义、组织和财政上的支援。

在反对派中，另外还有一些基督教民主党组织。从其潜在的能力来看，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人民民主联合会和民主左翼，前者的领导人为马里奥·希尔·罗布莱斯，后者为霍阿金·鲁伊斯·希梅内斯。在加泰罗西亚，加利西亚，巴伦西亚和巴斯克地区，程度不一地存在着地方性的基督教民主运动，但是其中只有早在内战前就存在于巴斯克地区的巴斯克国家主义党还象一个群众组织。西班牙人把大部分基督教民主组织视为联合在享有极大个人声誉的个别人周围的宣誓团体，实质上他们不是什么政治组织。他们把自己的政治前途都寄托在拟议中的民主中间派联盟身上（尽管鲁伊斯·希梅内斯倾向于和左派联合），可是他们能否在政治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这不仅取决于政权如何变化，而且也取决于西班牙的主教团是否决心主动帮助他们组成一个群众性的基督教民主党。

第三个反对派是由所谓的极左派构成的。<sup>①</sup>六十年代他们发现西共放弃了革命的原则，于是他们成立了这些组织。其中有些，如西班牙共产党（马列）和工人党，公开宣称是毛派组织，它们是随着中苏冲突的发生，公然从西共党内分裂出来的。相比之下，其它组织，如劳动者革命组织和赤旗，终于皈依僵化教条的马列主义立场，但是它们的渊源却寓于六十年代激进化的正统的劳工组织之中。所有这些组织（这里我们也包括了某些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的派别集团）在巴斯克地区、巴塞罗拿、萨拉戈萨、马德里和纳瓦拉的工人阶级中，都有自己的界线分明、地盘狭小的基地。

西共在反对派中占第四把交椅，这些组织在力量上没有一个是能和西共匹敌。1974年西共是这些组织中唯一向政府提出挑战

---

<sup>①</sup> 对这些组织如须有一个全面了解，见萨维尔·劳费尔刊登在《东西方》杂志（巴黎）上的文章，1976年3月16—31日，第12—20页。

的组织,这里我们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大的矛盾,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西共名不虚传地拥有全国性的群众基础,尽管这个基础还不够雄厚,然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为一个权威性的政党,尽管它并不太吸引人,但是它可以真正成为政府的替代者。

在内战以后的年代里,西班牙共产党不仅经历了取胜的国家主义者所施加的残酷迫害,而且也遭到其它左派的排斥。在几十年的历程中,尤其在1956年后,当圣地亚哥·卡里略作为党内的卓越人物出现后,西共一直致力于打破这种孤立的局面,它摒弃了传统的反教权主义的策略,并在西班牙劳工运动新发展的形势下采取灵活的立场。<sup>①</sup>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共产党领导抓住国内工人和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将被推翻,西班牙将建立起一个“反垄断资本家”的政权,这个政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左派在政权中将起主导作用。当这些预言没有变成现实的时候,西共不得不对佛朗哥政权进行重新估价,同时扩大寻找潜在的同盟力量。1967年圣地亚哥·卡里略出版了一本题为《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新办法》的书,这是朝这个方向迈开的第一步。他在书中提请大家注意,政府内部正在出现一股反对极保守分子和要求变革的潮流。<sup>②</sup>据他分析,这些进化论者是西班牙新资本主义中最先进和朝气蓬勃的力量的代表。卡里略没有提出和这个集团实行全面联合的主张,因为在1967年,这可能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建议,而且在党内会引起严重麻烦。然而,他还是认为,由于这些“新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正在遭到现政权的扼杀,所

---

<sup>①</sup> 对于这些政策如果想从历史角度作彻底研究的人,请阅读吉·赫梅特:《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巴黎1971年;或笔者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国内和国际演变》,载于《欧洲共产主义与缓和》,编者:鲁多夫·特凯斯,纽约1978年。

<sup>②</sup> 圣地亚哥·卡里略:《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新办法》,巴黎1967年,第25—32,95—101和111—116页。

以他们倒是愿意牺牲现存的极权主义政治结构以换取“社会”安宁。西共没有明确承认有必要与这些人士合作上几年，但是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合作，西共保证，为了换取“新资产阶级”对自由协议的支持，政治制度的变革将在最低限度的社会动乱中进行。<sup>①</sup>从五十年代末以来，西共一直辩解说，通过全国和平大罢工可以促使政府倒台，因此，西共在提出这样的保证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便之处，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予以充分注意。

早在1973年春、夏，西共已经开始和所谓的“新资产阶级”集团进行了非正式的接触。不过直到那年9月，政府进行了改组，在局面更为有利以后，西共中央委员会才同意派遣代表和他们进行正式会谈。<sup>②</sup>同年12月，卡雷罗·布莱科被刺以后，会谈双方达成了一项备忘录，后来，在1974年葡萄牙四月革命的影响下，会谈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时，西共已经把它的接触面扩大到了唐·胡安——西班牙最后一个国王阿尔丰索十三世的儿子 and 胡安·卡洛斯王储的父亲，佛朗哥曾经授与他在1969年登基的权利。西共认为，如果唐·胡安能直言不讳地谴责佛朗哥政权，并宣布他自己拥有继承权的话，西共将同意他担任佛朗哥以后过渡时期中的国王。为了避免同胡安·卡洛斯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会给唐·胡安以重新考虑的机会，西共在没有和其它反对派商量的情况下，竟然大方地宣布，这位王位继承人在“建立”一个全国和解的临时政府的时候，可以发挥他的作用。<sup>③</sup>拉斐埃尔·卡尔沃·塞雷尔是和流亡的巴塞罗纳伯爵谈判的主角，他是前独立的《马德里日报》的编辑，也曾一度是唐·胡安的亲密助手。他在共产党和某些“新资产阶级”的接触

<sup>①</sup> 见圣地亚哥·卡里略在《西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布加勒斯特1972年，第22—31页。

<sup>②</sup> 《工人世界》，1973年9月5日。

<sup>③</sup> 《工人世界》，1974年5月8日。

中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因此，1974年6月，当佛朗哥患病的消息披露时，西共和唐·胡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民社会党，西班牙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基督教民主组织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共产党人确信，佛朗哥活不过夏季，他死后政权很快会四分五裂，因此它坚持马上建立一个一元化的反对派阵线。唐·胡安拒绝了共产党人的建议，抱着等着瞧的态度。其它组织大多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共产党与这些组织取得过联系，其中也包括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共产党主张让拉斐埃尔·卡尔沃·塞雷尔或安东尼奥·加尔西亚·特雷维哈诺等人以“个人身分”参加阵线，还主张让街区和家庭主妇联合会一类基层组织参加阵线；社会党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只允许让政党和工会参加，以此来反对这个拟议中的联盟。也许更重要的是，社会党人觉得这项计划过于着急了一些，它显然感觉到，他们正在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凌驾于一切反对派之上的优势组织。<sup>①</sup>

共产党人认为，其它组织都在重犯历史性的错误，而且看来他们很难自拔，因此共产党人径自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干下去，1974年7月下旬，就在佛朗哥出院时，共产党人宣布民主政务会成立。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其中除了共产党人和工人委员会外，也包括人民社会党，卡洛斯党（这是觊觎王位的卡洛斯·乌戈·德·博尔邦·帕尔马的支持者们的组织，他们也极力主张“工人自治”），安达卢西亚社会党联盟以及无党派人士卡尔沃·塞雷尔，加尔西亚·特雷维哈诺和何塞·维达尔·贝内托等人。所有这些党派和个人都团结在十二点纲领周围（这一纲领一直维持到选举立宪会议的时候），他们号召组织临时政府，实行全国大赦，使一切政党合法

---

<sup>①</sup>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执行它的决议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加那利群岛等地，该党的一些组织起初参加了这一联盟，后来在中央党部的高压下才退出这一联盟。



化,给予工会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并主张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混杂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各得其所的联合。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标志着它从内战以来的孤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且也标志着,在他们试图发挥左派关键作用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人民社会党来说,当时它正在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竞争,以取得国际上的承认,它参加联盟的目的是要向外界证明,它不仅是一个团结在恩里克·铁尔诺·加尔万周围的大学组织。阿莱汉德罗·罗哈斯·马尔科斯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想把他的安达卢西亚社会党联盟变成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主要社会党组织。卡尔沃·塞雷尔也把联盟当作一个理想的工具,借此表示他已经完全不是现政权的名流,而是反对派的积极支持者了。总而言之,从反对佛朗哥政权的彻底性方面来看,哪一个组织能超过西共呢?

严格地说,政务会所代表的群众并不比西共的多。但是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个显著的胜利。1974年8月,最高统帅的侄子尼古拉斯·佛朗哥专程去巴黎会晤卡里略和政务会其它代表,这一消息无疑地证明了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此外,由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它是唯一起作用的反对派阵线,因此从心理上来说,也得益非浅。1974年9月,其它反对派组织也打算成立一个竞争性的组织——民主大会,但是由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导集团中存在着基本分歧,其中一些人不愿意他们的党去建立一个不言而喻在实质上是反对西共的集团,因此,这一努力没有成功。直到1975年6月,不参加政务会的其它组织,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民主社会联盟和各种基督教民主组织联合在一起,宣布组成了共同纲领派。

民主政务会是在最幸运的时刻出现在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

即使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观察家也会发现，西班牙的政治结构缓慢地，但是却十分明显地正在失去它的正统性。这里我们不打算深入研究公众舆论改变的原因，但是只要看到属于一切阶级的西班牙人都逐渐意识到这种现状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事情非常清楚，西班牙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削弱了佛朗哥政权的两大基本支柱——天主教会和军队，而这些变化对前者的影响要大大胜过后者。<sup>①</sup>

1974年2—3月间，西班牙政府企图流放比尔鲍，这件事使西班牙和梵帝冈以及西班牙主教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全面破裂。虽然最终政府为了避免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而作了让步，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后来，1975年3月，政府又禁止在瓦列卡斯工人区由马德里副主教发起的集会，一个月以后，当反对派对官方发出的全国性和解的呼吁表示赞同的时候，主教团心照不宣地和反对派唱一个调子。总的说来，主教集团在对待政府的立场上倾向于采取中立的立场。在下级教士和天主教活动家中的不满情绪颇为明显，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们采取了越来越彻底的反政府立场。

军队也受到了改革的影响，虽然严格的纪律把他们控制得更紧一些。卡雷罗·布莱科被刺以后，事情已经摆得十分清楚，军队中存在着两代人之间的分歧，那些参加过内战的军官希望军队充当党派的工具，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使全国继续忠于佛朗哥的继承

---

<sup>①</sup> 拉斐尔·贝尔达在他的著作中，对西班牙天主教的作用作过透彻的分析，见《西班牙的教会和社会，1939—1975年》，马德里1977年；其它有关论著则有何塞·乔·雷戈：《佛朗哥主义下的教会》，马德里1976年。很少有人涉及军方发生的变化，这是不足为怪的。胡里奥·布斯克茨曾著文谈到过佛朗哥胜利后军队的征兵问题，这是一个初步的分析。1977年布斯克茨以卡塔兰社会党候选人的身分当选为议员。他的著作《西班牙的职业军人：社会调查》（巴塞罗那1967年）仍值得一读。另一本使人感兴趣的书籍是马努埃尔·迪埃斯·阿莱赫里亚的《军队与社会》，马德里1972年，本书对文职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门的”探讨。

人。而那些青年军官则反对这种倾向，他们希望军队向专业化发展。青年军官们曾一度团结在参谋长马努埃尔·迪埃斯·阿莱赫里亚周围。在卡雷罗·布莱科被刺以后，他起来反对西班牙军队中最保守的分子，因此招来了他们对他的仇视。（民防卫队司令“极端主义者”伊尼斯塔·卡诺发布了一道对示威者格杀勿论的命令，迪埃斯·阿莱赫里亚怒斥并撤销了这道命令。）1974年6月，军队里的保守派分子抓住他于1973年12月危机的高潮中和共产党人保持接触的把柄，把他撤了职。有人希望迪埃斯·阿莱赫里亚效法葡萄牙的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但是他不愿意担任那样的角色。另一方面，大家也公认民主军人联盟确实也是葡萄牙武装部队的翻版。民主军人联盟主张西班牙的政治制度民主化，然而它和武装部队运动比较起来，有它不同的地方，参加这一联盟的大部分军官都认为，这些变革应该在军人不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完成。1975年6月，政府逮捕了民主军人联盟的八名军官；不过，该组织的实际成员的数字从来没有透露过，所以对它所产生的影响也只好作一些猜测。<sup>①</sup>政府感到幸运的是，西班牙武装部队从来没有卷入到灾难性的殖民地冒险事业中去，1975年10月，当强硬路线派的军官要求对西属撒哈拉进行干预的时候，政府果断地拒绝了这一抉择。<sup>②</sup>

1974和1975年出版的西共双周刊《工人世界》上，几乎没有一期不引证政府内部产生的新的不满情绪，每一期上差不多都在说佛朗哥主义的末日来临。这里，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共产党人的工作，那时，共产党人断言，在民主政务会的指挥下，将发生全国

---

<sup>①</sup> 英国共产党报纸《晨星报》（伦敦），1976年3月24日援引非正式资料说，民主军人联盟的成员中大约包括461名上尉，11名少校，54名中校，21名上校和5名将官。

<sup>②</sup> 共产党人早就认识到葡萄牙的局势和西班牙的不同，他们希望西班牙武装部队保持中立，不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见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的声明，载于《我们的旗帜》杂志（巴黎），第75期，1974年5—6月，第33页。

性的罢工，他们声称，政务会有能力单独发动一次足以使军队和民防卫队的五万名队员保持中立的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结果，这一断言完全是一句空话。1975年6月政务会发动了一次试验性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其实，连这次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微乎其微的。就象共产党人在其它方面所表现的那样，他们不仅过高地估计他们自己和一切反对派的力量，而且也低估了政府的力量。

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政务会非但没有把反对派的大多数团结在一起，也没有把在1973年12月以后，在西班牙形成的革命前的局势推上激进化的道路。共产党人顽固地坚持政务会应该包括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所反对的个人和组织，因此责任应该由共产党人来负呢还是由提出异议的社会党来负？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两方面都应该负责。共产党一味想欺凌其它组织，所以在政治上它变得不中肯了，而社会党也拒绝承认西共在民主化进程中可能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然而，如果把没有使佛朗哥垮台的原因都过分归咎于反对派的不团结，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1939年以来，有几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好处的组织不乐意和现政权决裂，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不满情绪是一回事，可是主动起来反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许多早期的反对派人士还把希望寄托在胡安·卡洛斯身上，他们认为，一旦他登上王位，政府就会实行真正的自由化，从而为西班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和西欧实行一体化铺平道路。他们对激进化的葡萄牙革命感到无比的忧虑，虽然他们反对把卡埃塔诺主义作为政治上可行的抉择，可是他们也害怕西班牙的局势会失去控制。

总之，西共还不是它的领袖们所想象或炫耀的磨得精光锃亮的政治武器，如果把西共的组织力量与其它党派相比，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可是它本身也还是问题重重。在马德里情况尤为严重，

1974年初执委会委员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被捕，这对马德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十七年的地下工作中，领导着首都的党组织，随着他的被捕，相当一部分宣传工具也被当局查禁，西共整个组织被迫进行调整。所以在这时期，如果不作好充分准备，便想袭击权力的城堡，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此外，西共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左派知识分子，还有工人积极分子）至今对自由协议的主张并不热心，因为这意味着和“垄断资本”结成联盟，即便这是一个暂时的联盟。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左派中持不同意见的人企图把西共党内的不满分子拉出去，另组一个名叫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组织。<sup>①</sup>他们除了攻击圣地亚哥·卡里略奉行的联盟政策外，还要求取得作为党内有组织派别的活动权利。

在劳工运动方面，西共也遇到了麻烦。工人委员会在西共的影响下，已经发展成为西班牙劳工运动中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但是西共的影响除了左右上层领导外，是否还能发挥其它作用也是一个问题。总之，虽然工人委员会由于其原来的模棱两可的法律地位而得到好处，然而，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政府对劳工运动中的异己分子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1972年6月，当工人委员会的马尔塞利诺·卡马乔，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和其它高级领导人在举行总协调会议时，被政府一网打尽，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搜捕，这一打击和其它类似的打击狠狠地腰斩了马德里和其它各处的工人委员会。结果工人委员会总部的领导权移交给卡特兰分会（其领导人为西普里亚诺·加尔西亚，他没有出席那次倒霉的会议），而且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即在1975年6月举行的工会选举中，领导遭到了惊人的失败，百分之七十五在职的联络员和车间工

---

<sup>①</sup> 他们的宣言全文由向卡里略挑战的亲苏派刊登在《工人世界》上，见1973年6月15—30日这一期。

会代表没有再次当选，由于西共和它的劳工活动家没有掌握工会的领导权，因此也不可能利用这一转机在分崩离析的工会组织中闯出一条路来。<sup>①</sup>

### 胡安·卡洛斯上台

1975年11月，法朗西斯科·佛朗哥经过一个月的垂死挣扎，做过不下六次手术以后死去了。有些人担心，而另外一些人则希望他的死会使水闸打开，由于长期期待着他的死亡，因此在他逝世的瞬间，事情反而变得平淡无奇了，而权力也就在平平稳稳的状态下作了转移。结果，尽管某些反对派也虚张了一番声势，然而，胡安·卡洛斯在他祖父退位四十六年以后，在相当平稳的气氛中登上了国王的宝座。

1975年12月，第一届立宪政府就职。那些希望和过去一刀两断的人感到十分失望。胡安·卡洛斯对于政府的实权到底在哪里并不明确，而且他也不想去试验佛朗哥遗留给他的权利究竟有多大，于是他就任命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为首相。另一方面，内阁中包括了一群革新派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有何塞·马利亚·阿雷尔萨和马努埃尔·弗拉加·伊里巴尔内，阿里亚斯分别任命他们为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阿雷尔萨曾担任过驻美和驻法大使，到六十年代末他已经成为一名温和的反对派人士，七十年代西德总统瓦尔特·谢尔在西班牙作国事访问时，他和其它三名反对派人士向谢尔递交了一封信，请求德国在推动西班牙政治结构的民主化进程中给予帮助。作为外交部长，阿雷尔萨打算使欧洲看到这个政权的更加自由化的一个方面。内阁中的另一位“革新派”人物是前情报部长弗拉加·伊里巴尔内，1974年他拒绝参加

---

<sup>①</sup> 1975年9月，西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在劳工运动中奉行什么策略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见西共理论刊物《我们的旗帜》，第81期，1975年10月。

当时阿里亚斯试图组织的毫无伪装的“政治联盟”后，他甘愿蒙受政治流放去作驻英大使。象阿雷尔萨一样，他在参加新政府之前一定得到过某些保证。后来的事态表明，弗拉加的个性喜欢专断独行，因此这就实在难以维护他的自由主义名声，然而他在1975年末和1976年初的一些姿态，诸如同人民社会党领导人铁尔诺·加尔万共进晚餐等，这与这个政权的活动家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

虽然弗拉加和阿雷尔萨担任着战略上象征重要的部长职位，但是从全面来看，这届政府与传统的佛朗哥历届政府比较起来，自由的进展也是极为有限的。然而，从1975年11月到1976年7月的整个时期内，“革新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是本届内阁的特点。反对派们还成功地削弱了改革措施，并且他们得到政府机关，最高军事部门和大部分非选举产生盘据在议会中的“极端分子”的支持，这些人都力图为改革设置障碍，并施展拖延的手法。和从前一样，阿里亚斯试图给人一个他是超越一切冲突的印象，而这个“地堡”（圣地亚哥·卡里略对佛朗哥信徒的称呼）心中完全明白，他自己才是他们的同盟者。<sup>①</sup>

虽然共产党人始终坚信，一切政治制度改革的努力都会失败的，但是在1975年12月，当“革新派”参加政府以后，显然西共又面临着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共产党人担心其它反对派组织，尤其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会受到政府的优先照顾，甚至会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以使西共的重要性处于边缘状态。鉴于上述情况，共产党人认为，西共和现政权一决雌雄已经迫在眉睫了。

西共原先把希望寄托于反对派联合阵线，在佛朗哥死后，它可以立即组织进攻。1975年6月纲领宣言派成立后不久，民主政务会就和纲领宣言派的代表会谈，希望两大组织迅速实现联合。同

---

<sup>①</sup> “地堡”一词出现在圣地亚哥·卡里略在西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载于《西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7页。

年8月，政府宣布终止执行人身保护法两年，随后在9月又处决了几名恐怖主义分子，这些虽然都促使会谈有所进展，可是进展的程度并不能使西共满意。结果，在第一届立宪政府面前各反对派仍旧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民主政务会和纲领宣言派不能联合的主要原因牵涉到当初提出的临时政府问题，也和共产党人反对胡安·卡洛斯“担任一个不过稍加乔装打扮的连续性人物”<sup>①</sup>有关。此外，西共还使民主政务会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通过合法的改良途径使国家发生明显的变化不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是办不到的”，这一段话作为保证条款，明确地写在《全国和解宣言》上。<sup>②</sup> 纲领宣言派中反对这一立场的组织并不确信国王能推行这些改革，可是他们至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他们辩解说，不论从哪一方面和立宪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是不策略的，而且那样做很可能会促使军方发动暴乱。

既然连一个短期的反对派联合阵线也组织不起来，于是西共就改变方针，把立足点移到动员群众的工作上去了。这一措施不仅可以使人民群众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百分之二十的通货膨胀和直线上升的失业现象）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反政府的不满情绪，而且可以促使政治形势进一步激进化，同时也可以阻止政府同温和的反对派之间建立和睦的关系。从1975年12月起，《战斗报》开始刊登西共的指示，它要求党的积极分子和在工人委员会以及街区和家庭妇女联合会中的同情分子发起抗议运动，反对政府强加的中止集体契约和冻结工资的做法。

在党的组织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在运输、冶金和建筑工人中，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四周的工业地带，抗议运动开展起来了，而且很快蔓延到其它地方。在一、二月间罢工达到高潮时，西班牙首

① 卡里略答《人道报》(巴黎)记者问,1976年10月25日。

② 《工人世界》,1975年4月的第三周。



都有三十万人卷了进去，它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完全处于瘫痪状态。<sup>①</sup>在马德里政府不得不对地下铁道和邮政事业实行军管，在巴塞罗那对政府雇员实行军管。

罢工获得了胜利，后来在维托里亚巴斯克城举行的要求大赦的和平进军中有五位示威者遭到悲惨死亡，这些事件促使反对派们达成了一项总的协议，到1976年4月，西共看到它的漫长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一些成果。民主政务会和纲领宣言派的代表在马德里的一家著名旅馆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两大组织联合组成了民主协调委员会。

这场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虽然民主协调委员会把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潮流汇合在一起（从毛派团体，如劳动者革命组织和工人党一直到伊格纳西奥·卡穆尼亚斯的自由人民民主党），可是这个包罗万象的联合体实在难以采取立场一致的果断行动。西共付出了比政府高的代价才取得了温和派暂时的支持，这的确是值得庆幸的，但是为了把协调变成现实，共产党人不得不放弃他们多年持有的某些观点。新联盟的条款中没有提到临时政府问题（相反，它提到了“宪法进程”的必要性），也没有提到胡安·卡洛斯和君主政体的问题。<sup>②</sup>此外，尽管斗争取得了比较大的胜利，但是在反对派中，只有极少几个组织认为群众动员是改变政治制度的手段。根据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向政府表示反对派不是在闹着玩的这一点上，进攻也许有好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它们不能代替谈判。而且，单单罢工也解决不了问题，反对派必须提出一条可行的选择道路。

协调委员会组成以及它认为有必要承认协议的破裂，这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人和极左派支持的动员群众的战略失败了，也意

---

① 维克托·迪亚斯·卡迪埃尔：《马德里在罢工：1976年1月》，马德里1976年。

② 《工人世界》，1976年4月9日。

味着那些主张反对派应该避免对抗的组织的胜利。鲁伊斯·希梅内斯的民主左翼尤为强烈地维护后一立场，民主左翼在加入协调委员会前曾提出过先决条件，那就是不建立临时政府，而且，反对派中的其它组织把举行自由选举认为是一种分裂行为。<sup>①</sup>对于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全部同意了，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民主左翼参加进来，这不仅可以弥补大部分自由和社会民主组织没有参加协调委员会的缺陷，而且当政府攻击协调委员会时，当政府断言协调委员会的胜利只会带来革命和骚乱时，政府的矛头便会指向备受人们尊敬的鲁伊斯·希梅内斯身上去。

政府的有选择的忍让政策（这在下列几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如它批准：1976年1月举行的基督教民主组织会议，人民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下的工会运动的会议，如劳动者统一工会的会议，5月和6月举行的社会党联合会的会议等。而另一方面，它又禁止省或地区性的工人委员会会议和受西共控制的组织的会议），加剧了共产党人和温和的反对派组织之间的摩擦。事实上，到6月底时，民主左翼总书记海梅·科尔特索说过这样的话：协调委员会里的某些党在走谋求合法化的道路，而另外一些党继续处于非法状态，他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矛盾，共产党人对他的这段话没有多加评论，也咽下去了。<sup>②</sup>

可是，事实证明，以阿里亚斯·纳瓦罗为首政府却没有能力去利用这些分歧。其实，他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出人意外地向同他对抗的议会挥舞鞭子，当时议会威胁说，它打算否决政府提出的修改刑事法典和政治结社法的动议，因为这纯然是为了装点门面。4月底，胡安·卡洛斯在答《新闻周刊》记者问时表示，他不同意首相

---

① 见《基督教民主主义面临的前途》（在民主左翼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6年4月初，油印稿），第5—8页。

② 《欧洲》（马德里），1976年6月19日，第17页。

的作法（国王称他为“彻头彻尾的灾星”）。<sup>①</sup>阿里亚斯政府的软弱无能威胁了君主政体的前途，所以国王去美国作国事访问回来后不久，终于采取了行动，他要求阿里亚斯·纳瓦罗辞职，并接受了他的辞呈。

### 苏亚雷斯登场

为什么胡安·卡洛斯一直不撤换阿里亚斯·纳瓦罗，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对新首相的人选举棋不定。任命一位新首相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佛朗哥在他的继承人的道路上早已设下了法律程序上的障碍，他授与王国委员会同时选择三名候选人的权利，国王只能在这三名候选人中挑选新首相。虽然国王可以拒绝挑选其中的任何人，而命令王国委员会给他一个新的选择，可是这种做法很可能会造成宪法危机。

1976年7月，王国委员会向国王提出了三名候选人的名单，其中有前外交部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前教育部长费德里科·西尔瓦·穆尼奥斯和阿多尔福·苏亚雷斯。国王选中了第三位人物，他任命这位比较年轻的四十三岁的苏亚雷斯担任首相职务，苏亚雷斯曾经是阿里亚斯领导下的全国运动的总书记。

在1976年7月，简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共产党经济学家拉蒙·塔马梅斯把这次任命称作“一个历史性的错误”，<sup>②</sup>《工人世界》把苏亚雷斯对全国的第一次电视广播比作为纯粹的口头上的改良主义。<sup>③</sup>这些看法也不仅仅局限于共产党人。只有比较保守的人士才欢迎这个选择，这主要是由于苏亚雷斯曾充任长枪党的头目而发迹，看来他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人士。没有

---

① 《新闻周刊》，1976年4月26日。

② 《对话手册》（马德里），1976年7月10日，第24页。

③ 《工人世界》，1976年7月14日。

几个人认为苏亚雷斯政府能度过夏季的，简直没有人相信他会使极权主义破天荒地朝民主政治作历史性的过渡。

这位新首相很年轻，有政治前程，他并不缺乏机会主义的素质，然而他居然这么做了。苏亚雷斯知道，政府的果断行动将会是粉碎反对派虚假的团结和推行“改良主义”解决办法的前提。现在回顾起来，的确，除了新首相领会到方式的重要性外，苏亚雷斯的改良计划和弗拉加等人的无多大差别。

苏亚雷斯的内阁几乎是清一色的。虽然他曾经邀请弗拉加和阿雷尔萨参加内阁，但被他们拒绝了，因此他的内阁里没有重要的政界人士。唯一留任的是费南多·圣地亚哥·迪亚斯·德·门迪维尔，他是阿里亚斯政府的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苏亚雷斯把他留任的目的是为了向军方作一下姿态，后来这位部长退伍了，而且他给一位著名的“极端主义”评论家写了一封反对苏亚雷斯的改革计划的信，1976年9月初，他很快被苏亚雷斯解除了职务。

1976年9月，苏亚雷斯向全国提出了他的改革计划。改革方案在秋季得到议会批准，几周以后也得到全体选民的同意，于是在1977年年中举行了议会选举。改革计划对右派和左派都提出了批评。苏亚雷斯威胁右派说，如果议会不同意改革方案，他将促使国王解散议会。他对左派的态度比较慎重，他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他的前任们从来做不到的。正如某些爱开玩笑的人在分析阿里亚斯和他的继承者之间的差别的时候说：前者对意见连听也不想听；而苏亚雷斯却听取了意见，不过然后他仍旧我行我素。

乍看起来，苏亚雷斯面对着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团结的反对派。1976年10月，一个新的反对派联盟民主组织纲领派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它包括了协调委员会内的一切组织，和加泰罗西亚、巴伦西亚、加里西亚的地区性组织，只有巴斯克和加塔兰的民族主义组织令人注目地没有参加。

然而,在表面平静的下面,实际上反对派中存在着极为深刻的分歧。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社会党以及自由主义者等比较温和的组织认为,从各方面来说,苏亚雷斯的改革方案是不够的,不过他们认为,这一方案提供了谈判的基础,尤其在选举法的某些方面。<sup>①</sup>这些组织在接到政府建议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并不使人感到惊讶。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组成协调委员会的时候,鲁伊斯·希梅内斯和他的民主左翼讲过,他们认为自由选举即意味着政治和道义上的分裂。所以,在苏亚雷斯政府组成以后的几星期内,民主左翼和基督教民主组织中的其它组织就开始和政府进行接触。

相形之下,共产党人(和另一些比他们更左的组织)干脆否定了这个改革方案。<sup>②</sup>1976年9月西共执委会发表了一份声明,把这次改革称为“骗局”和“不民主的”。<sup>③</sup>共产党要求一切政党合法化和国家机器中立化。这是讨论选举进程的先决条件。9月下旬,在西共帮助下,又起草了一份所谓的巴伦西亚文件,文件以强硬的立场号召成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临时政府,采取紧急经济措施和与前政府彻底决裂。<sup>④</sup>这个文件立即遭到温和的反对派组织的批评,因此协调委员会暂缓对它进行审议。

后来,西共继续公开持敌对态度,但是人们怀疑西共的这种不妥协立场是否是在故作姿态,以便在最终的谈判中增加它的资本

---

① 见埃乌赫尼奥·纳萨雷:《关于政治策略的报告》,1976年10月12日(油印稿),发表于在米拉弗洛雷斯举行的基督教民主党最高级会议上。

② 1976年7月下旬,西共中央委员会在罗马举行会议,该党向苏亚雷斯政府提出如下要求:(1)彻底全面大赦政治犯;(2)废除阿里亚斯制定的政治结社法;(3)政府辞职另组临时政府;(4)实行议会选举;(5)承认卡特兰、巴斯克和加里西亚地区的全部自治权。见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从非法到合法》,1976年7月,第9—11页。

③ 《工人世界》,1976年9月15日。

④ 同上,1976年10月27日,登载了全文。

或是为了确保它在和其它反对派同时取得合法化的地位。总之，西共无法再说，事情丝毫也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实质上已经产生了变化。政府对西共实际上抱着容忍的态度，这在一年以前是不能想象的。如今，西共在马德里的商业区建立了非正式的总部，它距全国保安部还不到半英里远，1964年西共中央委员胡利安·格里毛就死在那里。10月，在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马德里省委干部被介绍露面。当执委会在首都举行会议，决定党对在11月中旬要发动的一次大罢工的态度时，警察得到不要进入会场和逮捕他们的命令。

佛朗哥死后一年内，西班牙社会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毫不奇怪这对西共也产生了影响。毕竟，这些变化与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所预料的大不相同。我们不妨仔细研究一下当时的共产党文件，不难发现他们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虽然还没有一个文件详尽地分析党内的倾向，和澄清哪些政治或个人因素促成了这些倾向，不过，假如我们对于他们在民族问题和劳工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加以注意的话，这或许对我们是有用处的。

西共历来以坚决赞成地区自治和自决的面貌出现的，宣称它赞成实行联邦制，不过它主张在加泰罗西亚，加里西亚和巴斯克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当地居民要求完全独立还是与西班牙国家结成某种形式的联邦。<sup>①</sup>对于这些一般性的主张党内基本上没有多大分歧。可是党内的一部分人（巴斯克和巴伦西亚地方党的某些代表）要求，在民族自治的纲领里西共领导应该提出，不仅在上述地区而是在一切地区实行自治的主张，他们也要求，一旦左派在全国范围促成了民族自治，就应该成立地区性的临时政府，这些

---

<sup>①</sup> 关于西共立场的总声明见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多民族的国家》，巴黎1971年；和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西班牙民族问题摘记》，载于《我们的旗帜》，第84期，1976年3—4月，第13—25页。

意见使党内出现了新的问题。<sup>①</sup>这项政策就许多方面来说，和党的传统主张是一致的，但出于党内一个敌对派别之口，这似乎是一种危险的乌托邦思想，公开出来反对的代表人物是执委会委员皮拉尔·布拉博。1976年夏，布拉博在一系列的文章里<sup>②</sup>坚决反对局部自治的主张。她声称成立短期的地区性临时政府只会给全国的自治运动设置障碍，而且也会给那些指责共产党人赞成肢解国家的人提供口实。卡塔兰地区的霍塞普·帕利亚奇和霍塞普·塔拉德利亚斯鼓吹和苏亚雷斯开展分裂的谈判，西共已经在全力以赴处理这件事情，它希望在其它任何地区不要再发生类似的麻烦。虽然布拉博从未明确地说全国自治是不可能的，不过她强调指出，党如果企图这么做的话将会遭到困难。事实上，她站在马努埃尔·阿斯卡拉特等人一边，阿斯卡拉特是执委会委员，也是党的主要理论家，他反对没完没了地坚持自治的主张，以免我们“误了现实的列车”。<sup>③</sup>

在劳工运动中也产生了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类似的意见分歧。工人委员会是否应该改组成传统的工会，这是争论的焦点。六十年代初，工人委员会是在工厂大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利用政府发起的工会选举的机会，打进了官办工会组织。<sup>④</sup>这种合法和非法混杂在一起的活动使工人委员会巧妙地应付了强硬的镇压措施。到六十年代后半期，它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的主要劳工组织。它的成功似乎暗示总有一天它会把工会组织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只要劳工运动中其它组织都处于弱小的地位，

<sup>①</sup> 《工人世界》，1976年7月7日刊登了一篇由埃尔内斯特·马蒂写的持有这种观点的文章。

<sup>②</sup> 《工人世界》，1976年6月11日和7月26日。

<sup>③</sup> 马努埃尔·阿斯卡拉特：《今天，我们的旗帜》，载于《我们的旗帜》，第85期（无日期），第3页。

<sup>④</sup> 如果想全面分析西班牙劳工运动的发展情况，见洪·阿姆斯特登：《西班牙的集体契约和阶级斗争》，伦敦1972年。

工人委员会便可以避免采用传统的工会结构，避免它们的官僚主义和管理会员的方式，工人委员会可以维持一个不依赖任何政党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形象。根据这种观点，马尔塞利诺·卡马乔号召召开一次工人制宪大会，他提议把工人委员会作为一种媒介，其它工会组织，如统一工会和工人联合会通过它都参加这次大会。<sup>①</sup>1976年初，西共理论刊物《我们的旗帜》以同样的口吻强调工人委员会作为“一个新型的工会”<sup>②</sup>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作者写道，把工人委员会转变为“一个好斗者成员的组织”，会把它的本色一股脑儿地消灭掉的。这篇文章出现在1976年1—2月的群众罢工运动期间，当时看来工人运动的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到夏季时，其它劳工组织迅速成长起来，这就促使共产党领导对原来的策略重新进行估价，他们向劳工运动中的共产党积极分子发布指示，要他们全力以赴地改组工人委员会。1976年7月举行的工人委员会总部的会议上，通过了有关的决议。<sup>③</sup>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党内外的批评，有些著名的工运积极分子，如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和胡利安·阿里萨继续在谈论政治和工运方面分裂的必要性。<sup>④</sup>到了秋季，由于政治改革取得成功，显然，西共于一年前设想的分裂工运的路线完全行不通了，这时，《工人世界》发表了一篇颇有代表性的社论，声称如果工人委员会改组失败，这将会使它成为“乌有”。<sup>⑤</sup>

当政府对等候已久的政治改革方案举行公民投票时，西共已经全面放弃了分裂政策。尽管西共号召在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

---

① 《对话手册》，1976年6月19日。1976年发表的《工会联合会》的宣言，见《工人委员会文件》（马德里1977年），附录，第5—30页。

② 卡洛斯·埃尔维拉：《从民主的决裂到一元化的工会主义》，载于《我们的旗帜》，第83期，1976年1—2月，第26—30页。

③ 见工人委员会总部文件，巴塞罗那1976年。

④ 同上，第35页。

⑤ 见《工人世界》，1976年10月6日。



但这多多少少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西共执委会在许多声明里表示,西共早已放弃了过多的要求,如果有民主自由的话,西共将以“积极的姿态”参加政治的进程。现在,西共把它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争取西共的合法地位上。公民投票前几天,圣地亚哥·卡里略在马德里市中心举行了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这是一个迫使政府表态的行动。这时,来自极右派的怒吼声响彻云霄,政府不得不对此作出反应。在两星期之内,卡里略和其它七名执委会委员被拘捕。他的被捕使西班牙的许多城市发生示威运动,而且在一夜之间,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刷满了要求把他释放的大幅标语。政府向卡里略提出让他安全地离开西班牙的建议,卡里略对此表示拒绝。两三天后,他暂时获释,并被允许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

这时的西共已经不再是地下的西共而是非法的西共,接着它便成为极右派的攻击目标。他们对西共党内的活动分子采取了暴力手段,他们炸毁了马德里大学区内一家党的外围书店。但是这些事件远远比不上1977年1月下旬发生的对五个人的残酷谋杀事件,其中包括四名共产党律师。谋杀事件发生在晚上,而当天白天,一个极左派的突击队绑架了最高军事法庭的首席法官,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了西班牙政界的两股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趣完全是一致的。后来幸好没有发生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军方干预,而这些危机却使反对派和政府更加靠拢了。共产党人为死难者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葬礼,差不多所有的反对派人士都参加了。正如马德里《消息报》所说的那样,在佛朗哥死后的日子里,这是西共头一回“冲上街头的大出击”,<sup>①</sup>这是一次怀着明显的政治动机,有组织地倾泻悲痛的行动,它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

如今,西共和其它政党的合法化问题不能再迟迟不解决了。二

---

<sup>①</sup> 《消息报》,1977年1月27日。

月中旬,内阁颁布了一项法令,它宣布凡是要求取得合法地位的政党只要提供经过公证的该党章程就可以了。大多数团体,其中包括共产党提出了申请。政府立即宣布一大批团体为合法组织(包括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内),可是政府不承认共产党和其它极左派政党的合法地位。因为刑事法典规定,禁止屈从于“国际纪律”和旨在以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的团体开展活动,为了解决这些政党的宗旨和刑法规定之间是否有矛盾的问题,苏亚雷斯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最高法院去作出裁决。起初看来,排除程序上的障碍只是个形式上的问题,对共产党人来说尤其如此,所以他们估计在三十天内问题便可得到解决。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历来驯顺的最高法院却不同意政府的立场,有人认为它也许要作出不利于西共的裁决。后来,最高法院和司法部紧急磋商以后,宣称它对这样的裁决力不胜任,因此把问题又退回给政府去解决。现在,苏亚雷斯除了痛快地承认西共的合法地位之外,差不多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4月10日,也就是佛朗哥取得内战胜利的三十八周年的前八天和政府作出镇压垂死的全国运动的决定后不久,他终于宣布西共为合法组织。

军方对这一决定表示了不满,所以当时的新闻报导都集中报导这一方面的情况。某些观察家甚至猜测可能会由此而发生政变。诚然,有人反对这一决定(海军部长皮塔·达·维加和国防部长马努埃尔·古铁雷斯·梅利亚多不得不取消对卡那利群岛的访问而来协助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强调的是,接管政权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而高级军官们所感到困惑的是政府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所采取的方法。从一月份以来,内阁一直在研究要不要承认共产党的问题,但是最后决定却是在三位军方部长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而从全国人民的意志来看,刊登在新闻周刊《改革十六》上的民意测验表明,55%的人赞成共产党的合法化,只有32%的人反

对这一决定。<sup>①</sup>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猜想，政府所以迟迟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恐怕是由于它害怕军方会作出相反的反应，其实问题并不完全是这样。苏亚雷斯希望在通过法律解决西共合法化问题的过程中，使西共的存在被人们遗忘几个星期，这样，他和其它组织在占领政治中心的时候可以得到额外的好处。这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想法；虽然我们一直在说，1977年6月选举以来，苏亚雷斯已经取得必然的胜利，可是，在二、三月间，在政治方面他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其关键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当时并不完全清楚。

西共合法化后不到一个星期，西共中央委员会在马德里举行会议，这是四十年来破天荒的头一回。除了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她还在莫斯科，不过预计很快就会回国）缺席外，西班牙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全部出席了会议，会上，为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制定了行动方针。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全会上的报告强调了奉行温和路线的重要性，这是一条不挑起政治动乱的路线。<sup>②</sup>他号召中间派和左派制定一项制宪协定，而且他再次重申西共的立场，要求新的议会起草一部新宪法，以取代佛朗哥的基本法，然后新议会解散。他表示，共产党领导愿意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其它左派力量组成民主选举阵线，但是他暗示说，这样的联盟不可能拥有他所称的“大西洋政治的权力”。<sup>③</sup>

这次中央全会批准了党的选举纲领。纲领要求在宪法上明确写上一切政党合法的条款，它要求议会享有超越政府一切部门的

---

① 《改革十六》(马德里) 1977年5月1日。与此同时，有趣的是，《国家报》(马德里)也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1977年5月24日发表在该报上。测验表明卡里略是国内第二号最“不受”欢迎的人，他仅次于弗拉加·伊里巴尔内。

②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1977年4月，油印稿)。

③ 至少，卡里略在这里想捞取一部分政治资本，因为几星期以前，他反对和社会党人结成选举联盟，他说这样做国家会向两极分化，民主的进程也会受到威胁。

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求给予年满十八岁的人以选举权,给予少数民族和地区以自治的权利,并且要求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关于经济问题,纲领提出财政赦免和实行改革,要求对农业区的失业者扩大失业保险(这个问题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尤为突出),要求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承担更多的责任,要求设立一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行使国家计划局的职能。西共不提倡任何大规模的国有化措施,总的说来,西共的短期经济纲领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民主中间派联盟的纲领极为相似。

中央全会决议决定党从历史上效忠于共和国的三色国旗转向效忠于双色国旗,这是1939年佛朗哥强加于西班牙并和君主政体联系在一起的国旗,而且西共决定放弃历来坚持的共和政体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全会上争论得颇为剧烈。这些决定在党内某些人中间引起了一场骚动,会上,十一名中央委员在表决时弃权以示反对。其实,好几个月来,西共执委会一直在讨论赞成君主政体的问题,1974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圣地亚哥·卡里略对这一个问题早已作了预示,他说,假如“通过什么奇迹”国王能够带来民主的话,他的党将不会成为障碍。<sup>①</sup>总之,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一行动是带有嘲弄意味的。因为苏联《消息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暗示在佛朗哥死后君主政体的过渡是一条行得通的道路,为此,卡里略于1967年12月对苏联提出了批评,<sup>②</sup>这也是西共首次公开了它和苏联的分歧。当时西共正固执地坚持反对派通过总罢工可以促使政府垮台的主张,谁知道十年以后现实情况促使西共接受了它曾经剧烈反对过的这一立场。

在投票日开始前三个星期,正式的竞选运动开始了,不过西共心中明白,它最多只能获得总票数的百分之六或八的票数,所以中

---

① 《工人世界》,1976年4月16日。

② 《工人世界》,1967年12月31日。

央全会一结束，它就展开了工作。西共的基本方针是想把投人民联盟的票减少到最低限度。于是弗拉加和他的伙伴便成了共产党竞选演说家的主要攻击目标，西共给这一伙人起了一个“不得人心的联盟”的外号，实际上，当这两家对手唇枪舌剑地交锋的时候，本来循规蹈矩的竞选运动却变得激烈起来了。与此同时，西共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共抓住了好几桩事情攻击费利佩·贡萨雷斯。首先，在参议院选举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宁可和以鲁伊斯·希梅内斯和希尔·罗布莱斯为首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联合也不愿和共产党人联合。其次，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以它的高明的手段和运气，似乎很有可能去摘取民主化进程的胜利果实，而西共认为这些正是他们对民主化进程所作出的贡献，这一点也许正是共产党人恼火的主要原因。左派们为了争夺领导权，相互指责对方侵犯了它的政治地盘。在许多场合，共产党领导对费利佩·贡萨雷斯进行了尖锐的攻击，相比之下，一般地来说，他们对苏亚雷斯的态度要温和得多，有时甚至还为他讲几句好话。唯有拉蒙·塔马梅斯直截了当地攻击民主中间派联盟，把它比作象人民联盟一样的“佛朗哥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货色。<sup>①</sup>

从技术角度来看，共产党人的竞选运动组织得非常完美，它能召集规模最大，给人印象最深的群众大会，这是哪一个党也比不上的。单以马德里为例，他们动员了一万名监票员，所以当投票结束后几小时之内，共产党领导对于全省的选举结果心中已经有数了。在马德里，共产党发动了一次重新计票的活动，这使民主中间派丧失了早已赢得的一个席位；此外，当西共的律师声称他们有证据证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而不是苏亚雷斯领导的联盟已经获得马德里地区的多数票时，大部分观察家认为，西共的估计并不过分。然而，正如先前所表明的那样，西共的成绩并不显著，它得的票数占

<sup>①</sup> 《十六日报》(马德里)，1977年4月25日。

全国总票数的百分之九点二。

### 选举后的形势

1977年6月的选举显然说明西共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他们在众议院里只占有20个席位（民主中间派占有165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占有118席），他们在参议院里的地位更加不稳定，参议院共有议席248席，他们只占了3席。如果在某一个特殊问题上，当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达成协议的时候，谁也没法阻止他们，在新议会任期的头几个月里，在好几个问题上，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然而，虽然共产党人无法和中间派联盟或社会党人作激烈的讨价还价（由于他们一家的表决权从来不能左右一项提案的通过或否决），可是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主要由于他们通过工人委员会对劳工运动施加影响的结果。

西共领导把选举中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四十年来不易消失的反共恶毒宣传的影响，一般说来，共产党人的这种分析是为了尽量缩小党所遭受的挫折。此外，他们强调指出，选举结果显然对有意在西班牙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力量有利，而对人民联盟和其它组织，尤其象佛朗哥主义派的全国阵线不利，这些组织都渴望回到老路上去。

为了阻止倒退，6月15日以后，西班牙共产党煞费苦心地想促使组成一个有广泛基础的联合政府。西共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在巩固西班牙开始形成的民主政治的进程中，这样的政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必要支持。共产党人并不坚持他们自己一定要参加政府。根据他们建议的方案，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可以组成联合政府，然后，他们在议会里可以得到西共和其它政党的支持。

社会党人对这个全国集中的政府的建议没有表示赞许的反应,他们从这个建议中看出,共产党人显然怀有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处于劣势地位的企图。然而西共关于政治和经济紧急措施的某些主张却赢得了人们的支持。诚然,在选举以后的岁月里,凡是有政治头脑的西班牙人,尽管他们不同意西共提出的论点,他们都日益认识到,西班牙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过渡到佛朗哥以后的时代中去的时候被大大地忽视了。

在经济方面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在过去二十年内,不论在什么时候,经济始终处于糟糕的状态,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1975年为14%,1976年为20%,1977年超过了25%),国际贸易支付逆差达到令人惊愕的地步(1976年来又增加了五分之一),到今年年底时,失业率预期会达到劳动力的7%(也就是说,将近一百万人要失业)。1977年6、7月间,政府宣布了解决这个危机的一系列措施,可是这些措施基本上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办法,充其量只不过起些支撑作用而已。

就整顿西班牙经济的一切努力而言,也就是意味着要限止最高工资额,这一措施如果得不到左派政党和工会的主动默许,根本是行不通的。苏亚雷斯政府知道,通过作出某些让步,它可以指望共产党支持它的某些动议。当然,社会党很不赞成社会契约的主张。社会党由于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而变得趾高气扬,社会党领导坚持认为,在更迭政府时,他们才是左派的唯一代表。6月15日以后,社会党开始设想在西班牙出现两党制(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民主中间派联盟或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任何一个中右党派),而让共产党人和人民联盟扮演新制度中的边缘角色。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信心百倍地预期,在1979年内举行的新的大选以后,它将完全有能力按照它的主张组成新政府。

这些主张,不用多说,绝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口味。早在1977

年6月选举之前，西共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之间接连不断地发生争执(尤其在圣地亚哥·卡里略和费利佩·贡萨雷斯之间)。在选举以后的岁月里，情况也没有好转。例如，贡萨雷斯时常提醒他的群众说，西班牙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政党：执政党，打算执政的党，最后一种是既不执政又没有机会执政的党。显然他把共产党人归纳在最后一类党内。

1977年夏末，尤其在9月初，社会党人在议会里强行提出对政府投信任票(他们失败了)，此后西共和民主中间派联盟打算团结起来击败社会党。10月下旬，除了人民联盟之外，所有政党都在蒙克洛亚协议上签了字，这是一个带有经济和政治性的协议，协议的名称是根据位于马德里大学附近的首相官邸的名字命名的，协议充分显示了中间派联盟和共产党人的利益的一致性。在其它方面，尤其当苏亚雷斯政府和工人联合会等在争夺劳工运动的领导权时，政府则倾向于工人委员会。对此，社会党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它在协议上签字也显得非常勉强。

某些观察家把这项协议看作走向西班牙式的“历史性妥协”的第一步。这种解释也许是正确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各党之间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从战术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民主中间派联盟至多把西共当作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进行讨价还价时的工具，他们并不把它看作长期合作伙伴。就社会党人而言，他们对于“历史性妥协”不感兴趣，假如他们的党能巩固它的左派领导权，他们就能够挫败趋于妥协的种种努力。<sup>①</sup>对于共产党领导，

---

<sup>①</sup> 与此同时，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一会儿和这一派对手联合，一会儿又和那一派对手联合，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讨价还价的力量，以便进入政府。关于市政选举上的争论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1977年12月，社会党领导人和共产党人开始谈判共同提出候选人的问题，社会党人是否真想和西共结成这样的联盟呢？事实是，在1978年3月社会党人和苏亚雷斯在市政选举法上达成了协议，这个选举法有利于社会党人而不利国内其它政治力量。



尤其对于圣地亚哥·卡里略来说，他也许已经充分认识到在西班牙“历史性妥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然而，就目前而言，共产党人的基本目标是要缩小西共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之间的差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共将遵循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支持苏亚雷斯，共产党人认为，这将有助于巩固民主制度和使西共在国内有一块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把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结成较长时期的联盟的大门敞开着。在某些方面，共产党还不得不作出选择，但是在未来的一些日子里，他们没有理由不同时使用上述两种策略。

## 展 望

通过对最近西班牙共产党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分析，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西共不能担任“变革进程中的主要角色”，<sup>①</sup>而至今许多政党的领袖们都感到在1976年年中，西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其失败原因应归咎于党的相当令人失望的选举结果。如果当初西班牙能迅速地以革命的形式过渡到佛朗哥以后的时代去，那末今天西共本来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如今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发觉他们陷入了一个极不舒坦的尴尬局面，因为他们一方面不得不为社会党人的胜利的重要性进行辩解，而另一方面还要向共产党的活动分子和同情者们再次保证这种局面不是不可能改变的。

假如西班牙共产党继续是保守的斯大林主义的据点的话，那末不论西共领导人或是它的追随者们对于改变局势的任何乐观想法都是无法实现的。而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的进程中，西共已经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变化，这种变化将有助于西共去战胜这个最根本的不利条件。

---

<sup>①</sup> 1976年4月，马德里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报告中使用了这一词语（油印稿），第18页。

现在，西班牙共产党已经不再充任苏联外交政策的臂膀了。六十年代初，西共开始渐渐地脱离莫斯科，1968年华沙条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更加深了这种倾向。在卡里略和国际事务专家马努埃尔·阿斯卡拉特的领导下，西共对苏联的直率批评一天多似一天，他们反对把苏联的模式硬套在西班牙身上，或者更一般地说，套在西欧的身上。西共对于东欧集团压制基本的政治自由，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不止一次地公开提出了抗议。<sup>①</sup>结果，1974年初，苏联《党的生活》杂志声称马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已经参加了鼓吹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独立自主的“公开反社会主义的敌对阵营”。<sup>②</sup>最近，《新时代》杂志又指责西班牙共产党人对西德《明镜》周刊的谈话以及在科隆和卢加诺的演说是“使资本主义有利可图”的行为。<sup>③</sup>当然，这些公开出现的分歧对西共追求其体面的身分，不会有丝毫的损害，不过，西班牙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的摩擦事实上已经发展到意味深长的地步了。

西共在其它方面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已经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形式上的”自由作传统的批判，现在它已同意政治、公民、宗教的自由是任何政治制度下的基本权利的观点。同样，西共已经明确表示赞同政治上的多元论和尊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反对党。的确，在许多场合，圣地亚哥·卡里略表示赞成轮流执政的原则，他表示，他的党心甘情愿地服从通过选举表达的人民的意志。虽然许多共产党活动家也许把这些新发明当作将来要抛弃的战略措施，可是他们也会发现这些誓言将成为一件难以摆

---

① 《我们的旗帜》，第90期，第51—54页，这一期杂志转载了关于捷克当局迫害七七宪章签名者的《捷克斯洛伐克》白皮书的某些文件。

② 关于这一个问题详细讨论的资料，参见笔者的《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载于《共产主义问题》，1975年3—4月号，第43—52页；《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的演变》，载于上刊。

③ 《新时代》（莫斯科），1978年1月，第3期，第14页。

脱的紧身衣。

尽管西共在适应欧洲共产主义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和其它西欧共产党一样远了,可是,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西共还可以作出某些重要的选择。这不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或是从组织观念的立场出发都是办得到的。

西班牙选举以后两个星期,《新时代》杂志对圣地亚哥·卡里略最近出版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发动了辛辣的攻击。<sup>①</sup>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为国际上的畅销书,苏联对该书完全有理由作出强烈的反应,因为卡里略在书中几乎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卡里略不愿意从根本上对东欧集团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进行批评,而本来那是极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不管他避免采取这一步骤的意图是什么,不过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西共要么减少它对莫斯科的挑战,要么加强挑战并最终和苏联决裂。

从组织观点上来看也是一样,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将不得不更为明确地阐明它的立场。尤为重要,党内提出了推动党组织民主化和允许对于党的各项政策进行充分的无拘束的讨论的要求,西共必须对这些问题表明态度。虽然党内的某些人士(尤其是律师集团和那些团结在《事实》杂志的马努埃尔·萨克里斯坦周围的人)早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直到1978年4月西共九大以后的日子里,这些主张才在党内引起反响。1978年年初,西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在党纲里不再提列宁主义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媒介因素。这项建议首先是为了顾及公共关系而制定的一个策略,然而在没有得到党代表大会批准以前,卡里略和其它西班牙领导人不得不对争论采取忍让的态度,而这些争论不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看,都不如西欧共产党内发生过的那么严重。到目前为

---

<sup>①</sup> 关于该书内容,参见《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巴塞罗那1977年。苏联的攻击刊于《新时代》杂志,1977年6月第26期,第9—13页。

止，西共仍旧没有放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可是，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的争论，实际说明了党组织将难以控制的民主化进程开始了。

共产党为扩大他们的选举和政治队伍的种种努力似乎并没有立即奏效。目前，西共在议会里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这是它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情况。除非在1981年本届议会任期结束之前，左派能迫使举行“提前”选举，否则这种局面是难以改变的。

“提前”选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以设想，在定于1978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左派的总得票百分比将高于中间派和右派。街区和家庭妇女联合会（在马德里一地前者就有一百个以上）早就高度政治化了，在那里左派是颇有影响的。80%的人参加了议会选举，参加市政选举的人很可能会低于这个数字，因此，一个高度有纪律的投票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据估计，在某些西班牙大城市左派很有接管政权的可能，因为经济上的不稳定趋向仍将起作用。政府只要在某些方面受挫折的话，苏亚雷斯将被迫举行新的大选。同时，在这种形势下，苏亚雷斯不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这一点也应该强调的。在通过新宪法的公民投票以后，根据国内情况，也为了他切身的利益，苏亚雷斯有可能决定提前举行普选。

当然，现在预测在近期或较长时期内左派“力量关系”变化的前景还为时过早。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社会党人在巩固普选成果的同时是否也能巩固市政选举的成果，并且在劳工运动中占据优势的地位。社会党人在战胜工人委员会所居的优势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可是，在1978年的工会选举中，工人委员会仍旧占领先地位，所以在工运问题上，社会党的努力是徒劳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争夺左派领导权的斗争将主要体现在劳工运动方面。在劳工运动中，如果社会党人能够维持和扩大他们的影响，那

么当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将处于有利的地位，而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社会党中没有几家拥有这种地位的。

在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西共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之间的匹敌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十分勉强，可是他们仍然把彼此看作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天然合作者。与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相比，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自诩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它并不是永远不能和共产党人达成谅解的。不用说，社会党喜欢单独执政，如果办不到的话，两党很可能会达成一项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这多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目前，社会党在组成“人民阵线”的幻想下和极右派达成了协议，依赖这项协议极右派和社会党人希望在排斥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执政，要不然，给共产党人划地为牢，限止它的影响。所以，到目前为止，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的主要障碍是不容易克服的，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它也会逐渐消失的。

在展望共产党的较长期的前景时，应该强调指出，西共在西班牙左派中所居的地位决不能和意共在意大利政界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同时，恰恰由于共产党人竭力想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我们可以预料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发生的变化在加深（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它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化”）。对于西共的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变化，对于它如何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等问题，我们必须密切加以注意，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西班牙左派队伍中的这颗独特的星辰至少在今天是赞成这种变化的。

## 四、葡萄牙：葡萄牙共产党 与葡萄牙革命

欧塞比奥·穆哈尔—莱翁

随着推翻马尔塞洛·卡埃塔诺政权的军事政变，经历了将近五十年地下活动的葡萄牙共产党，终于于1974年4月25日又露面了。在往后的两年中，葡共和它的同盟者以列宁主义的革命能动性为策略开展了革命斗争，它已经接近了权力的中心。然而，自1975年11月左派政变失败以来，葡共的地位不断在下降，1976年6月安东尼奥·拉马洛·埃阿内斯当选为葡萄牙第二共和国的总统，随即他任命社会党总书记马里奥·索亚雷斯担任第一届宪法政府的首脑，这又是葡共最近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最近几年，在葡萄牙发展西欧式议会民主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光明，因此，现在来回顾葡萄牙共产主义最近所走过的道路和探讨其可能的发展方向的机会已经成熟了。<sup>①</sup>

因而本文将深入地探讨1974年4月以后，葡萄牙共产党人是如何在适应他们所遇到的政治和社会的客观现实。结论部分还要研究葡共可能会采取何种方式参加葡萄牙的政治进程，同时也将对该党改变政治方向的前景进行探讨，研究一下葡共会不会脱

---

<sup>①</sup> 关于较早对葡共的评价，见阿诺德·霍廷格：《葡萄牙共产党的崛起》，载于《共产主义问题》，1975年7—8月号，第1—17页；另见乔治·W. 格雷森：《葡萄牙与武装运动》，1975年夏，第335—378页；另见肯尼思·马克斯威尔：《葡萄牙革命的荆棘》，载于《外交季刊》，1976年1月，第350—370页。

离它历来遵循的列宁主义政治轨道，而转向西欧共产党早已采取的更加灵活、多元化和协商的立场。

### 地下活动时期的遗产

葡共遭受过葡萄牙当局的残酷迫害，它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活动后才进入1974年4月以后的时期。将近五十年的国内流放生活（葡共成立以后只有在1921—1926年的五年内才是合法的）对葡萄牙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4年初葡共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发表的题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优越性》一文对这一点作了生动的描述。<sup>①</sup>库尼亚尔一再提到“精神力量”以及提倡“精神上的坚韧性”，这也说明（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党）象笃信宗教那样信奉这些问题，他真心实意地认为共产党人的职责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它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先锋队”。库尼亚尔强调指出，哪怕稍稍偏离经典的列宁主义法则，都会从各方面对他的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从而成为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障碍。

这个观点影响了葡共和其它组织的关系，也对葡共乐意参加的各类联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此外，在葡共如何看待葡萄牙政治舞台上的其它党派这一个问题上，这种观点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亲苏立场”所产生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虽然苏联共产党强调，1974年4月以后，尤其在1975年夏，葡共在决意采取激进主义政策的时候苏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不论从实际上还是从推论上来看，一般所公认的对葡苏两党关系的阐述都是不正确的。首先，苏联似乎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内

---

<sup>①</sup> 标题译自葡文单行本，1975年由里斯本前进出版社出版。1974年该文转载于《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月号（多伦多），第25—35页，标题变得富有温和色彩，改为《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全部引文引自《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

在联系的对葡政策。<sup>①</sup>葡萄牙国内发生的事件不仅在苏联的外交决策机构中引起了无休止的纷纭的争论（即既要鼓励欧洲结构上的变化，又要和美国保持缓和状态），而且也使苏共和大部分西欧共产党之间发生了无休止的广泛的争论（即关于列宁主义夺取政权的方法是否继续行得通的问题）。这些争论只会使苏共强化其本来打算施加于葡萄牙共产党人身上的一切影响。<sup>②</sup>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如果只看到葡共基本上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那就忽略了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对苏联的绝对忠诚是葡共在地下活动时期形成的强硬、偏执的政治观点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在葡共领导的心目中，构成葡共策略的内外政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相信，由于国内的需要才和苏联保持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在研究葡共的目前和将来的政策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它和苏联的关系，也要注意它对国内环境所作出的反应，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它的政策。

某些研究葡萄牙政治局势的观察家发现，在1974年4月以后的岁月里，葡共持有明显的列宁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对政权虎视眈眈，它蔑视资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由此，观察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葡萄牙共产党不仅脱离国内的现实情况，而且它在苏联的指挥下，正在忙于从事夺取政权的活动。但是，在推翻了马尔塞洛·卡埃塔诺以后，选择以全力夺取政权为出发点的策略方针是笨拙和不理智的吗？完全不是的。首先，卡埃塔诺政权不是被政党推翻的，它是被少数葡萄牙军官推翻的。其中有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和法朗西斯科·达·科斯塔·戈梅斯将军，以及一些青

---

<sup>①</sup> 关于这一个问题，见若安·巴尔特·乌尔班：《苏联对西方革命的新观点》，1976年冬，第1359—1402页。

<sup>②</sup> 应该指出的是，葡共在充当南非的形形色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莫斯科之间的桥梁的时候，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葡萄牙共产党人的革命不妥协性对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富有吸引力。



年少校和上尉，他们组成了“武装部队运动”。<sup>①</sup>当年这些军人为支持萨拉查梦想建立的葡萄牙帝国而作战，惨痛的经历使他们感受很深，所以，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把武装部队运动视为一种民族解放运动，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促进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发挥先锋作用。此外，他们坚持认为自己应该在国家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因而他们对传统的参加选举活动的政党抱完全不信任的态度。

其次，上述那些政党的选民的基本力量，也就是政治和社会的中间派，显得软弱无能，士气低落。一位研究独裁政权的著名学者曾经说过，这些政权的特点就是造就一批软弱温和的自由主义分子。<sup>②</sup>葡萄牙政府通过阻止政治动员和卷入政治活动以及在国内间歇地放宽控制和实行改革等做法，实际上它已经成功地使大部分反对党人变得无所作为，或被同化过来，所以被迫处于秘密状态的反对派很容易受到最激进的组织良好的团体——共产党——的影响。

爆发革命的时候，葡萄牙共产党人由地下转为公开，这时它不仅富于反抗性，而且也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并且它在社会上斗争性最强的阶层中有着最强烈的影响，这些阶层是里斯本和塞德巴尔地区的产业工人和阿连特如地区的农业工人。政变后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时期（有时候接近于无政府状态），面对这种局面，葡共继续依仗地下时期形成的列宁主义的政治风格，这确实是一种行得通的抉择。

---

<sup>①</sup> 关于导致 1974 年 4 月政变历史事件的详尽记载，见阿韦利诺·罗德里格斯，塞扎里奥·博尔加和马里奥·卡多索等人著的《上尉们的运动与 4 月 25 日》，里斯本 1974 年。

<sup>②</sup> 见胡安·林兹：《独裁政权下的反对派：西班牙的例子》，载于《政权与反对派》，罗伯特·阿·达尔编，伦敦 1973 年，第 188 页。另见胡安·林兹：《伊比利亚半岛上激进主义的来源》（油印稿），1975 年 2 月。

这种风格在1974年4月以后是如何反映出来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从四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分析：1974年4月至1975年3月，1975年3月至8月，1975年8月至11月，1975年11月至今。接着，我们将研究共产党领导对每一阶段的政治形势是怎样认识的，以及他们根据这种认识如何制定他们党的策略。

### 谨慎的时期

在推翻马尔塞洛·卡埃塔诺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也就是一直到了斯皮诺拉将军离职为止，葡共充当了谋求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力量。由于葡共对葡萄牙政权的结构心中无数，所以在对于武装部队运动或其它党派的支持方面，共产党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1974年9月斯皮诺拉将军辞去了救国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后，右派的威胁似乎减小了，但是，直到1975年3月他最后退出政界以后，共产党才觉得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方针的时机成熟了。

一方面葡共对于新的军人统治者们抱有戒心，另一方面对于它本身是否能马上取得合法地位的把握不大，因此，共产党人便以有节制的热情迎接推翻马尔塞洛·卡埃塔诺的政变。政变的次日，葡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警告说，“承认葡共的合法地位将是检验在葡萄牙是否实行民主自由的准绳。”<sup>①</sup>政变以前葡共是注重在军队中开展组织活动的唯一的反对派组织，所以也许葡共早就知道政变迫在眉睫了。不过尽管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军队中反卡埃塔诺的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葡共对武装部队的谋反者们所施加的影响多于其它政党。其实，武装部队运动中的许多成员对于他们希望共产党人在革命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相当模糊。如果我们相信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洛的证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斯皮诺拉将军（作为救国委员会的首脑）向共产党发

<sup>①</sup> 见《葡共中央委员会公报》，里斯本1975年，第19页。

出参加第一届临时政府的邀请的时候，武装部队运动中的许多人都大为惊讶，临时政府任命葡共总书记库尼亚尔为不管部长，又让另一位葡共领导人阿韦利诺·贡萨尔韦斯担任劳工部长这个敏感的位置。<sup>①</sup>

显然，斯皮诺拉指望共产党参加政府以后，它的玩弄花招的能力将会大大地削弱，同时，政府可以借助葡共之手驾驭日益失去控制的劳工运动。而共产党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葡共参加政府的决定会使它陷入危险的境地，尤为严重的是，它很可能会因此而公开地断绝和左派的联系，但是葡共显然也感觉到，以冒一场风险来换取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也是值得的。诚然，葡共领导从来没有对斯皮诺拉和他的姿态抱什么幻想。例如，1974年2月，斯皮诺拉撰写的《葡萄牙及其前途》一书首次问世的时候，共产党就警告说，卡埃塔诺政权的“第二道防线正在建立之中”，因为该书鼓吹以联邦制解决葡萄牙的殖民地问题。<sup>②</sup>然而，看来只要斯皮诺拉能够推迟和武装部队运动的决裂，葡共领导就尽量不去公开地攻击他。到目前为止，武装部队运动在军队中的影响还不能占压倒优势，而救国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依然是潜在的权力角逐中心。

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们加强与武装部队运动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也一再强调坚持和其它党派组织团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葡共历来坚持团结的主张，但是在这里应该区别它在出击时和在对法西斯和反动派的威胁采取自卫手段时的不同团结措施。首先，以1975年3月以后的情况为例，那时葡共出于自卫的目的，它呼吁团结以对抗反动派的威胁。所以它向其它党派，如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作出了绝对温和和随

<sup>①</sup> 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洛：《使葡萄牙发生变化的五个月》，里斯本1975年，第17页。

<sup>②</sup> 见自由葡萄牙广播电台的播音稿，1974年3月2日，由外国广播新闻处翻译，载于《每日报导：西欧》，1974年3月6日，第XI—XII页。

和的姿态：葡共的库尼亚尔竟然把这些党称为“斗争中的伙伴”。<sup>①</sup>在社会领域的政策方面，它极力主张节制的原则，它提出不要把深入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方案列入武装部队运动的纲领中去，而且它认为阻止“反动派的进攻”的关键在于避免加深社会矛盾。<sup>②</sup>

尽管葡共的路线是温和的，但是它却熟练地忙于展开巩固自己地盘的工作。例如，它利用它所掌握的劳工部长的职位，把羽毛未丰的劳工运动和被大家称为工会联合会的组织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虽然1974年7月阿韦利诺·贡萨尔韦斯辞去了部长职务，由亲共的武装部队运动成员何塞·伊纳西奥·达·科斯塔·马蒂纳斯接替他，但是葡共仍继续保持并扩大它的影响，尤其在副部长一级的范围内。）葡共也在反对派联盟“葡萄牙民主运动”/“民主选举委员会”中开展工作。在那时，事实证明葡萄牙民主运动/民主选举委员会是十分有用的工具，它不仅能使共产党在省市一级的行政机构中保持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只要葡萄牙民主运动/民主选举委员会假设的独立性能够持续下去），而且葡共可以利用它来发动某些阶层的葡萄牙人，因为对这些人，如果采用“激进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口号是难以把他们动员起来的”。<sup>③</sup>

1974年9月斯皮诺拉和武装部队运动之间酝酿已久的冲突终于达到了一触即发之势，部分原因是，共产党的节制政策终止了。在批准向里斯本的“静默的多数”的进军以后，9月28日斯皮诺拉终于辞去了救国委员会的领导职务。那么武装部队运动是否曾经打算回到军营里去而把政权移交给文职人员呢？现在看来在他辞职以后，这种可能性显然已经越来越渺茫了。秘鲁和阿尔及利亚军人介入国家事务的形式对武装部队运动的吸引力日益加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政治论文》，里斯本1975年，第79页。

② 同上，第53—59页。

③ 见葡共中央委员阿尔多·诺古耶拉答《再生》周刊（罗马）记者问，1974年12月13日。

强。武装部队运动中的激进派开始筹划，他们想使他们的组织扮演完全类似于他们在非洲与之作战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角色，并把解放葡萄牙人民作为他们的天职。1974年9月以后，武装部队运动发起了一个文化推广运动，当有人问到这个运动的宗旨时，一位青年军官说，“我们要到人民中间去，帮助他们从愚昧的长夜中解脱出来。”<sup>①</sup>

共产党人对这些事态发展的意义心领神会。举例来说，葡共意识到不久的将来转向更左的方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0月下旬葡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明显地表露了这种看法。在这次历时一天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个一般说来温和的“紧急宣言”和修改了1965年的党纲，这个党纲对葡萄牙参加北约组织不作只字的批评，而且从葡萄牙共产党的词汇中勾销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而报界对会议的报导也都倾向于这些方面。<sup>②</sup>《卫报》（曼彻斯特）引述了大会的材料，宣称这次代表大会使“华盛顿和欧洲对在葡萄牙出现‘红色’威胁的恐惧减少了。”<sup>③</sup>虽然这次大会也确实暴露了葡共对今后要走的道路的矛盾心理，但是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对代表们所作的主要报告的意义更为重大，他宣称葡共领导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激进化的中期前景了。<sup>④</sup>

库尼亚尔高度评价了九月事件：

它将成为葡萄牙民主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政权取得了更大的统一性，它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国家机器巩固了；武装部队运动和民主力量增强了：事实证明，人民运动和军人之间的联盟已经成为政治轴

① 见《快报》周刊（巴黎），1975年2月10—16日，第40页。

② 诚然，《紧急宣言》真的阻止了对大企业和银行采取国有化的激进措施。同时它主张通过清除政府中的官僚政治和承认议会的权力来“使民主国家得以加强”。这份宣言和1974年的党纲收在《葡共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一书中，里斯本1974年。1974年春，第三次再版了1965年葡共六大上通过的党纲。

③ 《卫报》（曼彻斯特），1974年10月28日。

④ 见库尼亚尔在七大上的演说，第21—48页。下面一大段都引自他的演说。

心，民主改革的工作正环绕着它在进行。目前全面衡量九月底反革命被挫败的意义还为时过早。如果进步势力证明自己有能力和具体措施把胜利引向纵深发展的话，到那时候才可以说，在葡萄牙建立民主政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他接着又说，只有解决了4月25日以后葡萄牙存在的经济和政权分离的现象，才能使革命的进程一往向前，因为从那一天起虽然政权掌握在“民主力量”手中，但是“经济大权仍旧掌握在垄断集团和大庄园主手中”。他继续指出，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么垄断集团和大庄园主把政权接管过去，建立新的独裁政权，要么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葡萄牙，剥夺〔前者的〕经济大权，两者必居其一。”1974年9月以前，葡共一再强调指出，武装部队运动的纲领（总之读起来含义模糊、模棱两可）没有预见到任何激进的经济改革，一直到那时为止，他们总是只提对犯有破坏经济罪名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和没收的可能性问题。如今库尼亚尔着重指出，在不久的将来要采取反垄断的措施。他的分析无疑提出了绝对化的抉择。在葡萄牙没有西欧式政治制度的立足之地；葡萄牙的社会结构不允许同时存在资本主义式的经济集中和广泛的政治民主，因为在共产党眼里，葡萄牙资产阶级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它的统治，最终必然会导致暴力行动和建立新的法西斯专政。

由于葡共提出了那么苛刻的抉择，因此最终使葡共的选择余地大大地缩小了，也使它对武装部队运动内外的激进派变得格外敏感。然而，那时共产党人对是否投入到这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中去还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对于能否获胜把握不大。因此他们为了加强与武装部队运动和临时政府中的广大温和派和左派的联系，他们喋喋不休地宣传右派政变的威胁。

为了反击这种假设的威胁，在这一时期中共产党领导试图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也包括农民和各部分中产阶级的社会势力结

成广泛的联盟,这些人可能或“客观上”对支援革命感兴趣。然而,应该看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设想在塔古斯河以北的地区里难以得到支持,因为在那里小地主占优势,改革就意味着对他们的剥夺。葡共在夺取政权问题上所持的工运中心主义的态度结果也使对抗加剧了。此外,在这一时期内(以及往后的时期内)葡共毫不隐晦地认为,资产阶级政党正在迅速地变成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是受了地下活动时期传统的影响,葡共巴望葡萄牙政治舞台上的其它政党将会很快地充分暴露出他们的弱点,而在1974年9月以后的岁月里,葡共的这种看法更加坚定不移了。

在九月以后葡萄牙所处的特定环境下,武装部队运动(而不是其它政党)扮演了主要角色,因此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葡共与之结成政治联盟的轴心。葡共认为,武装部队运动早已成为“民主进程”的保证者;因而,在当时与它结成伙伴是绝对必要的。社会党人和人民民主党人也只好面对这样的现实以及作出他们认为恰当的反应。<sup>①</sup>

暗地里葡共对其它政党都怀有敌意,不过它仍旧坚持认为,只要这些政党改弦更张,向左看而不是向右看,它们还是可以起作用的。葡共采取这个态度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由于社会党人和某些欧洲国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如果共产党人与联盟中的头面人物公开决裂,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失策,而且在国际关系方面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排除社会党人在国内会引起适得其反的恶果。因为军方激进派中的某

---

<sup>①</sup> 然而,葡共认为,尽管社会党采取了“向右转”的政策,它靠近了最保守的势力,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与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因此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还存在着达成谅解的余地,共同发挥“高度的积极作用”。《前进报》(里斯本),1975年1月29日。库尼亚尔对人民民主党则抱不太乐观的态度,因为它是“从法西斯专政的娘胎里分娩出来的,它吮吸的第一口奶液来自法西斯的乳房。”同上报,1975年2月27日。

些成员<sup>①</sup>把一切政党都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所以如果一旦排除了社会党人，在极左派的煽动下，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掉转枪口来反对葡共。因此，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采取平衡的办法，一方面设法削弱其它党派，把它们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不从基础上割断与武装部队运动的关系。

葡萄牙四月革命以后露面的政党加起来至少有四打之多<sup>②</sup>，葡共密切注意的对象，武装部队运动中的激进派，它不相信依靠大多数政党便能完成葡萄牙社会的改造，其实，它持有这种看法也是毫不足怪的。幸好卡埃塔诺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党派不仅没有打碎新的国家机器，而且他们是否会全力支持激进派们着眼的革命目标也是值得怀疑的。在这一片萧瑟的景象面前，葡共与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对于共产党人固然不能抱完全信任的态度，但是共产党人却全心全意地支持武装部队运动的一切首创精神，为了保证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它几乎单枪匹马地极力主张武装部队运动一定要出席定于1975年4月选出

---

① “军方激进派”指的是武装部队运动内部两个多少属于截然不同的派别的松散的联盟的成员，1975年3月以后，这两个派别在政治上和个人方面的分歧涌现出来了，但是直到那时，它们在下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几乎是相似的：即关于保障武装部队运动继续参加政治进程的问题；关于武装部队运动正式成为一个政党的问题；关于它在国民大会中的席位分配问题等等。一方面有些军官和总理瓦斯科·多斯·桑托斯·贡萨尔韦斯关系密切，他们把共产党人视为政治轴心，以它为基础可以组成一个左派联合阵线。军官中有几名是彻头彻尾的葡共党员，他们与共产党的联盟反映了他们对于自发的民众运动的怀疑和厌恶远远超过其它事情。另一方面，武装部队运动的激进派中有些人团结在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洛周围，也有少数人团结在海军上将安东尼奥·罗萨·科蒂诺的周围。我们可以把这些军官笼统地称为军人民粹派分子，他们和（尤其那些团结在卡瓦洛周围的人）无产阶级革命纵队革命党和人民民主联盟等极左派组织关系密切，他们认为，只有抛弃传统的政治组织和通过工人、士兵会议使武装部队运动和人民直接接触，才能使葡萄牙革命推向前进。

② 《葡萄牙的党派和政治运动》一书提供了形形色色党派的大概情况，里斯本1975年。



的国民大会。此外，武装部队运动中的左派都是些缺乏政治活动经验和阅历相当浅的军官，所以尤其当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要么选择武装部队运动，要么选择法西斯统治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葡共的见解甚为精辟，因为共产党人的主张为武装部队运动继续控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除此之外，葡共的组织和鼓动才能，为武装部队运动得心应手地处理大城市和南方事务起了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军方激进派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提防着共产党人，可是另一方面，他们至少不象蔑视其它党派那样地蔑视葡共。

在“沉默的多数”示威事件以后，葡共和比它更左的组织渴望加强军方激进派的力量，他们要求把残留在葡萄牙军队里的相当数量的保守派军官清洗出去，但是这件事没有搞成。1975年初武装部队运动分部大会改选时，激进派的头面人物，如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洛等人被挫败了<sup>①</sup>，选举结果表明保守派分子的力量加强了，同时也表明激进派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军事机构“最高领导”所施加的影响方面，而他们却不能取得下级连队单位的支持（这里我们还必须把大部分由精锐的保安部队组成的队伍排除在外，这些保安部队的名称缩写为 COPCON，即大陆作战部队）。通过分部大会的选举，武装部队总部的组成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三月初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挫败激进派妄图控制整个组织的阴谋是完全办得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试图在3月11日策动政变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这是很难理解的。尽管如此，那天，他们对一支番号为 RAL-1 的左倾部队发动了一次空袭。反叛者们显然指望他们的行动会引起广泛的反响，但是由于其它部队拒绝参加，这次政变夭折了。即使到今天，如何看待这次事件的动机还是争论不休，关于

<sup>①</sup> 《快报》(里斯本)，1975年2月8日。

这次阴谋和对抗策略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不管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这一次策划和发动都很拙劣的政变给武装部队运动中的激进派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他们狠狠地（几乎致命地）打击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温和派分子。

### 使革命激进化

未遂政变以后，武装部队运动中获胜的左派分子打算利用这一新形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加紧采取行动。它的第一批措施中，包括成立一个由 25 人（后来扩大到 28 人）组成的具有充分行政和立法权的革命委员会，同时解散了最近选出的武装部队运动总部，在那里激进派曾经遭到过重大的挫折。享有最高政治权威的革命委员会立即签署了一系列的国有化法令（这标志着它与埃内斯托·奥古斯托·德·梅洛·安图内斯提出的过渡计划彻底决裂），同时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协调部来指导政府的“反垄断”经济政策。武装部队运动任命马里奥·穆特里亚为该部部长，穆特里亚是一位与葡萄牙民主运动 / 民主选举委员会有着密切关系的杰出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任命和委派葡萄牙民主运动的其它人员担任其它部长职务一事引起了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的反对，它们也反对暂时停止三个党派的活动以及禁止他们参加一个月以后举行的国民大会选举的法令（这三个党是：以前少校桑谢斯·奥索里奥为首的基督教民主党和两个毛主义组织，即重建无产阶级政党运动和工农联盟）。4 月初，武装部队运动和所有的主要政党签订了一项从制度上保证武装部队运动是一个政治组织的协定，这件事反映了国内力量的新的平衡。<sup>①</sup> 宪法协议授与革命委员会在三一五年时间内制订国内外主要政策的权力，而且规定在将来选举的

<sup>①</sup> 协定全文载于《武装部队运动简报》（里斯本），1975 年 4 月 22 日。

议会中给武装部队运动留出 240 个代表的席位。武装部队运动对这些措施作出了解释,它声称唯有在这些条件下,革命才有可能在“避免毫无用处的政党分裂和冲突并在自由的气氛中”获得发展;可是在签署这个协议的党派中,只有葡共和葡萄牙民主协会显示出了热情。

右派政变阴谋失败了,同时为了确保武装部队运动牢牢地掌握在左派分子的手中而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因此共产党人似乎认为,这些都为最后解决 1974 年 4 月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政权和经济大权分家的问题提供了结构上的有利条件。如果葡萄牙国内处于 1975 年 3 至 8 月的形势(葡共从这一形势出发来处理现实问题)下,葡共除了选择使革命不断激进化的策略外,任何其它决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1975 年 4 月国民大会选举的结果也许可以说明葡共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党人轻而易举地获得将近 38% 的选票,人民民主党人得票 26%,共产党人得票 13%。<sup>①</sup>如果温和的中间派和左派政党能够成功地在葡萄牙建立起议会式的民主政治,那么在葡萄牙逐渐发展的政治进程中,共产党人至少可以起到第二位的作用。

如果一旦摒弃了民主议会政治,共产党发现可能结成政治联盟的范围大大地缩小了。它唯一的抉择就是去和左派临时政府总理瓦斯科·贡萨尔韦斯以及武装部队运动内部的激进派进行合作。然而,在往后的岁月里,军队中的民粹派分子和团结在贡萨尔韦斯周围的亲共左派军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葡共虽然对此表示深切的关注,但是从当时来说,葡共领导深信,如果没有葡共参加,武装部队运动中的激进派不可能着手制订一项旨在使葡萄牙社会在结构上发生深刻变化的政策。

对葡共来说,它和武装部队运动的合作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可

---

<sup>①</sup> 关于选举的全部结果,见《快报》,1975 年 4 月 30 日。

以联合的对象社会党人抛弃了。当然，共产党人仍旧提出了与左派联合的号召(包括社会党人在内)，但是在付诸实践时，他们却显得越来越缺乏热情。7月底以前，在葡社党退出瓦斯科·贡萨尔韦斯的联合政府以后，葡共领导就作好了攻击该党政策的准备，谴责它是“反革命活动的轴心”，也谴责该党领导联合了“反动和保守势力以反对进步和革命的力量。”<sup>①</sup>

这时，葡共也注意去争取和极左派结成联盟，这也是葡共政策转变的另一个相应的措施。早些时候葡共对于极左派<sup>②</sup>的存在可以不屑一顾，就如一头犀牛看待一只蚊子那样，但是，一旦摒弃了库尼亚尔所称的有利于“实力力学”的“选举政治和选举主义”<sup>③</sup>，葡共就不得不和这些小派别打交道，与它们在葡共内部和群众组织中的影响作斗争。从党内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去妥善处理1974年4月后入党的数千名新党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葡共从两、三千名党员发展到十万名党员。<sup>④</sup>在这批新入党的未经考验的党员中，有些人指望以不断前进的方式建立新社会，如今他们遇到了不可避免的艰难和曲折以及葡共制订的退却和调整的策略，于是这些人开始对葡共不再那么着迷了，这也是毫不足怪的。同样，在共

<sup>①</sup> 《前进报》，1975年7月24日。

<sup>②</sup> 萨维尔·劳费尔所著的《葡萄牙的极左派运动》对这些极左派小团体作了全面介绍，该文载于《东西方》杂志(巴黎)，1975年6月，第269—280页。

<sup>③</sup> 见库尼亚尔的演说，载于《前进报》，1975年6月26日。在答奥里亚纳·法拉奇问时，他把他的观点讲得更加明确，全文载于《欧洲人》周刊，1975年6月15日。当问及葡共的策略是否对欧洲的右派有利，而使其它欧洲共产党难堪的时候，库尼亚尔回答道：“我是多么的难过，难过得心快要碎了，沮丧极了！我苦恼极了！真的苦恼极了！可怜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我为意大利共产党人流泪！我为欧洲所有的共产党人流泪，我痛苦，我难受！当然，我了解他们的悲叹。他们上这儿来的时候，也一再和我提到这些事情……面对西欧共产党的悲叹，我只有一个回答：我们，我们决不指望由选举结果来改变社会结构和破坏旧的一切。我们依靠革命，而这种革命与你们所采取的一切方法都是毫不相干的。”

<sup>④</sup> 见《前进报》，1975年7月17日。关于葡共组织上的扩大，见该党的组织工作简报，载于《战斗报》(里斯本)，1975年6月。

产党历来影响很深的劳工运动和某些社会阶层中，葡共发现自己现在必须对极左派组织的挑战作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急迫的反应。极左派组织无论在人数上或组织上都不如葡共，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统制经济的策略提出了批评，他们主张在传统的党派组织之外争取“直接民主”，这些都打动了武装部队运动中的民粹派分子的心弦，结果他们之间结成了心照不宣的联盟。

且不谈葡共的观点和它承担的义务，当它在贯彻它的政策时，它发现，在这一时期中，它自己根本不是局势的主宰者，它常常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它根本不可能使武装部队运动中的激进派接受它的策略，武装部队运动内部在如何组织权力机关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葡共对于这些争论和以后形成的决议也只好采取容忍的态度。其中有一个决议提出了建立街区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的问题，由此葡共再次确信，“武装部队运动更直接地参加葡萄牙的政治进程不仅不会使葡共失去其葡萄牙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相反却再次肯定了它的这一作用。”<sup>①</sup>那时武装部队运动中的许多军官显然都已经认识到军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是凌驾于一切党派之上的，它应该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即使那些我们称之为武装部队运动中亲共的军官，经常采取类似共产党人的立场，但是他们也不是共产党人的驯服工具。他们对于武装部队运动和葡共的联盟有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我们可以这么说，一旦他们的革命冒险行动取得成功的话，根本不可能设想他们会把政权移交给库尼亚尔和他的同事们的。

不过这些仅仅是一个福星正在升起的党的一些磨难而已。1975年春，社会党人的威信不断下降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党从来没有掩饰过它的观点，它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军方应该尽可能不扮演主角，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它与武装部队运动的

<sup>①</sup> 见《前进报》，1975年6月5日。

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社会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获胜以后，提出立即举行地方和省级选举的要求，武装部队运动没有同意，后来武装部队运动又正式承认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为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以此来削弱社会党和其它工会组织的基础，这么一来，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恶化了。社会党断定，在激进派的方案中是没有社会党的立足之地的，这也毫不足怪。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要找武装部队的碴儿。1975年5月下旬，罢工的印刷工人占领了里斯本《共和国报》的印刷厂，这就给社会党提供了一个机会。<sup>①</sup>社会党人一再要求把占领印刷厂的工人驱逐出去，但是武装部队运动对此置若罔闻，于是，在7月11日，社会党终于退出了内阁。

尽管社会党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但是它却选择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向瓦斯科·贡萨尔韦斯总理、武装部队运动中的激进派和葡共提出了挑战。1975年仲夏，武装部队运动失去了一大批葡萄牙人对它的热烈而主动的支持，这是自从推翻马尔塞洛·卡埃塔诺以来头一回出现的情况。革命委员会将大量时间花费在没完没了地争论微妙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差微方面，在里斯本的令人陶醉的狂热气氛中，这些争论似乎与正在作出的决定越来越不相干，而人民大众对这些决定也产生了疏远的感觉（甚至往往变得漠不关心）。亚速尔群岛上主张独立的情绪正在日益高涨，葡萄牙在安哥拉的非殖民化计划遭到了彻底破产，这些都使总的紧张局势加

---

<sup>①</sup> 在策划向武装部队运动激进派提出挑战时，社会党人完全明白，从战略上来说，这场要求军方让这家报纸恢复自由的斗争是非常厉害的一着棋，而且几天以后，又发生了占领天主教统治集团的复兴广播电台的发射台事件，事情就变得更加惹人注目了。葡共参与了占领《共和国报》的事件，尽管它应对此负责，但最多也只负间接的责任，而且它这么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和毛派的葡萄牙民主联盟有联系的工人的好斗精神作出反应。但是，不用说，社会党的决定不仅在国内，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和美洲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些国家密切关注着葡萄牙局势的发展，尤其对日益增长的共产党影响表示关切。

剧了。在经济领域方面，政府也是困难重重：经济萧条，失业人数增加（据官方数字为 25 万人，但是由于成千上万的在前殖民地定居的居民提前返回葡萄牙，这个数字很可能会翻一番），因越来越多地进口农产品而造成的贸易支付逆差直线上升。这些经济问题只有通过强制实行紧缩措施才可以有所缓和，然而，对于贡萨尔韦斯和武装部队运动来说，遗憾的是贯彻这些措施需要一笔不小的政治资本，这正是这位处于四面楚歌中的总理所缺少的东西。

在武装部队运动内部，贡萨尔韦斯一直不断受到仍旧留在革命委员会内的军队中的民粹派分子和少数“温和”的左派领导人的攻击。与此同时，社会党人也对他进行攻击，但是在面对社会党人对他攻击的时候，武装部队运动几乎总是自发地起来维护他，这就说明了在 7 月和 8 月的部分时间内，贡萨尔韦斯为什么能顶住了企图把他赶下台去的大大小的尝试。然而，在 8 月初，埃内斯托·奥古斯托·德·梅洛·安图内斯和革命委员会里的其它八名军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九人文件”，他们严厉批评了贡萨尔韦斯总理，指责他把葡萄牙引向东欧式的极权主义政权以及试图“以宗派和暴力方式强制推行政治教条”，他对这一切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sup>①</sup>“九人文件”提出的可供选择的策略是建立一个广泛的集团，其中包括城乡工人和大部分中产阶级，这一集团将保证葡萄牙和平而又长期地走向社会主义。虽然文件的签署者自封为 1974 年 4 月革命的真正继承者，把他们的建议看作是供武装部队运动唯一可选择的左派路线，但是正是他们对贡萨尔韦斯的批评在军队的各阶层中引起了极强烈的反响。不过，革命委员会里的“温和的”反对派如果没有取得大陆作战部队司令，野心勃勃的萨赖瓦·德·卡瓦洛的临时支持的话，他们就未必能在 9 月初下决

---

<sup>①</sup> 声明发表在《新闻报》上（里斯本），1975 年 8 月 8 日。

心把贡萨尔韦斯赶下台去。<sup>①</sup>

在武装部队运动内部终于消灭了针对激进派的一切抵抗，如果我们能充分估计到共产党人会从中吸取些什么教训，如果我们毫不忽视葡共拥有协调支持贡萨尔韦斯的示威和罢工的能力，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葡共基本上是那出即将上演的戏的旁观者，这出戏将于7月下旬或8月初在武装部队运动总部和革命委员会内演出。除非象过去常常做的那样，继续敦促激进派消除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否则，对于武装部队运动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简直无计可施。

为了谋求某些政治影响，在这段时期内，葡共领导试图与社会党内的左派分子拉上关系或是使他们从社会党里分裂出来，这些人对于社会党领导集团决定同在国内重新出现的更加保守的、甚至明目张胆的反动势力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一事表示不满。社会党退出内阁后，贡萨尔韦斯组成了新的临时政府，于是共产党唆使社会党左翼知名人士安东尼奥·雷斯和安东尼奥·洛佩斯·卡多索参加新政府，这些努力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们的作法促使社会党领导(至少暂时)团结在马里奥·索亚雷斯的周围并作出和武装部队运动决裂的决定。

“九人文件”派和萨赖瓦·德·卡瓦洛都一致反对贡萨尔韦斯，谁知他们却得到了军队的意想不到的巨大支持，这些都迫使葡共暂时采取比较调和的立场，而在7月初，当社会党决定退出葡萄

---

<sup>①</sup> 卡瓦洛竟然与“九人文件”派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这确实有些使人感到意外。尽管如此，这也是他素来对共产党所持的谨慎小心态度的必然结果。8月初，当一些身分不明的左派军官(没有人公开指责他们是共产党人或受葡共的指使，但是卡瓦洛显然认为葡共应对此负责)在大陆作战部队统辖的一个精锐的突击团内发动了一次兵变，这时，他对共产党的直觉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强了。1975年8月8日的《新闻报》对“纳维斯事件”作了分析。这时，大陆作战部队里的军官也起草了他们自己的文件，批评共产党，社会党和军队里的温和派分子。见《快报》，1975年8月15日。



牙联合政府时，葡共却号召赶快建立“清一色的革命政权”。<sup>①</sup>8月10日举行的葡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发出了策略退却的信号，会上，库尼亚尔极力反对“强硬立场”，也不同意“在那些拥护和反对革命的人中间划一条僵硬的界线”，他再次强烈要求把“一切关心进程的势力团结起来”，以反对“法西斯和反动势力”。<sup>②</sup>但是在8月中旬，由于武装部队运动中的军人民粹派集团对卡瓦洛感到厌恶，其中大部分人又转而支持贡萨尔韦斯，这时葡共在大陆作战部队中的民粹派分子和亲共的第五师军官的赞助下放弃了调和立场并与极左派恢复了友好关系。<sup>③</sup>由于双方都蔑视社会党，而且大家都显然感觉到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抉择的机会不多了，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了革命联合阵线，并发表联合宣言，号召“广大群众猛烈地向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动进攻，把革命向前推进”。<sup>④</sup>在8月的某些日子里，看来葡共（正如索亚雷斯所说的那样，它在与极左派结成了“非神圣同盟”的情况下）已经作好了再次攻打冬宫的准备工作的。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个短命的联盟，所以对权力的城堡也没有发动猛烈的进攻。在最后关键时刻，葡共意识到它所处的地位的基本弱点，也意识到武装部队运动中的激进派已经丧失了积极的进取性，于是葡共就后退了，它决定同意把贡萨尔韦斯赶下台去，并提出了与社会党举行会谈的建议。这些步骤表明共产党政策的新时期开始了。

在往后的日子里，即直到11月中旬流产的左派政变为止，葡

---

① 《前进报》，1975年7月10日。

② 见库尼亚尔在中央委员会上的演说全文，载于《前进报》，1975年8月11日。

③ 1975年8月30日的《快报》的一篇文章对葡共在这情况危急的一个月中的政策上的曲折变化作了一个总结。

④ 关于他们的宣言全文，见外国广播新闻处：《每日报导：西欧》，1975年8月26日，第M4页。

共发现它虽然处在一个恶化的政治环境中，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它决定抛弃贡萨尔韦斯并参加海军上将何塞·平埃罗德·阿泽韦多领导的第六届临时政府（它只取得一个小小的公共工程部长的职位），这也反映了葡共对国内发生的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化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

### 斗争使力量对比的差距扩大

显然葡共原来打算让贡萨尔韦斯作为左倾政府的首脑继续执政的，它不愿意社会党得心应手地把它在历届政府和新闻宣传中苦心经营所取得的地位一笔勾销掉。但是政府的更迭对于葡共，或更广泛地说，对于一切热中于采用激烈手段的势力来说，也并不是完全不利的。

共产党人推测，首先，一个新政府，尤其是一个右倾的政府将不得不对稳定政局（在军队和平民范围内）和经济局势负主要的责任。看来葡共是无力担负这个重任的。其次，共产党所称的内阁中的“社会党霸权”也许会使社会党本身产生不安定的因素，很可能会加剧社会党内部的紧张状态，最终导致社会党分裂。

虽然共产党人把这一新的时期看作为“所有左派势力退却”的时期，但是他们却坚持认为葡萄牙的局势中仍旧蕴藏着“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巨大潜力。<sup>①</sup> 1974年10月葡共首次公开阐明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样，葡共在欧洲则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葡共坚信资产阶级民主是行不通的。由于葡萄牙工农业发展的水平不高，库尼亚尔认为，社会党立场的胜利可能会伴随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和“唯有通过镇压机器才能强加的那种剥削”。<sup>②</sup> 正如共产党人在11月所声称的那样，“民族民主革命”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不

---

① 《前进报》，1975年9月18日。

② 例如，见《前进报》，1975年10月9日。

消灭自由和扶植一个新的独裁政权”，局面是无法改变的。<sup>①</sup>

“法西斯主义”再次成为主要的敌人了。从某种角度来看，法西斯幽灵的复活使人们回想起了葡萄牙革命初期阶段，那时，葡共表面上主要盘算着防御问题，但是在幕后它却紧紧地抓住进攻的一面。共产党人认为，目前社会党在政治上占了优势，但这并不是由于它的力量壮大而造成的，它是革命力量，尤其是武装部队运动分裂的产物。所以，在这一时期里与“反动派”的斗争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它将使武装部队运动团结起来，使军队中的民粹派、亲共军官和“九人文件”的支持者们重新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它将迫使社会党要么和人民民主党（目前共产党人已经公开把它称之为反动派）继续保持联盟，要么和葡共以及某些极左派政党联合，两者必居其一，别无它择。

由于葡共非常勉强地参加了本届临时政府，所以现在它可以相对泰然地采取“左的”立场。它毋须再去维护官方的政策，因而它与其它左派对抗的机会增加了，它能抢在这些组织之前，先发制人地向阿连特如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发出号召。共产党控制下的工人（如建筑和冶金工会的工人）现在也可以提出稀奇古怪的工资要求，这些都迫使社会党采取自我遏制的政策，因为社会党掌握着财政部，他们对经济政策负有最重大的责任。相比之下，共产党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它轻易地挫败了社会党想把工会联合会中的主要工会争取过去的尝试。

关于土地改革计划，葡共也采取了比较自由的立场。虽然农业部长安东尼奥·洛佩斯·卡多索是社会党人，但是共产党人维托尔·洛罗担任了负责农业结构的国务部长这一关键性的职务，他往往和那位部长发生矛盾。在“地区土改中心”里，从贡萨尔韦斯政府继任下来的共产党主任委员可以无视里斯本发出的指示，

<sup>①</sup> 《前进报》，1975年11月13日。

把他们的管辖范围当作自治的领地。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怂恿土地荒的雇农非法占领土地。于是，葡共便可以进一步提出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而把非法占领者赶跑的却是社会党。

随着贡萨尔韦斯的下台，武装部队运动领导阶层中的保守分子的影响跟着加强了，可是这一切却使共产党人在武装部队运动中继续开展旨在加强左派力量的组织工作的机会增加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1975年8月前，我们对葡共开展这项工作的广度并不清楚，但是显然在那个时期的初期，葡共自己也感到紧张，所以它在和军方打交道时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态度，尽量少公开干预武装部队运动的事务，以避免引起军方激进派中某些集团的反感。然而，如今共产党人发觉，它在与武装部队运动合作的联盟中已经不再是弱者了，它意识到了自己的影响力，它在挑动连队的无组织无纪律活动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葡共至少（和其它极左派一起）要为组织松散的士兵必胜联合会和全国各地军队兵工厂丢失武器的事件负部分责任。库尼亚尔在一篇讲话里严肃地指出，唯有“停止清洗左派分子”和“在军队和政府中增强革命左派的地位”，政府才能消除军队内部日益增长的不安定因素。<sup>①</sup>（军队内部的不安定局面，尤其在里斯本和波尔图军区的部队中，的确成为政府深感头痛的一个问题：到11月初，事态发展得极为严重，当建筑工人包围了圣·本托的国会大楼时，保安部队竟然拒绝去进行干预。）

早在10月中旬以前，也许比共产党领导期待的还要早一些，出现了反对平埃罗·德·阿泽韦多政府和政府中的温和派的风潮。共产党觉察到了这一点，它认为现在“右派改组的危险已经被克服了”，于是它就开始大声疾呼地号召改组内阁和革命委员

---

<sup>①</sup> 《前进报》，1975年10月23日。

会。<sup>①</sup>

11月中旬，事态发展到危急的地步，在政变与反政变的谣传中，工会联合会在里斯本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要求平埃罗德·阿泽韦多辞职，要求贡萨尔韦斯重新上台。对于这一挑战，内阁以罢工来作回答，而且在革命委员会对它投信任票前，拒绝恢复工作。事情陷入了僵局，而且很可能会清洗革命委员会内残余的左派分子，于是，某些军事单位策划了一次类似1975年3月斯皮诺拉喜剧式的未遂政变。

这里不宜对这次叛乱或对共产党人卷入的程度作详细研究，对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不曾，今后也许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的。<sup>②</sup>在政变以后的一系列演说中，<sup>③</sup>葡共领导特别提到葡共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赞成对抗行动，它一再要求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危机（的确，葡共本意也想不诉诸于政变来达到它的目的）。但是这种微妙的、墨守成规的区分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街区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在11月25至26日夜里在里斯本市内和周围的一切活动都表明，共产党和形形色色的极左派组织的代表，如无产阶级革命纵队革命党和人民社会主义阵线都深深地卷入了这次政变。葡共直到认清形势的发展趋向后可能退却了，而且当它看到这场骚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时，它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因此，好几个月来，共产党一直公开地向第六届临时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但是在较量实力的决定性时刻它又后退了。接下来葡共就设法有秩序地撤退，尽量减少它和极左派受到的沉重

---

<sup>①</sup> 库尼亚尔在托里斯·诺瓦斯的一次群众集会上采取了这一立场，他说，武装部队运动“联合进步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葡萄牙的政治活动的时刻到来了”。见《新闻日报》（里斯本），1975年10月20日。

<sup>②</sup> 关于这一事件的官方看法，见《调查委员会对11月25日事件的初步报告》，里斯本1976年。葡共证明有个别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未遂政变，但是它坚持说，没有证据表明共产党领导曾直接介入这一事件。《前进报》，1976年1月22日。

<sup>③</sup> 见1975年12月初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演说。

打击。

### 对失败的反应

虽然共产党人可以这么说，他们默许把瓦斯科·贡萨尔韦斯赶下台去是临时的、策略上的退却，因为他们深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便可以恢复进攻，但是11月25日共产党政策失败的含义却属于不同的范畴了。尽管这场灾难发生以后的一段时期中，也许葡共坚持认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它所抱的革命进程迅速发展的希望却破灭了。

葡共可以坚持认为军人继续干预政治生活是必要的，也可以坚持军队和“人民运动”联盟的绝对必要性，然而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这些都等于在逆水行舟。11月未遂政变后，150名军官遭到逮捕，大陆作战部队被解散，卡瓦洛，罗萨·科蒂诺和陆军参谋长卡洛斯·索亚雷斯·法比亚奥被开除出革命委员会。于是，在革命委员会里处于左派地位的只剩下梅洛·安图内斯的“九人团”了。他们坚决主张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武装部队运动继续充当葡萄牙的领导力量，他们还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参加这一进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属于那些常备军里职业军官们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些军官中包括了新任陆军参谋长拉马洛·埃阿内斯和前内政部长马里奥·菲米尼奥·米格尔，平息叛乱就借助于他们之手，如今他们以政权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了。军官们反对军方继续卷入政治活动，他们推行改组和精简军队的政策，以便将全部政权移交给文职人员，同时尽快地让军队回到营房里去。最后，他们提出修改1975年4月武装部队和各政党共同签署的约法。1976年由葡共和其它一些主要政党共同签署的修正案反映了局势的变化。修正案中不再提武装部队运动及其总部或军方在葡萄牙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问题，而且它试图把革命委员会

降到基本上只起顾问作用的地位。<sup>①</sup>

共产党人善于词令，纵然他们始终认为在葡萄牙的政治前途中，资产阶级民主是无法实现的，虽然他们也声言要保卫和巩固土改和国有化等革命成果，可是他们也认识到，新的局势要求在各方面，尤其在政治和社会的联盟方面，采取实际上节制的政策。<sup>②</sup>如今葡共放弃了前一时期的野心勃勃一味独左的立场。反过来它却痛斥极左派，斥责他们“在自己无力抵挡或挫败敌人的时候，却去挑动敌人对自己的进攻”。<sup>③</sup>

当时的局势要求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社会党领导方面来看，他们不想接受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建议，他们力图摆脱共产党的纠缠（而人民民主党则要求把共产党人从临时政府里驱逐出去），但是这样做或许会丧失来自全国某些阶级或阶层中的一部分人的支持。面对社会党明摆着的不愿和共产党结成联盟的形势，共产党人试图通过工会委员会、街区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等社会组织，使两党在基层一级进行接触，与此同时，它打算参加1976年4月举行的选举，它希望先发制人地至少以等差级数的形式组成葡共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以防止中右的社会民主中心党和人民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策略也许有利于葡共在中产阶级中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有助于争取那些社会阶层以结成广泛的联盟，这些社会阶层客观上对这一阶段的革命感兴趣，但是他们对加入左派队伍，尤其对与葡共搞联合却抱着犹豫的态度。

在这一阶段中，葡共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示威运动，抗议政府制订的提高食品、能源和交通费价格的法令，也反对中止集体契约

---

① 《快报》，1976年2月26日。

② 见葡共总书记库尼亚尔的声明，载《前进报》，1975年12月12日。

③ 《新闻日报》，1976年1月16日。

的法令，因为这使得 75 万以上工人的工资遭到冻结，这些示威运动明确地奏出了葡共的新方针的基调，它没有去年秋季所组织的进军和集会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基本上只表达了共产党人称之为“面包加黄油”等经济问题上“联合一致行动”的要求。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葡共对工会领导人想把工会搞成过分政治化的组织和对他们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批评，<sup>①</sup> 葡共指出，这些做法对于缓和群众组织内部的紧张状态和解决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人之间的分歧都是不利的，这些也是葡共方针改变的征兆。

如果从葡共为 1976 年议会选举所作的准备工作来看，上述种种努力就更显出它的重要性了。葡共极为推崇这次选举的重要性，它把它看作为葡共和社会党之间最后达成谅解的手段，这简直带有嘲弄意味。一月初，选举的组织工作开始了，他们组成了全国、地方和地区性的选举委员会，这些选举委员会和一个总部设在里斯本的负有特殊任务的小组相配合，对选举的模式作实验性的分析，它们向各级党组织建议在特定的地区内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某一区域内的居民中的哪一部人值得去联络等等。<sup>②</sup> 在竞选运动中，葡共煞费苦心淡化自己作为“工运中心主义者”的形象，为了尽量扩大它的社会基础，葡共不再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和一切工人的党”，而把自己称为“工人的党”，它还分辩说，投共产党的票就是意味着“投反法西斯的票和投民主团结的票”。<sup>③</sup>

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共产党人的战略至少部分地取得了成功。<sup>④</sup> 一年前，社会党得票占 37.9%，这一次几乎下降了 3%，社会党在国民大会里的议席也由 116 席下降至 107 席。人民民主党的

---

① 例如，见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载于《前进报》，1975 年 12 月 16 日。

② 《前进报》，1975 年 3 月 16 日。

③ 《前进报》，1975 年 3 月 16 日。这一期《前进报》全部刊登有关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导，据该报说，某些干部公然反对采用“工人的党”这一词语。

④ 见《快报》，1976 年 4 月 30 日。



得票数由 26.4% 下降为 24%，丧失了 9 个议席，总数为 71 席。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中心党的得票数相对地增加了，从 7.5% 左右上升到将近 16%，议席增加了一倍多，由 16 席增至 41 席。葡共的得票比例也有上升（增加了 2% 强），得票占 14.6%，这个数字使它在国民大会里增加了 10 个议席，总数达到 40 席。在 263 个议席中，人民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中心党只拥有 112 席，因此它们不能组成政府，因而，至少从数字上来看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除了这些全面的情况外，对于某些共产党的作为也要做一些附加的评论。葡共在它的传统基地，南部工业城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贝雅、埃武拉和锡图巴三地葡共获得的选票占领先地位；而在北方只遭到了微小的损失（在某些地方，得票数甚至还稍有增加）。为了取得这些成就，葡共把投葡萄牙民主运动的某些选票拉了过来，一般人几乎都认为葡萄牙民主运动只不过是葡共的一个方面而已，在这次选举中它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葡共在南方的胜利特别明显，因为在北方，葡萄牙民主运动的支持者们大部分都投了社会党的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选举结果表明葡共的选民有其地区性的特征，而且也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人本来试图从那个基础上来扩大它的力量，并争取赢得第三经济的雇员、中小农场主和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现在看来这种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议席合起来有可能在国家一级组成联盟，共产党领导却喋喋不休地预言社会党不具备单独执政的能力；但是葡共本身也仍旧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力量。如果在表决共产党认为至关重要的立法议案时，葡共弃权的话，那么人民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中心党联合起来投票，很可能挫败葡共的措施。此外，国民大会的程序规则规定，在议会票数方面，政府即使不能

得到足以成事的大多数票，政府照样可以行使其职权。在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必须取得绝大多数议员的赞同，政府才下台。然而，共产党人是不愿意和人民民主党、社会民主中心党投同样的票的，反之亦然，如果弃权呢，同样可以使提案通不过。因此，社会党很可能在稍少于多数议席的情况下，不和共产党人联合而单独组成政府。

面对令人沮丧的前景，共产党人怀着在未来的政府里发挥更大影响的希望，决定在 1976 年 6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尽管长期以来，葡共一直坚持认为应该由一名军人来担任共和国总统，但是它还是作出了上述决定。1976 年 2 月签订的宪法协议赋予了总统广泛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葡共曾经希望革命委员会会推举出一位大家一致同意的候选人，可是事实证明，革命委员会提不出这样的人选，结果，革命委员会里的两名成员总理平埃罗·德·阿泽韦多和陆军参谋长拉马洛·埃阿内斯被宣布为候选人。平埃罗·德·阿泽韦多以无党派人士的身分参加竞选，而拉马洛·埃阿内斯却很快接受了其它三个大党——社会民主中心党、人民民主党和社会党的支持，这三个党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加起来约占总票数的 75%。葡共推举中央委员奥克塔维奥·帕托为它的候选人，起初葡共希望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得到绝对多数票，从而不得不进行第二轮竞选，在第二轮选举之前，葡共或许可以迫使别人作出重大的让步。万一情况不妙，甚至在第一轮选举前，葡共便退出选举。然而，当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洛以松散的极左派联盟的候选人资格参加竞选的时候，葡共的选择权被剥夺了。卡瓦洛的出现使帕托非留在竞选行列里不可了，目的是为了不让卡瓦洛抢先成为左派的发言人。

用共产党人的话来说，结局是灾难性的。<sup>①</sup> 竞选结束时，卡瓦

---

<sup>①</sup> 例如见葡共在《前进报》上的评论，1976 年 7 月 1 日。

洛得票超过 17%，占第二位，仅次于埃阿内斯（比帕托的得票数高一倍多），在南方葡共的根据地，他轻巧地把共产党的候选人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把 1976 年 4 月葡共掌握的 40 多万张选票一下子全吸引到他那一边去了。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以后，共产党人想阻止社会党人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的任何可能性，都成了泡影。就如预料中的那样，埃阿内斯委任索亚雷斯担任新政府的首脑，同年仲夏，社会党领导向国民大会提出了改组内阁和政府的计划。

葡共坦率地承认它在总统选举中已经丧失了它的阵地，但是卡瓦洛和帕托总共为革命左派赢得了 24% 的选票，比 4 月间投这两位候选人所属党派的票数增加了 20 余万票，对葡共来说，这多少也是一种自我慰藉。虽然共产党领导告诫说，在近期内，对于左派可能重新采取的“高级斗争方式”的任何幻想都应该反对，但是这次选举仍旧可以被看为对选择更加激进道路的潜在支持。尤其，当极左派号召建立一个革命阵线并恢复奉行群众性示威政策的时候，葡共表示反对。应该看到，这种节制仍不失为一种战术策略：葡共断言新政府的纲领掩盖了“给葡萄牙的民主政治带来极大危险的右倾社会民主政策的意图”。而且，葡共继续坚持说，在葡萄牙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它宣称，它反对任何企图把稳定经济的重担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措施。<sup>①</sup>

尽管葡共对社会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可是在 1976 年后期，在国民大会上，葡共没有正式提出任何非难的动议。相反，他们却以加倍的努力想让社会党邀请他们去参加政府，如同 1976 年 12 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共产党人呼吁社会党人参加社会党和共产党候选人行列那样，统统被社会党拒绝了。虽然市政联合选举的企图没有成功，可是葡共却决心要改变 6 月总统选举时的悲惨结

<sup>①</sup> 例如，见《前进报》，1976 年 7 月 29 日。

局，它与葡萄牙民主运动和其它左倾无党派人士组成了选举阵线——人民联合选举阵线。

选举中，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在 1976 年 10 月下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各获得 100 万张以上的选票，人民联合选举阵线获得将近 74 万张选票，由于部分选民转向支持人民联合阵线，所以它把 250 个以上的市政国民大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市政选举中，社会党也总算支撑住了，它尽量避免与右派或左派结成联盟。至于共产党人，他们表明仍旧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1977 年初以后的情况更说明了这一点，在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葡共又一次巩固了它对劳工运动的控制。社会党一心一意想打破这种局面，结果不仅碰得头破血流，有时还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社会党反而失去了它历来控制的某些工会(如南方的银行雇员工会)。更有甚者，1977 年 3 月中旬，政府宣布将埃斯库多(葡萄牙货币单位——译者)贬值 15%，与此同时，又批准某些食品价格上涨以及把某些国有化企业归还给原主，这样，社会党简直休想改善他们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了。

社会党内部也是困难重重。在 1976 年 11 月初举行的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左翼提出了一份竞选领导的名单，居然得到 25% 的代表的支持，几天以后，这一派处在前台的头头为了反对该党的温和的农业政策而辞去了农业部长的职务。社会党内的派系斗争贯穿于 1977 年，那年晚些时候，洛佩斯·卡多索(前农业部长)和另外两名社会党议员宣布脱离社会党议会党团，从今以后他们将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投票。

这时，共产党人还是一个劲地谴责索亚雷斯政府的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社会党人为了在议会里取得共产党人的合作，最终将不得不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并作出重大的让步。当然，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掉，不过从当时来看，索亚雷斯仍旧还有玩弄权术的

力量。1977年12月，对他的政府的信任投票没有通过以后，他设法通过谈判使社会民主中心党成为他的正式伙伴。当然，这个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本身还是一个问题。不过它至少顶住了1978年2月社会民主党和葡共分别在国民大会上提出的挑战。

### 葡共未来的道路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1974年4月马尔塞洛·卡埃塔诺被推翻以后，葡萄牙的政治局势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葡萄牙共产党采取了激进和革命的政策，这也可以视为它对高度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所作出的反应。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葡共开展工作的环境在本质上不同于二次大战以后法共和意共所处的环境：(1)1974年在葡萄牙不存在同盟国的占领军(事实上，葡萄牙的军队属于社会上最激进的阶层)，(2)根据国际形势，看来美国和西欧不可能直接干预葡萄牙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有长期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一条激进化的道路，这也是毫不足怪的。

后来发生的事件，尤其是拉马洛·埃阿内斯当选为总统，马里奥·索亚雷斯辞去总理职务，都暗示了在这场赌博中葡共很可能成为输家；不过，结果尚不够明朗。假如在葡萄牙不能成功地建立起西欧式议会民主政治，那就可以使共产党确信，他们蔑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反对议会政治是完全有根据的。

但是，即使出现向议会制政府逐渐演变的局面，也不能保证共产党人的观点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在什么情况下，还要多久葡共才能放弃列宁主义的观点而采纳多元化和协商的立场？其实这些早已成为其它主要的西欧共产党意识形态武库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东西了。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结束语中来讨论。

我们在对议会民主制度下共产党可能采取的政策进行探讨之前，不妨先对政治和经济问题作一概述，这些问题是葡萄牙实现民

主的稳定的先决条件。从广义的政治来说，索亚雷斯和葡萄牙的温和派分子必须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使全国具有一致的看法：关于完成 1974 年四月革命的任务问题和确立议会制度以作为维护胜利果实的最好保证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极右派和极左派一贯都持反对立场，首先，他们不承认四月革命的合法性，其次他们也反对把议会民主作为保卫和扩大胜利果实的手段。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北方的中、小农场主，从前殖民地回国定居在大城市里的回归者，南方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农业无产者，在今后的岁月里，政府对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地位问题必须予以关心。

这只不过是整个方程的政治方面的问题，葡萄牙的经济必须从政治和社会革命所造成的极度危险的状态中恢复元气，经济复苏才能使冒险取得成功。武装部队运动执政后提出的非殖民化计划，使贸易形式在结构上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也丧失了因开采前殖民地的贵金属和其它资源而获得的高额利润，而且造成了大量白人居民回到葡萄牙，使大城市里的失业人数达到膨胀的地步。此外，由于实行了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国内外投资资金的来源枯竭了。另外，移民的汇款减少了（这是葡萄牙大宗收入的来源），旅游收入没有了；这两笔损失不仅使葡萄牙政府难以弥补进口粮食所造成的传统的农业亏损，而且也造成外贸支付逆差上升。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使收入分配更趋公平的保证得到兑现的同时，在政治上就要求采取相当灵活的政策。

显然，事实证明，索亚雷斯和他的后任都没有妥然地解决这些问题。为了便于讨论，也因为迄今他们的成绩还不算坏，我们不妨假设，他们至少部分地取得了成功。那么反过来我们对葡共有些什么指望呢？

随着葡萄牙议会民主的不断加强，共产党人要么继续信奉“实力力学”的原则，冒险地成为一支对范围相当狭小的社会阶层有影

响的边缘力量,不然,就象他们的西欧同行一样,改变党的立场,把他们的精力集中用在争取国内中产阶级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方面。然而,正如其它共产党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种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很可能是缓慢的,战略上的重大改变,至少在初期看上去象是单纯在作战术上的调整。西欧共产党认为,他们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必须在议会民主政治的参数中培育和发展起来,因此,要葡共也同意这种观点还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格外注意葡共对其社会和政治联盟的伙伴的态度上的变化,也要注意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以及它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变化;因为,一些研究其它共产党的报告指出,<sup>①</sup>这几个方面可以反映葡共非激进化的征兆。

近期和中期的变化前景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共产党领导态度的变化,或者更进一步说,取决于共产党领导组成的变化。由于目前葡共领导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前进报),因此“国内和国际社会民主政治”巴望葡共“归化”的“梦想”也是无法实现的。<sup>②</sup>库尼亚尔总书记是葡共激进政策的设计者和指导者,他的高度道德和执偏的政治观点使这种变化更难实现。此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葡共中央委员会的主宰人物。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葡共领导集团中曾经有人向库尼亚尔的领导地位提出过挑战(例如在197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然而,即使有过的话,任何这样的动向很可能不是批评库尼亚尔的政策激进倾向方面的问题,而是批评他在革命领导上的明显的摇摆态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牢牢地记在心上。

情况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妨简单地来研究一下。首先,共

---

<sup>①</sup> 例如,见唐纳德·布莱克默和西德尼·塔罗合编的论文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普林斯顿1976年。

<sup>②</sup> 《前进报》,1975年12月4日。

产党人显然期待葡萄牙工人阶级会向他们提供强大的组织力量和选举上的支持。可是,与许多欧洲国家的情况相比,葡萄牙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容易受激进的花言巧语的感染,这种现象也许反映了潜在的工团主义的传统和影响。所以,卡瓦洛在总统选举中的强硬立场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葡共不能把葡萄牙的产业和农业无产者视为它独家的领地;在起草党的政策的时候,葡共领导人必须经常与极左派的乌托邦和蛊惑人心的路线作斗争。因此,近期内,在葡共内部削弱它的激进主张的行动简直不可能得到葡共的社会基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因为政府强行采取加强控制工资和严肃工业纪律的措施,只会增加工人中的不安定因素。这些措施(至少在短期内)会使国内的阶级阵线严重分裂,也可能导致葡共的组织形式或意识形态的变化。

军方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这对于葡萄牙共产主义演变的短期和中期的前景也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看来,军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角色,尤其葡萄牙的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严峻时期,政府不可避免地想从他们那里找到靠山,而军方也正想借此来施展他们的权力。共产党人也将费尽心机去支持军队里残留的左派分子,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梅洛·安图内斯、瓦斯科·洛伦索和其它人直接支持共产党人,也不是由于他们和共产党人持同样的观点(前面谈过,“九人文件派”在防止共产党人抓权上起过重要作用。),葡共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继续坚持捍卫和扩大葡萄牙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就,坚持让葡共在这一事业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也让军队里的左派继续发挥他们的促进作用,至少共产党人在挽回他们丧失的某些影响(不一定指领导权)的斗争中,军队里的左派是他们的同盟军(虽然仅仅是“客观上”的)。

1976年8月,革命委员会里的左派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到底保留他们掌握的军事指挥权呢还是继续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他



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军队里的左派是怎样看待他们的未来的作用的。这个最高军事机关本来可以很好地改组一下，以削弱左派对军队的控制，可是这一抉择事实上却使革命委员会成为左派施加影响的最后据点。此外，1977年春，在总统选举前早已销声匿迹的安图内斯又重新开始发表声明，他要求革命委员会和宪法委员会（一种宪法法庭，拥有撤销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的权力）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把革命委员会和宪法委员会看作与国民大会和内阁平行的行使权力的中心。<sup>①</sup>最近，安图内斯在答西班牙杂志《对话手册》问时，他表示大力反对葡萄牙政治上向右转的倾向。<sup>②</sup>现在我们很难预料军队里的右派和左派的均势能维持多久（虽然1978年初的事件表明左派正在迅速丧失它的影响力，例如瓦斯科·洛伦索被撤去了里斯本军区司令的职务），也很难预料，在解决可能出现的冲突中，埃阿内斯将起什么作用。人们可以断言，共产党人在观察局势时，一方面深怕他成为葡萄牙的戴高乐，另一方面又把他看作在反对更保守的分子的斗争中可能团结的同盟者，其实这两个方面也并不是互相抵触的。

就目前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葡共会发生什么变化：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局势也不会要求它发生变化。葡共领导仍旧坚信尽管“战术上”失败了，但是它在过去三、四年中形成的政治路线相对地说是正确的，而且应该继续贯彻下去（因为它毕竟没有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就如库尼亚尔在答《快报》问时所说的那样：“葡共的战略路线就其主要方面来讲，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sup>③</sup>

1976年11月葡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由36名增加到90名，其中一些新干部都是在

---

① 《快报》，1976年11月5日。

② 《对话手册》杂志（马德里），1977年2月26日。

③ 《快报》，1976年11月19日。

1976年4月以后入党的新党员，他们的政治观点不是通过地下活动的经验而形成的，因此，据猜测，库尼亚尔的上述观点很可能会被削弱。<sup>①</sup>然而，应该强调的是，事态向这方面发展也许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就目前来说，其影响也是有限的。葡共的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委员会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大部分进入扩大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是1974年以前葡共组织内的积极分子。所以，只有当葡萄牙共产党内的另一代人掌握该党大权的时候，葡共的观点才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这一代新人既没有经历过地下活动时期，而且在1974年4月政变以后的狂风暴雨的日子里，他们也不是葡共开展工作的领导干部。

---

<sup>①</sup> 见《前进报》，1976年11月18日。

## 五、希腊：非西方式背景的 共产主义

季米特里·基齐基斯

希腊共产党以非法身分度过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1974年夏当它以合法身分出现时，它所面临的希腊政治局势和二十七年前它最后公开活动时代的局势已经大不一样了。1947年11月希腊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当时，正值内战时期，共产党人依仗游击战术和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偷运入境的物资供应，似乎以武力夺取政权已指日可待。那时，国内的一切反共分子组成了共同阵线，他们听从八十七岁的自由党人塞米斯托克莱斯·索福利斯为首及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指挥，并支持政府对暴乱者发出的禁令。

虽然共产党人要对1946至1949年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负责，但是相比之下，到了1974年，希腊共产党人已经不再是希腊政界权贵们的传统劲敌了。如今，劲敌的帽子却落到了那些激烈的反共分子头上，他们是1967至1974年乔治奥斯·帕帕佐普洛斯—季米特里奥斯·伊奥安尼季斯军人独裁政权的主要责任的承担者。1967年4月21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陆军军官们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过去他们事奉过的权贵们，这些军官在四十年代后期，为了雅典政治家们的利益，曾在希腊的深山之中和共产主义作过战。政变的军官们的唯一主张是高举反共的旗帜，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种难以下确切定义的思想体系，虽然

他们面临着由这个国家富有的城市寡头政治集团制造的社会不平等局面,但他们的目标却是让全体希腊人享有社会的公正待遇,陆军军官们(当时帕帕佐普洛斯和伊奥安尼季斯都是上校衔)推翻了他们的主子,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囚禁了起来。政治活动被终止了;不同政见受到严厉的镇压;长达七年之久的军人独裁统治开始了。

但是,由于国内局势愈加动乱,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日益严重,再加上1974年对塞浦路斯危机的处理完全失当,结果,军人政权终于又被推翻了,由更为强硬的伊奥安尼季斯取代了帕帕佐普洛斯。军人统治给希腊权贵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创伤,所以当1967年前的寡头统治的权贵们重新掌权的时候,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一个以秘密小集团自居的怪物)采取了大为宽容的态度。1963年辞去首相职务并自动迁居法国的康斯坦丁诺斯·卡拉曼利斯,于1974年7月23日奉召从法国回到希腊,他开始着手组织联合政府,并筹备举行新的大选和全面恢复议会统治的工作。卡拉曼利斯在1955至1963年担任首相期间,一直是反对党谴责的对象,他们指责他负责的1961年的议会选举草率从事,并要他对左联党议员格里戈里奥斯·拉姆布拉基斯在1963年的死亡一事负道义上的责任。<sup>①</sup>由于对七年独裁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伤疤极为敏感,所以卡拉曼利斯一回到国内,他首先关心的事便是向他的同胞们证明,当年为了反对他而指责他的独裁倾向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

<sup>①</sup> 在1961年的大选中,卡拉曼利斯的全国激进联盟得票占49.6%。乔治奥斯·帕潘德雷乌和索福克利斯·韦尼泽洛斯的中间派联盟以前也参加过竞选,而且也获胜过,但是这一回他们和斯皮罗斯·马凯齐尼斯的小党进步党组成联盟,结果只获得34.3%的选票。共产党控制的全国农民民主阵线得票占15.1%,大大低于1958年的得票记录——24.3%。由于对选举结果表示失望,这两个反对党对投票中的欺诈和恫吓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此外,他们把拉姆布拉基斯在萨洛尼卡遇难一事也归咎为政府的预谋行动。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就走得更远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名叫拉姆布拉基斯的青年运动组织,企图在年青一代中传播共产主义,这个组织的领袖是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电影“Z”就是以拉姆布拉基斯的遇难故事为蓝本的,塞奥佐拉基斯还为这部电影谱了曲。

上，他是希腊最完美的民主主义者。1974年以来他的所作所为显然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确保他本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他不化大力气去对付共产主义，而是竭尽全力地让他的同胞们知道他是这个国家的伟大希望，唯有他才能防止1946至1949年或1967至1974年的事变任何变种的再现。

卡拉曼利斯重新掌权了，他代表了1967年前的社会政治权贵们的利益，这样，也就为希腊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恢复它的势力的意想不到的机会。至于共产党人是否有能力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来提高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1978年年初，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充其量来说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当然，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命运将由下面两点来决定：首先，他们是否能避免过去所犯的那种错误（即无条件地俯首听命于莫斯科和采取敌视农民的政策），其次，他们是否能够制定一项政策，它既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派集团所接受，又能适应“上校时代以后”的希腊社会现实情况。

本文打算对希腊共产主义的发展——包括它的力量、弱点和大选记录作一小结。文章将从1919至1920年俄国革命后希共的兴起一直讨论到1974年它的再次露面，也将谈到它为争夺议会选举的席位的合法积极活动的种种情况。然后，经过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希腊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本文将对希腊共产党试图利用这一自愿奉献的机会所开展的工作，及其成功的前景作出评述。

### 至 1974 年的希腊共产主义

希腊工人运动的发展开始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但是一直到1918年11月，在皮雷埃夫斯举行全希腊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时候，才正式成立了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是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或战争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小组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1920年4月18日至26日在雅典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1919年3月在莫斯科创立的第三国际的支持者们取得了领导权,他们在党的名称上加了用括号括起来的“共产主义者”一词。这个党采用了锤子和镰刀作为他们的党徽,而且还正式参加了共产国际;然而,该党出版的日报仍旧沿用“激进报”的名称,这份报纸早在皮雷埃夫斯大会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版了。<sup>①</sup>

在二十世纪的前半世纪中,希腊的重工业规模极小,这是新成立的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由于缺乏产业工人阶级的基础,因此在选举中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受到了限止。在这一时期中,为什么希腊不能象西欧大多数国家那样,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或改良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政党,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希腊事实上存在的某些左的或中间的党的名称给了人们一些错误的印象。例如,一度活跃于两次大战之间的阿列克桑德罗斯·帕帕纳斯塔西乌的农民和工人党,以及乔治奥斯·帕潘德雷乌用于争夺1946年选举的社会民主党<sup>②</sup>,虽然都是以西方思想为基础的,可是实质上都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其实,唯有埃利阿斯·齐里莫科斯和阿列克桑德罗斯·斯沃洛斯教授才真的想建立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工人党,他们在德国占领希腊期间,创立了人民民主联盟,而且作为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员与德国人作战。然而,在1951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民主联盟只获得3912张选票,这是它单独唯一参加的一次选举,从此以后它就销声匿迹了。为填补1947年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的空缺,左联党成立了,从精

---

<sup>①</sup> 斯塔夫罗斯·佐瓦拉斯:《人民的旗帜:〈激进报〉(1917至1936年)的历史记录》(布加勒斯特,1960年)。另见季·基齐基斯:《国际政治中的宣传运动与压力:在和会上的希腊及其要求,1919至1920年》,巴黎1963年,第460—480页。

<sup>②</sup> 乔治奥斯·帕潘德雷乌于1933年组成了社会民主党,直到二次大战以后,该党在希腊境内才开始积极活动起来。

神方面来说,左联党是民族解放阵线的继承者,而不是人民民主联盟的继承者。

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参加了第一次大选,它获得的选票不到两万张,该党在各地区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都被击败了。在1926年11月7日的选举之前,共产党人已经把他们党的名称正式改为希腊共产党,但是为了争取根据希一土洛桑协定被从小亚细亚遣返的失去家园的希腊人的选票,希共便以工人、农民和难民联合选举阵线的名义参加竞选。希共获得了41982张选票,占总投票数的4.4%。由于在选举中首次采用了比例选举制度,因此这次选举使共产党人在279个议席中取得了10个议席。在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运气时好时坏,可是他们获得的票数从来没有超过10%。只有当采用比例选举的时候(1926、1932和1936年),他们才赢得议席,而当多数党的候选人在各自的选区里自然地赢得竞选的议席的时候,共产党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议席(1923、1928、1933和1935年)。

在1928年8月19日的选举中,共产党人的得票数下降至14325票,占那次总投票数的1.4%,他们的候选人全部落选。然而,在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他们的工作有了起色。1932年9月25日的选举中,他们获得58223张选票(占5%),和10个代表名额。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共产党人虽然没有得到议席,但是得票数却和以前大致相同,共获得52958张选票(占4.6%),然后在1935年6月9日的选举中,得票数又明显地增加了。纵然当时实行的多数选举制度仍旧把共产党人排除在议会之外,但是共产党人利用了所有中间派和非共产党左派政党弃权的好机会(其中他们的某些支持者宁可投共产党的票也不愿弃权),积聚了98699张选票,达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高峰,占总投票数的9.6%。后来由于重新采用比例选举制度,于是在1936年1月6日的选举中,共

产党人获得了 300 个议席中的 16 个席位,但是该党得票数却下降至 73411 票,占总投票数的 5.8%。<sup>①</sup>

不言而喻,希腊共产党人仍然代表了国内的一个很小的少数派。由于希腊缺乏重工业,所以它也无法取得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支持,1936 年共产党议会党团成员的社会出身也反映了这一缺陷:议员中有几名烟草工业的工人,一名理发师,一名有轨电车的雇员,一名律师和一名中学校长。<sup>②</sup> 希共在 1936 年的党员总数为 14000 人。

从 1936 至 1941 年,在伊奥安尼斯·梅特克萨斯将军的独裁统治期间(如同 1967 至 1974 年军人独裁统治时期一样),希共因内部冲突而变得特别脆弱。从 1936 至 1941 年,它分裂为三派。在其中的两派,即所谓的前中央委员会和临时领导机关中,梅特克萨斯安插了他的特务。第三派是在希腊的监狱,尤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克洛那夫利阿要塞的监狱里形成的。这一派的成员之一帕弗洛斯·内费卢季斯于 1974 年在雅典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他至今仍是希共党员。他写道,在梅特克萨斯独裁统治形成的时候,“希共和人民群众毫无联系”。<sup>③</sup> 希共对于最终出现的政变丝毫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尽管它怀疑有人正在策划这次政变。结果,就出现了类似 1967 年的那种情况,政变的当天晚上,大批共产党干部在他们的床上被逮捕了。

1941 年 1 月 29 日梅特克萨斯去世,这样,乔治二世和希腊广大群众的联系被割断了,而在此之前,这位将军在 1936 年政变时

---

<sup>①</sup> 季·基齐基斯:《希腊》,载于让·梅勒阿和斯坦·罗康合编:《选举统计资料国际指南》,海牙 1969 年,第 1 卷,第 163—182 页。

<sup>②</sup> 季·基齐基斯:《1967 年军人政变前希腊的议会和社会变迁》,载于《社会史》,渥太华 1970 年 11 月,第 63 页。

<sup>③</sup> 帕弗洛斯·内费卢季斯:《厄运的根源。希腊共产党分裂的基本原因,1918 至 1968 年:官方文件和个人经历》,雅典 1974 年第 2 版,第 116 页。



则割断了乔治二世和资产阶级的联系。乔治二世被人们称为希腊的“英国”国王(因为他赞成亲英政策,同时也由于他在1935年复位之前在英国度过了十二年流亡生涯的缘故)。同年5月,这位国王再次离开了他的祖国,他听任任何政治运动来摆布希腊,只要它能够支持取悦于中产阶级的议会民主,组织反对轴心国侵略者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发扬社会正义并能讨好广大群众就行了。那么这时如果希共能够披上民主的外衣,这无疑又给了共产党人一个史无前例的良好机会。共产党人相应地作出了反应,在因饥饿而使社会差别消除的气氛中,共产党人于1941年9月27日在雅典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sup>①</sup>

毫无疑问,民族解放阵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等于共产党,它也是希腊抵抗轴心国占领的最重要的组织。关于这一点,民族解放阵线的共产党领导成员佩特罗斯·鲁索斯在他的回忆录中是公开承认的,该回忆录于1966年由该党的流亡出版社(政治和文学出版社)在布加勒斯特出版。<sup>②</sup>鲁索斯以自豪的口气描述了希腊共产党的不平凡变化,希共通过民族解放阵线从1941年5月到轴心国占领的末期,把自己从一个绝端脆弱分裂的实体转化成为希腊境内居主宰地位的政治势力。据鲁索斯说,社会差别现象因占领而消除了,因而民族解放阵线就成为一个拥有150万以上成员的庞大的兄弟会组织;那时,全国的人口为735万人;当时,坚强的团结和崇高的牺牲精神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了。这个组织的队伍里包括了六名主教,数以百计的神父和大批爱国人士,他们作为阵线的成员同德国人作战,但是他们对于希共无条件地从属于苏联这一点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

<sup>①</sup> 季·基齐基斯:《希腊的饥饿,1914至1942年:政治上的后果》,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评论》杂志(巴黎)1969年4月,第17—41页。

<sup>②</sup> 佩特罗斯·鲁索斯:《重要的四年》,布加勒斯特1966年。

共产党人常常把外国占领和对他们不利的独裁政权相提并论。实际上，共产党人经常把1967年4月21日上台的军人政权比作战时德国的占领。<sup>①</sup>不过这样的比喻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它无法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1936至1941年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占领期间，共产党人的势力大大加强了，而在1967至1974年间，他们所受到的压迫比以前要小得多，可是他们却毫无成就。

1936年希共党员为14000人，1944年梅特克萨斯宣布它为非法组织的时候，由于德国占领结束，希共利用了当时希腊的民族情绪，党员一度增加至35万人。但是在1946至1949年的三年中，共产党人无视希腊尊贵的民族感情，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争，这种作为使它跌进了失败的深渊，名誉扫地，1947年被宣布为非法，最后于1949年军事上又彻底失败了。

早在1951年受共产党控制的左联党成立的时候，希共又以改头换面的手法出现在希腊的政治舞台上。战前，共产党人历来拥有不足10%的选民，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派组织，而内战又给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它实在很难指望能有所作为。1958年左联党获得24.3%的选票，而其中大部分选票是由中左的非共产党的选民投的，因为他们抗议历时三年的卡拉曼利斯政府的过于保守的社会政策。在1964年2月16日的选举中（1967年4月21日政变前的最后一次选举），共产党采取了战后最典型的一次行动，当时左联党获得的选票也仅占总票数的11.8%。

如同1936年那样，1967年共产党人措手不及地掉进了军事改变的圈套。他们没有作任何反抗，希腊共产主义似乎已经濒临

---

<sup>①</sup> 见季·基齐基斯：《希腊的共产主义运动》，魁北克1975年9月，第334—354页。

彻底崩溃的边缘。随即又产生了无可规避的结局：寄居在“国外”（即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成员和代表“国内”共产主义的左联党的领导成员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左联党自 1949 年以来被迫接受定居在国外的共产党领导者的指示，远在 1967 年以前他们对这种作法不断发出抱怨，国内的活动家们认为，这些人早就和希腊的现实脱节了。<sup>①</sup>左联党坚持认为，流亡在国外的希腊共产党有着一段极为纷乱和不光彩的历史，他们玩命地相互倾轧，以致许多人对它丧失了信心。季米特里斯·弗兰塔斯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从 1947 至 1956 年他是希共政治局成员，又是 1948 至 1949 年的共产党游击队政府的国防部长。他的经历造成了他对党的信仰的毁灭，关于这一点倒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从 1924 年起，弗兰塔斯就是希腊共产党党员。1943 年轴心国占领期间，他组织并领导了受共产党影响的泛希腊统一青年组织。在内战时期，他曾任共产党的农业部长，后又任国防部长。但是在 1956 年 3 月，他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是被推翻的尼科斯·扎哈里阿季斯为首的希共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的成员。根据希共和苏联的决定，他被流放到喀尔巴阡山，度过了十一年极为艰苦的流放生活。1967 年 10 月，他终于设法在巴黎获得了避难权，至今他一直住在巴黎。尽管他还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再是列宁主义者），可是法国的左派新闻记者，如《世界报》的厄里·鲁洛拒绝帮助他出版他的回忆录。他出于无奈，于是把他的一部分回忆录交给了雅典的极右派报纸《城堡报》，该报以与记者谈话的访问形式分成四篇文章予以发表，刊登在 1973 年 4 月 1 日到 5 日的

---

<sup>①</sup> 《论希腊共产党的分裂》，见安东尼奥·索拉洛：《希腊共产党党史》，米兰 1973 年。1948 年前，索拉洛是希共党员。

该报上。<sup>①</sup>

对于内战时期希共总书记尼科斯·扎哈里阿季斯和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首脑马尔科斯·瓦菲阿季斯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决裂，许多人已经论述过了，如埃凡格洛斯·阿韦罗夫—托西扎和佐米尼克·埃夫泽斯等人。然而，弗兰塔斯的回忆录所透露的情况为以往的分析又增添了新的内容。<sup>②</sup> 弗兰塔斯指出，苏联人对扎哈里阿季斯说，1948年他们收到一封由瓦菲阿季斯（人们都叫他马尔科斯）写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控告扎哈里阿季斯是叛徒。弗兰塔斯好象相信确实有过这么一封信，但是他没有亲眼见过；当然很可能这个控告是斯大林伪造的，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深这两位领导人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

他的回忆录还涉及了另外一件严重事件，1955年在苏联的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的希腊共产党难民敌对派之间发生了冲突。

① 弗兰塔斯：《为什么我不同意共产党》，载于《城堡报》（雅典），1973年4月1日至5日。后来弗兰塔斯在雅典全文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其第4卷名为《1950至1967年希腊共产党的悲剧》，1976年出版。

② 埃凡格洛斯·阿韦罗夫—托西扎：《火焰和斧子：1946至49年的希腊》，巴黎1973年，第260—263页；佐米尼克·埃夫泽斯：《游击队员和内战，1943至1949年》，伦敦1972年。阿韦罗夫—托西扎曾担任过外交部长的职务，他现任卡拉曼利斯政府的国防部长。

阿韦罗夫说，由于马尔科斯·瓦菲阿季斯对铁托无限崇敬，因此他被排挤掉了。马尔科斯和铁托一样，是一位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因而莫斯科命令扎哈里阿季斯解除了马尔科斯的一切职务。阿韦罗夫还进一步指出，马尔科斯不同意扎哈里阿季斯的军事战术，后者想以阵地战来取代游击战，也就是打一场正规战。

根据从马尔科斯那里获得的基本材料，埃夫泽斯进一步证实阿韦罗夫所指出的引起分裂的最根本原因是正确的。据说，1948年1月15日马尔科斯不同意扎哈里阿季斯的观点的时候，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不是正规军，目前我们无力开展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行动。”载于《战略家》第309页。同年8月，在另一次激烈的争论中，“马尔科斯指责扎哈里阿季斯企图瓦解革命。”载于同书，第330页。埃夫泽斯声称，扎哈里阿季斯对马尔科斯搞了一次未遂的暗杀活动；而阿韦罗夫不信有那么一回事。

马尔科斯在他的题为《马尔科斯·瓦菲阿季斯日记》中，他以一系列的文章详细描述了他和扎哈里阿季斯的决裂情况。载于《新闻报》（晚刊）（雅典），1976年12月13—21日。

1955年弗兰塔斯正好在莫斯科，他是希共政治局成员。当时，党派他去塔什干处理一个宗派小集团，该集团是由居住在那里的12000名前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员形成的。这个破坏性的小集团的领导者是一群反对扎哈里阿季斯领导集团的以塔基斯·季米特里乌为首的共产党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马尔科斯·瓦菲阿季斯，季米特里斯·帕察利季斯，莱奥尼扎斯·斯特林戈斯，科斯塔斯·科利亚尼斯等人。然而据弗兰塔斯说，其实这个小集团是由苏联当局组织起来的，因为他们早就决定要让这些人来取代扎哈里阿季斯。<sup>①</sup>

弗兰塔斯一抵达塔什干，一名苏共的代表要求他帮助这个宗派小集团而不是去粉碎它，并要求他在苏联的支持下担任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弗兰塔斯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苏联人采取了报复手段，1955年8月18日当扎哈里阿季斯本人抵达塔什干时，苏联秘密警察以刀子武装了将近五百名希腊共产党人，试图谋害弗兰塔斯。弗兰塔斯向扎哈里阿季斯建议，他们两人回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去，那里驻有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首脑机关，他们可以从那里来平息这个派别活动。然而他的呼吁无济于事，于是弗兰塔斯就继续留在塔什干。1955年9月10日，在苏联特务的策划下，500名武装的派别活动分子袭击了塔什干的希共机关。弗兰塔斯和他的35名同伴躲在屋子里，用家具封住了门户。战斗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袭击者们一边还高呼“杀死弗兰塔斯”的口号。最后，3000名前游击队员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援救弗兰塔斯，才把他们解救了出来。随即他就回到了布加勒斯特。

1956年10月，弗兰塔斯在罗马尼亚被捕，被处以在罗境内流

---

<sup>①</sup> 1931年经共产国际的认可，扎哈里阿季斯出任希共领袖。1934年，他被任命为总书记。

放的刑罚，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七十年代中期，希共国内派开始合法活动以后，希共国外派坚持要人家称它为希腊共产党。为了区别于以前统一的希共和现在的“国内”派，我们在下面的把它称为希共—国外派。）

1967年的雅典政变使希腊共产党的国内派和国外派之间的危机加深了，可是正式的分裂却是在1968年2月该党的十二中全会上发生的。这样就出现了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和希腊共产党—国外派。由于上校政权禁止一切政党，所以左联党作为共产党的合法形式已经不准活动了，尽管如此，左联党却深深地倾向于共产党—国内派，因为在许多问题上，它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尽管这是一次最严重的分裂，不过也不能把它看作为六十年代希腊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一次分裂活动。1964年，一个毛主义集团也从左联党内分裂了出去。它在伊安尼斯·奥齐阿斯和伊萨克·伊奥扎尼季斯的领导下出版了《新生》月刊，这个组织一直维持到1967年军事政变为止。

### 不合法时代的结束

所有这些共产党组织都从帕帕佐普洛斯—伊奥安尼季斯独裁统治时期的魔劫中死里逃生，1974年夏，议会制在希腊恢复以后，它们又重新登上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它们向卡拉曼利斯政府施加压力，要他准许自1949年以来居住在东欧和苏联的希腊难民全部回国，它们企图以此来加强它们在国内的支持力量。

1975年2月20日，希腊议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内政部长康斯坦丁诺斯·斯泰法诺普洛斯说，难民总数接近十万人，虽然政府不可能允许那么多的人一下子回来，但是政府将允许他们个别地回国，每位难民只要填一份申请回国的表格就行了。这位部长接着又说，事实上回国是极容易的，因为政府不再要求每个申请回

国的人宣布他的政治信仰。<sup>①</sup>

事实证明，回国的手续并不象斯泰法诺普洛斯所说的那么容易。例如，公安部长干脆拒绝马尔科斯、瓦菲阿季斯从苏联回国，虽然他在1976年7月25日正式提出过申请。<sup>②</sup>尽管如此，从1974年以来，许多难民都回到了希腊。如，1976年10月4日，71名希腊共产党难民从塔什干乘船抵达皮雷埃夫斯，他们在这个港口城市受到大批同志的欢迎。<sup>③</sup>这样的团聚又引起了希腊国内反共人士的极大关注，他们担心在回国的人中至少有一些人在国外受过游击战术的训练，并认为这些人正在把武器偷偷地带入这个国家。

尽管新的政治气候对共产党有利，但是在卡拉曼利斯统治下于1974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并没有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就。称为左翼联盟的共产党选举阵线获得464316票，占总票数的9.45%，在300个议席中获得8个议席(见表1)。这个选举联盟由三家共产党组成：以伊利阿斯·伊利乌为首的左联党；以总书记阿拉拉姆博斯(巴比斯)·德拉科波洛斯和莱奥尼扎斯·基尔科斯为首的希共一国内派；和以阿里拉奥斯·弗洛拉基斯(约蒂斯)为首的希共一国外派。在左翼联盟候选人名单上当选的8名议员是：左联党的伊利阿斯·伊利乌；希共一国内派的巴比斯·德拉科波洛斯和莱奥尼扎斯·基尔科斯；希共一国外派的阿里拉奥斯·弗洛拉基斯(约蒂斯)，格里戈里奥斯·法拉科斯，米娜·娅努太太，康斯坦丁诺斯·卡波斯和季米特里斯·贡蒂卡斯。

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8名议员中有5名属于正统的亲苏的希共一国外派。席位的分配反映了希共一国外派相应的力量对

---

① 《评斯泰法诺普洛斯政府的政策声明》，见《论坛报》(雅典)，1975年2月21日；《新闻晚报》(雅典)，1975年2月21日。

② 《城堡报》，1976年10月8日。

③ 《黎明日报》(雅典)，1976年10月5日。

表 1 1974 年 11 月 17 日希腊议会选举结果表

党派和 选举联盟	得票数	占总票数的 百分比	席位数	占总席位的 百分比
<b>保守派</b>				
新民主党	2,670,804	54.37	220	73.33
<b>中间派</b>				
中间联盟—新力量 (选举联盟)	1,002,908	20.42	60	20.00
<b>非共产党左派</b>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666,806	13.58	12	4.00
<b>共产党</b>				
左翼联盟(左联党、希 共—国内派和希共— 国外派的选举联盟)	464,331	9.45	8 <sup>a</sup>	2.67
其它 <sup>b</sup>	107,507	2.18	0	0
总计	4,912,456	100.00	300	100.00

a 其中左联党一席,希共—国内派二席,希共—国外派五席。

b 这一类中包含一些小党派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其中也包括希腊毛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它获得 1,013 张选票,占总投票数的 0.02%。

资料来源:理查德·斯塔 尔编:《国际共产党事务 1975 年年鉴》,加利福尼亚 1975 年,第 202 页。

比,关于这一点,在它出版的一份雅典的日报——《解放报》的销售量上也有所反映,这家报纸的销售量几乎比《黎明日报》高出一倍,后者是希共—国内派和左联党的日报。以 1976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的一周为例,《解放报》的平均日销售量为 13904 份,占雅典—皮雷埃夫斯地区 13 家日报的总销售量的 2.8% (见表 2)。这个数字使它在 13 家报纸中名列第 8 位。对比之下,《黎明日报》的日平均销售量为 7312 份,占总销售额的 1.5%。这个数字使它处于 13 家报纸的末位。



表 2 雅典—皮雷埃夫斯地区报纸平均日销量

(1976年7月26日至8月1日的一周)

报名(按销售名次排列)	销售量(份)	占总销售量的百分比
1. 新闻报(晚刊)	137,775	28.2
2. 下午报	80,668	16.5
3. 自由报	75,590	15.5
4. 新闻晚报	49,514	10.1
5. 城堡报	33,295	6.8
6. 论坛报	28,444	5.8
7. 每日新闻	22,026	4.5
8. 解放日报	13,904	2.8
9. 自由世界	13,644	2.8
10. 雅典人报	11,515	2.4
11. 熔炉报	7,398	1.6
12. 国民先驱报	7,330	1.5
13. 黎明日报	7,312	1.5
总 计	488,415	100.00

资料来源:《信使报》(雅典),1976年8月5日。

在1974年的选举中,希腊毛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单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它仅仅获得1013张选票,占总票数的0.02%。(这里应该提出的是,贴上毛主义标签的不只是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一家。事实上,目前希共有二十多个极左的分裂小派别团体,其中称得上彻头彻尾“毛主义”的是希腊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

根据1974年的选举统计,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希共经历了1947年以来旷日持久的秘密时期以及后来的七年反议会制的军人独裁时期,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共产党人在希腊的力量遭到削弱。1974年当共产党被允许合法存在和参加竞选的时候,他们取得了他们历来掌握的10%左右的选票。以往,非共产党的中左选民往往投左联党的票,使它在初期的一些年代里获得的票数希共

(1954年高达24%)高于,这一回中左派的选民却另开渠道,支持别的党派去了,主要都投票支持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情况既然这样,那么希腊共产主义的前途究竟如何的问题,随之也产生了。共产党人会不会从历来对共产党的号召毫无反应的希腊民众中间找到新的支持基础呢?共产党人在1949年武装反叛垮台以后被彻底挫败了,他们会不会避免类似的错误呢?譬如象无条件地屈从于外国(即苏联)的意志和毫无能力去适应农民的现实情况等等。他们是否能够一方面采取促使向卡拉曼利斯政府妥协的政治策略,而另一方面又不丧失在希腊的政治生活中扩大共产主义影响的新机会?1974年选举以来度过的岁月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更加一目了然了。情况虽然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问题本身丝毫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试图解决的这一连串问题的前景作一番研究。

### **共产主义和希腊的现实状况**

过去二十年中,尽管希腊的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但是实质上它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希腊占压倒优势的社会阶层。希腊拥有的大工业数量不多。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大部分是买办出身,他们不是为外国企业服务就是本身的企业和外国有联系。工业无产者的数量极为有限。所有这一切显然影响了共产党的命运,也窒息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感染力。

从人口统计学上来看,希腊人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人口之一,所以对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那一部分来说,在希腊强调坚持传统的重要性是正常的现象。这不仅因为希腊的人口出生率十分低,每年为0.5%,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从农村直接向国外移民的关系,农村里充满了上岁数的人。这种情况和土耳其恰好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譬如，尽管土耳其也向外移民，但是它的人口是非常年轻的，年人口增长率为 2.5%。

希腊所崇尚的传统不是西方式的，这是影响共产党人运命的另一个因素。西方人一心一意想发现希腊贵族的祖先有西方的血统，因而长期以来，他们制造了希腊文化具有西方风格的神话，其实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根据东正教最伟大的教士圣·格里戈里奥斯·帕拉马斯和十五世纪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耶奥尔吉奥斯·奥·特拉佩宗蒂奥斯的一系列思想，他们认为，希腊存在着传统的俄罗斯—希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文化，其中，希腊东正教和伊斯兰教间不仅不发生矛盾，相反它们是在相同的社会现实中产生出来的。<sup>①</sup> 西方对这个地区的文化渗透开始于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结果在希腊引起了亲西方倾向——“西方派”的发展，也产生了反西方的传统政治倾向——“东方派”。1821年，十九世纪西欧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成功地把西方式的革命和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权贵——自由主义者<sup>②</sup>强加于希腊，到目前为止，这些还继续是希腊参加欧洲共同市场的积极支持者。1977年，一位雅典的律师在一篇关于评论希—土危机的文章里坚持说，如果土耳其投向苏联集团的怀抱，希腊应当感到高兴，因为这么一来，希腊将成为西方在这一地区的唯一“宠儿”了！这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观点。<sup>③</sup> 1821年，东方派失败了，但是他们仍毫不含糊地继续

<sup>①</sup> 约翰·梅恩多夫教授的许多著作对塞萨洛尼基大主教格里戈里奥斯·帕拉马斯(1269—1359年)作了深入的研究。《论“东方派”和耶奥尔吉奥斯(1395—1484年)》，见季·基齐基斯：《从拜占庭到当代希腊》，载于《大百科全书》，巴黎1970年，第7卷，第1077—1085页。

<sup>②</sup> 这里使用的“自由主义者”一词的含义是广泛的，它并不局限于指1910年由埃尔·韦尼泽洛斯组成的自由党。

<sup>③</sup> D. P. 卡瓦斯：《土耳其与西方》，载于《政治问题》(雅典)，1977年4月2—8日，第8页。这个论点使人联想起希腊的西方主义者对十九世纪希—土斗争的解释，他们把这场斗争视为欧亚间的冲突。毋庸置疑，这样的解释是违反现实的，因为自古以来，希腊文化在欧洲和亚洲是同样活跃的。

反映希腊人所遵循的原则，今天，他们在遍及全国的东正教寺院和希腊军队里找到了避难所，他们代表了所谓的“东方现代化主义者”的倾向。寺院里的修道士和部队里的士兵全是来自希腊农村的农民子弟，因而他们受到希腊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共产主义如同自由主义属于外来的思想意识形态，它在希腊还没有发展成为真正为农民谋利益的变种（如果在理论上办不到，那么在实际上也应该这样），它应该把农民和农村的利益放在工业无产者和城市之上。希腊的“毛主义者”和西方的毛主义者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城市，而对农村却一无所知。他们在雅典出版的周刊有《人民之路》（希共—马列）和《人民斗争》（毛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这两家刊物很少提倡发表希腊农民的观点，而是大量介绍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观点，以及攻击苏联的反苏文章。（《人民斗争》得到中国的公开支持，有时，北京的中国新闻社还援引它的文章。<sup>①</sup>）

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农民共产主义在希腊赢得了一名真正的支持者——阿里斯·韦卢伊奥蒂斯，他是以农民为主的共产党游击队，全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1945年6月，希共领导宣布阿里斯为冒险主义者并把他杀害了。今天，所有的希腊共产党都以他为光辉榜样，并无休止地颂扬他，同时谴责杀害他的人。可是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党采纳他的观点。

结果，希腊的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创造性，也没有群众支持的基础。凡是西方存在的一切共产主义的变种，在希腊也都存在，而且都是作为输入的外国方式存在的。甚至希腊的“民族色彩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也严格地局限于西方的框框之内，这对于非工业化的希腊毫无现实意义。这个口号是为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服务的，

---

<sup>①</sup> 例如，见1976年8月3日，中国新闻社发布涉及苏联航空母舰《基辅号》进入地中海的消息。

而不是为希腊共产党服务的。人们也许会说,事实上不存在“希腊共产主义”,而只有“在希腊的共产主义”。通过对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的政治生活的研究,这种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sup>①</sup>

### 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

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是希腊最著名的当代作曲家,他生于1925年,1943至1950年在雅典学习音乐。1954至1960年,在巴黎完成学业,这时,他的音乐和他本人也都西方化了。他和巴黎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象卡拉曼利斯那样,深受法国政治的影响。

塞奥佐拉基斯从十七岁起就参加了共产党。1967年前,他是左联党的一名领导人,也是国会议员,1963年民主青年拉姆布拉基斯运动成立,他担任领导职务。1968年希共分裂以后,他成为希共一国内派的政治局成员,但是在1972年他脱离了该党,其原因我们将在下面加以叙述。1974年左联党重建时他再次出任领导职务,为该党的执委会委员。1977年11月的选举中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显示出了不景气的现象,于是他作出了抉择,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通过和希共一国外派的合作去追求他的目标。

塞奥佐拉基斯历来运用他享有的作曲家的威望来为他的政治目标服务,而且他在1974年后的公开声明中仍旧表明,在这一方面他是一成不变的。他公开表示他要成为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那样的共产党人,试图把希腊的全部共产党人置于他的领导之下。为此,他甚至还提出了行动计划。

1972年4月,他发表了一份二十五页的备忘录,塞奥佐拉基斯向他以前的同志们说明了他当年退出希共一国内派的理由。塞

---

<sup>①</sup> 关于研究塞奥佐拉基斯生平的专题著作,见乔治·吉安纳里斯:《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纽约1972年。

奥佐拉基斯以 1968 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流产的捷克经验教训和当时在智利掌权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为例来论证他的论点,他写道:

在过去两年中,我参加了希腊共产党一国内派的领导集团,经验告诉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再代表革命的变革了……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对抗的结构中,这种革命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希腊的革命变革和革命力量的完全独立是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独立的人民运动将不会遇到帝国主义的强烈的反应……也不意味着在由此而发生的冲突中,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不再是这个运动的天然同盟者。<sup>①</sup>

塞奥佐拉基斯继续提出了他的设想,他主张解散一切现存的希腊共产党组织,把它们成员重新组合在新的独立的人民运动中去。他没有提出谁来担任这个设想中的运动的领袖,但是他在备忘录里所使用的语气使人毫不怀疑他是想来担任这个角色的。至于这个运动的文化问题,他明确地指出,要以西方文明为基础,他说,“我坚信二十世纪是自由的世纪,是全世界文明凯旋的世纪。”<sup>②</sup>

在上校政权时期,塞奥佐拉基斯一度坐过牢,后来又在巴黎过了四年流亡生活。当卡拉曼利斯政府宣布一切政党合法化以后,他于 1974 年 7 月回到希腊,这时离他写备忘录已经有两年了。由于他把音乐用于政治目的(最突出的例子是在电影“Z”中),因而在 1967 至 1974 年的军事独裁期间,这位爱辩论的作曲家的音乐唱片受到查禁,而如今他的唱片的销路却很广。尽管他是颇孚盛名

---

<sup>①</sup> 这是一份没有标题的希腊文打字备忘录,签署日期为 1972 年 4 月,第 2、4 页。笔者个人收藏有这份备忘录的副本。较早和较近的法文文本的日期为 1972 年 3 月 19 日,澳大利亚,悉尼。

<sup>②</sup> 同上,第 8 页。

的作曲家，并且在1964年的选举中当选为代表左联党的议员，可是在1974年11月的选举中，他作为共产党左翼联盟的竞选人竟没有赢得议席。这一事件对正统的希腊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的成员们都为这位作曲家的不听话的脾气担忧。但塞奥佐拉基斯却坚定不移地打算在希腊继续推行他的“独立”策略，追求他在国外创始的独立人民运动。就目前而言，塞奥佐拉基斯将在左联党的普通党员中开展活动，左联党颇合他的口味，就象他在1976年夏末对非共产党的中间派报纸《论坛报》所说的那样：“我是属于左联党的。他们都是富有智慧的老共产党员，他们的一生经历充满着痛苦、思索和行动。他们没有障眼物。他们完全是自由的。”<sup>①</sup>

然而，塞奥佐拉基斯宁可利用雅典的非共产党报纸，而不用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的联合日报《黎明日报》向希腊人民陈述自己的观点。例如，1976年8月，他在发行量相当大的右翼日报《下午报》上发表了 two 篇标题醒目的文章：《两大集团钳子下的唯一出路：支持卡拉曼利斯的全民团结》<sup>②</sup>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对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对政府的不妥协立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重复他的公诸于世的著名信条：“不选择卡拉曼利斯就选择坦克！”他认为卡拉曼利斯代表了国内反对军人政权捲土重来的唯一力量，因此他应当受到全体希腊人的全力支持。<sup>③</sup>

然后，1976年9月6日，在同一份右翼报纸上开始刊登一篇塞奥佐拉基斯的五十页的报告，标题是：《让我们组成希腊色彩的新左派》。显而易见标题是借用了法国共产党的口号——“法国色

---

① 《论坛报》，1976年8月8日。

② 《下午报》，1976年9月26日。

③ 关于更早些时候宣传亲卡拉曼利斯的口号所作的努力，见《论坛报》，1976年8月8日。

彩的共产主义”，而早在两个月以前，塞奥佐拉基斯已把报告提交给左联党的筹划指导委员会。在这份报告中，塞奥佐拉基斯以最明确的语言指出，希腊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独立的姿态。<sup>①</sup>他认为不论国际共产主义(主要是莫斯科)的反应如何，希腊共产党人应该对执政的右派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恩里科·贝林格对执政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所作的“历史性妥协”相类似，这就是他的主要观点。<sup>②</sup>他说为了防止独裁主义者卷土重来，希腊共产党人必须和卡拉曼利斯政府合作。塞奥佐拉基斯坚持希腊共产党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反对在制定政策方面屈从于外国，对此，他作了下列说明：

我相信正统的共产党人一直对(非执政的)欧洲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者)事实上放弃共产主义一事进行谴责。这是文字游戏。那么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呢？现在单从理论角度来对它下定义已经不可能了。它已经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经典的列宁主义。五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赋予了共产主义这个词汇以历史性和实质性的含义。共产主义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改良了的斯大林主义及其变种的混合物。因而，可以这么说，苏联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指责(非执政的)欧洲共产党放弃一般所谓的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和主要特性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无数迹象向包括我在内的欧洲人表明，欧洲共产主义的进程取决于我们，我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歪曲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我建议的)新方针是民族色彩的社会主义。左联党已经有魄力地、彻底地、明确地宣称它同意这个方针。然而希共一国内派却还在犹豫不决。

塞奥佐拉基斯的反正统的观点居然发表在发行量很大的右派

---

① 《下午报》，1976年9月6日。

② 《论贝林格的“历史性妥协”的建议》，见本卷中贾科莫·萨尼的一章。



报纸上，这种令人注目的做法使许多人相信这位作曲家和他的党发生了矛盾，他在《下午报》上发表的观点代表了他个人的看法，可是塞奥佐拉基斯在他的文章中却说左联党也同意他的观点，而且，据我们所知，左联党主席伊利阿斯·伊利乌对他的主张是赞同的——至少就他个人而言。那么塞奥佐拉基斯为什么把他的报告去发表在《下午报》上呢？看来其原因在于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的关系问题上。这两个党是合作的，不过两党的某些党员，尤其希共一国内派的党员感到塞奥佐拉基斯和伊利乌走得太远了。正如塞奥佐拉基斯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正在犹豫之中。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的联合机关报《黎明日报》完全受希共一国内派的控制，该报主编是希共一国内派的第二号人物莱奥尼扎斯·基尔科斯。所以，当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产生分歧的时候，左联党就处于没有党报的地位，无法公开发表它的意见。既然这样，为了把自己的观点公诸于众，左联党和塞奥佐拉基斯就不得不借用非共产党的报纸了。

当然，伊利乌年迈多病，塞奥佐拉基斯很可能成为朝气蓬勃的新领袖，他也许会把两党团结起来，而且使他们赢得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伊利乌的默许下，塞奥佐拉基斯将会全力以赴地利用他个人的威望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使左联党和更加难以对付的希共一国内派接受他的观点。《下午报》的发行量几乎为《黎明日报》的十倍，他把他的纲领发表在《下午报》上，可以想象他是打算以此来作为促使局势朝他的方向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塞奥佐拉基斯企图利用公众舆论来支持他的立场，可以预见，希共一国内派对他这种做法的反应是敌对性的。但是即使在稳健的共产党人中，他的这种做法也得不到广泛的赞同。事实上，这种做法使得左联党领袖伊利乌和希共一国内派领袖德拉科波洛斯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伊利乌怂恿希共

一国内派中富有斗争精神的党员放弃共产党的标记，参加到左联党的队伍中来：“我的那些希共一国内派的朋友们坚持称他们自己是共产党……他们不了解苏联对这个名称拥有版权，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名称赠送给弗洛拉基斯了。因而，不管他们如何描述自己是共产党人，他们却早已被人看作为变节者。我要告诉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回到左联党的队伍中来。”<sup>①</sup>德拉科波洛斯对这个建议的回答也非常干脆，他说“不行”。<sup>②</sup>

当然，从基本立场上来说，他愿意以支持塞奥佐拉基斯的方式来搞联合，这也反映了他的个人要求，因为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他们都倾向于欧洲共产主义。

### 右派的反应

另一方面，右派和卡拉曼利斯政府很快就对作曲家的合作建议作出了非常友好的反应。他们表示他们不仅随时准备合作，而且也希望看到塞奥佐拉基斯的雄心壮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够得到实现。其实，差不多从军人独裁政权垮台以来，或是从1974年11月选举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有利于促使稳健的共产党人和卡拉曼利斯右派之间达成全国性的（或者说历史性的）妥协。这种气氛有时还促使出现互相吹捧的场面。例如，对于左联党的伊利阿斯·伊利乌，卡拉曼利斯的新民主党领袖和政府的台柱之一乔治奥斯·拉利斯于1975年3月曾作过如下的评论：

伊利阿斯·伊利乌给了我解决希腊政治局面的钥匙。这位左派领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受到所有的人，甚至他的劲敌的崇敬，但是他的个人命运却是极为不幸的。内战时期，从1946到1951年，他被驱逐了

---

① 《论坛报》，1977年2月26日。

② 《黎明日报》，1977年3月8日。

五年,而且其中两年他还不断地受到折磨。然后他又度过了他的艰难危险的半秘密状态的生活。1967年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位德高望重、饱经风霜、病魔缠身的领袖再次被放逐到雅罗斯,并受到非人的折磨。后来他作为犯人被转移到雅典的军人医院,在那里他度过了难以忍受的四年。可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屈服。他历来直言不讳、刚正不阿,如今,他仍然无所怨恨。①

伊利乌的答词如下:

以拉利斯为例,他被军人政权囚禁过,上校们不必再去凭借任何特殊的手段,他们囚禁他的根据正是他本人签署的用来反对我们的法律。传统的右派也成为他们自己制造的用来钳住左派的武库的受害者。这倒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从今以后,我们双方都在寻求相互了解的途径。②

而现在塞奥佐拉基斯首次公开提出了合作问题,而且得到了公开的答复。

由于伊利乌的共产党的力量远不如贝林格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因此,卡拉曼利斯不觉得他对左派作出的任何妥协性的安排持有恐惧心理;而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倒是有所惧怕的。卡拉曼利斯赞同和左联党以及希共一国内派实行合作,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高他自己的声望,尽管就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共产党和卡拉曼利斯本人一样,缺少和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紧密联系。也许他已经认识到,赞助塞奥佐拉基斯的“独立左派”和“全国性妥协”的主张,也就是保持共产党队伍不统一的一种手段。当然,右派对塞奥佐拉基斯的称颂招来了下面一段评论,1976年9月《下午报》写道:

---

① 《论坛报》,1975年,3月4日。

② 同上。

最近,《下午报》伸出友好之手发表了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涉及爱琴海危机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主要在侨居国外的广大希腊人中造成了巨大和深刻的印象。对此,政府在一篇声明中表示了赞同的立场,声明也强调了塞奥佐拉基斯的爱国主义实质。几乎所有的雅典报刊都对这两篇文章发表评论……事实上,在发表文章的同时,塞奥佐拉基斯已经为希腊新的左派明确地奠定了基础,这个左派以勇气和负责的精神,与以往的一切罪过和过失一刀两断了。<sup>①</sup>

希共一国外派对“新的左派”和“全国性的妥协”的主张的总的反应是强烈的、不调和的。1975年3月19日,阿里拉奥斯·弗洛拉基斯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党对希腊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态度:

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希腊)共产党不仅面临着受美国和保守政治的政府鼓动的军国主义动运,而且也面临着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右派修正主义集团所设置的障碍。这个集团是以“共产党一国内派”的名称出现的,目前,它正在和统治阶级合作,在工人运动中开展工作。<sup>②</sup>

### 1977年11月的选举

1977年11月举行的新议会的选举对稳健的共产党人和卡拉曼利斯政权都是沉重的打击,这样,使共产党左派和卡拉曼利斯之间的“全国性妥协”比以前更成问题了。选举以前,塞奥佐拉基斯一方面受到希共一国外派的攻击,另一方面,他想把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联合起来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的企图又遭到了失败,一气之下他离开了希腊,可是,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联合了两个社会民主派的小团体和一个从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派里分裂出来的团

---

① 《下午报》,1976年9月6日。着重点系原文所有。

② 《黎明日报》,1975年4月5日。

体组成了进步左派力量联盟,开展竞选活动。这个联合正如表 3 所揭示的那样,结果一败涂地。它获得的选票还不到总数的 3%,它在议会里只赢得两个席位。这两个席位分别由左联党的伊利乌和希共一国内派的莱奥尼扎斯·基尔科斯所占有。(显然,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丧气的表演对塞奥佐拉基斯产生了影响,他回到希腊,并决定和希共一国外派进行合作。)卡拉曼利斯的党得到的选票也不到总数的 42%,而在 1974 年它得到的选票占 54%。这样,它丧失了历来投右派选票的传统选民中一大部分人的支持,尤其失去了农村中农民的支持。

虽然新的党派的生产使情况多少有点复杂化,不过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明显地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它所得的票数从 1974 年的 14% 增加到 1977 年的 25%,同时,正统的共产党力量——希共一国外派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它单独的得票百分比相当于 1974 年左翼联盟的得票百分比。这样,它显然已经把在 1974 年支持过欧洲共产党的选民大部分争取过来了。<sup>①</sup>“毛主义”组织虽然仍旧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派,但是与 1974 年相比,它也有了不错起色,它的得票比例从 0.02% 上升到 0.41%,而且头一次在农村中也感到了它的存在。<sup>②</sup>

这些结果使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些结果最终表明,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看,希腊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从文化方面来看,它也是一个非西方化的国家。选举中所有的失败者都是属于亲西方的知识分子范围的。卡拉曼利斯是一个一心一意想成为绅士的农民,由于他支持“欧洲启蒙运动”和推崇含

---

① Th. 罗马诺斯:《希共一国内派的危机与复兴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载《反抗》(雅典),1977 年 12 月 31 日,第 26 页。

② 瓦斯·特扎内塔基斯:《极左派分子在选举结果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意义》,载《论坛报》,1977 年 11 月 23 日。

义模糊的社会民主思想，不禁使人油然想起了莫利哀的资产阶级贵族式的人物。同样地，民主中间联盟的成员和进步左翼力量联盟大部分成员的灵感也都来自欧洲思想，实质上不是社会民主思想就是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相比之下，唯一的赢家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和他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越来越公开地表明，他们信奉第三世界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至少在口头上是这么说的），而且得到小农场主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民，是向这个党提供新力量的源泉。

其次，选举结果也表明，在过去三年中，正统派——亲苏的希共一国外派成功地利用结社自由和停止反共宣传的大好时机，不仅保持了1974年支持过它的那些中坚力量，而且还有效地把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部分支持者团结到它的旗帜下。

第三，选举结果也表明，希腊知识分子（包括欧洲共产主义者，欧洲中间派主义者和欧洲卡拉曼利斯分子）的欧化狂热性早就把希腊人民中相当一部分人推到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怀抱中去了。事态的发展使共产主义在希腊取得成功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当然，帕潘德雷乌的党不是共产党，但是由于它的激烈的反美和反北约的立场，由于它不愿公开地批评共产主义，由于他公开宣称他要把1941至1944年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各派力量置于他的领导之下，也由于希共一国内派对帕潘德雷乌的立场和他的作为保持沉默，所有这一切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共产主义在希腊农村中那些固守旧传统的人士中的传播变得更容易了。此外，帕潘德雷乌的反土耳其情绪与1974年季米特里奥斯·伊奥安尼季斯将军所表现出来的一模一样，这只会使希土冲突永远保持下去，在希—土地区加深已经存在的鸿沟，从而使苏联从中渔利。

表 3 1977 年 11 月 20 日 希腊议会选举结果

党派和选举联盟	总得票数	占总票数的百分比	席位数
保守派			
民族党 <sup>a</sup>	349,851	6.82	5
新民主党 <sup>b</sup>	2,146,687	41.85	172
中间派			
新自由党 <sup>c</sup>	55,560	1.08	2
民主中间联盟 <sup>d</sup>	613,113	11.95	15
非共产党左派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sup>e</sup>	1,299,196	25.33	93
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派			
进步左翼力量联盟（联合民主左翼党、希共一国内派、社会主义行动党、社会主义道路运动和天主教民主党的选举联盟 <sup>f</sup> ）	139,762	2.72	2
共产党			
希腊共产党 <sup>g</sup>	480,188	9.36	11
“毛主义派”			
希腊共产主义运动 <sup>h</sup>	11,962	0.23	0
人民民主联盟 <sup>i</sup>	9,500	0.18	0
其它	24,691	0.48	0
总计	5,130,510	100.00	300

a 斯泰法诺斯·斯泰法诺普洛斯和斯比罗斯·塞奥托基斯的民族党。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党。

b 康斯坦丁诺斯·卡拉曼利斯的新民主党。

c 康斯坦丁诺斯·米佐塔基斯的新自由党。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党。

d 乔治奥斯·马夫罗斯的民主中间联盟。1974 年改名为中间联盟一新力量。

e 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f 这个联盟由左联党领袖伊利阿斯·伊利亚领导，其中包括左联党，希共一国内派、社会主义行动党、社会主义道路运动和天主教民主党。社会主义行动党和社会主义道路运动成立于 1974 年选举以后，前者由脱离中间联盟一新力量的人所组成，后者由脱离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所组成。天主教民主党的领袖是 N. 普萨鲁扎基斯，他是从右翼的国家社会党内分裂出来的，过去，他对共产主义、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进行过猛烈的攻击。

g 虽然它非正式地称被作希腊共产党一国外派，但是它拒绝接受国外派的标记，因为它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的希腊共产党。

h 虽然希腊共产主义运动表示支持中国，但是它却没有得到中国的正式支持。

i 人民民主联盟，该党出版《无产者旗手》周刊（雅典），自称为毛主义者，可是却追随阿尔巴尼亚路线，它并不为毛逝世后的中国领导所支持。该党领袖为伊安尼斯·奥齐阿斯，1976 年它从一个亲华的党内分裂出来的。希腊马列主义组织现改名为希腊共产党一马列。该党领导人为伊萨克·伊奥尔扎尼季斯，北京的中国领导正式承认了它，它没有参加 1974 和 1977 年的选举，但是一直出版《人民之路》（雅典）。

资料来源：《论坛报》（雅典），1977 年 11 月 22 日。《每日新闻》（雅典），1977 年 11 月 24 日。选举举行时，笔者正在雅典，因此对谬误之处作了订正，并加以详细说明。应该指出的是，1978 年政府发表的材料与本表略有出入。

## 全国性妥协方案

尽管选举结果已经揭晓，但是在共产党内部和希腊的右派和左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情况仍在进行：把这一点牢记在心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希腊的右派和左派才有可能实行合作？从长远来看，在希腊发展意大利式的“历史性妥协”究竟对谁有利？对卡拉曼利斯的传统右派有利呢还是对共产党人有利？据笔者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取决于希土关系的发展情况。

如同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那样，希腊稳健的共产党人也坚信，希土战争（至少是维持一个旷日持久的危机状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也想利用这种局面使自己上台。他们都希望重新出现类似二次大战时期民族解放阵线所创造的记录。对于可预见到的未来的分析也许可以总结如下。1941年希腊传统的右派有能力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德意保的侵略，但是与此相比，今天他们已经没有多大能力去组织民众反抗土耳其的入侵。在反抗土耳其的侵略问题上，共产党在民众中的组织基础比较雄厚。如果这场预期的战争一旦失败，新的（共产党）左派将会掌握反侵略的武装力量，而且也会激励起反对土耳其占领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一旦打赢，共产党也会由于支持了卡拉曼利斯政府而使其地位得到加强。

1975年3月18日，希共一国内派递交给卡拉曼利斯政府一份由莱奥尼扎斯·基尔科斯签署的备忘录，备忘录明确地表明了共产党对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的估计：

首相先生，我们愿意就塞浦路斯危机向您的政府提出一些看法，我们的祖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因此我们认为，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必要进行调整。我们感到……我国正在被赶到巨大的世界危机的中心地带去，而且，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而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关于全国作好准备的问题，我们主张把武装力量的准备、军民团结



和人民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团结等问题联结在一起……(因此),我们建议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本届国会的一切党派和团体毫无例外地参加政府,以便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共同的民族大业。<sup>①</sup>

一年以后,共产党利用再次发生的爱琴海危机(开发大陆架的问题)要求政府组织一支民族自卫队,也就是一支共产党希望掌握的人民武装。1976年8月13日,希共一国内派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特别会议,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国正面临着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来自国外的威胁……西斯米克I号(加深1976年危机的土耳其军舰)不断的挑衅,使希土之间的紧张状态达到危险的地步。武装冲突的危险迫在眉睫……(我们建议),为了准备长期的斗争,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都动员和组织起来,在人民的组织的参加下,这种动员的形式应该是各自为政的……(我们特别建议),成立一支由全体后备役希腊人一致轮流参加的民族自卫队。<sup>②</sup>

当天,基尔科斯在雅典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新闻报》上作了如下声明:

我们和土耳其之间的危机可能是旷日持久的……举例来说,古巴还没有和美国正式发生战争,但是古巴在稳固的道义和政治基础上把它的人民动员了起来,在国内建立了各种机构和组织,这么一来也使经济和社会大大地发展了,从而使它在国防上的准备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完善得多。<sup>③</sup>

中间派的《新闻报》要求希腊公众推行类似的路线,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虽然安德雷斯·帕潘德雷乌也想在希土危机中渔利,但是他却采取了绝然不同的策略。左联党和希共一国内派采取了支持政府并想爬到政府背上去的做法,帕潘德雷乌非但不这么干,他却大肆攻击卡拉曼利斯,指责他不立即向土耳其宣战,他还指控首相为民族的叛徒。帕潘德雷乌似乎还在寻找机会唆使军队起来反对卡

<sup>①</sup> 《黎明日报》,1975年3月20日。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新闻报》,1976年8月13日。

拉曼利斯，他希望葡萄牙式的军事政变会使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运动上台。

1977年4月，希土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冲突，帕潘德雷乌对这场冲突的反应正好说明了他的策略。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希腊的萨摩斯岛和土耳其的海岸间抓获了一名希腊渔民，据说这是属于希腊的水域，而且土耳其人很快就释放了这个渔民。帕潘德雷乌对此却发表了煽动性的声明，这一点就清楚地表明他试图把希腊政府推上战争的道路。

总之，爱琴海危机的发展过程深刻地说明了，左派对卡拉曼利斯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脆弱性的估计并不是不现实的。旷日持久的危机表明，现任首相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缺少一个解决希土纠纷的明确方针。他所作出的决定都属临时性的措施，而土耳其人却以深谋熟虑的计划来行事，结果，希腊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卡拉曼利斯执政以后，他对土耳其采取了强硬立场，然而，1976年7至8月在爱琴海发生的西斯米克 I 号的石油勘探活动又迫使他退却了。首先，他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呼吁，希望它能谴责土耳其；可是在1976年8月25日举行的安理会上全体一致规劝两国就爱琴海纠纷进行直接的双边会议——这是一种同意土耳其而不同意希腊的立场。然后，卡拉曼利斯又向国际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国际法院禁止西斯米克 I 号在希腊认为属于它的大陆架地区勘探石油。但是，1976年9月11日国际法院以十二票对一票、两票弃权驳回了希腊的控告。

卡拉曼利斯所寻求的其它反对土耳其并加强其外交攻势的渠道也同样没有奏效。例如，希腊首相曾奉行过巴尔干半岛谅解政策，以期使希腊部分地脱离美国，而与苏联重修和好，其最终目的是想在反对土耳其的事业中取得巴尔干半岛上的共产党国家和苏联的支持。然而，爱琴海危机刚爆发不久，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都宣布它们在这场争执中采取中立的立场,既然这样,土耳其当然大受其益了。此外,到1977年初,苏联越来越向土耳其靠拢。同样地,希拉曼利斯也费尽心机想使希腊挤进共同市场,他希望他能凭借西欧的力量来遏制土耳其。但是也许只有法国例外,共同市场的成员国都不愿意无条件地支持雅典去反对安卡拉,1977年春,甚至法国也明确宣布它不愿作出这样的支持。事实上,巴黎对于希腊进入共同市场一事也抱冷漠的态度。对卡拉曼利斯来说,法国的态度是一个巨大的甚至灾难性的打击,因为他历来把他的内外政策建立在“希法联盟”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指望在法国的支持下,希腊早日被吸收进共同市场的基础上。

总之,卡拉曼利斯发现他在国际上 is 孤立的,因此他被迫在土耳其的生气勃勃的外交政策面前退却了。由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的政府腐败无能,因此他的威望日益下降,这也增加了他的麻烦。从1977年3月27日开始,中间派报纸《论坛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文章以有力的证据指出,不仅一切政府机构中的绝大多数官员昏庸无能,而且普遍地贪污腐化。政府对这些非常有说服力的指控概不理睬,也许因为这些指控涉及了首相的兄弟阿伊莱夫斯·卡拉曼利斯。

针对这种局面,1977年夏卡拉曼利斯试图通过和美国恢复密切关系来寻找出路,尽管如此,他为了尽量不让国内对他的治国能力不满的敌手把自己赶下台去,他只好要么到左派那里去寻求支持,也就是依靠“广大群众”,要么和土耳其开战,把筹码押上去听其自然。两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可是,不论处于哪一种情况,希腊共产党都会从中捞到好处。

不管卡拉曼利斯将来对希土冲突采取什么态度,也不管他和美国以及北约组织的关系如何,在他的1974年后的第二阶段的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特点:希腊共产党已经得到重新组织它的力量和扩大它的势力的机会了。

## 六. 芬兰: 芬兰共产党与选举政治

约翰·H. 霍吉森

1916年,列宁一反他的暴力革命的一般倡议,他指出,一个和已经开始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大国接壤的小国有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sup>①</sup>当时列宁心目中指的是不是芬兰,对这个问题先撇开不谈,看来芬兰是符合他的既明确又含蓄的标准的。这不仅因为芬兰和苏联接壤八百英里,而且它还自以为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劳工运动。此外,大多数芬兰共产党党员似乎都同意通过投票箱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观点。因此,对于致力于以“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来说,在探讨其可能性和会遇到的问题的时候,芬兰倒是一个既有意思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芬共通过其控制的芬兰人民民主联盟,在选举过程中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它在战后的十次大选中,得票数占20%以上。在西方,只有法国和意大利党才能和它媲美。由于这些成就,因此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把芬兰、法国和意大利都归类于世界上“动荡的民主政体”。<sup>②</sup>另一份研究报告则把芬共包括在致力于“和平道路”的十三个“最有影响”的非执政的共产党的行列之中。<sup>③</sup>

尽管战后至少有七个党派的角逐构成了芬兰政治生活的特点,可是事实上,二次大战后左右芬兰选举运动的却是芬盟、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农民)党,这三家也因此而享有盛名。在一次选举

① 《列宁全集》第5版,第30卷,莫斯科1962年,第122页。

② 塞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纽约州花园城1959年,第30、32页。

③ 乔治·赖斯:《非执政党与“和平道路”》,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73年7—8月号,第65—66页。

表 1 共产党选举结果和

大选年	芬 兰	
	占总选票的百分比	芬共党员数 芬兰人民民主联盟人数
1945	23.5	19,000
1946		
“		
1948	20.0	53,000
1951	21.6	45,000
1953		
1954	21.6	46,000
1956		
1958	23.2	47,000
1962	22.0	50,000
1963		
1966	21.2	47,000
1967		
1968		
1970	16.6	48,000
1972	17.0	48,000
1973		
1975	19.0	42,000 <sup>e</sup>
1976		

a 法共统计资料仅表示发出的党证数,而不是接收党员的总数,因此表中的党员

b 国民议会选举。

c 在 1948 年意大利的选举中,共产党—社会党联盟得票占 31%。由于意共通常来的。

d 1967 年由于芬盟吸收了 25,000 名芬兰民主青年联盟成员入盟,因此从 1966

e 1973 年初,因更换党证,芬共党员数减少了,从 47,611 人下降至 35,756 人。

资料来源:选举资料来自几本统计手册,《世界报》(巴黎)和下列三本书:年,第 40—41 页;菲利普·威廉斯:《法国的政治家与选举,1951—1969 年》,科·扎姆佩蒂:《1972 年选举结果与比较》,米兰 1972 年,第 25、139、143、党》,载《斯拉夫评论》(俄亥俄州,哥伦布城),1970 年 3 月,第 80 页;安尼·出版社,1972 年第,32—35 页。

## 党员人数比较

法 占总选票的百分比	国 法共党员数 <sup>a</sup>	意 占总选票的百分比	大 利 意共党员数
26.2 <sup>b</sup>	825,000		
25.9 <sup>b</sup>	895,000	18.89 <sup>b</sup>	2,150,000
28.2	895,000		
		21.0 <sup>c</sup>	2,250,000
26.9	625,000		
		22.6	2,150,000
25.9	430,000		
19.2	425,000	22.7	1,800,000
21.7	406,000		
		25.3	1,600,000
22.51	426,000		
20.02	426,000	26.9	1,500,000
		27.2	1,600,000
21.25	455,000		
		34.4	1,600,000

数比实际人数多。

得票数至少比议席少 1%，所以 1948 年它的得票数是根据议席数 (22.8%) 推算出

至 1970 年它的盟员数大幅度地增加。

1950, 1958 和 1964 年也更换过党证。

亚科·瑙西艾宁:《芬兰的政治制度》,译者:约翰·霍吉森,马萨诸塞州 1971 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 年,第 292—293 页;贾埃米利奥·伊普塞维奇和恩里 145—146 页。关于党员数,参见各党正式资料及约翰·霍吉森:《芬兰共产党 克里格尔:《法国共产党人:民族的形象》,译者:埃莱茵·豪佩林,芝加哥大学

中(1958年的选举)芬盟获得了多数席位,但是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一贯是最稳定的得票者,在七次选举中,它都名列前茅,得到了多数席位。中央党在两次选举中(1948年和1962年),获得最多的席位。

从芬兰的内阁组成方面来看,也反映出了这三个党所占的优势。1944至1948年和1966至1970年两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以及1970至1971年和1975至1976年两个较短的时期中,这三个党都参加了联合政府。从1977年5月直到最近,在以社会民主党领袖卡莱维·索尔萨为首的多数党政府中,其它两个党也参加了。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中央党对政府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目前,中央党再次成为芬兰内阁的支柱。<sup>①</sup>

### 芬 兰 模 式

在通过议会手段获得权力的问题上,芬共抵制了1956年苏共领导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模式——1948年的捷克模式。芬共主席阿内·萨里宁虽然也承认,在战后初期的年代里,东欧某些国家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社会主义,但是他认为关于那些事件的情况却是非常紧张。因此,那不能算具有代表性的。尽管芬共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意他的观点,然而萨里宁仍旧对芬兰将以更加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持乐观态度,这种方式 and 捷克等国经历过的道路比较起来要和平得多,对此,他曾作过如下的说明:

芬兰多少是一个例外,因为一般说来,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劳工运

---

<sup>①</sup> 如需纵观芬兰的政治情况,见亚科·瑞西艾宁:《芬兰的政治制度》,译者:约翰·霍吉森(马萨诸塞州1971年),重点见第40—41、180—181、262—265页。1977年5月社会民主党主席卡莱维·索尔萨组成了多数党内阁接替中央党领袖马尔蒂·米图宁的少数党政府。尽管如此,中央党仍旧占有最多的部长职位(五个),其中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全部最重要的职位。

动，而相对地说，这个左翼劳工运动是强有力的。当社会主义原则在劳工运动的其它方面占优势时（我指的在社会民主党内），选民中的大多数可能会转而支持社会主义的变革。<sup>①</sup>

在民族主义的芬兰，芬兰共产党始终在小心谨慎地开展工作，尤其在战后初期的年代里。那时，芬兰的选民们难以接受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这是赫塔·库西宁充分认识到的一个事实，她在逝世前多年担任芬共政治局委员和芬兰人民民主联盟议会党团主席。<sup>②</sup>一般说来，芬兰民众都厌恶 1944 至 1947 年存在于赫尔辛基的 A. 日丹诺夫联合管制委员会，而且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移居国外的一些共产党人于 1946 年返回芬兰也是一个不详的征兆，其中包括赫塔·库西宁的前夫 T. 列亨。谣传说，芬兰存在着一个共产党的“障碍”集团，而国外也有芬兰的政治家卖身投靠莫斯科的流言蜚语。从 1941 年起，赫塔·库西宁的父亲担任苏共中央委员，后来他在斯大林（1952 至 1953 年）和赫鲁晓夫（1957 至 1964 年）手下任苏共主席团（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个在 1939 年曾经自发团结一致地奋起抗击苏联武装力量入侵的民族来说，上面提到的一些事实确实给它增添了不安。<sup>③</sup>

基于这种情况，所以在选举时，芬共就自然而然地回避使用共产党的标记，而以芬兰人民民主联盟的旗号来开展竞选运动。三十年来，芬盟中的共产党骨干力量始终没有受到过挑战。芬共的五万名左右党员是芬盟的最大构成部分（其它构成部分包括 1967

---

① 见萨里宁答《芬兰画报》（赫尔辛基）记者问，1976 年 1 月 28 日，第 22 页。

② 见《自由北方》（赫尔辛基），1946 年 4 月 4 日。

③ 笔者写过两本书对库西宁的政治生涯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其一是《爱德华·居林和奥托·库西宁传略，1918—1920 年》，赫尔辛基 1974 年。另一是《潜逃到俄国：奥托·库西宁的《政治传记》》，瑞典文版，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 1974 年；芬兰文版，赫尔辛基 1975 年。



年参加芬盟的25,000多名芬兰民主青年联盟成员和两万余名芬兰民主妇女同盟的成员)。在芬盟的地方、区和全国执行委员会里,芬共党员占了很大比重,也许这就深刻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保护伞组织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sup>①</sup> 芬共中央委员会自己也承认芬盟正在开始变成一个联合的政党,不过它还是希望不要出现共产党对芬盟的过度控制的现象,而且它似乎对芬盟和芬共合并为一个政党的建议抱否定态度,虽然共产党内部主张合并的压力还是不小的。<sup>②</sup> 例如,在1972年举行的芬共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主义的头面人物莱奥·苏翁佩建议改组芬盟,以便进一步缩小左翼社会党人(即非共产党人)的影响。<sup>③</sup>

芬盟在1970年的选举中遭到重大挫折(见表1),而且,1973年9月智利阿连德联合政府被推翻,这对“和平道路”的拥护者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芬共和芬盟的领导对于在芬兰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仍然抱乐观态度。<sup>④</sup> 至于这样的乐观态度是否有道理,那又另当别论。而且,也只有当人们对芬盟力量的来源和芬盟在大选中起伏的成就了解以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作分析的话,通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一般人认为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成功基本上反映了经济因素(即经济情况最糟糕时,其成就就愈大),可是在芬兰,

---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约翰·霍吉森:《芬兰共产党》,载《斯拉夫评论》,1970年3月号,第83—84页;埃莱·阿莱纽斯在《赫尔辛基新闻》上的引语,见1970年5月16日该报。1975年在地方一级和区以及全国一级的执委会中,芬共干部分别占35—40%和60—70%。见《十六和十七大之间芬兰共产党的活动》,赫尔辛基1975年,第42页。

② 见《芬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声明,赫尔辛基,1972年3月31日—4月2日》,赫尔辛基1972年,第36页。

③ 《赫尔辛基新闻》,1972年4月2日。

④ 关于对智利事件的反应,见阿尔沃·阿尔托和约尔马·亨蒂莱在《芬兰画报》上的文章,1973年9月28日,第31页;另见埃莱·阿莱纽斯在《芬兰画报》上的文章,1973年9月21日,第7页。

共产党在选举中的起伏情况主要由政治因素决定的。<sup>①</sup>（托马斯·格林在分析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命运时，他注重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sup>②</sup> 芬盟的命运看来尤其和它的主要对手芬兰社会民主党的兴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两个党对芬兰的选民，尤其对反对派选民都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因此，我们在对芬共过去的成就和它的和平议会政治策略的前景作评价时，也可以从中找到某些现实的基础。

### 战后力量的原动力

芬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18 年，那时，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在历时三个月的内战中被击败以后逃亡到莫斯科，就在这一年的夏季，他们成立了芬兰共产党，尽管如此，芬共在议会里取得成就基本上也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sup>③</sup>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实际上芬共是一个非法组织，党员最多的时候为二千人，虽然在整个二十年代，它努力在两个类似芬盟的选举阵线（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和小农选举组织）中开展工作，但是在全国性的选举中，它获得的选票占 12.7%（1922 年曾高达 14.8%，在 200 个议席中占了 18 席）。1930 年以后，当所有的极左派组织（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和小农选举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时，共产党人不是弃权就是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只是在 1944 年，由于芬苏停战，

---

① 有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机会受到限制的时候，也就是共产党人最能取得成功的时候，持这种观点的有赛摩·马丁·利普塞特（见《政治人》，第 45—46、118—119、125 页）和查尔斯·密考德（见《法国的政党：意识形态的神话和社会现实》，载《现代政党：对政治的比较探讨》，编者：西格蒙·纽曼，芝加哥 1956 年，第 152 页）。

② 托马斯·格林：《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对比研究》，载《世界政治》季刊，1968 年 10 月，第 9 页。

③ 如须进一步研究芬兰的内战事件，见约翰·霍吉森：《芬兰的共产主义：历史与阐述》，普林斯顿 1967 年，第 53—80 页；另见马文·林塔拉：《三个世代：芬兰政治生活中的极右派》，布卢明顿 1962 年，第 7—70 页。

芬共才成为一个完全合法的政治组织。这样又为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为争取 1945 年 3 月的大选胜利而组成芬盟铺平了道路。在战后第一次选举前夕,芬兰总统 J. K. 帕锡基维提出了他的著名呼吁,他呼吁在议会里要出现“新的面孔”。<sup>①</sup>选举揭晓时,芬盟得票占 23.5%,在 200 个议席中占了 40 席。

这和二十年代的水平相比,芬共的实力实际上增加了一倍,而且这些成绩还是在经历了将近十五年的非法时期后取得的。如果想要对共产党在选举中的突出成就的原因进行评价的话,那么首先应该了解一下芬盟在整个战后时期的经历。虽然芬共所继承的战前的政治信仰(有一位学者把它叫做政治上的“孟德尔法则” Mendelian law<sup>②</sup>)也许在芬共恢复活力方面起了某些作用,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能说明芬盟为什么在 1945 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两次战争之间的选举充满了恫吓与暴力,而 1945 年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被允许参加的这次选举却没有出现上述情况,但是这同样也不能充分说明共产党势力扩大的原因。相反,最终的答案也许应该从政治事件中去寻找,这些政治事件,就如理查德·汉密尔顿在他研究法国工人阶级的著作中提到过的那样,使工人阶级的选举模式令人注目地重新组合了。<sup>③</sup>尤其,由于芬兰工人阶级对极端主义统治芬兰抱反对态度,同时由于他们日益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内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政治上它可以成为工人利益的最合适的代言人,也许出于这两个原因,芬兰工人阶级在 1945 年的选举中才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不过,我们对上述问题的两个方面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

① 见《巴锡基维路线》第 1 卷,波伏 1956 年,第 15—16 页。

② 见罗伯特·莱恩:《父与子:政治信仰的基础》,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59 年 8 月号,第 502 页。

③ 理查德·汉密尔顿:《第四共和国的富裕和工人阶级》,普林斯顿 1967 年,第 285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二十年中，芬兰(如意大利和法国)同时经历了保守的“右翼”和革命的“中间派”的政治运动。<sup>①</sup>古斯塔夫·曼内尔黑姆属于前一类人，他是民主时代的贵族，他曾两度担任国家元首(1918至1919年和1944至1946年)，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议会制政府的制度。<sup>②</sup>直到他逝世为止，曼内尔黑姆如果不是在行动上，那么在精神上始终忠于拉普阿(Lapua)运动，这个运动从1930年初形成开始，就一直奉行消灭一切党派和议会制政府的极端主义路线。<sup>③</sup>1932年，罗马胜利地向法西斯进军约十年以后，在门特塞莱的芬兰居民中，有一支由维赫托里·科索拉领导的拉普阿运动起来造反，他们主张向赫尔辛基进军，并要求成立新政府，新政府应该由曼内尔黑姆担任总统，并由他的密友鲁多夫·瓦尔登担任总理。但是这次造反以不流血的方式被粉碎了，造反的头头们都遭到逮捕，于是拉普阿运动被宣布为非法组织。<sup>④</sup>

同年(1932年)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军人党派——人民爱国运动。<sup>⑤</sup>由于它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类似以雅克·多里奥为首的法国人民党，它也采取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sup>⑥</sup>)，攻击芬兰境内说瑞典语的少数民族，因此它开罪了在拉普阿运动里占主要地位的实业家，同时它也没有把支持拉普阿运动的年老一代中的保守分子争

---

① 利普塞特在《政治人》中提出了这些带有描写性的分类，见第130页。

② 见马文·林塔拉：《四个芬兰人：政治传略》，伯克利和洛杉矶1969年，第13、22、37—39页。

③ 见马文·林塔拉：《三代人》，第183、193页。

④ 《论拉普阿运动》，见马文·林塔拉：《三代人》，第164—199页；另见林塔拉：《芬兰》一章，载《欧洲的右派：历史性的简介》，编者：汉斯·罗杰和尤金·威伯，伯克利和洛杉矶1966年，第434—435页。

⑤ 林塔拉在提供给罗杰和威伯的稿件中提到了人民爱国运动，见《欧洲的右派：历史性的简介》，第435—441页；另见《三代人》，第221—243页；另见《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形象：人民爱国运动》，载《中欧问题》季刊，1962年10月，第309—315页。

⑥ 关于对多里奥的党的评论，见尤金·威伯：《法国》，载罗杰和威伯合编的《欧洲的右派》，第107—110页。

取过来,这些人中有曼内尔黑姆和 J. K. 帕锡基维。1918 年帕锡基维曾经热切地希望芬兰采用德国式的君主政体,如今他反过来严厉谴责人民爱国运动,指责它是一个企图在芬兰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组织。人民爱国运动的领导人确实非常崇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们尤其崇拜法西斯的意大利。尽管如此,人民爱国运动获得了公务人员、大学师生、医生和职员的支持,在 1936 和 1939 年的选举中,它分别得票 8.3% 和 6.6%。

人民爱国运动追求相当于德国的“民族共同体”,而它的最终理想却打算通过向苏联作领土扩张以建立起一个大芬兰国。看来 1939 至 1940 年和苏联发生的冬季战争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和德国结成参战同盟与人民爱国运动的大芬兰国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随着德国战败,人民爱国运动的抱负也破产了,1944 年根据芬—苏停战协定,人民爱国运动被明文规定为非法组织。

虽然某些人或许会辩解说,共产党人在战后得到的支持不能从战前或战时所发生的事件上去寻找根据,<sup>①</sup>但是芬兰经历了右派极端主义的时代(不论门特塞莱的叛乱还是和德国国社党的合作),这些就不能不被看作战后共产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一个因素。这也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赫塔·库西宁在战后被释放出狱后的头几年中,她一再强调反法西斯主义和支持民主的主张。芬盟的拥护者们公开接受了这些主张,如果当时直截了当谈论社会主义,他们反倒会抱疏远态度。<sup>②</sup>此外,芬盟还提出,必须对那些在战时给芬兰带来灾难的肇事者追究责任,关于这一点也得到左派组织的大力支持。我们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来看,在两次大战之间,三个

---

<sup>①</sup> 例如,见艾里克·阿拉德:《传统的和新兴的激进主义》(打字稿,1963年)第38页。

<sup>②</sup> 见《自由北方》(赫尔辛基),1946年4月4日。

欧洲最强大的非执政共产党(芬兰、法国和意大利党)在政治上都经历了和这种或那种右派极端主义的殊死斗争,这无疑不是一种巧合。

### 社会民主党的软弱性

芬兰人民抵制右派极端主义的做法,不仅为发展共产主义的政治前途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而且使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关于战争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面评价问题上产生了矛盾,矛盾本身又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而社会民主党则是芬盟战后左派选举时的劲敌。<sup>①</sup>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争论主要环绕着韦纳·坦纳的为人及其政策而展开的,在四分之一以上的世纪里,坦纳掌握着社会民主运动,而且或许他也是本世纪芬兰政界里唯一的最强有力的领袖。战时,由于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党不放,以至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反对他的政策的动向,结果使这个党在战后初期的年代里失去了选举的号召力。

社会民主党内的矛盾可以追溯到1939至1940年,那时芬兰和苏联发生了一场冬季战争。事件发生时,坦纳任芬兰外交部长,一方面他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另一方面,当其它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对那次短暂的战争进行彻底调查时,他又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据一位右翼观察家说,1940年担任该党书记达十年之久,外号“芬兰的马克思”的K.H.维克<sup>②</sup>掀起了一场斗争,他把环绕着和苏联发生冲突事件的有关秘密的面纱揭开了。可是,1940年秋,由一小

---

<sup>①</sup> 凡是在社会党表现出软弱无能和不团结的国家里,共产党都有表明它们在选举中取得成就的记录,关于这一点,加布列尔·阿尔蒙特在他的处女作《共产主义的呼吁》中曾经提及过。见该书(普林斯顿1954年)第387—388页。法国也不例外,法共在社会党四分五裂的时候得到了好处。见密考德:《法国的政党》,第137页。

<sup>②</sup> 见埃尔基·雷克宁发表在《瓦萨》杂志(赫尔辛基)上的文章,1939年3月22日,第37页。

撮支持引进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和坦纳关系密切的人首先发难,结果,维克和另一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约翰·黑洛被逐出执委会,并被开除出党。1941年芬兰加入反苏的德国集团后,坦纳公开要求“粉碎”维克和他的支持者们,<sup>①</sup>结果,社会民主党的六名议员(包括维克在内)和赫尔辛基市财政局长以叛国罪被捕入狱。<sup>②</sup>

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粉碎社会民主党内部反对坦纳的势力,坦纳深信德国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芬兰只有依靠德国的支持才能保证它的独立,这些看法也遭到来自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反对。随着战事的发展,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员毛诺·佩卡拉和J.W.凯托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芬兰和苏联进行单独签订协定的谈判,他们主张芬兰的独立应该在最后的和会上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而得到解决。1944年6月26日芬兰总统里斯托·吕蒂致函希特勒,向他保证他本人或他授权的内阁决不会和苏联单独签订和约,这时绝大部分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员为了断绝和这一立场的联系,他们煞费心机地要使社会民主党退出内阁。可是坦纳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支持下,把这项动议压制下去了。<sup>③</sup>

由于吕蒂总统的辞职,他向德国的保证成了一纸空文,1944年8月4日,曼内尔黑姆元帅出任总统(紧接着在九月份就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事态的发展使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矛盾激化了。佩卡拉等人警告说,由于和苏联实行了停战,共产党可以合法地活动了,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一方面让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坦纳和其它人引退,另一方面给获得自由重返议会的维克派恢复党籍,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未来的选举中,共产党将会把左派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

① 《芬兰社会民主报》(赫尔辛基),1941年7月31日。

② 见霍吉森:《芬兰的共产主义》,第181—191页。

③ 同上,第196—202页。

坦纳把佩卡拉的建议视为夺权阴谋而加以拒绝了，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也否决了佩卡拉相继提出的和共产党结成选举联盟的建议。当反对派不顾执委会的决定，公开宣称他们将和芬盟结成选举联盟的时候，佩卡拉和凯托被驱逐出执委会，而且，凡是主张和共产党人组成选举联盟的人都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因而，在1945年3月选举前夕，相当多的社会民主党人看清了该党党魁在战时和极右派勾结的真面目，他们毅然决然地转向支持共产党控制的芬盟，结果使芬盟在政治上一举告捷。<sup>①</sup>

### 政治上的稳定时期

事实证明，芬共一旦组成了自己的选举力量，芬兰共产主义（即芬盟）的选举力量相对地说是稳定的。在战后十年的选举中，芬盟所得选票的起伏率只有1.7%左右（见表1），这与芬兰人在政治活动方面历来奉行的原则是一致的。<sup>②</sup>

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象其它一切国家的选民那样，芬兰人一旦认定一个党派以后，他们的政治忠诚一般是不大会改变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是随着父母投票，实际上随父母投票的芬兰人的比例高达75%，<sup>③</sup>所以在1945年，投芬盟票的人

① 见霍吉森：《芬兰的共产主义》，第202—214页。

② 关于正常年代里芬兰选举结构的稳定情况，见塔皮奥·科斯基阿霍：《普选与1907至1966年的选举中党派所占的议席》，载于《我选哪个党？党派、政治和选举资料与研究》，编者：奥拉维·博尔格，赫尔辛基1970年，第161页；另见瑞西艾宁：《芬兰的政治制度》，第40—41页。

③ 关于世代的政治延续性问题，见V.O.小凯伊：《政治、党派与压力集团》，纽约1958年第4版，第234—235页。关于芬兰的选举习惯，见安蒂·亚科拉：《选举探讨和影响投票态度的一般因素》，载于《我选哪个党？》，博尔格编，第123页；另见里斯托·桑基阿霍：《对芬兰党派地理上的支持》，载于同书，第191页；另见奥尼·兰塔拉：《选民选择权的变化》，载于《政治与社会》，第16卷，瓦马拉1957年，第72—74页；另见佩尔蒂·佩索宁：《人民的授权》，波伏1965年，第96—97、106、117、348页，英译本题为《芬兰的一次选举：党派的活动与选民的反应》，纽黑文1968年。



从来没有那么多过，而且他们的子女也跟随他们投票。

当然，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得选票的平均差数在 1.7% 左右，但是它的选举力量却不如历次选票表示的那么稳定。1948 和 1970 年偏离平均数最大，那时，在多党制下芬盟失去了相当数量的选票（分别为 3.5% 和 4.6%）。在解释五十年代所出现的起伏现象时，某些观察家断定，失业和投芬盟的票有着直接的联系。<sup>①</sup> 例如，艾里克·阿拉德在分析 1951 和 1954 年芬兰议会选举情况时，他对某些选民家庭作了调查，他发现在大萧条时期，他们所以支持芬盟原来和他们的失业有关系。<sup>②</sup> 其它研究资料也表明，在 1958 年的议会选举中，家庭失业是坦佩雷市投共产党人票的决定性因素。那年，在投票前夕整个国家的失业现象非常严重，结果共产党的得票数从 1954 年的 21.6% 的水平上升至 23.2%。<sup>③</sup>

毫无疑问，从某些方面来说，芬兰的失业问题也许是选举中决定支持共产党人的重要的自变数。然而，我们如果想把这个发现作为普遍规律来对待的话，那倒应该持郑重态度。事实上，1948 至 1975 年的连续资料（包括战后十次选举中的九次）表明，失业（自变数）和投共产党人的票（应变数）间存在着相反的关系：即：选举

---

① 例如，见艾里克·阿拉德：《社会结构和政治活动》，博尔高 1956 年，第 83 页；另见利普塞特：《政治人》，第 106、248 页；艾里克·阿拉德：《芬兰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工人阶级的觉悟》，载于艾里克·阿拉德和伊尔耶·利图宁合编的《分裂，思想体系和党的制度》，韦斯特马克学会学报，第 10 卷，图尔库 1964 年，第 112、114、116—117 页。阿拉德发现，在芬兰北部和东部这种连锁反应尤为明显。见《芬兰的共产主义》，载于《芬兰的道路》（赫尔辛基），1961 年第 1 期，第 5 页；另见《政治激进主义力量变化的几个因素》，赫尔辛基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62 年第 15 期，第 10 页。

② 阿拉德：《社会结构和政治活动》，第 84 页。阿拉德在《传统的和新兴的激进主义》一文中认为，失业现象和共产党人力量的增长无疑是有联系的，但是对其最初的力量的大小却很少或没有联系。

③ 见佩索宁：《人民的授权》，第 88—91、95、297、399 页；利普塞特：《政治人》，第 118—119 页；见 1963 年 7 月 15 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中国文件。

前夕的失业率越高,投芬盟的票越少。<sup>①</sup>在1970年的选举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了,那年芬盟失去了大量选票。虽然它吸收了25,000名青年联盟的成员入盟,但是它得票只占16.6% (1966年为21.2%),破天荒地第一次下降至20%以下。可是,在选举前夕,这个国家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业问题。正如一位观察家在1968年指出的那样,“我国的失业情况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甚至在所谓的大萧条时期也没有这么严重。”<sup>②</sup>所以,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这是战后芬盟所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因此,至少在芬兰这个国家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我们还有必要探讨一下其它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明为什么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命运会不断变化。

### 1970年挫折的原因

政治上的抉择问题倒是一个值得注意探讨的课题,就如上文中提到过的那样,它是1945年芬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1970年选举前夕,芬兰的工人和农民分别占支持芬盟人数的81%和13%,<sup>③</sup>可是与1966年或战后大部分年代相比,他们的选择目标不再是那么明确了。社会民主党和芬兰共产主义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又冒出来了一个新的农村政治反对派,对芬兰的反对派选民来说,这一切都给他们扩大了选择的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民主党,有人说社会民主党已经逐步解决了它的内部纠纷,正在以更加团结和激进的态度出现在选民面前,这种说法或许是不确切的。在五十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派系斗争,一派以坚持反共政策的党的书记韦纳·

---

① 佩阿尔森的相互系数( $r$ )为-0.67。芬兰的失业资料来自日内瓦国际劳工局发行的《劳工统计年鉴》和泰霍·普尔基宁:《失业的分布情况。对1948至1953年芬兰失业分布的社会政治调查》,波伏1956年,第231—234页。

② 见《新芬兰报》(赫尔辛基),1968年9月15日。

③ 盖洛普民意测验,《赫尔辛基新闻》报导,1969年11月23日。

莱斯基宁为首，他是坚持反共政策的，另一派以党主席埃米尔·斯科格为首。在许多由莱斯基宁控制的地区党部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于1957年召开了一次临时代表大会，会前，斯科格被邀与韦纳·坦纳会晤，坦纳曾因“战争责任问题”入狱并退出政界，这时他又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的角逐场上来了。<sup>①</sup>坦纳宣称，为了回答反对派集团对他的起诉，他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同意作为“协调候选人”来和斯科格派的候选人竞选。选举的结果很难说是协调的，因为当坦纳以一票之差居领先地位时，斯科格和他的追随者们竟然起来抵制党的执委会和书记处的选举。1958年议会选举以后不久，社会民主党领导采取了行动，他们把“反叛”的成员和组织开除出党，<sup>②</sup>于是，在1959年春，斯科格派以它的十四名议员为中心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党派。

1963年当拉斐尔·帕西奥接替坦纳担任社会民主党主席以后，党内的纷争才开始缓和下来。帕西奥在一篇纲领性的演说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而且他意味深长地指出，过去社会民主党犯了一个错误，它把社会民主党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党这一点给忘记了。<sup>③</sup>在往后的几年中，在党内和睦相处和使社会民主党的形象更为激进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66年帕西奥组阁时，他让芬盟和芬共的部长都入阁，这是他在激进化方面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社会民主党在改变政治形象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这从它在

---

<sup>①</sup> 1946年坦纳被判处五年半徒刑，但他于1948年获释；不久他又被选入议会和社会民主党执委会。1957年芬兰总统乌尔霍·凯科宁委托坦纳组阁，结果没有成功，尽管如此，苏联的评论员抓住这个机会，谴责坦纳是芬兰资产阶级手中的反动工具。见《消息报》，1957年10月26日。

<sup>②</sup> 见埃米尔·斯科格：《社会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波伏1971年，第367—407页；另见瑙西艾宁：《芬兰的政治制度》，第27页。

<sup>③</sup> 全文刊登在《人民报》（坦佩雷），后来又转载于《芬兰社会民主报》；摘录刊登在《新芬兰报》，1963年6月27日。

1958, 1966 和 1969 年的得票数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在这几次选举中, 一切芬兰党派的支持者们都被要求在芬兰的政党之间作出抉择。<sup>①</sup> 1958 年, 社会民主党基本上奉行了稳健的和非激进的政策, 而且由于党的队伍的分裂, 因此那些对政府不满的人和失业者丧失了对它的信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它却出人意外地证明它在民族联合党的支持者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民意测验中有 26% 的人投它的票), 民族联合党是芬兰政治领域里的右翼。它的支持者们认为,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在 1966 年民族联合党投票比例下降为 19%, 到 1969 年票数只占 9%。1970 年选举前夕, 社会民主党的姿态已经变得日益激进, 以致芬盟的支持者中有 51% 的人把它作为首先选择的对象(1958 年只有 30%, 1966 年为 38%)。显然, 在过去十年中, 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芬盟的越来越难以对付的政治对手了。

### 芬共的分裂

当芬兰社会民主党政治上似乎正在向左转, 党内趋向更加团结的时候, 芬兰共产党内却发生了战后第一次最严重的分裂。当时, 它正处于党内冲突的痛苦之中, 主要矛盾集中在有关主义和策略等问题上, 也就是说, 是坚持斯大林立场的强硬路线呢还是在芬兰的政治结构中去寻找能促使共产党力量发展的新路线。

六十年代中期, 芬共党报上公开出现了反对芬共总书记维莱·佩西和其它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言论。<sup>②</sup> 1966 年举行的芬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上, 保守派领导集团内进一步出现了裂痕, 阿内·萨里

---

<sup>①</sup> 见佩索宁:《芬兰的一次选举》,第 141 页和《多党制下的分裂性》(美国政治学学会 1972 年年会论文),第 15 页;另见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赫尔辛基新闻》报导,1969 年 12 月 5 日。

<sup>②</sup> 见伊尔凯·哈卡莱赫托在《芬兰画报》上的概述,1969 年 4 月 3 日,第 51、54 页。

宁当选为党的主席，接替了党的元老艾莫·阿尔托宁，阿尔托宁曾经处心积虑地要清洗芬共党内的“修正主义的臭虫”。<sup>①</sup> 萨里宁在党内相对地说是一位新手(他于1944年才入党)，他担任党的主席一方面为党带来了朝气，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大大开罪了党的统治集团中的许多因循守旧的人。他对传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概念作了新的阐述，他提倡“工人政权”和更加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的一种新的“民主集中制”形式，而且他公开赞同社会主义制度下许多不同的党派共存的主张。<sup>②</sup> 此外，在他领导下，芬共一反1948年以来所持的对立立场，接受了内阁职务，而当年当K.A. 法格霍姆提出在他的政府中给共产党人五个部长职位的时候，共产党人拒绝了这一建议。<sup>③</sup> 1966年，在以拉斐尔·帕西奥为主席的芬兰社会民主党的内阁中，芬盟主席埃莱·阿莱纽斯和两位芬共党员接受了部长职位。

采取这一步骤本来是为了争取与其它政治力量和解及争得更多的合法地位，可是谁知道事与愿违，这倒富有讽刺意味了，因为共产党人去担任政府公职的时候，正好是失业高潮和经济上必然要采取严峻措施的时候，如将芬兰马克贬值等。公众认为政府应对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负责，而这时阿莱纽斯偏偏担任了财政部长，芬盟盟员莱奥·苏翁佩任公共事业和交通部长(尤其负责有关失业问题)，芬盟盟员马蒂·科伊武宁任社会事务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很难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卸掉。结果，芬盟的传统支持者们对芬盟的支持减弱了。<sup>④</sup> 由于对共产党人的支持大幅

<sup>①</sup> 见《新日报》(图尔库)，1966年4月26日。

<sup>②</sup> 见萨里宁答《芬兰画报》记者问，1967年1月28日，另见他发表在《人民新闻》上的评论，1966年8月31日。

<sup>③</sup> 关于这一段往事，见油印稿《1948年8月20日K.A. 法格霍姆总理在坦佩雷工人大厦的演说》，K.D. 4560号(赫尔辛基：国家情报中心)，第4—5页。

<sup>④</sup> 1966—1970年，芬盟和芬共参加内阁后的各种民意测验表明，选民对芬盟的支持发生了逆转的变化，1972年9月24日的《赫尔辛基新闻》的一篇社论对此进行了论述。

度地下降,因此,在1970年议会选举一年以后,共产党人决定退出阿赫蒂·卡尔亚莱宁的内阁。

芬兰南部地区是芬共保守派的堡垒,在那里反对萨里宁的“改良主义”势力首屈一指,后来萨里宁把这些人称作兰白型的社会主义(仿照芬兰国旗起的浑名),这些人团结在芬共副主席,国会议员泰斯托·西尼萨洛的周围。在整个这一段时期内(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西尼萨洛以捍卫斯大林主义为名,反对萨里宁和他的新发明,如“工人的政权”等等。<sup>①</sup>

1968年苏联军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的“人性味的社会主义”的试验随之破灭,这些都使芬共党内的矛盾加剧了。入侵捷克后的头一天早晨,萨里宁召集了一次芬共政治局会议,会上表决通过了对苏联侵略捷克的谴责。<sup>②</sup>后来,芬共中央委员会以压倒多数(二十四票对九票)批准了这个谴责。9月,芬共副主席埃基·萨尔马代表党的正式立场,把苏军进入捷克称为“占领”,而且声称这一事件在芬兰共产党人中间造成了严重危机。当萨尔马遭到莫斯科攻击时,芬盟和芬共的报纸《人民新闻》奋起捍卫,该报指出,他的意见反映了芬兰共产党人的看法。<sup>③</sup>然而,这一观点也并不为所有芬共党员所接受。在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政治局的决议之前,反对派们针对萨里宁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散发了一分油印声明,对他的态度作了强烈的谴责。<sup>④</sup>后来,反对派成员指出,芬共对苏联入侵捷克的批评是加剧党内危机的主要因素,萨里宁也认为捷克事件“大大地”加剧了党内矛盾。<sup>⑤</sup>

---

① 1970年2月15日的《赫尔辛基新闻》中有一篇文章概括了西尼萨洛的观点。

② 见《纽约时报》,1968年9月25日;另见《人民新闻》,1968年8月29日。

③ 《人民新闻》,1968年10月3日(引自《新芬兰报》,10月4日。)

④ 1968年10月6日的《新芬兰报》援引了油印声明的摘录。反对派一再说萨里宁是不受欢迎的芬兰杜布切克。

⑤ 《赫尔辛基新闻》,1969年10月9日和26日。

1969年4月，争论终于爆发为公开的对抗，那时参加芬共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代表退出了会场，他们单独举行会议商讨另组新党的办法。<sup>①</sup>当反对派拒绝参加选举芬共干部的时候，来自芬兰北部的三十七岁的地区党委书记阿尔沃·阿尔托当选为总书记，接替了担任总书记达二十五年之久，如今又倒向反对派一边的维莱·佩西。这时，反对派也开始在全国组织“影子党”，1968年8月，受西尼萨洛控制的六个地区执行委员会撤换了放弃马列主义原则的芬共干部。<sup>②</sup>

然而，经过1969年5月成立的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一场正式的决裂避免了。到1969年年底，该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旨在表面上恢复党的团结的书面协议，该协议在1970年初举行的芬共临时代表大会上被正式通过。按照协议规定，三十五名中央委员中反对派占十五名，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反对派占六名，八名党的书记中反对派占三名。芬共临时代表大会后议会选举开始了，虽然这个协议防止了在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自己提出对立竞争的候选人名单，但是这仍旧掩盖不了党内严重分崩离析的现象。芬盟作为政治选择对象的魅力丧失殆尽，人民对它的支持一落千丈，结果，它在议会里丧失了五个席位。

尽管芬共在评价自己在选举上遭受的失败时，不如萨里宁分析两年前瑞典共产党所遭受的类似失败那样直言不讳，但总的说来芬共似乎已经认识到上面提到的原因了。在评价瑞典共的失败时，萨里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对于我们的瑞典兄弟党的失败深感遗憾。但是这个结果也并不令人感到完全意外，因为，就如其外围组织一样，瑞典

---

<sup>①</sup> 一位代表提议新党命名为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见《新芬兰报》，1969年4月8日。

<sup>②</sup> 《赫尔辛基新闻》，1969年8月29日。

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这些分歧使党的战斗力削弱了，使它无法组成一个统一战线，而且还使党的摇摆不定的形象暴露在选民面前。而社会民主党检讨了1966年地区选举中失败的原因，所以它在政策问题上作出了激进的姿态，毋庸置疑，这一措施对选举的结果产生了影响。许多选民显然认为投社会民主党的票比较保险和稳妥。当然捷克事件对选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sup>①</sup>

芬盟主席埃莱·阿莱纽斯事后在分析1970年芬兰的大选时承认，由于芬盟参加政府，由于苏联侵略捷克产生的灾难性影响，以及芬共党内的分裂，这一切使他的组织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虽然处于变更中的芬兰民主政治的面貌很不明朗，但是阿莱纽斯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反对派政治运动——乡村党正在崛起。<sup>②</sup>乡村党为了争取农村中态度摇摆的选民的支持，它综合了右翼资产阶级和左翼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于1970年提出了一个竞选纲领。<sup>③</sup>乡村党的支持者中，农民占49%，工人占43%，显然，它把中央(农民)党和芬盟的选民吸引过去了，这么一来，它得到的选票从1966年的1.7%增加至1970年的10.5%。<sup>④</sup>

## 展 望

1972年的议会选举进一步证明，1970年芬盟丧失选民的现象并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虽然芬盟在1975年的大选中又夺回了一些丧失的阵地(见表1)，但是它还是没有恢复到1970年前的地位。这一情况大大地削弱了人们对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

① 引自1968年9月16日的《新芬兰报》。1968年大选中，瑞典共产党得票占3% (1966年的地区选举中得票为6.4%，1964年普选时得票为5.2%)。见M. 唐纳德·汉科克：《瑞典：工业化后政治上的变化》，伊利诺斯1972年，第117页。

② 见《人民新闻》，1970年5月16日。

③ 奥拉维·博尔格：《芬兰的党派和政纲：1880—1964年》，波伏1965年，第340页。

④ 《赫尔辛基新闻》，1969年11月23日和1970年3月24日。



目前,党的领导也充分认识到,芬共和芬盟没有能够跟上芬兰社会急剧变化的步伐。萨里宁主席承认,芬共失去了城市中的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以及农村中较贫困的人的支持。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他极力想在劳工的“新阶层”中加紧工作,以争取新的支持,这个“新阶层”指的是象护士一类的白领职业者。<sup>①</sup>

此外,在芬共党内削弱苏联的影响也许会使芬兰的反对派选民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一个较好的看法,但是芬共在加强其独立性的同时党内的关系也严重地紧张起来,结果芬盟在选举中的命运又受到了影响。1975年芬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萨里宁承认芬共面临着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亚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任何时候所面临的问题,或许还要远远地超过。<sup>②</sup>西尼萨洛的少数派几乎控制了大部分芬共地区党组织(十七个地区中控制了八个),在它影响下的那些地区内,它企图迫使同级的芬盟组织服从它的领导。更有甚者,西尼萨洛把埃莱·阿莱纽斯的理论观点称为“反共产主义”,<sup>③</sup>而且,斯大林主义的少数派和莫斯科都声称,芬盟领导的新更迭表明芬盟企图让其所有成员(共产党或非共产党人)接受它的纲领,它正在打算破坏芬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形象,同时企图通过将芬共隶属芬盟的手法消灭芬共。<sup>④</sup>1973年西尼萨洛派企图迫使阿莱纽斯下台的阴谋未遂。为了反击对阿莱纽斯的人身攻击和上述事件,1975年阿莱纽斯警告说,不断增加的压力很可能会使芬盟与芬兰共产党斯大林主义变种的合作告吹。<sup>⑤</sup>事态的发展确实削弱了芬盟的号召力,可是在1975年的议

---

① 见《人民新闻》,1970年6月18日。

② 见《赫尔辛基新闻》,1975年3月2日。

③ 同上,1975年5月17日。

④ 《这是谁的变种?》《新时代》周刊(莫斯科),1975年5月2日,第14—15页;另见阿尔沃·阿尔托在《共产党人》(赫尔辛基)上的文章,1969年4—5期,第140页。

⑤ 见《芬兰画报》,1975年5月16日,第53页。

会选举中,由于选民们厌烦了乡村党的缘故,所以芬盟终于取得了比1972年好的结果。1970年乡村党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其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它沾了共产党和农民党的光,另一方面,芬兰的选民们如同1958年选举前夕一样,认为社会民主党已经“资产阶级化了”。<sup>①</sup>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芬盟仍旧是议会中三大集团之一,1975年11月,它不顾斯大林主义派的反对,再次参加了政府。1978年,它在以社会民主党主席卡莱维·索尔萨为首的内阁里占有三个部长职位。

然而,这些离芬共和芬盟的纲领里所提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还差得远哩。芬兰历史上,工人阶级在二百个议席中占多数的时候只有过三次(1916年103席,1958年101席和1966年103席),而且在普选中得票超过半数也只有一次(1966年占51%)。今后要想在议席和普选方面再出现类似情况的希望是渺茫的。此外,芬兰共产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矛盾由来已深,指望他们携手合作广泛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这几乎肯定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芬盟和芬共在内阁中充其量占有三、四个部长的职位,因此可以预料,这样的内阁不会发生激进的变化,至多出现“妥协的妥协”,就象1966年共产党参加内阁后,社会民主党的总理在他的施政纲领中所说过的那样。六十年代初,北京曾作过这样的判断:历史上没有通过议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sup>②</sup>所以,对

---

<sup>①</sup> 1975年选举前夕,芬盟参加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人中,只有30%的人将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二选择对象(1969年为51%,1958年为30%)。但是保守的联合党的支持者中有24%的人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可以接受的对象(1969年为9%,1958年为26%)。见《赫尔辛基新闻》,1974年5月5日。

<sup>②</sup> 见1963年7月15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中国文件。

全世界大部分非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假如芬兰的前景算得上是一个典型例子的话，那么，在七十年代末，这种判断便不是毫无根据的了。

## 七、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斗争

——特龙德·吉尔伯格

对所有非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求国际团结和置身于相当敌意的政治环境中的需要，是长期的两难困境，依旧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与过去一样。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和在许多次要问题上）党的领导人一定得衡量与国际共产主义重要中心有密切关系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不能任意制订对当地社会具有某些号召力的纲领和政策。特别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人必须与受社会民主党人或其他种种“改良主义者”操纵的强大工人组织周旋和竞争；在左的方面，更要与为数众多的托洛茨基派、毛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团体剧烈争夺当地居民中任何一种激进派的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造成许多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产生亲苏和亲中国的派别，以及企图在吵吵嚷嚷的两派中保持不稳定的平衡的“中间派”团体。使陷于苦恼的领导人的不幸更加复杂化的是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比领导它们的党更加教条，从而成为政治活动中心进一步分裂的因素。

除了与国际共产主义和国内具体情况有关的难题之外，非执政的共产党还陷入国际性的国家政治的罗网。若干年来，西欧共产党主要地被看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尽管这些党在许多事情上强调其不属任何中心的独立性，可是在每次竞选运动中，西欧舆论对于这种彻底的转变，表示了不能排除的怀疑，因此影响每一次

竞选的结果。一度“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阵营，由于苏联和中国的尖锐冲突，现在严重破裂，这个事实依旧一点也没有解决公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还有，某些执政党的行为大大妨害西欧共产党加强它们在国民中形象的努力(特别是意大利、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68年华沙条约国占领捷克，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华沙集团以外各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降。就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国家利益严重地妨碍共产主义的政治发展。但是许多著作表明莫斯科不愿调整外交政策来适应国际共运和各个国外党的需要；因此，苏联外交政策仍然可能是继续妨碍欧洲非执政共产党在政治取得成功的主要不利条件。<sup>①</sup>

虽则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行为极大地削弱西欧许多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可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其他因素为世界这一地区的左翼组织创造相当好的机会。越南战争和随后遍布这个地区许多国家的反美主义，给予共产党现成的论据，可以用来扩大群众支持和渗入到现存的群众组织中去。同时，美国卷入东南亚，为共产党指责美帝国主义提供证据，引起历来亲美的地区极大惊愕。这种情况有利于降低反苏主义，减轻对国内共产党不信任的普遍观念。

而且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和社会危机，为左翼激进主义提供相当多的机会。这种危机既反映在如能源问题那样高度实质性问题，也反映在现代社会的心理危机方面。后者表现在到处流行的嬉皮士和吸毒现象，以及后来产生的宗教主义、神秘主义、信仰来生等逃避现实社会的趋向。加之，西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尽管出发点不同，开始对福利国家的

---

<sup>①</sup> 关于苏联的作用的深入讨论，见弗农·阿斯帕图伦：《苏联对外政策的作用和能力》，波士顿1971，特别见第10章。

基础表示怀疑。工人阶级领袖害怕日益增加的生产自动化和合理化会严重妨害传统工业无产阶级的地位，而劳动工人责怪他们的领导人“领袖主义”。中产阶级越来越感觉到被无所不包的福利国家所抑制，认为它严重地限制个人创造性和坚强的个性。这样普遍的对社会怀疑，肯定会向所有那些认为有责任怀疑现状，如有可能要改变现状的人，提供新的令人激动的机会。

七十年代的北欧共产党就是此种机会和不利条件相冲突而产生的混乱状态的重要部分。它们有没有能力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很可能就是这十年和下一个十年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关键。

要确切估计它们成功的可能性，必须首先考察四个党——丹麦共产党、挪威共产党、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和冰岛人民联盟——过去的政治情况，以及在当地政界中它们的左翼盟友和对手过去的政治情况。对于这些政党和团体来说，在历史的早期都碰到过七十年代出现的许多问题和机会，只不过形式稍有不同，具体条件略有差别。此外，这四个政党和它们所联合的左翼团体现在正在推行的政策带有一种明显的“记忆错觉”。情况确实常常如此，历史的遗产在当代北欧左派的斗争中，仍然有重大的影响。

### 从革命到世界大战

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成功后的困难时期。这三个党都是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因为后者年龄较大的领导人拒绝接受党内左翼和党的青年组织热情倡导的新的革命口号。共产国际的成立，成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进一步使激进分子疏远修正主义领导人，形成三国社会民主党内一条显明的分界线。“赞成还是反对共产国际，是问题的关键。”这是挪威左派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在伟大十月革命后，那些激动人心、但也动荡不定的开头几年里，这个口号响彻三个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sup>①</sup>

冰岛的政治条件和斯堪的纳维亚差异很大。这个岛从 1380 年起归丹麦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名义上一直隶属于丹麦。因之，岛上的民族主义力量替代在斯堪的纳维亚非常重视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阶级对立。加之，这种独立的要求显然很难使左翼组织献身于国际主义。冰岛的激进派基本上留在传统的政治运动范围里，在这个范围里建立党派；为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正义而斗争，还是使用平均主义的口号在人民之中开展起来的；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一直很少差别，因为渔业和鱼类加工业是这里的主要经济依靠。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式的共产党才建立起来。<sup>②</sup>

在丹麦和瑞典，共产党作为母党的一个小小左翼分支而诞生，它从来不曾把大多数社会党人争取过来，也从来未能争取中、左派选民中的大多数。这两党的教条主义和坚决支持第三国际的态度，以及党员二十一项条件，加上第三国际推行的革命纲领，很快使他们在工人运动和选民中处于孤立。当 1923 年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准备努力实施欧洲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时，就把丹麦和瑞典共产主义此后许多年的命运决定了。丹麦共产党和瑞典共产党成为宗派主义的组织，固执地忠实于第三国际变化不定的政治路线，可是却令人奇怪地脱离国内社会现实，也脱离了在困难动荡的二十年代中存在于两国国内的、力量相当大的激进主义。

先谈谈丹麦的情况，两个小团体——即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劳动党——在俄国革命后几乎立刻从丹麦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1919 年，比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劳动党更加左倾的

---

<sup>①</sup> 例如见奥拉夫·舍弗洛：《挪威共产党问题》，载于《共产国际》，汉堡 1923 年，第 23 期，第 107—114 页。

<sup>②</sup> 《1969 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加利福尼亚 1970 年。

社会民主青年宣布改名为丹麦左翼社会主义党；第二年，这个党又与社会主义劳动党合并，改组成为丹麦共产党。

经过相当激烈的宗派斗争，丹麦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入特格·特格森之手，这个党在他的领导下，在普选和丹麦工人阶级运动中逐步走向下坡。在1929—1930年期间，丹麦共产党经历好几次清洗，最后产生以阿克塞尔·拉森为首的领导班子。拉森原想保持他的主席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他的任期比预计还要长。<sup>①</sup>

瑞典的形势也很复杂。早在1912年，在年轻领导人塞特·赫格龙德和卡尔·林德哈延鼓动下在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一个激进的宗派。1916年齐默瓦尔德会议上，代表社会民主青年联盟的赫格龙德和蒂勒·内曼坚持列宁的政治路线，虽然瑞典代表团还不愿意正式与社会民主党决裂。但是决裂终究在1917年初发生。那时，党的左派成员和大多数青年联盟成员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这批人很快组成瑞典左翼社会主义党。<sup>②</sup>

宗派主义一开始就折磨这个新成立的党。虽然坚强的革命派还是占大多数，但是有改良主义倾向的党员也不在少数；仅仅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目的把他们连在一起。在1919年，当左翼社会主义党必须决定是否参加第三国际时，大多数人赞成，右翼反对，后者1921年与党闹翻了。1923年这一派人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1921年左翼社会主义党中多数派建立瑞典共产党。<sup>③</sup>

巨大的困难立刻显露出来，瑞典共产党的革命者必须不断适应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的纪律。1924年赫格龙德因为在国际中有

---

① 彼得·罗德：《丹麦共产党》，载于《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的共产主义》，A. F. 乌普汤编，纽约1973年，第9—12页。

② 奥彻·斯帕林：《瑞典共产党》，载于《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的共产主义》，第62—68页。

③ 同上，第62—68页。



他独立的见解，被迫退出瑞典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赫格龙德的后任是卡尔·奇尔邦，他接受第三国际指示，执行与社会民主党有限合作的政策，但是当莫斯科的政策转变为对“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十足仇视的时候，奇尔邦则畏缩不前。1929年，第三国际领导主张撤换奇尔邦，可是这一次瑞典共产党的多数派跟随被罢免的领导人，而莫斯科支持许戈·西伦。因此瑞典有了两个共产党，一直到1937年奇尔邦派组成社会主义党为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个瑞典共产党领导人是西伦的后任斯文·林德罗特。<sup>①</sup>

挪威的情况与另外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不一样。在那里，挪威工党的左翼在齐默瓦尔德和坚塔尔两次左翼力量国际会议（在1915年和1916年）以后这段时间里，力量大大增强。到1918年他们已经积聚足够作一次成功的争取挪威工党领导权的竞赛。1918年复活节大会选举出来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牢牢掌握在马廷·特兰梅尔手中，他是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他的思想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的非常独特的混合物，并坚决认定每一个党有根据其国内情况决定它政策的权利。尽管丹麦和瑞典的党已经接受第三国际的组织原则，把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下，可是特兰梅尔坚持通过工会集体入党的原则，他决不从这个观点上退却。<sup>②</sup>

由于思想意识和组织原则不符合统治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教导，挪威工党与“世界革命总参谋部”的冲突仅仅是迟早问题。在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上，作为第三国际挪威成员的挪威工党代表对国际的组织原则表示保留态度。1920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以后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特兰梅

---

① 同上页注，第69—72页。

② 挪威工党对组织问题的看法，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33年，第28—30页。

尔的观点与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观点发生冲突,到1922年挪威工党与第三国际的裂痕发展到无法弥补的程度。于是在莫斯科与奥斯陆之间爆发公开的论战。特兰梅尔和他的亲密同志攻击第三国际背离正道,尤其背离了上一年国际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执行联合战线的政策。<sup>①</sup>

到1923年末挪威工党与第三国际间的破裂终于来到。那时,看得出莫斯科已经决定要迫使挪威工党分裂,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忠实于它的挪威党。这出戏演得完全成功。1923年11月,在挪威工党代表大会上亲国际派突然站起来,唱着国际歌,大踏步走出会场,另外组织挪威共产党。<sup>②</sup>挪威共产党曾经加入另外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党的共同阵营,在阵营中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派别自称“真正”的共产党。

至于挪威工党,它与第三国际的调情,虽然根据革命的义务来说是严肃的,但是还是由于不理解统治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原则。几年后,挪威工党对于马列主义原则在口头上同挪威共产党同样有革命热情,但不多久它与一个规模不大的挪威社会民主党重新统一,这个党是1921年从工党分裂出去的温和分子组成的。1927年以后,挪威工党参加斯堪的纳维亚庞大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队伍——这几个党成为它们各自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支配力量,一直保持到今天。

另一方面,挪威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党的阵营里很快找到合适的地位,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第三国际忽左忽右变化多端的政策指导下忠实地尽其职责。在这方面,它跟随其他两个忠于第三国际的斯堪的纳维亚党的领导,成为国际共运可信赖的,但

---

① 克努特·兰菲尔德:《挪威政治中的苏联论点》,奥斯陆1961年,第51—56页。

② 挪威工党代表大会议事录,见《工人日报》(奥斯陆),1923年11月6日。

是相当次要的成员。

在组织上，挪威共产党象它的两个姐妹党一般，经历相当的复杂。这个新成立党的第一主席是斯韦勒·斯特斯塔德，但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是阿维德·汉森和佩德·富鲁博滕，二人都是党的书记处书记。随着1928年第三国际突然转向反对工人阶级的合作政策，挪威共产党的右翼在党内处于孤立，接着来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汉森集团现在接过清洗后缩小了的党的领导权。但是到1931年夏天，第三国际决定撤换汉森，因为这个党在挪威政治里越来越孤立，于是约翰·埃格德·尼森成为新的主席。可是党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克里斯蒂安·希尔特手中，他是中央委员会中所谓“中间”派的领袖。在第二次大战德国人占领挪威前共产党的最后一个领导人是埃米尔·勒夫利恩，这个人在战后几年内证明是挪威共产党主要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后还要讨论)。<sup>①</sup>

上面的讨论表明，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在两次大战之间，表现出非常“易变”。在1921—1927/1928年，它们坚决支持第三国际“联合阵线”的政策，可是到1928—1933/1934年，它们同样忠诚地奉行要共产党人打倒社会民主党人的反“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1934—1939年，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共产党同样迅速地转向建立一个“人民阵线”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昨天被唾弃的社会民主党成为今天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伟大的共同努力中最有价值的一员。当约瑟夫·斯大林在1939年8月与希特勒签订不光彩的不侵犯条约时，这三个党立即在它们的政策宣言中表示跟随他的总的领导。<sup>②</sup>

此种策略方面令人吃惊的灵活性，在当地政治环境里得不到

<sup>①</sup> 挪威共产党领袖勒夫利恩发起的清洗的讨论，见《工人报》(奥斯陆)，1934年2月9日。

<sup>②</sup> 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例子见《工人报》1939年9月15日的文章，它全盘接受苏联关于国际形势的观点。

许多有意义的政治支持。对于非社会主义的一般群众来说，不论共产党用什么手段都去不掉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头上“红色代理人”的丑名。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种灵活策略和共产党对待联合阵线不光明正大的态度足以证明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因为共产党的组织人员利用党组织领导人中间的合作，不停地促使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离开他们的领导人。共产党在 1928—1933/1934 年死硬路线时期发动的分裂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行为不会很快被忘掉，于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严厉的反措施，有效地把共产党人排除出所有工人运动中较为重要的地位。

当然这三国党在竞选中失败的程度确实有所不同。例如，虽然丹麦共产党 1926 年只获得 0.4% 的选票，1929 年降低为 0.2%，可是在 1935 年它的份额为 1.6%，1939 年增加到 2.4%。对照起来，瑞典共产党得票比例却不断下降，1940 年为 3.5%。

冰岛共产主义的基础与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三个党不同。1930 年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反对派分裂出去，抗议母党的改良主义政策，组成一个相当松懈的左派联盟。这个组织就称为冰岛共产党。1938 年社会民主党又一次分裂，退出的一批人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立即更改组织名称，叫作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冰岛政治界上新添的这个名称，在意识形态上有点混乱，但是就在那一点上也表现了它的力量，就是它具有超出传统共产党一般狭隘范围的号召力。在保持它的思想意识上的杂乱性同时，这个党的纲领强调实质性的经济问题，特别着重强调冰岛人最最普遍关心的事业，即摆脱丹麦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有助于使它能在 1944 年冰岛正式独立时参加联合政府，并允许它留在政府里一直到 1947 年，当时竞选不利，被迫暂时成为反对党。<sup>①</sup>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冰岛联合人民党—社会主

<sup>①</sup> 《1969 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第 429—430 页。

义党就着意奠定和保持相当广泛的政治基础，这是北欧共产主义中独一无二的业绩。从意识形态的正统观点看来，这个党是大可怀疑的，但是从国内的政治情况看，贯彻它的思想意识观点是唯一有意义的道路。这条道路避免了双重灾难：既不至于隔断国内社会环境的主流，又不会象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那样，在这段时间里经常被攻击为“外国的代理人”。冰岛共产主义此种独一无二的情况，在战后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严峻地考验了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和它们与各自当地环境的关系。只要莫斯科批准（甚至推动）人民阵线政策，西欧共产党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国内群众一定会普遍接受这个政策，因为所有左派政党的反纳粹态度得到极大部分舆论的积极响应。可是在苏联放弃这个政策与纳粹德国签订不侵犯条约之后，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与西欧共产党人一样，陷入暂时的困惑之中。摆在全欧洲共产党领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两者看来同样令人不快。一方面，西欧共产党人可以支持苏联政策的改变，可是这样做他们肯定要被当地群众再一次看成不值得信任的“红色代理人”。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最后政策变动，但这样做又要犯破坏第三国际纪律的不可容忍的错误。

1939年8月23日纳粹—苏联条约签订。几天以后，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党领导集团接受苏联领导。当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三党发表几乎相同的声明，谴责英、法帝国主义制造战争，为纳粹德国开脱责任。<sup>①</sup>同样，把苏联并吞波兰东部，说成是这个地区被践踏的大众等待已久的解放。<sup>②</sup>这三个党在苏芬冬季战争中的僵硬亲苏立场，引起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强烈抗议，<sup>③</sup>毫无疑

① 例如《工人报》，1939年9月15日。

② 同上；也可见1939年11月11—13日挪共中央讨论，载于《工人报》，1939年11月14—19日。

③ 《工人报》，1939年12月1日。

问，甚至当地共产主义所保有的最低限度的公众支持也立刻化为乌有了。但是尽管有如此明显的警告，它们还是照样遵守莫斯科的纪律，服从莫斯科的指挥。

德军在1940年4月9日进攻丹麦和挪威，为这个时期共产政策极端僵化提供另一个例子。虽然这两个国家里除了当地纳粹党以外的所有其他政治党派全都转入地下，继续为反抗占领者而斗争，而丹麦和挪威共产党保留合法组织达数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还企图在群众性的工人阶级组织里扩大他们的影响，同时与德国人保持小心的对话。瑞典共产党从中立的安全窝里，看着两个邻国的遭遇，强调需要与新的德国保持“正确”的关系。在所有三个国家里，公众舆论几乎把当地的共产主义与叛逆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由于德军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才得到良好机会来扩充它们在国内的势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夜之间，半心半意的“伙伴”一变而成为对占领者“决战”的最活跃的主角，丹麦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成为两个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此种战时的经历反过来在两党中促使领导向民族主义方面明确转变。在丹麦共产党内，最高策略家阿克塞尔·拉森，他曾经在三十年代力挽党丧失公众支持的颓势，现在又成为地下最活跃的一位人物；在挪威佩德·富鲁博滕作为超等的破坏专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他还具有与社会民主党和抵抗运动中的非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协商所需要的外交手腕。<sup>②</sup> 丹麦和挪威共产党强烈关心民族需要的正确性，为1943年苏联所支持的解散第三国际的决定所证实。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见奥彻·斯帕林等：《北欧各国的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奥斯陆1965年。

<sup>②</sup> 例如：富鲁博滕致流亡在伦敦的挪威政府的信，见《战时我党政策》，载于《挪威共产党文集》，奥斯陆1945—1946年，第14—18页。

因为这两个共产党置身于地下最活跃的反纳粹力量之中，它们获得极大威望，由于苏联在共同斗争中担负巨大牺牲和担子，进一步提高它们的信誉。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达到新的高度，在战争快结束时，丹麦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为左派力量的最后重新统一作了重大努力。<sup>①</sup>

在瑞典，先前与“红色代理人”的对抗转向缓和，当苏联受人攻击时，甚至还能得到相当的支持。瑞典共产党现在变成坚强的民族主义者，并为同盟事业尽力，这是尽管中立实际上亲西方的人民群众所欢迎的行动。1944年在党代大会上，瑞典共产党接受社会民主党所提出大部分政治纲领，而且甚至强调保证要用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sup>②</sup> 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这样的纲领转变，加上在民族政策上的强调，是对长期传统做法的彻底的背离。

战时冰岛的政治情况与任何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同。的确，冰岛没有直接卷入战争，在这方面它具有与瑞典一样的特权地位。但是在冰岛领土上驻有外国军队，这个事实使中立地位消失了，而中立地位是斯德哥尔摩竭力加以维护的。

在战争期间，冰岛真的获得了政治独立的首要民族目标。在此过程中，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发挥了极大作用，因此它得到公众相当大的支持。同时，它灵活的思想纲领，加上这个新独立国家在战时遭受的经济困难所引起的对激进主义的有利条件，把这个党推入国家政治的主流之中。<sup>③</sup>

### 1917—1945 年时期：概况的分析

在考察战后时期北欧共产党和国内具体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

① 罗德：《丹麦共产党》，第 20—22 页。

② 斯帕林：《瑞典共产党》，第 80—82 页。

③ 《1969 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特别见第 429—430 页。

之前，暂时停下来先谈一谈从1917年到1945年间总的得失情况，似乎是可取的。譬如说，在这些年份里，各党是否存在政治上可以利用的机会？这些党有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机会？如果没有，原因何在？

国际共产主义号召建立一个兄弟般团结的与和平的新世界，这个旧世界在以往十年里出了严重的乱子，现在它提出可以替代的社会政治制度，至少具有极大的成功因素。加之这个主义的革命对那些嫌恶现存制度而又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它的人，有潜在的吸引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下层的中等阶级经济上的生存能力，迫使许多人变成游民无产阶级分子，使他们容易接受激进政治纲领的影响。当三十年代初大萧条袭击欧洲的时候，几百万失业和无家可归的平民为群众革命运动增添了生力军。

那末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者为何不能利用此种大好机会呢？有许多不同的理由。首先，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缺陷甚多，还没有堕入革命前混乱的地步。旧制度的政界头面人物成功地使三个国家都置身于第一次大战之外，战后几年里明智的社会立法有助于减轻蹂躏中欧和西欧的世界性萧条的社会经济影响。所有三国都有基本民主的政治修养，有深厚的分享民主制的传统。几百年来的文化和历史传统重视个人主义不重视集体主义，对许多人说来，共产主义对阶级团结的极端强调，尤其是对无产阶级团结的强调，与新从农业社会经济地位脱胎出来的社会，似乎有点格格不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神论对以路德教义为强大文化和宗教力量的社会里的许多人，是不相容的。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基本上合乎礼仪的心理，因此，政治难以发挥使一方得利而另一方受害的作用。所有这些因素无疑使列宁的政治理论在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群众中受到孤立。



第二个主要阻力是在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之前已经有了很好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在这一点上规模庞大的丹麦、挪威和瑞典社会民主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三个党表现出许多共产主义者所没有的优点，包括社会不必经过流血革命可以用和平方法改变的信念。（流血革命似乎是可笑地为其他不够文明的人民所保留）。此外，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是民族主义者，虽然口头上常常强调国际主义。他们政纲的这一方面使他们能够着手解决每个工人十分紧迫的具体问题。丹麦社会民主党、挪威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有足够的组织上的灵活性，允许各地区的政治组织有相当的自治权，这点对于怀有地方主义精神和骄傲的居民群众来说特别重要。把信仰宗教作为个人私事，这样，一个信教的无产者可以心安理得地参加左派政党，或者投左派的票。最后，三个社会民主党，尤其是挪威工党（在三十年代前它实际上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民主组织）内的明显的激进主义因素使它们对斯堪的纳维亚真正激进的群众具有号召力。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令人困惑的一些方面，尤其在1923—1924年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一起实行令人吃惊的策略变化以后，使这些党的形象堕落为受外国主人牵线跳舞的木偶。俄罗斯的遥控，认为苏联落后和具有异己文化的普遍概念，三十年代斯大林政权的暴行，都阻碍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和竞选的成功。虽然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在俄国革命前已经盛行于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但是它主要是以相同的历史、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国家里的一些团体为基础。等到人们知道国际主义在1917年后的世界已是苏联囊中物之后，着迷于这个理想的浪漫主义热情衰退了，只有真正的信徒作为克里姆林宫的追随者还保留着。

上述种种主要障碍只有在1941—1945年期间才第一次至少

是暂时不起作用。在这段时间里当地的共产党人成为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外国占领的共同斗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精力,遭受重大的伤亡。在丹麦和挪威的地下斗争中和在中立瑞典的广泛反法西斯阵线里,共产党都愿意与其他政治团体合作。国际共产主义老师苏联,那时候是反纳粹联盟的一个领导力量。当然,没有东线巨大的作战努力,也许不可能打败纳粹德国。自从俄国革命后,这时第一次不把苏联看成要毁灭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欧洲社会的异己力量,而把它看成是使它们得救的一个主要力量。大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舆论被浪漫主义的亲苏主义冲昏头脑,这种现象大大加强当地共产主义者的号召力。

冰岛共产党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伙伴比较起来,在1930—1945时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冰岛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避免了象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那样在国内环境中遭受孤立,而且在其他西欧共产党很少具有影响的时候,它成功地在一相当长的时间中保持着政府的席位。同样,它在冰岛的工会里占有优势,获得使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人看了眼红的成功。

此种成功的来源是左派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同孤立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度独创的结合的结果,此种独创的结合成为这些年来冰岛党政策的特征。当与莫斯科的联合使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党与它们各自的具体环境和群众隔绝开来的时候,冰岛就是因为地域上相隔遥远,共产党在执行政策时不受“外国”因素的干扰。与其他西欧党的领导人不同,西欧党领导人受莫斯科煽动不断进行宗派斗争,直到只留下最驯服的同路人为止。冰岛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民族任务,在他们看来,这个任务需要左派广泛的联合。他们这样做,也许在意识形态上不够严格,但是他们兼收并蓄的能力是优越的。

## 民族主义和国际团结(1945—1960)

当北欧四党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全都觉得前途乐观。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在选举中的成功，显著地说明它们在全国选民中威望的巨大增长。在丹麦，共产党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得到选票 12.4%；在挪威，共产党得票 12%。两党都参加从解放到第一次普选时期两国成立的第一届民族联合过渡政府。在瑞典，共产党在 1944 年战事刚结束时的选举中得票 10.8%。在三国工人运动的许多群众组织中共产党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共产党人在地下斗争中建立功绩的声誉，远远超过丹麦和挪威共产党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范围。历史上第一次，这三个党在各自的社会享有重大权力的真正机会。上面提过，冰岛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参加 1944 年独立后建立的第一届联合政府，在战争结束后两年里它继续留在政府里。

但是正在普遍成功的高峰时，北欧党，特别是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遭遇痛苦的两难的困境。斯堪的纳维亚三党的成功，是由于在战时执行坚决的民族主义政策，和苏联在东线的军事胜利；现在就是这个胜利使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处于优势地位，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行施苏联共产党的霸权。这样，压倒一切的苏联国家势力和重建与莫斯科原有仆从关系的幽灵，又复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人和其他党的头上。总之，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现在不得不在“民族道路”与国际团结之间，以及在具有广泛基础的较灵活政策为一方与意识形态一致性为另一方之间作出选择。

在所有三个党里，战时执行的民族主义政策引起党内正统分子的反，这些人害怕与非共产主义力量过分合作，会发生危险的意识形态腐蚀。在 1945 年和 1946 年期间，当时为与社会民主党

人紧密合作，进行认真谈判时，此种恐惧在所有三党中都占优势，先前关于工人阶级团结的乐观情绪一下子成为左派政治团体里痛苦的混战。共产党人不打算放弃组织基础，希望联合的办法基本上是个松弛的党团联盟，联盟里他们能够保持独立自主，甚至对社会民主党人搞统一战线的策略。后者反对这种态度，严厉地谴责丹麦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早先在国内与纳粹和卖国贼相勾结。

到1946年后期，清楚地看得出，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政治局面又回到人们熟悉的战前的模式，不会有工人阶级的联合了。<sup>①</sup>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走上日益孤立的道路，同时毫不动摇地效忠于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个人。1947年年中以后，此种倾向更加明显，当时安德烈·日丹诺夫宣布国际关系中两个阵营的观点和成立共产国际。西欧共产党现在用越来越多的力量向社会民主党人作政治上的攻击和反对建立新的西方防御组织。在所有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共产党和它们的决策机构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并千方百计破坏后者在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占优势的影响。<sup>②</sup>丹麦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试图先发制人，阻挠新的集体安全安排的出现，积极带头参加这个时候建立的许多和平组织。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后，共产党人还发动各种各样的运动，企图重建丹麦和挪威外交上的中立。在瑞典，重点放在维护已经存在的中立，阻止美国在欧洲增加势力。

这种政策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到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为止，三个共产党不论在地方性还是全国性选举中，一再遭受失败。到五十年代中期，它们降低为三十年代那样左翼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政治派别。丹麦1954年的地方选举共产党得票低到3.4%。

---

① 例如，见《1946年挪威共产党代表大会声明》，载于《自由报》（奥斯陆），1946年6月8日。

② 例如，见《自由报》，1947年8月23日。

1957年议会选举数字更下降为3.1%，到1960年的议会选举只有1.7%。挪威党的衰落从1947年已经开始，当时它在地方选举中得票9.8%。1949年，战后第二次议会选举，得票数下降到5.8%，1953年进一步低落到5.1%。瑞典共产党在1946年第二届议会以前历次选举成绩不错，可是立刻就遭到与斯堪的纳维亚兄弟党同样的命运；到1952年全国选举中，它只能得到4.3%的选票。<sup>①</sup>

斯堪的纳维亚党在国内遭遇到的这些巨大难题，由于难以应付苏联共产党全面控制国际共运而更加复杂化。1947—1948年后苏共发起在所有欧洲共产党中清洗“国内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铁托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丹麦、挪威和瑞典三党领导阶层发生重要的变动。挪威党的变动特别大，功勋卓著的战时地下领袖佩德·富鲁博滕被当作铁托主义者和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而清洗出去。三十年代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挪共领导人的埃米尔·勒夫利恩现在再次出任大家同意的党的首领。在瑞典，1953年斯文·林德罗特下台，由希尔丁·哈格贝格取代。从三十年代前期起就领导丹麦党的阿克塞尔·拉森虽然还保持着职位，但是在丹共全国领导机构下一级有很多人被撤换，在地方基层一级也有许多人事调整。<sup>②</sup>

虽然清洗以及意识形态和组织路线的僵硬政策，使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在各自当地社会的地位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但是这些新上任的斯大林主义党的领导人确实保证完全符合莫斯科的政策和愿望，从而他们只对他们认为值得的唯一赞助人——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保持忠诚。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人责骂社会民主党人在探索“工人阶级团结”方面不愿合作，责骂

<sup>①</sup> 这些统计数字取自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官方的有关年份的统计年鉴。

<sup>②</sup> 罗德：《丹麦共产党》第22—23页。

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责骂重新建设的经济政策，责骂一般的亲西方政策，诋毁这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屈从。相反，他们欢呼苏联的内外政策，把它说成是人类对和平与进步的最大贡献；他们把在东欧建立的人民民主制度说成是解放；并表达他们的一厢情愿的希望：他们的国家很快会走上同样道路。再也不提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纲领宣言。挪威和瑞典共产党却开始再次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丹麦共产党的阿克塞尔·拉森比起挪威和瑞典的斯大林主义者来，在各方面灵活和非教条得多，显然难以接受此种完全从属国外主子的做法，因此，丹麦共产党表现的斯大林主义特色要比两个邻国少得多。但是他的这种政策，在国内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在与莫斯科关系上，由于拉森缺乏完全的“同步性”，给他带来许多难堪。<sup>①</sup>

1953年斯大林之死，使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在内的全部欧洲共产党大为震惊，在一段时期里，以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为一方与以苏联共产党为另一方的关系，维持原来的状态。在斯大林死后一年里，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与欧洲别的共产党竞向去世的领袖歌功颂德，而苏联的至高无上，作为世界其余部分学习的榜样，从来没有被公开怀疑过。

但是，还是存在一种对国内政策和对莫斯科关系重新估价的静悄悄的企图。早在1953年秋天，挪威共产党公布新的党纲，在向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主义表示通常的忠心外，还讨论国内政治形势。丹麦和瑞典党也对党纲作了同样的修正。

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尤其是发生了令人触目的1956年秋天波兰普遍骚动，驱逐斯大林主义领导，以及匈牙利发生革命和随即被苏联占领以后，三党小心翼翼的重新估价的行动便变为质询的洪流和不断增

<sup>①</sup> 拉森最终被逐出丹麦共产党。见罗德：《丹麦共产党》第24—26页。

加的斥责。上述的这些事件引起国际共产主义第一次严重危机，从此未曾恢复过来。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报纸大声要求解释：为什么苏联以外的兄弟党对斯大林时代的活动茫然无知？赫鲁晓夫插叙的那种滔天罪行为何能在苏联社会主义时代发生？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人对入侵匈牙利持严肃的保留态度。从那时起，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民族共产主义”的探索就开始了。<sup>①</sup>

无论如何，对斯大林的揭发和东欧发生的事件，相当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在所有三个党中，许多党员在当地党部前面烧掉他们的党证，或者游行到苏联大使馆表示割断与当地共产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质隶属关系。群众游行示威，要求终止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者在选举中的运气每况愈下。1957年挪威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得票只有3.3%，1960年瑞典党遭受重大挫折，它们在全国选举中只得到4.5%的选票。在丹麦党内，1956年事件直接反应在党的统治集团的最高一级上。阿克塞尔·拉森从来未曾完全同意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和对外屈从，强烈批评苏联占领匈牙利，公开称赞南斯拉夫的道路。结果他在1958年丹麦党代大会上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过后又被开除出党。由克努德·耶斯珀森登上党主席位置，丹麦共产主义至少暂时可靠地被赶回亲莫斯科的屈从的羊栏里。<sup>②</sup>

1956年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三党中都出现巩固的亲苏领导，但是此种表面现象是不真实的。许多人对现行政策提出质问。在挪威，挪威共产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雷达·拉森继续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民族形象的党；在瑞典，党的书记处书记卡尔一亨里克·赫尔曼松成为瑞典党内抱有相同观点的党员的主要发言人。

---

<sup>①</sup> 对于丹麦共产党，例子见雷达·拉森的评论，载于《自由报》，1956年6月22日。

<sup>②</sup> 《1969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第265页。

丹麦共产党把阿克塞尔·拉森同他的追随者赶走和降级以后，再也没有象其他两党那样表示民族主义的热情，相反，它面临分裂和背叛。就是这样，当五十年代行将结束之际，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走上导向六十年代完全不同遭遇的道路。

主要因为冰岛远离欧洲大陆，在战后几年里，虽然苏联加强在欧洲的地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所遇到的困境远比斯堪的纳维亚各党为小；而且，它对付困难的办法也明显地与斯堪的纳维亚党不同。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它保持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在那些年份里拒绝屈从克里姆林宫政治上一致性的要求。它就这样不参加对“铁托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进行的政治迫害。与此同时，冰岛党在政策上一直讲求实用，因此避免犹太教法典式的对异端“主义”的刺耳申斥，这种申斥声响彻哥本哈根、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共产党的大厅。结果是，这个党在冰岛工人运动中保持优势地位，特别在工会中的地位。1947年它退出联合政府以后，在当地选民中依旧有大量的追随者。<sup>①</sup>

由于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从来没有被完全纳入苏联控制的共产党的罗网里，斯大林的死，虽然也震动，但比起其他党在政治上一蹶不振的那种情况，影响要小得多。1956年冰岛共产主义的有利地位非常显著地表现出来，那一年欧洲共产主义普遍经受一连串痛苦的震惊，每一个党在国际运动中的命运急转直下。也是在那一年，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参加左派竞选联盟，叫做人民联盟。（从此这个党改名为人民联盟。）在人民联盟中间高度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成分，保证它在联盟中占有优势地位（虽然共产党人不打算得到这个联盟的最高职位，最高职位由社会民主党人

---

<sup>①</sup> 这种情况反映在1963年和1967年全国选举之中，当时冰岛共产党分别获得全部选票的14.2%和15.7%，与五十年代选举情况相同。



汉尼巴尔·瓦尔迪马尔松担任)；而1956年人民联盟竞选的成功被认为主要是共产党的胜利。在选举以后一段时间里，人民联盟参加联合政府，一直到1958年，在它的政策里带有相当程度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的影响。<sup>①</sup>

当大多数别的欧洲共产党正处在因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暴动引起的选择“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同的民族道路”，还是“国际团结一致”这个问题上极度痛苦的时候，冰岛同志以直接参加联合政府的行动，公开选择前者。同样，冰岛共产党人首先关心国家经济发展，关心在捕鱼权上与英国的争执，关心岛上美国驻军问题和冰岛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在苏联1957年到1959和1960年时非常明显地发狂似地努力重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时，这件事却奇怪地似乎对它毫不相干。总而言之，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困难时间里，雷克雅未克的同志却成功地坚持着民族主义的立场。<sup>②</sup>

但是，应该看到，人民联盟虽然在国内政治环境中取得成功，但是它在成立以后，确实碰到相当大的内部困难。以往要使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相当正统共产党人的关系保持下去，这本来就是很棘手的问题，现在有了正式联合，更加剧了困难程度。汉尼巴尔·瓦尔迪马尔松1956年辞去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职务，担任人民联盟的首领，他眼看共产党人不断企图增加联盟中的影响，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努力在联盟中实行某种独立自主的政策，结果引起相当多的不满。在人民联盟中的联合人民党—社会主义党成员企图攫取对联盟的完全控制权失败后，他们甚至纷纷议论，需要在不同的更合适的意识形态基础上重建人民联盟。这种变动在六

---

① 《1970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斯坦福德1971年，第202—204页。

② 国家与冰岛共产党关系的一个例子，见《人民意志报》，雷克雅未克，党的主要机关报。

十年代真的终于发生,但是那时之前,联盟抱成一团,在冰岛政治中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sup>①</sup>

### 左派的分裂,1960—1977

回顾以往,1960年似乎把北欧共产党引入历史的新阶段。六十年代里,国际共产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根本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使西欧共产党人也许已经察觉到的参加国际间政治运动的好处缩小或消失,而许多西欧国家内的情况却对各种形式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发展有想象不到的有利条件。在每一个西欧共产党争着利用这些条件的同时,各国间的差别则越来越明显。到七十年代后期,如果有人想对这个地区的非执政共产党以共同类型分类,那末他的试图肯定是要失败的。西欧共产主义的学者,由于不必再对它们分门别类,更便于他们论述世界上这个地区共产党所经历过的主要发展趋势。对斯堪的纳维亚三个党来说,这些主要趋向十分相似,尽管它们得到的结果相当不同。另一方面,冰岛的共产党人遭遇的经历和制订的政策,不能作同样的趋向分析。因此冰岛必须作为特殊事例来讨论。

在最近十七年里发生的、影响国际共产主义的许多令人瞩目的事件中,没有一件比中苏冲突所起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前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总是围绕着走民族道路还是献身于莫斯科这个问题,可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苏联人和中国人之间针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国际的团结一致、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可取模式以及共产主义中心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争论。所有共产主义者对超国家团结的忠诚,在这段时间遭受到严重的

---

<sup>①</sup> 组织方面的变化发生在1968年最后几个月,见《人民意志报》1968年11月5—12日。

也许不能恢复的破坏。不但莫斯科失去共运中无可怀疑的领袖地位,而且许多人反对共产主义有领导中心的思想。多中心论、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道路和欧洲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全都成为西欧和其他地方熟悉的概念,表明共产主义者政治斗争现在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战略和战术。因为中国人对莫斯科牌共产主义的挑战也属于意识形态性质,中苏争论时期引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前所未有的议论。所有这些使左派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更加繁多,对选民和分析家来说,这些现象使西欧左派运动的政治景象变得非常的复杂,甚至达到混乱的程度。

在这种组织和思想的一片混乱中,无论如何,人们能够看清两种趋势。一个可说成是左派的分裂,另一个可以说是亲苏阵营的瓦解。

就第一项说,丹麦呈现出最混乱的局面。1964年,两个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戈特弗雷德·阿佩尔和贝尼托·斯科科萨——组成亲中国团体,叫做共产主义劳动小组。1967年这个团体分裂,当时斯科科萨参加一个新的左翼党叫左派社会主义者。1968年秋天这个党又告分裂,出现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叫做共产主义联盟(马列)。1968年又成立一个新的丹麦左派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个青年组织成立后第二年,又出现另一个组织,叫共产主义青年(马列)。1969年,丹麦左派社会主义者把它所属的一个青年组织开除出去,这个组织建成社会主义青年团,隶属于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最后,在同一年里,一个小小的托洛茨基团体组成革命社会主义者,并立即参加了第四国际。<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下列出版物:《国土与人民报》(丹麦共产党日报)、《前进周刊》(丹麦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方针》(丹麦共产主义劳动小组)、《共产党人》(瑞典马列主义革命者共产主义联盟)、《青年共产主义者》(丹麦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其他小册子。以上定期报刊均为哥本哈根出版。

在挪威,情况也差不多一样复杂。<sup>①</sup>1967年,挪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一部分人,分裂出去,另组共产主义青年,站在挪威共产党亲苏派一方。第二年,社会主义人民党的青年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与母党决裂,采取毛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个青年组织叫社会主义青年团。挪威共产主义青年和挪威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69年和1970年期间在执行诸如工人参加企业决策工作这类纲领时配合得很好。挪威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69年独自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党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列)。当时还成立了“马列学习小组”,看起来这个团体集合了许多党派和组织的革命分子,甚至还包括不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人,“马列学习小组”以后正式成了一个政治团体。1970年挪威共产党内还分裂出一批政见不同的人,组成“挪威共产党马列战线”。

1973年,由于一个名叫工人共产党—马列的新党的成立,引起挪威共产党中许多左派团体的重新合并。这个新党在全国大学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强大的力量。

瑞典的左派也经历左翼分子分裂和宗派主义的痛苦。<sup>②</sup>例如瑞典共产党内的亲中国的不同政见者,早在五十年代就成立共产主义工人联盟。六十年代又成立毛主义的共产主义联盟(马列)。这个组织在1970年分裂,当时有个领导人因滥用基金被开除,这个人在极大部分原有成员的支持下,建立KFML(r),这是马列主义革命者共产主义联盟这一名称的缩略字,后边加上一个(r),表示新党的革命献身精神。1973年马列主义革命者共产主义联盟

---

① 摘自下列出版物:《自由报》(挪威共产党周刊)、《方针》(人民社会党)、《工人日报》(挪威工党报)、《阶级斗争》(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前进周刊》(瑞典共产主义青年)以及其它小册子。以上定期报刊均为奥斯陆出版。

② 摘自下列出版物:《新日报》(瑞典左翼共产党双周刊)、《北极光报》(北博顿共产主义日报)、《社会主义论坛》(北博顿理论季刊)、《星火报》(瑞典共产党—斯德哥尔摩),以及其他小册子。

改称为瑞典共产党,接过1967年原共产党改名为左翼党—共产主义者(即瑞典左翼共产党)时所放弃的名称。稍早一些时候,左翼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从党里分裂出去,日益亲近名叫马列主义斗争联盟的亲中国组织。加之,在七十年代,一个存在很久的学生团体瑞典清明联盟越来越有毛主义的倾向。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在各种青年组织中亲瑞典左翼共产党分子,在1973年又自行组成共产主义青年。两个托洛茨基派团体——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小组——也出现了。

直到最近冰岛共产党人才预防建立毛主义的分裂者组织。只是在1972年产生过一个马列主义共产党。这个组织规模极小,对斯堪的纳维亚毛主义团体起不了作用。<sup>①</sup>

1967年冰岛人民联盟内部发生的分裂,对冰岛共产主义影响较大。<sup>②</sup>那一年,汉尼巴尔·瓦尔迪马尔松以个人名义参加议会竞选,来抗议联盟内共产党人控制的政策。第二年,他退出联盟,随后联盟改组为人民联盟党。经过这次变动,共产党人与其他附属团体切断组织上的联系。拉格纳·阿纳尔兹成为重新建立的共产党的首领,但是党内更有势力的人物是吕德维克·约塞夫松和马格尼斯·基亚坦松,这两人在1971—1974年人民联盟参加联合政府时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后将详细谈到)。虽然瓦尔迪马尔松和他个人的追随者分裂出去,但是还算不上是左派本身的分裂,它的确使人民联盟内部的意识形态更加净化和一致,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件事可以断定是人民联盟在政治上向左转的一个行动。尽管此种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净化”,人民联盟仍旧保持民族主义的,重实效的和相当灵活的特性。例如,在约塞夫松和基亚

---

<sup>①</sup> 《萌芽报》(雷克雅未克),1972年8月9日。也可见毛主义的出版刊物《Stettabarattan》,雷克雅未克。

<sup>②</sup> 《人民意志报》,1968年11月5日。

坦松在联合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那些年份里，他们是冰岛民族主义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尤其在关于捕鱼限制区和英国侵犯雷克雅未克划定的冰岛领海地区这种爆炸性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段左派组织上宗派主义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中苏分裂对北欧共产主义所起的削弱作用。国际共产主义对抗中心的存在势将破坏丹麦、挪威共产党、瑞典左翼共产党和冰岛人民联盟代表斯堪的纳维亚唯一真正革命党派的权利。今天，有人大声指责他们仅是“资本主义的走狗”、苏联帝国主义的附庸、脱离政治实际的一群又乏又老的官僚主义领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时代负起领导责任。对于为自己思想意识的正确性洋洋得意的党来说，此种指摘是绝对难以接受的，共产党继续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进行反击。北欧左派的内战没有平息的迹象。

虽然左派的分裂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亲中国的毛主义团体发展起来，但是也有有利于莫斯科的分裂。在共产党领导人拒绝接受克里姆林宫要他们加入由亲苏力量组成的反北京战线的地方，如冰岛、挪威和瑞典就产生这种有利于苏联的分裂。在丹麦，不需要建立支持莫斯科观点的分裂者组织，因为丹麦共产党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牢牢地掌握在坚决亲苏联共产党分子的手中。

在冰岛，人民联盟中共产党人的“非正统”的工作方法，使其中亲苏派在六十年代后期就脱离了党，成立冰岛社会主义者组织。这个组织在整个六十年代势力微弱。<sup>①</sup>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汉尼巴尔主义者”的汉尼巴尔·瓦尔迪马尔松一伙人，在瓦尔迪马尔松领导下成立了自由左翼党，这证明他离开过去与共产主义组织紧密合作已经越来越远了。自由左翼党的政策性质可以从其名称上看得出来，它削弱了人民联盟

---

<sup>①</sup> 例如，《萌芽报》，1970年4月20日。

吸引冰岛政治圈子里左倾分子的机会。<sup>①</sup>

在瑞典,以前主席希尔丁·哈格贝格为首的亲苏力量,很早就控制这个国家的北方,尤其是北博顿,在那里哈格贝格派出版国内唯一的一份共产主义日报。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哈格贝格集团与以 C. V. 赫尔曼松为首的党的领导在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问题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看法上经常发生小冲突,这些纠纷最终在 1977 年春天导致正式分裂,出现一个亲苏的新党。

在挪威,挪威共产党主席雷达·拉森的中间主义政策,在 1967 年受到以前党报《自由》报主编耶根·沃格特为首的亲莫斯科领导人的直接挑战。这种挑战没有成功,拉森谴责这个集团所提出的意见。但是拒绝把他们开除出党。随后这些人退了下來,这个集团威信也随之下降,当时 1975 年,拉森让党讨论关于取消党的组织机构,参加范围更大的左翼政党的建议。就在那个时候,一些较老的坚定的党员站了出来,把拉森轰下了台,阻断了党“滑离”正统的意识形态。拉森和几个追随者也就一个接一个脱党。<sup>②</sup>

毛主义的分裂者集团和亲苏派的出现在一个侧面侵蚀了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的力量,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早期丹麦和挪威左派社会主义党的成立在另一侧面削弱了丹麦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的支持力量。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是由 1959 年曾担任过丹麦共产党领导人的阿克塞尔·拉森组织的;挪威社会主义人民党是在 1961 年由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政见者组织的。虽然这两个社会主义人民党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竞选中的得失相差很大,但是它们在这整个时间里成功地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吸引走了大量的支持者。丹麦和挪威共产党人对待社会主义人民党时而采取公开

---

① 1974 年选举,自由左翼党只获得全部选票 4.3%。

② 关于这个问题见《工人日报》,1975 年 11 月 1—3 日;也可见佩尔·埃伊尔·黑盖:《分裂的挪威阵线》,载于《共产主义问题》,1976 年 5—6 月号,第 49—59 页。

的敌对态度，时而使用谨慎的合作手段。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丹麦和挪威共产党觉得从合作中得不到应该得到的好处，最后这两对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保持互不相关的态度。

消除共产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隔膜的最有创造性的努力也许是七十年代初期在挪威所做的事情。在1973年议会选举前，挪威共产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以及挪威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结成竞选联盟，后者是因为抗议党的领导亲共同市场政策而退出来的。这个联盟叫做社会主义竞选联盟，得到议会中十六个席位，其中一席是挪共主席雷达·拉森。1973年竞选的成功，使在竞选联盟中的社会主义人民党成员开始要求联盟内各党实行组织上的合并，而且，使人惊异的是，在拉森领导下的共产党领导机构表示他们愿意这样办。从1974年到1975年初，拉森的态度引起党内大量的尖锐争论。许多人认为只有左派组织上的合并才是避免有成功希望的社会主义竞选联盟瓦解和失去影响的唯一有意义的办法，然而另外一些人根本反对撤销挪共的组织。结果，如上所述，后一派得到胜利，在1975年挪共党代会上，雷达·拉森失去党的领导地位，由马廷·贡纳·克努德森继任。社会主义竞选联盟投票决定开除挪共，以后雷达·拉森退出挪共，成为这个缩小了的联盟的领导人之一。虽然挪共向社会主义竞选联盟在关于竞选和政策方面的合作作过很含糊的允诺，但是在可否与社会主义竞选联盟合并问题的争论上，产生了极大的痛苦，<sup>①</sup>这次争吵中所受的创伤不是很快能够治愈的。

挪共面对着与社会主义竞选联盟的关系问题，在过去两三年中越来越感到痛苦。社会主义竞选联盟在1973年竞选中包括挪共在内，1975年挪共脱离后重建了这个组织。这个新的社会主义

---

<sup>①</sup> 例如见黑盖：《分裂的挪威阵线》，以及1975年11月载于《自由报》、《方针》和《工人日报》的文章。



竞选联盟参加新近(1977年9月12日)的议会竞选,结果完全失败。它只得到总选票的4.1%,而在1973年“老”社会主义竞选联盟,得票11.2%。挪共几乎衰落到濒临消失的地步,它得到的选票只有0.4%,还比不上得票0.6%的红色竞选联盟。挪威左派遭受损失,显然社会民主党人(挪威工党)拣到便宜,它得票比例从1973年的35.2%,上升为1977年的42.4%。<sup>①</sup>

以上的讨论清楚地说明,由于长期宗派主义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加剧了组织问题上的困难,它仍旧折磨着北欧,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左派。造成分裂的问题可以分作下面几方面: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多中心主义问题;中苏争端;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问题;以及与非共产主义的国内环境的关系。因为北欧共产党在这几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有助于解释它们在晚近这段时间内的成功与失败,并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决定它们未来前途,所以它们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值得仔细加以探讨。

## 国际问题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历来是,在于存在一个世界共产主义中心呢,还是有几个中心,或是有许多国家的不同的共产主义。上面提到的许多毛主义团体是从母党分裂出来的,因为它们的党员认为党的政策过分屈从于苏联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的内外政策。同样,在冰岛人民联盟、挪共和瑞典左翼共产党中的亲莫斯科派不满意党对苏联忠诚不足的做法。可是,极大多数母党的党员留在正式的党组织里,支持各自领导的国际政策。

但是这些政策相当不同。在克努德·耶斯珀森领导下的丹共,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一直保持对苏共的坚决支持,甚

<sup>①</sup> 选举结果可以见《工人日报》,1977年9月13—15日。

至在苏军入侵捷克之后也不动摇，这种态度至少在短期内使丹麦左派在全国大选中遭受惨败。在几经犹豫和多次磋商以后，耶斯珀森接受苏联的解释：因为社会主义在捷克受直接威胁，所以干预是必要的。丹共还支持苏共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忠实地跟着苏共多次提出召开一次国际共产党会议。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偏离正统”的做法，与苏联抱同样的态度。总之，在北欧诸国中，丹共是莫斯科最正统最忠实的支持者。<sup>①</sup>

别的重要的共产党可没有表示如此忠诚顺从的作风。冰岛党传统地保持孤立主义态度，与世界运动的主流很少接触。可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冰岛人民联盟不断地提出反对运动分裂的意见，对于大国企图控制小党的趋势表示严正的保留态度。例如苏联入侵捷克引起冰岛大量严肃的谴责，人民联盟甚至威胁要开除坚持与“占领国家”和它的官方党组织发生关系的党员。<sup>②</sup>从那时候起，人民联盟一直坚持这种极端的立场。的确，冰岛共产党人仅仅偶而派观察员参加别的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和地区性会议。任何时候人民联盟领导评论国际事务，总是援引它们认为正确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党的观点。冰岛人保持这种立场，拒绝在中苏纷争中和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站在任何一方，只是重申每一个党都应该有自己的政策立场。<sup>③</sup>

挪威共产党和瑞典左翼共产党同样拒绝在中苏纷争中站在任何一方，强调国家共产主义，强调灵活性的必要性和政纲必须适合国内具体情况。在瑞典，左翼共产党试图以强调国内政策来利用国内的激进主义，在国际运动方面瑞典人强有力地主张不能有单

---

① 见我的文章《北欧共产主义的范例》，载于《共产主义问题》，1975年5月—6月号，第20—36页。

② 关于禁止同华沙条约国接触的决议的讨论，见《晨报》（雷克雅未克），1968年10月8日。

③ 《新日报》，1968年8月22—26日。

一国际中心和不存在为他人学习的典型。对捷克的人侵是共产党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它激起党的领导人赫尔曼松勃然大怒,他指出人侵是“完全不正义的”,要求瑞典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以示抗议。<sup>①</sup>瑞典左翼共产党领导人还出访西欧党的领导人试图建立谴责这次入侵者的“联合战线”。此种政策引起左翼共产党内剧烈的思想斗争,斗争结果,以希尔丁·哈格贝格为首的亲苏派分裂出去,在1977年春季另组新党。

挪共在拉森领导时期(1965—1975)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与瑞典党同样的立场。拉森也用强硬的语言谴责对捷克的人侵,以后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攻击。在他担任党主席十年里,这位一度曾是《自由报》的主编继续强调国家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着重指出中苏纷争造成了世界左派和进步力量的不必要的分裂,并主张扩大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党的联系。他几次公开访问中国,在六十年代后期击退一次亲苏派的挑战。七十年代,他的所谓在国际共产主义方面的“中间主义”政策,受毛主义派一再的攻击,这批人最终分裂出去,建立新的挪威左翼的团体和党派。

虽然拉森在1975年失去主席职务,可是他之所以被罢免,并不是由于党在国际共产主义的立场,而是国内问题和组织问题长期争论的结果。至于国际问题,挪共继续拉森的政策,虽然过去的领导人已经不在。<sup>②</sup>

挪威和瑞典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态度与挪共和瑞典左翼共产党对主要共产主义大国的国家政策的看法密切相关。在这个大家关心的事情上,两党当然强调每个国家有决定自己外交政策的必要性。因此,它们狠狠地谴责苏联在捷克的行动。同样,两党都

<sup>①</sup> 瑞典左翼共产党的答复,见亲苏的《北极光报》,1973年6月29日和8月31日。

<sup>②</sup> 1975年11月挪威共产党代表大会决议,似乎指出了这种连续性。见《自由报》,1975年11月上半月。

强调,欧洲各国不管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都应根据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迎合“大国沙文主义”,来制订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的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显然很接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sup>①</sup>

尽管挪威和瑞典共产党人对苏联的帝国主义倾向偶而严加责备,但是,似乎存在支持苏联外交政策的不能再减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个限度,两党就不能或不愿干了。因而,它们有时要谈谈苏联的“进步政策”和加强和平的努力。此外,两党和它们重要机关报上总的语调,保持小心的亲苏口吻。此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称赞的态度,特别在七十年代前期,赫尔曼松对瑞典北博顿地方党里的“斯大林分子”努力实行某种的和解,拉森和许多向他在挪威党领导地位挑战的毛主义分子战斗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

由于冰岛党在所有重要外交政策问题上传统性地强调民族主义和中立,所以在人民联盟的出版物上看不到挪威和瑞典共产党报上明显存在的国家外交政策上小心的亲苏主义,就不足为怪了。相反,它的报纸强调冰岛党反对美国在冰岛和欧洲的势力,坚决支持冰岛的民族主义和中立地位。<sup>②</sup>

可以断定,丹麦共产党人比其他重要的北欧共产党更加热烈支持苏联外交政策。丹麦共产党报纸不但习惯地摘引《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而且即使在评论苏联国内发展情况时,总是极口称赞。因此,丹共完全属于对苏联不加批评的赞美者阵营。<sup>③</sup>

虽然北欧共产党对待国际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观点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它们对“主要敌人”和怎样对付那些敌人的理解上,人们就察觉不到有什么差异了。四个党一样反对“美帝国主义”,反

① 这一判断是依据对《自由报》和《新日报》的密切的考察作出来的。

② 例如,见《人民意志报》,1973年4月29日和6月14日。

③ 例如,见耶斯珀森在1973年丹麦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评论,载于《国土与人民报》,1973年3月3—4日。

对“资本主义”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军事系统，如北大西洋组织，还一样反对把四个国家拉入西方合作事业的任何企图。根据同样理由，它们全部支持各式各样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第三世界反西方——特别是反美国——的感情，支持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进步”政治力量。

在丹麦、挪威和冰岛，共产党人反对美国势力的斗争，成为持久的反对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运动。在丹麦和挪威，这个运动由于个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所执行的政策不为斯堪的纳维亚大多数人民喜欢时，进行得尤其激烈。也许这种政策的最好例子是美国卷入越南，和希腊在 1967—1974 年独裁的“上校政权”对反对派的镇压。西班牙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可能性又惹起另一次反对参加这个联盟的嘲笑性的呼喊；在西班牙，对纳粹占领的长期回忆和对佛朗哥政权的继续憎恶，造成对此种事态发展的普遍反感，这一点至今未变。1974 年葡萄牙革命以后，丹麦和挪威共产党人积极支持葡萄牙共产党，指责北约和美国逐步消灭葡共在这个国家内的势力的卑鄙行为。<sup>①</sup>但是迄今，丹共和挪共要它们国家退出北约，但重新恢复中立的运动没有成功。两国有许多同意继续留在北约的人，而且这种舆论在不久将来似乎还要占优势，因而进一步反北约的努力难望有什么结果。

冰岛形势大不相同。冰岛参加北约引起许多人不满意，一个原因是大批美国人从凯夫拉维克航空基地纷至沓来；另一个原因是冰岛与另一个北约成员国英国在捕鱼权和扩大冰岛领海以保护其极为重要的渔业问题存在长期争论。这样，人民联盟把参加北约问题设法与真正民族主义的要求和极为关键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因此发动一次有效的运动。运动的结果，使冰岛与美国在七十年代重新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美国作了一些让步，但仍保留空军

<sup>①</sup> 例如，见《自由报》，1974 年 5 月 6—11 日。

基地),同时与英国进行鳕鱼战,由此使这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sup>①</sup>虽然如此,冰岛依旧留在北约组织里,尽管有许多要它退出这个组织的威胁,看起来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实现。

瑞典左翼共产党没有提出关于参加地域防御组织问题,因为瑞典是中立国,与北约并不保持特殊关系。因此,瑞典共产党人集中鼓吹继续中立,与此同时,还指责瑞典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站在一条线上的伪装中立国。<sup>②</sup>可是,总而言之,这种指责难以在瑞典捞到许多政治资本。

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为重要的地域经济组织(潜在的政治组织),给北欧共产党人造成七十年代可充分利用的政治问题。在这些年代里,丹麦和挪威政府申请参加经济共同体,而冰岛和瑞典意图与共同体谈判缔结特别贸易协定。这四个国家的共产党一致反对参加共同市场或与地域组织发生任何联系。四党异口同声把共同市场说成是大国控制的超资本主义组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特别是丹麦和挪威把西德看成可怕的怪物),相继声明,参加其组织或发生其他联系将破坏民族文化的继续存在。而且坚持说,参加欧洲共同体将损害所有工资收入者、渔民、农民和小企业家的利益。最后,还时常提出意见,认为北欧人民不应与民主基础薄弱的国家直接发生联系(意指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地中海国家人民)。<sup>③</sup>

参加共同市场或与它发生关系足以把和共产党组织并无直接关系的大量的个人会合在一起。牵连在一起的有重要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还有民族沙文主义分子;加之,那些与左翼政界没有正式关系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利益攸关。也有可能认为参加共

<sup>①</sup> 在与英国开展“鳕鱼战”的几个最激烈阶段,《人民意志报》要求发动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得到其他党派的大力支持。见《人民意志报》1973年5月22日。

<sup>②</sup> 例如,见《北极光报》,1979年9月18日。

<sup>③</sup> 引自丹麦共产党的《国土与人民》和挪威共产党的《自由报》,1972年上半年。

同市场会受到重新强大起来的德国过多的影响。就美国暗中支持这个组织的扩大而言,北欧人民相当浓厚的反美主义,这次又有可能再度抬头(这个问题待以后讨论)。

结果是,丹麦、冰岛和瑞典的运动都未成功。丹麦成为共同市场正式会员,另外两国与它谈成某些贸易协定。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使三个党的号召力扩大到它们原来的政治界限以外,而这种好处对于三党获得群众支持方面仍旧有相当的重要性。

挪威反共同市场运动最为成功。那里,特殊的条件使这场运动成为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最令人注意的政治事件。<sup>①</sup>由于挪威经济条件与众不同,使许许多多挪威人觉得参加共同市场将有损他们的经济生活;大多数农民、沿海地区渔民和许多小工商业者都持有这种看法。因为思想上的疏远和文化上的隔阂,挪威工人阶级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工会会员,也反对加入共同市场。相反,较大的实业家、银行股权持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上层领导以及保守党人始终主张参加共同市场。

这样,反对参加共同市场的联盟成员包括各种不同政治成分,从坚定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农民,与一部分城市和乡村的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者、毛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极左翼;它还包括挪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相当一部分人。挪威共产党在这个联盟中即使不是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一分子,在运动中它着意制定一个民族主义的、甚至带有一定程度沙文主义的纲领。就是这个问题向挪威公众证明,挪共不是外国的走狗,却是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民族利益的坚定的保护者。

反共同体的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一次“征求意见”的公民投票,把这个问题诉诸民意,结果以 55% 对 45% 之差否决参加

---

<sup>①</sup> 《工人日报》,1973年9月12—13日,讨论反对欧洲共同体运动对1973年全国选举的影响。

共同体的意见。挪共欢呼这次结果是公众对它的政策的赞同，满怀信心地预测它的国内政策将有无限前途。<sup>①</sup>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反共同市场联盟的成功是因为联盟得到非社会主义分子的支持，这些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他们与挪共或其他左派分子，除了共同市场问题以外，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一旦这个问题得到使他们满意的解决，挪共似乎肯定要受到再次的相对孤立。

人民群众在挪威参加共同市场问题上很激动，这似乎对选民至少产生暂时的影响，就是说促使舆论向左摆动。这一点在1973年议会选举中左派竞选联盟取得相当成功足以为证。加之，许多工会会员在共同市场问题上反对工会组织领导阶层，为共产党渗入工人运动造成进一步的可能性。此种状况发展的长期作用究竟如何，尚难分晓。

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卷入越南，这个问题为所有共产党人提供扩充其政治影响的、达到寻常左翼圈子以外的现成良机。美国的卷入越南遭到大部分北欧（可以说全欧）舆论的严厉谴责。这个问题又产生潜在群众运动的大部分必要条件。它使公众对美国产生愤怒情绪，不满美国以世界大国的力量反对小小的似乎是真正的解放运动。此外，公众对行踪飘忽的北越丛林战士和他们挫败美国人巨大攻击力量的能力，有许多罗曼蒂克的想法。

北欧共产党人，尤其是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党人带头发动并积极参加无数次广泛的反美“越南运动”，他们企图利用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越南运动的成就比起挪威不参加共同市场的运动来，其效果相差颇远。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各主要共产党在六

---

<sup>①</sup> 这个观点在挪共发动的为1973年全国选举所进行的竞选运动中有明确的表示。



十年代蓬勃兴起的“越南运动”中,进行强烈的竞争。左边是毛主义团体,他们非常活跃,设法取得许多群众组织的重要职位。右边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对这问题有强烈兴趣,控制了相当数量的跨党团体和行动委员会。因为六十年代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党在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掌权,它们比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组织能使越南委员会具有更大的影响。结果,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又一次处于孤立境地,左派批评它对美帝国主义缺乏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右边,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把它们强行撵出各种组织的重要职位。

### 国内环境问题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北欧共产党在一些战略和战术的特定问题上作出根本性的决定。怎样取得政权?通过“群众行动”还是通过选举胜利?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共产党与其他政治组织间应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与它们合作呢?还是排斥它们?倘若要合作,应采取何种方式?上层行动一致的统一战线?还是基层行动一致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对非共产主义左派应采取怎样态度?敌视呢还是合作?要是采取合作,应该是何种形式的合作?以一件件事情为基础的协议呢?还是更正式的安排,包括组织合并在内?共产党如何对待民族文化?如同共产主义国际制度的遵守纪律的成员那样抛弃它呢?还是象努力维护文化遗产中“进步”因素的民族政党那样保卫它?

四个党中每个党都明确地选择遵循“民族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政党的地位。每个党都主动地参加全国、地区和当地的选举,在竞选中,试图使用民主政治程序,为它们的详细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纲领谋取最大的好处。与此同时,四党都成为民族主义的、北欧合作和超然于欧洲政治体系以外的重要发言人,

这一点在反北约和反共同市场的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清楚。<sup>①</sup> 民族发展的历程、民主的传统和个人的权利和冰天雪地北方四个小国在政治上和社会经济上值得骄傲的成就，也是十八年来共产党政治纲领突出宣扬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在某些情况下曾与保守力量（如挪威在反共同市场运动时）进行政治合作，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发动种种反对丹麦和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人民党，试图证明它们和极左派同样革命。在日常政治中，丹共、挪共、瑞典左翼共产党和冰岛人民联盟强调必须消除跨国公司对本国经济的“压制”，实施更加“公平”的税制，增加工人参加企业的决策，发起旨在加强对大工厂、大银行实行国有化的计划。在象扩大冰岛和挪威领海范围这种最使人激动的问题上，冰岛人民联盟和挪共（还有挪威左翼竞选联盟）都赞成扩大领海范围，认为这是完全符合“民族利益”的，所以获得广大公众的支持。在关于政府控制北海油田的勘探和开发的争论中，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一般民族主义的主张时，挪共也显出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总而言之，这四个党提出十分近似的政策，其目的在取得具有民族责任心的新形象。<sup>②</sup>

北欧共产党人最大的问题是本国政界内左派的政治组织太多。在这个问题上四党的态度又一次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四党几乎同样抵制那些左派分裂团体，称它们为“沙箱激进分子”、“极端分子”或“左倾幼稚病”患者。因为大部分左倾分子组织申斥本国共产党是“国家资本主义者”或“苏联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共产党也只能以同样的手段回敬，其结果一般说来形成左派之间相互的诅咒，此种对骂只能使人们把左派看成不负责任的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但是，如上边已着重指出，冰岛共

<sup>①</sup> 例如，见挪威共产党五月宣言，载于《自由报》，1971年5月1—7日。

<sup>②</sup> 这一点挪共在1971和1972年反共同市场运动中，也许表现得最为有力。

共产党人直到最近才受到左倾分子重大的攻击，在那里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出现谩骂的形式。无论如何，这种意识形态的攻击和反击，在传统上讲求实际的北欧政治体系中显示出异常的不实事求是。

虽然北欧共产党对付左派的挑战，反应十分一致，但是它们在回答由强大的政党和组织造成的与它们眼前利益有关的问题时，却互不相同。在瑞典，1970—1976年间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稍有下降，要保持继续组阁必需共产党的支持，因之在这段期间为瑞典左翼共产党提供施展权力政治的机会。这样使瑞典党能够在原来的公众支持范围以外，顺利地扩充它的政治影响。但是社会民主党在1976年议会选举中败给中右联盟，使局势骤然变化，而1977年春季瑞典左翼共产党的分裂，引起人们严重怀疑：这个削弱了的党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没有能力再次在议会里发挥平衡作用。<sup>①</sup>

在丹麦与挪威，丹共和挪共必须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同时竞争。它们对丹麦和挪威社会主义人民党的成立，最初的反应是排斥：它们认为工人阶级需要团结不要分裂，它们公开申明，它们怕这两个新党虽然在表面上为社会主义奋斗，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左翼”。此种尖刻的词句表明它们臆料社会主义人民党会严重地损害它们的右翼，因而进一步使它们处于孤立的境地。这种臆料以后表明有充分的根据。

但是，一旦丹共和挪共的最初的沮丧消除，它们对社会主义人民党采取比较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丹麦，虽然1968年左派社会主义者的成立更加妨害丹共竞选得票的机会，但是在1973年，丹共与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竞选，它还是获得足够的选票，在议会里占有六个席位，大部分增加的选票是从社会主义人民

---

<sup>①</sup> 非社会主义联合政府在这个时候不很稳固，一次可能的辞职也许会促使社会民主党人再度执政。

党那里争取过来的。挪共虽然常常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意见分歧，还是与它组成选举联盟。就这样，在1971年市级选举时，它们之间存在有限合作，而在1973年议会选举时，两党都参加左派竞选联盟——社会主义竞选联盟——取得了良好结果。上文提到，在整个1974年和1975年，挪共轻率地打算解散本身组织，与社会主义竞选联盟合并。可是1975年党代会决定反对这个行动。随着这个决定的作出，1975年代表会前一直担任挪共领导的雷达·拉森，脱离挪共，成为社会主义竞选联盟的一个领导人。<sup>①</sup>

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大力争取加强它们作为民族的和激进的政党的形象，争取作为一个献身于社会正义、个人权利、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实体。为此目的，它们大量宣传左派团结的必要。但是当能取得团结的机会来到时（如1974年和1975年挪威的情况），它们在最后的决定性的阶段退却了，它们选择继续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虽则这种决定只意味继续处于政治上的孤立。

即使瑞典左翼共产党长期来是斯堪的纳维亚比较“开明”的共产党政策在二十年中取得成功的象征，在这个问题上它也遭到几次挫折。首先，C. H. 赫尔曼松引起北博顿地区党内比较正统一派的愤怒，这使他在七十年代初被迫向这一部分人让步，而此后的政策往往使左翼共产党在吸引瑞典选民的能力上较之以往大为逊色。1975年赫尔曼松下台，由拉斯·韦尔纳继任，但争论越来越激烈。1977年春季，左翼共产党中“民族主义”领导人与北博顿地区“斯大林主义者”间的长期不睦，终于使左翼共产党正式分裂。从这次分裂而产生的新党叫工人共产党，它的首领是罗尔夫·哈耶尔。前共产党领袖希尔丁·哈格贝格对这次强行分裂也起了作

---

<sup>①</sup> 例如，见《国土与人民》，1968年8月21日；《自由报》，1973年3月12—17日。

用,他的儿子哈吕·哈格贝格是唯一的瑞典共产党报纸——《北极光报》的主编。<sup>①</sup>

瑞典共的分裂,几乎完全由于对国际共产主义和与苏共关系的不同意见造成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其分歧可追溯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时候,而目前的破裂正是从那时开始甚嚣尘上的长期斗争的逻辑的结果。分裂使瑞典四个党都自称“真正的共产党人”这样总的说来使瑞典左派运动问题大大恶化。

要衡量瑞典左翼共产党和新成立的工人共产党相对的力量为时尚早。前者无疑控制住原来党员中的大多数,但后者的力量在于其纪律性和地区性的集中支持(北博顿省和哥德堡市),它似乎将在瑞典左派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与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各国共产党不同,冰岛人民联盟在国内左派中享有优势。同时,它表现出能按照广大国民要求制订政策的巨大本领,它不但能与其他左派团体如“汉尼巴尔主义者”合作,而且还能和象进步党人这样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合作。至于政策方面,人民联盟努力争取在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立场极受冰岛人民的欢迎,尤其受到有组织工人阶级的拥护。其他对一般公众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实际主张包括:扩大全体公民(不问政治观点如何)福利国家享受项目的计划;开展保持冰岛文化值得骄傲的传统,不受“美国化”和其他西方流行文化的侵蚀。<sup>②</sup>这些政策,反过来又便于与冰岛政治舞台上较右的力量进行协作。真的,人民联盟从1971年到1974年又一次参加联合政府,由于此种政治协作,冰岛共产党人负有清醒、负责的政治作风的盛誉,此种美誉很少给予它的斯堪的纳维亚同伴们。

---

<sup>①</sup> 根据与瑞典驻华盛顿大使馆马茨·贝尔格屈斯特的讨论,1977年5月各期《北极光报》,实际上天天在讨论这个问题。

<sup>②</sup> 例如,见《人民意志报》,1973年4月29日。

## 影 响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里，北欧共产党组织混乱，一再出现分裂，出现新党，使它们在国内选民中的号召力受到限制，而毛主义分子从左面的挑战，破坏它们称为北欧国家革命力量唯一代表的权利。与此同时，反对党对本国政治情况发表意见的机会却大大增加了。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普遍显露衰老，发生政治生活两极分化的现象（尤其在丹麦、挪威和瑞典），选民中出现日益增长的分裂，并有丢弃旧有的忠于一党的观念，找寻新颖的观点和政策的愿望。更有甚者，目前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对福利国家的总体重新估价，带来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时期，产生一种对攻击现状者有潜在好处的形势。最后，反美主义和对欧洲区域组织（尤其是欧洲共同体）的不信任促成了中立主义，改善对苏联的态度使许多人象在冷战年代那样憎恶苏联。

在此种环境中，北欧共产党人处境如何呢？表 1 和表 2 说明它们在努力争取群众支持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成功。表 1 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丹共、挪共、瑞典左翼共产党和冰岛人民联盟以及它们的北欧左派对手选举中的成绩；表 2 是 1967 年到 1977 年十年来各党党员人数。

如表 1 所示，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共产党尚不能积贮足够的选举力量，因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六十年代大部分时间的瑞典，瑞典左翼共产党当时能为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提供必要程度的支持——有少数党在本国政治环境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此外，各共产党在选举方面的影响，近年来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分裂之故，趋向下坡。有一部分公众把共产党人看作没有希望的分裂者和教条主义者；另外一部分公众对它们组织变化觉得眼花缭乱不知所以。

表 1 北欧左派在议会选举中的选举力量

1944—1976/77 年 (数字为总票数的百分比)

A 丹 麦					
年	社会民主党	共产党	社会主义人民党	左派社会主义者	
1945	32	—	—	—	
1947	40	—	—	—	
1950	39	—	—	—	
1953(4月)	40	—	—	—	
1953(9月)	41	—	—	—	
1957	39.4	3.1	—	—	
1960	42.1	1.1	6.1	—	
1964	41.9	1.2	5.8	—	
1966	38.2	0.8	10.9	—	
1968	34.2	1.0	6.1	—	
1971	37.3	1.4	9.1	—	
1973	25.6	3.6	6.0	—	
1975	29.9	4.2	5.0	2.1	
1977	37.1	3.7	3.9	2.7	

B 挪 威					
年	工 党	共产党	社会主义人民党	社会主义竞选联盟	红色竞选联盟
1945	40.7	11.8	—	—	—
1949	45.4	5.8	—	—	—
1953	46.4	5.1	—	—	—
1957	48.1	3.3	—	—	—
1961	46.5	2.9	2.4	—	—
1965	43.0	1.4	6.0	—	—
1969	46.4	1.0	3.4	—	—
1973	35.2	—	—	11.2	0.04
1977	42.4	0.4	—	4.1	0.6

C 瑞 典				
年	社会民主党	左翼共产党	共产党	马列主义革命者
1944	46.6	10.3	—	—
1948	46.1	6.3	—	—

1952	46.1	4.3	—	—
1956	44.6	5.0	—	—
1960	47.8	4.5	—	—
1964	47.3	5.2	—	—
1968	50.1	3.0	—	—
1970	45.3	4.8	—	—
1973	43.6	5.3	0.4	0.2
1976	42.7	4.8	0.3	—

#### D 冰 岛

年	自由主义者和 左派联盟	社会主义者 组 织	人民联盟	社会民主党
1963	—	—	16.0	14.2
1966	—	—	17.6	15.7
1971	9.0	—	17.1	10.5
1974	4.3	—	18.3	9.3

**资料来源：**各年《丹麦统计年鉴》；各年《挪威统计年鉴》；各年《瑞典统计年鉴》；各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斯坦福德）；《北欧统计年鉴》（斯德哥尔摩 1974 年）。

对照起来，冰岛党显示出它有能力超越狭隘的意识和组织的界限。的确，就是它这种正式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左派力量联盟的形式，证明具有广大的支持基础。人民联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得到全国总选票的 15% 到 20%，它是议会里一个比较大的党派。显然，大部分人认为它是可尊敬的责任心强的党。

党的发言人所宣称的党员人数与外界估计的人数，其间相差很大，可是从表 2 看来，各党人数差距不小。但是无论如何，党员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是很低的。这种情况对强调入党高标准的马列主义思想来说，倒是一致的。当然，全部革命左派的人数还要多一点，因为许多比共产党更左的团体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出现；但是，毛主义分裂分子团体充其量只有几百个党员。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新近瑞典左翼共产党的分裂，无疑对它的党员人数，



同样对瑞典革命左派总的人数，会产生某些影响，但是迄今尚无可靠的数字来衡量影响的程度。

至于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在以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为一方和以冰岛共产党为另一方之间，也有显著的区别。在每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工会的全国大会和大多数全国性工会都牢牢掌握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共产党人只控制几个地方性的组织，主要在滨水区，在建筑和金属工厂和在林业工人中间。因此，共产党在工会里的力量，从整个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工作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别的左翼党派。譬如说，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在几个大型工会和重要的地方性工会中有某些支持力量。<sup>①</sup>

人民联盟在冰岛工会联合会里多年来占有压倒的优势，从1973年起它的主席就是共产党员布荣·荣松。<sup>②</sup>此外，共产党人控制着大部分重要地方工会，如雷克雅未克的总工会。

应该反复说明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人在丹麦、挪威和瑞典的群众运动中，均未能获得控制权。虽然挪共确实在反对挪威参加欧洲共同市场运动中发挥强大的影响，但是这件事情上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挪威工党领导的工人群众憎厌共同市场的缘故；此外，挪共从这次运动所起的作用中几乎没有获得持久的好处。

---

① 《工人日报》社论，1975年11月25日；社论承认现在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在产业工人中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

② 《1976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加利福尼亚，1976，第177页)。

表 2 北欧共产党的党员人数

	党员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b>丹 麦</b>		
1967	6,000	0.13
1968	6,000	0.13
1970	6,000	0.12
1971	5,000	0.10
1973	5,000—7,000	0.10—0.14
1975	8,000	0.16
1977	7,500—8,000	0.15—0.16
<b>冰 岛</b>		
1967	1,000	0.5
1968	1,000	0.5
1970	1,000	0.49
1971	1,000	0.49
1973	2,000—2,500	0.95—1.19
1975	2,500	1.15
1977	2,200	1.00
<b>挪 威</b>		
1967	2,000—3,000	0.05—0.08
1968	2,000—3,000	0.05—0.08
1970	2,000—3,000	0.05—0.08
1971	2,000	0.05
1973	2,500	0.06
1975	2,500—5,000	0.06—0.13
1977	2,500	0.07
<b>瑞 典</b>		
1967	29,000	0.37
1968	29,000	0.37
1970	24,000	0.30
1971	17,000	0.21
1973	17,000	0.21
1975	17,000	0.21
1977	17,000	0.2

资料来源：各年《国际共产党事务年鉴》(斯坦福德)；中央情报局：《全国基本情报知识手册》，1977年1月；各年《全国统计年鉴》。

## 未 来

简言之，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人在他们国内的政治制度里未曾取得较大的影响，因之未能完成他们所说的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冰岛共产党人虽然没有达到后面一个目标，但是他们已经成功地在政治领域里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今后年代里他们的前景如何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人们必须扼要地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使北欧共产党在利用其所碰到的机会时未能得到较为实际的、持久的好处？根据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情况，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着重指出，意识形态分裂和组织分裂、意识形态的固执不化、对外关系上的污点和其他中间派左翼团体的竞争起了削弱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使挪共、丹共和瑞典左翼共产党孤立的重要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别处——即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基本上是具有政治民主的、长期传统的、着重人道与经济健全的社会。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长期以来被看成政治民主的典范，民主政治使人民共同遵守民主竞争的规则，普遍尊重全国和地区的机构，就能弥合现代社会里典型的裂缝。在所有三个国家里，政府机构具有有效和廉洁的名声，公民一般愿接受一定程度国家对他们生活的干预，这种干预有些国家的百姓（比如说美国）恐怕受不了，这主要因为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高度信任被任命的和选举出来的官员，因此他们不愿意把政治看成一个胜利一个失败的比赛。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社会计划是世界羡慕的对象，在战后大部分时间确实使社会上大多数人感到相当满意。三国的经济政策建立起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成为世界上生活标准最高的国家。在每个国家里，当地的人民差不多都是一个种族，保证极少可能出现民族和人种冲突。有以上种种特性的社会一般来说不大会产生激进主义。他们倒有点儿倾向

政治上的中庸和稳定。

尽管有种种阻碍，斯堪的纳维亚左翼力量从六十年代以后稍有高涨。这种趋势包含几种因素，如上所述，越南战争产生的反美主义，强烈反对参加共同市场，有效地促使左派势力的复兴。挪共 and 瑞典左翼共产党反对苏联政策和莫斯科规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鲜明态度，在挪威和瑞典可能也发生有利作用。但是最重要的影响无疑在于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近年来所遭遇的问题和这个地区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对福利国家的“信任危机”。

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陷入典型的进退维谷的境地。虽然它们在开始时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党派，有明确的组织基础和支持范围，但是它们执政以后有必要根据整个社会来制订政策，不能单顾一个阶级。因此，到五十年代它们希望成为“人民的党”，要吸引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小自耕农以外的其他成分。这种政策使这些党失去某些传统支持，而左派分子从党内分裂出去。丹麦和挪威社会主义人民党肯定在这个事态中得到最大好处，也使共产党略有所得。对于共产党人的发展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民主党丧失一部分左派支持后的反应。社会民主党迫不及待地(有点发疯似的)重申它们“固有的”左倾政策，这样一来使得共产党的立场看起来似乎较之以往更为“主流”，从而使许多人消除了投票支持共产党是不光彩的那种看法。

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产生对福利国家普遍的重新估价。许多人日益认为，为维持福利国家支付费用所必需的大量的管理工作、税收和其他货币捐献太多了，情况清楚表明，这些国家似乎已经达到人民支付“税收的极限”，超过此限度，公众的支持将要下降，或者会成为政治上的反抗。七十年代初，在丹麦的莫根斯·格利斯特鲁普领导下建立了“拒付税收党”，它取得相当的成

功，这就是反抗的一个迹象。<sup>①</sup>人们还日益反对生活官僚主义化，反对对人们活动范围越来越多的管理和限制，尽管其中有的对人们有好处。这方面的例子是挪威民族主义政党的成立，它主张撤销国家官僚政治，回到粗野的个人主义的“古代挪威方式”中去。<sup>②</sup>对现存制度的怀疑，常常使想要改变这种制度的人得到机会；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从群众的不满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好处。

但是，这些因素能否补偿斯堪的纳维亚共产党人多年来无能为力之境况，能否给他们提供重大的发展的新机会，还是很大的疑问。有一些影响——如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和共同市场问题——业已消失。也许最关紧要的是，目前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发生的不安，其原因来自中等阶级关心其自身的利益和有人要求回到集体主义较少的社会。共产党人较之社会民主党人更加明确地主张更多的集体主义，更严格的管理，给私营企业较小的活动余地，因此目前抗议的浪潮，最终不象会增加这三个国家里许多左派团体的利益。相反，它可能对当地右翼力量有好处。特别是挪共和瑞典左翼共产党新近的分裂，对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来说，未来将继续是暗淡的。

冰岛共产党人避免了大部分包围斯堪的纳维亚同伴的困难，这已经为相当明确的政治记录所证明。此外，冰岛比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能为国内的共产主义提供更肥沃的土壤。特别在近几年来，冰岛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它的经济一直是依靠渔业，依靠这种众所周知的不稳定的和难以预测的资源。

那末，倘若人民联盟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民族主义的态度，它将完全有可能确保对冰岛一般公众和岛上工人阶级的号召力。这样，它将肯定保持住西欧一个最成功的共产党的地位。

<sup>①</sup> 格利斯特鲁普的进步党在1977年2月丹麦的选举中，获得全部选票的14.6%。

<sup>②</sup> 必须指出，挪威这个党目前正在衰落；在1977年的选举中，它没有获得议席。

## 八、大不列颠：对英国共产党来说， 革命还是渐进主义？

戴维·林恩·普赖斯

英国共产党的宣传，一再重弹国内“革命形势”的老调。从表面看，有些迹象是存在的。英国有持久的经济问题。诸如通货膨胀，对英镑的信任危机，工业生产不能令人满意，紧张的劳资关系。已经失去帝国地位的英国，仍然在努力调整它已经下降的世界地位；似乎缺乏一定的目的和方向，由于削弱了有组织的宗教，那种漫无目标的现象显得更加突出了。但是所有这些都等于革命形势吗？

更加可能的是，上述种种因素，将形成按照历史模式变革的力量。诚然，当代变革的速度、复杂性和深度都是空前的。但是，当代变革和历史上变革的不同，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就是革命前的形势，因为典型的革命催化剂——不断上升的期望的丧失和绝望——在当代英国社会里并不存在。英国共产党有意忽视这个区别，就加剧了英共在判断问题上进退两难的境地。

### 表 现

传统上英共在政治策略上有两种见解：忠实于马列主义教导，使用不论何种手段来取得政权，或者在现存制度解体以前在这个制度里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成立一个联合阵线。从1920年英共成立起，它就是一直在探索扮演哪一个角色的演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共不妥协地主张“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完全屈从于苏联或第三国际的命令。在那个发展阶段英共是一个僵化的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它有一个独裁的领导，不能容忍党内不同的意见。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些党员感到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脱离了工人阶级。为了改进它的形象，须寻求工党和工会的支持<sup>①</sup>，然而两者对英共都是敌视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和反纳粹战争给英共从未有过的政治上合法地位。到1944年党员人数上升到56,000人，而在1920年只有4,000人。<sup>②</sup>然而，如果英共相信它在战争中的努力会带来大量政治上的好感，它一定感到失望。工党政府的上台和1945年起实行福利国家计划，削弱了英共的地位，因为议会党表示，它对工人阶级的贡献，比自称为革命党要多的多。事实上已经由上而下来了一个革命。此外，虽然第三国际在1943年已经解散，把英共和莫斯科分隔开来，人们仍然怀疑苏联实际上还是控制着英共。因此，英共的声誉一直很低。

五十年代带来新的痛苦。1956年2月，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某些暴行，在这一年的后一些时候苏联入侵了布达佩斯，这使英共党员下降三分之一。可是党内民主委员会重申英共的组织原则，这样至少暂时结束了内部改革的前景。<sup>③</sup>

在以后的若干年份里，党员人数还是逐步下降。1977年党员人数25,293人(英国人口为54,421,000人)。<sup>④</sup>在七十年代，它肯定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只有9—15%党员年龄在25岁以下，而

---

① 彼得·希普利：《现代英国的革命》，伦敦1975年，第23页。

② 理查德·F. 斯塔尔编：《1974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斯坦福德1974年；《1975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斯坦福德1975年。

③ 《工人日报》(伦敦)1956年11月3日。

④ 《泰晤士报》(伦敦)1977年10月4日；理查德·F. 斯塔尔编：《1977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斯坦福德，1977年。

主要的党领导,年龄已高,不接触英国社会的变化。例如,1975年的党代大会上,425名代表中,只有45人年龄在25岁以下;233人是25岁到40岁,而164人超过40岁。这样,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6.25岁,而1973年上届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平均年龄为34.8岁。虽然25岁以下代表只占总数的10%,但40岁以上却达到34%。<sup>①</sup>英共青年党员的情况也突出表明党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1967年,英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有6,000人,但是到1976年末,人数下降到仅仅2,000人。<sup>②</sup>总的来说,这种可怜的现状应归咎于同“新左翼”的竞争,他们提出的纲领比英共青年团更能激发青年人的兴趣。同时,青年人长大了、参加工作、结婚、成家,总之,他们逐渐成长,消失青年的热情。

英共在吸引社会的其他部分成员方面也没有显著的成绩。在他成立之初,英共特别注意妇女的作用,确实,它专为妇女设立一个妇女部,一份妇女报刊,以及妇女地区委员会。但是在最近几次的党代大会上,执行委员会42个成员中,妇女只占15%,在党员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可能不会很高。对侨民社会,英共最没有吸引力。在英国的加勒比海人,非洲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都愿意组织起自己的民族文化团体。结果是英共很少侨民党员,它的执行委员会忠实地反映出党的社会成分的这方面情况。<sup>③</sup>

“工业无产阶级”组成的党的骨干。最近几次党代大会中,有40%代表来自蓝领工人——工程、造船、动力和建筑、矿业以及铁路工人。而且,党的传统支持在于重工业地区——苏格兰,南威尔士和伦敦东部。苏格兰有7,000个党员;伦敦5,000个,威尔士2,000个。<sup>④</sup>这些都是经历了激烈的工艺技术改革的地区,传统工

① 《1974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和《1975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

② 《经济学家外事报导》(伦敦),1976年11月5日。

③ 《晨星报》(伦敦),1973年6月4日。

④ 同上,1973年5月14日。



业衰落,失业率高,并且出现了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然而,英共自从 1969 年以来,仿效工会的榜样,对白领工人抱有一定的兴趣。(应注意,执行委员会中与体力劳动工人比起来白领工人占大多数。)如果通货膨胀和工艺技术的改革,使白领工人的实际工资继续下降的话,可能引起知识分子日益强硬的态度,从而真正增强工人运动和英共的地位。

战后几年里,英共抑制着自己的幻想,现时英共成为一个小心翼翼和矛盾重重的党。那么它怎样才能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作为令人尊敬的政治党派起来作战呢?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于只知富裕生活的一代人呢?

英共承认在群众运动方面,他们没有机会同工党竞争。因此他们一般地支持工党政策实行妥协。这种态度使英共处于不舒展的地位,因为工党的右翼(“改良主义者”)同英共是死对头。有一位观察者敏锐地提到:共产党人说,“一旦工党把改良主义清洗出去,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不谋求在左派联合中独占领导地位”,但是“他们和工党将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sup>①</sup>

实际上英共和工党一样,在对工人阶级有影响的问题上都要露一手。英共提倡社会改革,提高生活标准,扩大工会权利,实行公有制,废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建立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议会。这个纲领,分明是民主主义战斗性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引起党内正统派的批评,认为这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

英共试图安心做好两件传统任务,结果没有一件使人满意。关于宪法的探讨丝毫没有结果。最近六次选举中,英共候选人没有一个当选,而党得到的最高选票是 1966 年的 62,112 张。绝大多数的选票来自苏格兰、南威尔士和伦敦东部。这些地方是党员

<sup>①</sup> 希普利:《现代英国革命》,第 117 页。

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它候选人最多的地方。<sup>①</sup> 尽管竞选多次失败，然而英共坚持认为，选举的成功对于走向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 国内问题

英国共产党的纲领非常明显地看得出对全体选民没有号召力。但并不是单单那个纲领是不能吸引较多支持的原因。更多的理由还在于党自身的特性。

英共这个政党共有四层组织：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它的各种委员会和部门，地区和支部。支部既有以选民区为基础，也有以工厂为基础。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各地区和各支部。但是实际上全国代表大会仅仅是党领导的一枚橡皮图章。它以完全不民主的方式进行工作，极少受到反对。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担负代表大会职责。它每两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党的活动。执委会选出一个政治委员会，这是党的神经中枢。后者包括党总书记，副书记，主席，全国组织委员，产业组织委员，党机关报《晨星报》的编辑等等，其中有著名的工联主义者。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是指定而不是选举产生的。

虽然英共中央是有纪律的，而且相当活跃，但是政治委员会很少授权给下属，也不鼓励任何独立的工作。这种僵硬的作风是党在基层工作的一大弱点，因为虽然党非常强调工厂中支部的活动，用它来打击资本主义实业家制度的心脏，但是各工厂的具体情况肯定不一样。这一级传统性的党的僵化工作方法，激起一些激进分子的质问：这样的基层活动究竟有多大作用？

除了这些机构的弱点外，英共饱受队伍内部分裂的苦楚。在六十年代前五年中，对党的政策的批评首先来自直接行动的宣传

<sup>①</sup> 《每日电讯报》(伦敦)，1975年11月1日。

人员,如雷格·伯奇。争吵起因在于对产业工人的宣传鼓动问题。按英共的主张,工厂是产业中斗争的关键部门;但是伯奇和持异议者指出,那种主张是自相矛盾的。英共既然支持工党公有制的纲领,又如何推进产业工人的战斗精神?最后,英共的矛盾心理终于把这批持不同策略的人赶出党外。1966年伯奇离开英国自行建立一个英国共产党(马列),这是毛主义者的团体。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1973年,斯大林主义强硬路线者反对党试图与苏联保持一定距离(愈到后来愈甚),这种不同意见使全国代表大会活跃起来。1975年11月间召开的第三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比较平静,所有政策性的提案都一致同意通过,但是此种平静掩盖着背后依旧存在的不同意见。1976年1月,英共前总书记约翰·高兰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透露出这些不同意见,他探索性地谈到党试图独立于莫斯科的意图。<sup>①</sup>这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迫害持不同政见的人,并承认英共对斯大林时期的清洗运动“批评不足”。而后在1976年2月11日,英共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指导破了产的厄珀·克莱德造船厂的雇员在1971—1972年进行斗争而闻名全国的吉米·里德,在为党工作26年之后辞职了。他的辞职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但是他批评党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sup>②</sup>

由于1976—1977年间英共排除阻力制订一个1951年《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文件的修正本,修正后的文件遵循欧洲共产主义路线(以后讨论),因此使斯大林主义者和较少正统思想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剧了。1977年7月17日,主要的斯大林主义者锡德·弗伦奇,他曾尖锐地反对新起草的那个声明,决定分裂出去建立他自己的小党——新共产党。新共产党其所以存在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是,“英国共产党已经向反苏主义投降,现在正企

① 《今日马克思主义》(伦敦),1971年1月。

② 《泰晤士报》,1976年2月13日。

图把社会民主纲领强加给工人阶级。”<sup>①</sup>实际上，新共产党的纲领没有什么新的创见，因为它仍然保持忠实于传统的马列主义的教义——即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以及武装斗争的可能性。

支持新共产党的人为数有限——约 50 名成员参加公开讨论分裂的会议——英共的反应是意料之中的敌视。它认为“建立一个分裂的组织……这只能使工人阶级的敌人高兴。”<sup>②</sup>

的确，新共产党的反对，并不能改进英国共产党人的形象，但是恐怕新共产党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新党规模小，没有宣传设备，而它追求一个“苏维埃英国”完全不合公众舆论。再者，苏联对新共产党保持缄默，这表明自称为斯大林主义的少数党的前途未必乐观。弗伦奇年近六十，有四十多年党龄，他早期活动没有能够吸引很多新党员。因此，他和新共产党未必能为英国左派带来新的理智的活力。正如一家报刊的评论所说，“人们不知道应该赞扬他的顽强呢，还是悲叹他的自我欺骗。”<sup>③</sup>

### 与国内其它力量的关系

作为国内战略的一部分，英国共产党倡议同左派联合。它所重视的首要目标是工党。从英共的观点看来，同工党取得联系，有利于参加工人运动，并通过集团投票，为利用产业活动达到政治目的增加可能性。

然而，迄今为止，工党基本上未接受英共的求爱。确实，工党在 1973 年就不再排斥英共，英共可以邀请几个国会里的工党议员和几个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参加它的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并请他们在英共机关报上写稿。但是工党在正式场合仍然是敌视

---

① 《泰晤士报》，1977 年 7 月 19 日。

② 《晨星报》，1977 年 7 月 25 日。

③ 《观察报》(伦敦)，1977 年 7 月 24 日。

英共的。同样重要的是，在重工业地区的基层单位里，在工党的支持者和英共的积极分子之间，经常抱有不妥协的敌对情绪。

在寻求政治上的联合时，英共试图就个别问题上同其它“进步的”组织取得合作。这些组织有青年自由者，核裁军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和联合国协会；合作的问题包括智利、南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产业关系、全面教育和工资冻结等。在这些努力中，大部分取得一些成就。

然而，当英共寻求与极左派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时，就出现全面的争执和敌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关于走什么道路取得政权的观点的分歧。在六十年代，英共专心致力于议会道路，未能认识社会、政治和知识界的变化，并事先未作准备，结果英共和共青团在学生运动中都没有起到任何重大的作用。此外，今天英共首先关切的是同工党的主流派联合，而不是建立能直接行动的真正的群众组织。这样，极左派就严厉批评英共缺乏革命献身精神。

极左派同时也直接同英共争夺支持。这个从左边来的挑战主要来自托洛茨基团体。它们叫作工人革命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前者约有 2,000 名党员，后者约有 3,500 名党员。<sup>①</sup>

英共和工人革命党之间，在工厂这一级有特大的磨擦。前者在管理部门征求党员，而后者则在车床工人中招徕。意识形态的小冲突是经常的。工人革命党认为英共为斯大林主义者，抨击他们阻碍托洛茨基派在产业工人中的活动；此外，工人革命党常常要求英共党员抵制“右翼”领导。英共方面，新近在产业里的对抗中，谴责托洛茨基派和其它派别挑起不必要的暴动。这种暴动破坏了产业工人的关系，并且不但危及工党而且有损英共渴望领导的整个工人运动。

---

<sup>①</sup> 《1974 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

在同托洛茨基派的相互攻击中，英共忍痛表现出一种节制的形象，以确立它民主政党的信誉。但是，这种努力事实上降低它与工党合作时所提出的“左派联合”口号的意义。由于两党之间的力量悬殊，这使英共处于软弱的地位。

尽管英共未能同其它政治力量合作，尽管它在基层一级工作停滞不前，英共还是通过工人运动施展它最大的影响。虽然它没有控制住任何个别的工会，而它在近几年来，几乎在所有的工党政府与工人的对抗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七十年代，英共在工会的选举中，表示出它的成就并不大，而在某些地方遭到惨败。例如，虽然英共在机械工人混合工会中影响最大，但是在1975年工会选举执行委员会的结果，温和派获得压倒的胜利。得到共产党支持的著名左翼分子鲍勃·赖特在1976年11月当选为副书记，使情况有了好转，但是英共的损失仍然远远没有恢复。

## 国际主义

如果英共的国内政策，因自相矛盾而受到损害的话，那么它对国际问题的姿态存在更大矛盾。概括地说，英共的世界观简单得很：美国和北大西洋组织是坏的，苏联和华沙条约是好的。它赞成把欧洲经济共同体说成是“资本主义俱乐部”，而把经济互助委员会和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楷模。可是在最近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英共支持对抗苏联的铁托路线。如前所述，这个立场激起斯大林主义强硬路线者的反对。这种有限的独立性，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第一次出现，以后渐渐有所发展，它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即对1976年6月欧洲共产党在柏林会议的结果表示谨慎的欢迎。在评论这次会议的结果时，英共执委会说：“上月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和会议的准备工作的表明，到目前为止，在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使用的某些方法现在已不再合适了。”<sup>①</sup>这是英共强硬的语言，清楚地反映出英共不愿意过分接近苏联。即将发生某种事情的一个迹象，在戈登·麦克伦南去莫斯科参加1976年3月苏共第25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已经显露出来，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它将保证个人自由，实行多党政治，工会的独立，宗教信仰的自由，研究、文化、艺术和科学活动的自由。”<sup>②</sup>

在适应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方面，也许是英共自从1968年同莫斯科保持距离以来作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决定。如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一样，最终说出两项客观现实：“苏联神话的危机和西欧社会的复杂性。使经典式类型的革命几乎不可能实行。”<sup>③</sup>因此，从1976年以来，英共抓住新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明确特征：承诺建设一个自由的多党制的社会主义，承认不同政党有轮流掌权的权利；反对有一个领导党，反对苏联革命方式是西方楷模的概念；最后，批评苏联压迫国内持不同政见者。

1977年中期，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因为苏联《新时代》杂志攻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和他直言不讳的欧洲共产主义观点，引起了相互的攻击，英共对此总的说来是保持缄默的。但是在难得的公开评论中，英共的确对莫斯科有所批评。同时还作出英共可能采取的意识形态上道路的一些暗示。7月初英共总书记戈登·麦克伦南在《晨星报》上发表关于欧洲共产主义争论的详细评论。麦克伦南说得不很明确，但是他清楚地谴责《新时代》首先破坏友好的礼节。他说，“遗憾的是这种做法背离了共产党之间进行讨论的重要基础。”为了加强他的论点，他又说，“必须

---

① 《晨星报》，1976年7月12日。

② 《晨星报》，1976年3月2日。

③ 《欧洲时报》(伦敦)，1977年3月6日。

清楚地懂得,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有它自己的主权,不仅要决定它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而且要制订出自己的国内政策,没有旁人可以越俎代庖。”他引用了众多党外人士的语言——他们把国际共运中对待不同意见的人比作天主教对待异教徒——他说,“不存在一个中心,不可能有驱逐出教那么一回事。”<sup>①</sup>

在1977年11月英共第35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麦克伦南向1,500名代表发表他同样主题的报告。例如他用确切的言词指出,英共将制订它自己愿走的路线,而且大会通过新修正的《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文件,它包含欧洲共产主义所主张的特色,即尊重民主自由,接受投票箱决定和其他政党的权利。<sup>②</sup>

从表面上判断,这种灵活性的明显增长,使英国和欧洲政界受到鼓舞。但是象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一样,英共党内的僵硬性和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是历来如此的。此外,英共对苏联和东欧镇压行为的批评会增强到与这些政府断绝关系的程度吗?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无疑必须在党内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同样重要的是,英共谨慎地避免同任何西欧政党集团发生联系。在1977年11月党代大会上,总书记麦克伦南不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认为它既无用处,含义也不精确。他继续讲到,虽然“我们热烈地欢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在西欧的前进,以及日益增长的团结一致……我们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英国的政策”。如果我们的政策“在某些主要方面符合于欧洲和别的地方的其他共产党的政策,这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许多客观情况与我们的一样。”<sup>③</sup>

也应该注意的是,即使英共与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党一样采

<sup>①</sup> 《晨星报》,1977年7月4日。

<sup>②</sup> “论议会”,见《泰晤士报》,1977年11月13日和14日;《每日电讯报》,1977年11月14日。

<sup>③</sup> 《泰晤士报》,1977年11月14日。



取赞成欧洲共产主义的正式立场，它仍处于矛盾的地位。英共曾再三宣称在东西方危机中，只要发生“帝国主义的侵略”，<sup>①</sup>它将要支持苏联。此外，英共继续为国际主义团结而工作，在它看来苏联和东欧的胜利才是根本重要的。正如麦克伦南 1977 年 7 月在《晨星报》上所写的评论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就，使得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更大的可能。”<sup>②</sup>

而且，这种矛盾状态不大可能改进英共在全体选民中的地位。英共要求英国选民相信，在国内事务中，如果英共取得政权，它将允许其他党派作为合法的反对派而存在，并且它会给任何击败它的党派让路。但是没有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过，鉴于英共对苏联的含糊态度，很难令人相信英共会采取它所宣布的那种路线。

## 展 望

英共总书记在 1977 年 7 月和 11 月有关欧洲共产主义的声明中清楚地打算先发制人地消除潜在的重大争论。然而这一努力看来不可能完全成功地扼杀纷纷议论，因为党内青年和学生部门表示对欧洲共产主义有强烈的兴趣。在麦克伦南的第一个评论出现的那个月，英共青年一翼，在伦敦举办为期九天的共产主义大学，参加的学生超过千人。尽管讨论的主题是新起草的《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另一重要的题目是党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态度。这些辩论的参与者赞成英共逐渐趋向于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那样的更加温和的形象前进。<sup>③</sup>

① 《泰晤士报》，1977 年 4 月 23 日。

② 《晨星报》，1977 年 7 月 4 日。

③ 《泰晤士报》，1977 年 7 月 11 日。

今后,青年组织更倾向于世界主义的态度,将向英共提出一些问题。许多青年共产主义者是亲欧洲的,而且取得称为欧洲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是以前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左翼同情分子在1975年组成的。亲欧洲共产主义者批评反欧洲共产主义者是不现实的“小英国”的保护主义者,同时强力要求英共党员在欧洲共同体里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认为这样一种首创精神,有助于能够与其他欧洲共产党联结在一起,为准备一个欧洲的的社会主义共同纲领铺平道路。

就英共这方面说,它继续正式要求英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它坚决支持工党内反欧洲的议员。如同过去一样,这种矛盾态度可能继续削弱党的力量。一方面英共承认欧洲共产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使自己处在英国民族主义保护人的地位。对于一个自称为国际运动的拥护者来说不可能有这样的姿态。

但是英共现在穿上的这种民族主义外衣,似乎不能阻止它在国内影响的逐步衰退。英共在意识形态上左右摇摆,党员减少,它不能吸引青年人,它在选举中遭到惨败。从政府内部看,工党左翼推行比英共更为激进的政策。作为一个战斗的党,它已经落在主张直接行动的托洛茨基派的后面。在变动的年代里,英共中央领导仍然处于僵化的状态。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也许将迫使英共还要进行另一次曲折的调整,还要进入另一个意识形态的矛盾状态。英共继承着一个笨拙的教条的传统,面临着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它已经感到,须被迫作出部分的妥协,此种妥协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无力和最后的瓦解。

## 九、欧洲共产主义的挑战

克文·德夫林

多年来，莫斯科……就是我们的罗马。当年我们谈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仿佛它就是我们的圣诞节。那是我们的幼年时代。今天我们已经成熟了。

——1976年6月29日圣地亚哥·卡里略在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东柏林会议上的发言。

1967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举行了第一次欧洲共产党会议；1976年6月在东柏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将这两次大会作一简略的对比，不难看出在这十年中，欧洲共产主义（东欧，西欧和东—西欧）所发生的巨大变化。<sup>①</sup>

到1967年，欧洲共产主义坚如磐石般的团结早已不复存在，其主要原因是中苏冲突的破坏性冲击，以及六十年代初使许多西欧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的那种适应环境的“修正主义”浪潮。下面这份缺席者的名单便是最好的例证：卡罗维发利会议遭到了东欧的阿尔巴尼亚党，南斯拉夫党和罗马尼亚党，以及西欧的荷兰党，冰岛党和挪威党的抵制，瑞典党也只派了一名观察员参加。然而，那些参加了这一次大会的党，在苏共典范式的领导下维护了团结一致的传统。所以会议文件即使算不上是顺利地，也是迅

---

<sup>①</sup> 本章涉及的东欧共产党的全名如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东德）、土耳其共产党。

速地被通过了。1967年1月忠诚的法国党和波兰党提出了召开一次全欧会议的建议；同年2月在华沙举行了唯一的一次预备会议；随即在4月举行的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一个文件，文件中除了极为笼统地提到东西欧共产主义领导者们早已分枝的政治利益问题外，还一般地号召以长期的努力来发展缓和。<sup>①</sup>

第二次欧洲会议和第一次作对比，差别是明显的，为召开这次会议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与第一次会议相比也是令人瞩目的。1973年11月，由亲苏的党（西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首先提议召开另一次全欧会议，随后举行一次世界性会议。各党秘密磋商（这些磋商是长期筹备过程中一系列活动中的第一步）了好几个月，于1974年10月在华沙举行了有二十八个党参加的协商会议，这离提议也差不多有一年了。而大会本身直到1976年6月下旬才得以举行，比原定计划推迟了整整一年。而且，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次会议非但违反了苏联人及其支持者们的愿望，而且变成了一次标志着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多样性成了制度化的会议。

原来由克里姆林宫制定的“方案”的意图看来是相当明确的。以“争取和平、安全和合作，以及欧洲社会的进步”为目标的共产党会议，按照计划“不能迟于1975年年中”在东柏林举行；原来打算把这次会议和定于1975年夏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安会衔接起来，下一步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胜利三十周年衔接上。克里姆林宫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从理论上对欧洲缓和局势作出解释，以便缩小东欧国家在赫尔辛基被迫作出的让步所造成的影响，这个让步指的是“三号篮子方案”（即报导，思想和个人的更加自由

---

<sup>①</sup> 十六个月以后，当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大部分西欧党的反应强烈地表明了它们之间在政治利益上的分歧。1968年8月27日和29日举行的意共中央全会上，总书记路易季·隆哥在发言中批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过分关注“意识形态的侵略”所造成的颠覆性影响而没有履行卡罗维发利文件所提出的缓和策略。

化运动);同时,这次会议至少也会隐晦地重申苏共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居的老大哥地位。

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根本失算似乎在于谋求尽可能多的党来参加这一次会议,更为严重的是,把曾经抵制过卡罗维发利会议的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也拉进了会场。结果表明在其它独立自主的党的支持下,南斯拉夫人所坚持取得的让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让步指的是“共同一致作出决定”的新的议事程序原则,这在华沙会议一开始就被通过了。的确,紧接下来的旷日持久的筹备过程的经过情况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在二十几个月里至少举行了十六次会议,忠诚的多数派为了缩小初次让步所产生的影响,反复作出了最终几乎是徒劳无益的努力。

在华沙会议和1974年12月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首次正式预备会议以后,官方的保密帷幕把一切活动都掩盖起来了,但是在关于会议文件的特点和内容上所出现的对抗的轮廓却是够明显的。<sup>①</sup>对于独立自主的党来说(主要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瑞典共产党,稍后,在某些问题上法共也参加了进来),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反对再三试图让欧洲共产党接受文件草案中有关意识形态部分中所提出的类似“总路线”那样的东西(这是由作为东道国负有起草一系列文件草案责任的东德人提出来的)。在反抗这种压力的时候,独立自主的党坚持了它们的主张:如果非要有一个共同文件的话,<sup>②</sup>那么它必须以名副其实的共同一致为基础;它必须强调自治、平等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互不干涉的原则(其必然结果就是不承认苏共的特殊地位);它必须不包

---

<sup>①</sup> 关于对(至1975年5月以前的)初期筹备工作的分析,见克文·德夫林:《党与党之间的戏剧性事件》,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75年7—8月号,第18—34页。

<sup>②</sup> 在不同时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意大利和西班牙党的发言人都认为会议不必通过一项文件。据推测,他们采取这一立场是为了强化制定一个符合他们意图的文件的要求。

含批评任何出席或不出席的党(如中国党)的内容;它必须只谈政治行动而不是意识形态;而且,无论如何不能用它来约束任何党。

这些争论的最初阶段出现在所谓的工作小组的会议上<sup>①</sup>,该会议分别于2月中和1975年4月初在东柏林举行。这一阶段以陷入僵局而告终。在4月的会议上,东德人提出了第一个草案,南斯拉夫一位提供情况的人士说,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在行动和思想方面采取共同立场”<sup>②</sup>的草案被独立自主的党拒绝了。

### 持续的僵局

这时,为了打开僵局作了这样的尝试,即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一个力量均等的八国“助手小组”去解决,助手小组由四个独立自主的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意大利和西班牙)和四个忠诚党(苏联、东德、法国和丹麦)所组成。助手小组于1975年5月中,7月初和7月中<sup>③</sup>会晤了三次,都没能达成协议:东德在7月提出的第二份草案文本对独立自主的党来说也不比第一份容易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塞季奥·塞雷在8月底会见记者时说,进展“非常微小”,东德提出的两份草案“所包含的政治和理论原则方面的论点实在无法接受(而且并非限于意共一家)。”接着他又进一步提供了某些有价值的细节:

协议中关于缓和的概念是一般化的,但是在文件的第一和第三章

① “工作小组”的代表团和执意参加特别起草会议的代表团的数目是相同的(如1975年2月为16个,4月为20个)。因而,会议的名称就变得重要起来,后来,代表团以“起草委员会”的名义会晤的时候(如在1975年11月和1976年5—6月),这就意味着达成一项共同一致的协议已经为期不远了。

② 见德夫林:《党与党之间的戏剧性事件》,第32页。据报导,意共的贾恩·卡洛·帕耶塔把第一份草案称为“书于德国,译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时代的旧俄文”的文件。见《西欧共产党之间的深刻而不明朗的分歧》,载《宣言报》(罗马),1975年5月17日。

③ 1976年9月,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意共的塞季奥·塞雷对笔者说,有一次助手小组会议(也许是最后一次)开了八天之久。

上,我们宁可冒陷入僵局的风险。第一章包括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包括了对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作用的一系列评价问题。第三章……阐述了共产党的战略问题,据说它是这么写的:共产党起着先锋作用,追求相同的目标,并且接受单一的理论的指导。我们,而且也不仅仅是我们,相信文件里的这些内容并不反映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也不反映它的成员对各种问题所持的方针,如葡萄牙问题。<sup>①</sup>

塞雷提到了葡萄牙,这倒是一个及时的提示,事件本身正在使欧洲共产党对欧洲大陆局势作出共同一致的分析变得难上加难,尤其是变革的动乱正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影响着南欧各国。在1975年春和初夏,葡萄牙共产党联合了左派军人与马里奥·索亚雷斯的社会党抗衡,葡共的这种抄近路追逐权力的做法成了加深不团结甚至发生论战的根源。<sup>②</sup>意共和西共的国内命运无疑受到葡萄牙戏剧性事件的不良影响,他们公开批评了葡共的政策,同时对社会党明确地表示同情(更为节制的南共和罗共的党报也表达了极为类似的观点,他们公开赞同索亚雷斯,而不赞同“莫斯科的”阿尔瓦罗·库尼亚尔。)<sup>③</sup>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英共和瑞典共则和其它大多数共产党一起对葡共表示兄弟般的支持。法国党却又以与众不同的姿态出现,他大声疾呼全面地支持库尼亚尔,尽管库尼亚尔对宪法民主表示出的毫不掩饰的蔑视(人们对他和奥里阿纳·法拉西会谈时所讲的话记忆犹新)<sup>④</sup>与法共宣布的国内原则相抵触的——例如,1975年出版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自由宣言”。<sup>⑤</sup>

① 1975年8月31日《快报》周刊(罗马)。在稍后的十月中旬,塞雷答《快报》记者问时说,在最后一次八国党会议以后,“分歧深如鸿沟,以致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② 见 K. S. 卡罗尔:《葡萄牙的困境》,载《新观察家》(巴黎),1975年6月2日。

③ 1974年早些时候,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出席了在里斯本举行的葡萄牙社会党代表大会——非共产党的大会。

④ 这篇答记者问载于《欧洲人》周刊(米兰),1975年6月15日。

⑤ 见《人道报》,1975年5月16日。

虽然法共在葡萄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使其卷入和法国社会党的盟友或敌手发生论战，但是意共却一再把它对葡共的批评和它对以下问题的战略上的重视联系起来，即它极力主张通过多党的渐进方法，促成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资产阶级”自由将会得到保证和扩大——这种前景意共认为不仅适用于意大利，而且一般地也适用于先进的西方社会。<sup>①</sup>因此，在关于葡萄牙事态的发展问题上，各党之间的争论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地区性的问题（自然，在这些问题上要取得一致意见就格外困难），这些问题包括“各国所走的道路”问题，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本国共产党的“先锋作用”问题，以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不是一个小问题）。<sup>②</sup>

这些争论并不局限于西方党之间。也许由于苏联当时正全力关注于赫尔辛基会议，因而直到1975年8月，它们对葡萄牙事件以及相应问题的评论是比较克制的。可是，一到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结束，一般说来，苏联和东欧对葡萄牙和“意识形态变迁”的评论变得更为率直，采取的路线也更为强硬了。<sup>③</sup>

---

① 正如意共书记皮耶罗·皮拉利所说的那样，“我们再次重申，在葡萄牙问题上，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以及将来的所作所为都涉及到原则性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认为，西欧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道路上，这些带有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见《顽强的要求》，载于《再生》周刊（罗马），1975年8月20日。

② 1975年8月下旬，索亚雷斯建议召开一次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在维护民主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意共和西共，很快会同法国社会党都倾向于接受这一建议；葡共持反对态度；法共最终表示对这一提议持相当保留和有争议的态度，实际上等于拒绝了这一建议。从对这一提议的反应看出，南欧诸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共产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严重性。见《乔治·马歇对马里奥·索亚雷斯的回答》，载于《人道报》，1975年10月23日。

③ 最明显的例子是伊凡·赫利夫卡发表在1975年8月26日的《真理报》（布拉迪斯拉发）上的一篇文章：“不幸的是，在我们的运动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样的事，某些同志宣称他们需要为他们的党赢得最广泛的联盟，于是，在这种凭空捏造的托词下，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对苏联进行批评。他们也常常对沿着革命道路胜利前进的革命运动进行非难，这条道路是迄今为止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这种行为客观上损害了革命派和革命。”在文章中，赫利夫卡还谴责了“对中国目前的政策所采取的任何中立立场”；这也再次表明，它显然和关于会议文件上的斗争是有联系的。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布拉格)总编辑康斯坦丁·扎罗多夫于8月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sup>①</sup>扎罗多夫在评述列宁写于七十年前的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坚持“自上而下”的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他强调这种专政应该以“政治上”的多数而不是以“算术上”的多数为基础的。对“现代调和者”(即共产党通过广泛的政治联盟谋求选举上的进展)的非难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列宁主义的思想……彻底揭露了至今仍然流行的机会主义观点,这些观点企图说明拥有权力的手段应该是某种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投票的结果。”

扎罗多夫的文章(和一系列类似的文章,更早一些的有博里斯·波诺马廖夫,亚历山大·索博洛夫以及其它一些人写的)可以被看作是苏共领导集团中较为保守的分子所作出的一种努力,他们试图通过重申苏共的革命正统性从而对策略性地强调缓和起“平衡”作用。然而,它也包含了再次声明苏共享有向其它共产党讲授意识形态和政治课的祖师爷的权利。

大部分西方党都没有理会这篇文章,可是来自意大利<sup>②</sup>、英国<sup>③</sup>和法国党的反应却是强烈的。其中法国党的反应最有意思。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在8月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出了最初的反应,他强调说,“法共在一切领域中的政策是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制定的,”他的党“对于民主、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前景”的态

<sup>①</sup> 扎罗多夫文章发表的当天,以帕耶塔为首的意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打算和苏联讨论“有关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这两件事难道是巧合吗?8月11日持共产党路线的《国家晚报》(罗马)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样的安排就使这篇文章成为“一种严峻的教训性的警告”,它是针对多样化自主道路的意共和其它党的。

<sup>②</sup> 《团结报》于8月9日和12日发表的声明中,对《真理报》作了批评:“想使人家听命于僵化的普遍法则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对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扎罗多夫根据教条主义思想形成的那种理解。”

<sup>③</sup> 英共发言人乔治·马修斯评论道:“英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我们党独立制定的,而不是由任何其他人制定的。各国共产党赞成一个单一的政治中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载《晨星报》(伦敦),1975年8月14日。

度并不是从现存的这种或那种模式中滋生出来的。四星期以后(随着时间的间隔加重了反驳的分量),法共出人意料地重新进行反击,由中央委员会成员雅克·香巴士在《人道报》头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批评扎罗多夫把列宁在1905年沙皇俄国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当作“处处和永远有效,因而也对法国有效”。法国所争取的“先进的民主”的目标和“将算术上的多数和政治上的多数作对比的经院式的区分观点是不相容的”。<sup>①</sup>法共对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点作了深思熟虑的反驳,由此可见,法共和苏共的关系早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就在这种激烈的论战和政治利益各不相同的背景下,八国党的助手会议也失败了,不论在正式会议上,或是在9月接连不断的许多双边会谈中,在会议文件问题上都陷入了僵局。这样的对抗也必然会转移到更为广泛的公开的讨论会中去。

与此同时,西班牙共产党也为独立派帮忙,它在1975年9月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详细阐述它在全欧会议上的立场的决议。<sup>②</sup>该决议指出,“欧洲共产党在诸如社会主义民主方式等关键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因此,“通过模棱两可的阐述试图表达虚假的一致将是消极的做法”。按照西共的观点,这次会议“即使没有最后文件,也会产生积极的后果”;如果非要有一个最后文件不可,那么它只能涉及到经双方同意的那些问题。总而言之,“西共不能赞同一个(甚至)似乎对所有的党带有强制性的纲领性的和意识形态式的文件。”

---

① 《人道报》,1975年8月9日和9月4日。

② 笔者始终没有得到西共决议的文本。这里的叙述是根据以下的报导材料综合而成的:1975年9月25日的《团结报》;9月20日的《宣言报》;9月23日弗拉内·巴尔别里发表在《日报》(米兰)上的文章;以及1975年10月西共执委会委员马努埃尔·阿斯卡拉特私下会见时提供的六点总结。

## 莫斯科举棋不定

就在这个时候,关于会议的方针问题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接踵而来的戏剧性的变化中的头一次变化。9月下旬,苏共发出了一个信号,声称为了“考虑会议的下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它的一个代表团将去出席10月9日至10日在柏林举行的会议。独立自主的英国党这时也进一步说,它将“继续为会议能在年底前顺利举行而进行工作”,<sup>①</sup>这一事态表明,“下一阶段”将涉及到保守的多数派对独立的少数派的让步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在10月9日至10日由二十七个代表团(圣马利诺借故缺席)出席的会议上,东德提出了和以前大不相同的第三份草案。这份草案的主要内容似乎是不易引起争论的关于赫尔辛基会议后的缓和问题,这个问题在原草案的第二章里也曾谈到过。《团结报》(10月11日)对此结果表示满意,它评论道:尽管对最近的“综合物”仍需作进一步的“推敲和澄清”,但是大家都同意把这份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以便最终达成一个能为各党所接受的文件”。大家也同意在10月9至10日的讨论基础上,“以及在所有参加会议的党可能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将于11月会晤,“在各党同意的基础上”拟定出最后的草案。<sup>②</sup>

<sup>①</sup> 《晨星报》,1975年9月27日。

<sup>②</sup> 帕耶塔在10月9至10日会议上的发言(载《团结报》,1975年10月14日)和早些时候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载《团结报》,1975年10月30日)中,对目前事态发展的方向表示出审慎的满意。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就制定一个共同的文件而言,应该建立在共同一致原则和充分自由辩论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不仅要全面地和毫不含糊地确认各国党的平等地位和独立性,而且各国党也要脱离组织上的约束,抵制作作为义务要承担的外来的指示,而这种义务并非由于对本国的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直接负责而产生的”。关于意共在筹备工作中的作用问题,他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文件,据我们看,它试图涉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共同探讨和达成协议时机尚不成熟。我们主张,内容要简洁,不要包罗万象,甚至不惜给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文件似乎太简单了或在关键问题上局限性太大了。”另见帕耶塔答记者问,《不要共同的策略》,载《新观察家》,1975年10月12—15日。

显然，共同一致的原则取得了胜利，双方继而又同意把综合的结果提交给各自的中央委员会去批准，这就标志着以新的形式和更高的水平从制度上认可了各共产党的自主原则。它也标志着最小公分母可能已经是小得实在可怜了。

正如让·卡纳帕在这次会议和后来的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的那样，法共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份草案。<sup>①</sup>他在发言中抱怨说，随着岁月的消逝，“文件中的政治性内容减少了，贫乏了。这不是我们的主张。”在“为数众多的党”的要求下，如今这个文本仅仅局限于赫尔辛基会议后“争取缓和、和平共处、裁军和合作等方面的问题了。”他的党对这些局限性表示遗憾，文本对波及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危机、工人阶级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及民主力量广泛团结的可能性等等问题没能作出共同的分析，法共对此尤感遗憾。法共要求文件至少应该表明，鉴于和平共处“在任何情况下并不说明社会和政治的现状，因此，各共产党在完全自主和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要开展它的阶级斗争……”

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苏联人的立场又出人意料地改变了——真可以说是“变化多端”。当二十八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11月17至19日开会的时候，结局和10月份原先期望的大不一样。这次会议没有通过修正草案，也没有确定大会召开的日期。相反（英国《晨星报》11月20日报导说），它决定任何党都可以参加的“起草小组”将于12月开会，“考虑大家提出的意见并从事制定草案的工作”；起草委员会将于1月份再次会晤，讨论起草小组的结论并“考虑”确定大会召开的日期。

大会延期召开（而且从起草委员会倒退到起草小组），这一情况表明，又有人出来横生枝节地阻挠几星期前出现的共同一致的

---

<sup>①</sup> 报告全文刊登在《新法兰西报》，1975年10月20日；答记者问，据法新社1975年10月11日电和1975年10月13日《人道报》。

协议。这又是在紧急关头形势的新发展。就在 11 月中的会议的前几天，一位南斯拉夫发言人宣称：“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目前我们正沿着制定一份适合于每个党的（会议）文件和政治性公报的道路上前进着。”<sup>①</sup>

出了什么意外情况呢？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发言人后来发布的声明才使人们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在 11 月会议结束后随即发表在西班牙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上的一篇记者访问记中，西班牙代表团团长马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回答了编辑部提出的问题“大会延期的原因是什么？”

让我们从筹备过程的开始阶段来说吧。那时，就有一种倾向表明，有人打算在会上为欧洲党提出一个类似“总路线”那样的文件。各国党，包括西共在内，坦率地宣布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达成一项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文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这些问题都是各党自觉自愿地同意的，如果当时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么目前的会议也许本来会使筹备工作告一段落的。

可是事与愿违。迫使别人去接受一份所谓的“意识形态式”的文件的倾向又重新抬头了。面对这种情况，相当多的党的立场仍旧坚定不移。

继续这种讨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我感觉到那些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他们自己的会议（原文如此<sup>②</sup>）的党和那些曾经一度对于及早召开大会感兴趣的党，现在也都宁可让这次会议延期了……

总之，就我们来说，筹备工作的进程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促使强调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各共产党的独立性。<sup>③</sup>

<sup>①</sup> 南共执委会书记尤莱·比里契答半月刊《文学报》（萨加拉布）记者问，1975 年 11 月 13 日南通社报导。

<sup>②</sup> 最近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有法国、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党；但是阿斯卡拉特在这里显然指的是定于 1976 年 2 月下旬召开的苏共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sup>③</sup> 《西欧共产党会议：阿斯卡拉特的宣言》，载《世界报》，1975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2 日的英共日报《晨星报》几乎全文刊登了阿斯卡拉特的声明；但是看来东欧或西欧的党报没有一家提及此事。

稍后，英国代表鲁本·福尔伯发表的一个声明实质上证实了阿斯卡拉特讲的话。他指出革命的对抗始终存在于两派之间。一派迫切要求“制定一份可以被称作为总路线的文件”，另一派则反对这样的宣言。在10月的会议上，如果最后的文件只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它将)基本上只涉及为了欧洲的和平和缓和而团结一致的斗争问题，那么协议似乎早已达成了……因此，英国代表参加了11月的会议，“它希望那时最后草案会被通过，同时把早日召开会议的日期确定下来。可是文件的整个特点又引起了问题。有的党要求把文件压缩到一定的范围，而另一些党却赞成一份内容更加广泛并涉及基本问题的文件。”<sup>①</sup>

另外一些间接的暗示也提到了11月会议的逆转形势。帕耶塔在11月13日答《团结报》记者问时，详细阐明了众所周知的意共立场，他说，11月会议丝毫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他又说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恰恰由于南斯拉夫没有理会11月的会议，所以南斯拉夫首席代表亚历山大·格尔里奇科夫的声明更是意味深长。格尔里奇科夫没有提到东德提出的显然会有争议的草案文本(这是东德人所作的第四次努力)，他指出，由于在10月会议上提出的第三份东德草案删去了有争论的主要部分，因而“第一次为与会者提供了工作的基础。……争论的部分是关于问题的探讨方面的，而且毕竟也不是议事日程内的事情，而是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众所周知多少含有争持不下的问题。)”他认为筹备过程这样旷日持久，“本身就证明各国党为了阐明自己的利益、观点和政策着实花费了力气”。<sup>②</sup>与较少官方性质

---

① 《晨星报》，1975年12月19日。

② 答《共产主义者》周报(贝尔格莱德)编辑部问，南通社1975年9月30日报导。格尔里奇科夫认为，党与党之间的分歧已经那么严重，因此，目前想要“为各共产党制定一个共同的策略和战术，甚至想协调他们之间的外交政策，这种想法早已过时了。”

的南斯拉夫报刊评论员所持的立场相比，这种故作乐观的姿态尤为引人注目。<sup>①</sup>南斯拉夫人似乎胸有成竹地把11月的草案仅仅视为从共同铺平的道路上的一个临时性的偏离，因为独立自主的党坚持他们的立场，亲苏的多数派还将不得不折回到原路上来。

南斯拉夫所持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12月苏联的立场又发生了另一次转变，回到“比较温和”的路线上来了。这样连绵不断的变化表明了克里姆林宫的不稳定性，这件事也可以和苏联代表团成员的更迭联系起来：在10月的会议上，首席代表是博里斯·波诺马廖夫；在11月的会议上，康斯坦丁·卡图舍夫接替了他；在12月的会议上，后者又被吉星高照的勃列日涅夫的门徒瓦季姆·萨格拉金所接替。“起草小组”在12月16至19日举行会议的前几天，萨格拉金飞往罗马，似乎是去和意共领袖们举行一次“转折性”的会晤。来自各国首都的“消息灵通”的报导相继指出，在这一系列的会谈中，萨格拉金表示苏共愿意删去11月草案里有争论的（纲领性的）部分，同时对某些有争议的章节重新进行考虑（如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西欧局势的分析问题，以及共产党和其它势力的关系问题等等。）<sup>②</sup>

即使在上述的基础上，达成共同一致的文件的过程仍然是缓慢的（在1976年1月13至22日的“马拉松式”的起草会议上，显

---

<sup>①</sup> 例如，1975年12月15日，在萨格勒布电台的广播中，米利卡·松迪奇指责“某些党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一个‘强硬’的公报，其中包括各党都要承担的某些义务。”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筹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的协议的背离行为。”在12月10日的较早的一则广播中，松迪奇把话讲得更明确：他指名道姓地批评勃列日涅夫，他抨击了苏共的顽固立场，因为苏共坚持认为，“通向社会主义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对于合作，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

<sup>②</sup> 1975年12月30日《世界报》（巴黎）发布了一条来自莫斯科的电讯，报导了“苏联新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与此同时，雅克·阿马尔里在谈到持强硬路线的11月草案时说：“实际上，莫斯科要求这个文件……一本正经地谴责‘美国对西欧的统治意图’，也谴责‘北约组织对欧洲社会主义大家庭所形成的危险’。苏联还要求对西欧共产主义者可能参加的左派联盟下一个严加限制的定义。”

然，草案文本中大部分取得了协议，但某些重大问题仍悬而未决。)①

### 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

在会议文件问题上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对抗的同时，大多数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共同一致的利益，他们也意识到团结起来维护这些利益的重要性。1975年末和1976年初，传统的忠诚派法共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就显得意义尤为重大了。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法共更加强调赞成多党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也体现在随之产生的时时刻刻(有时几乎是专做给别人看的)对苏联政权的批评上，这样，法共和苏共之间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论战。

法国共产党人在迎接他们的二十二大(定于1976年2月4—8日举行)的筹备过程中，立场发生了转变。随后也出现了法共、意共和西共的战略性联盟。它们通过发表双边公报，声明两党赞同多党制和信仰自由，不久以后这就是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②贝林格和马歇在罗马会谈后，于1975年11月发表的意共—法共两党的声明确实可以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宣言。公报表示在“争取多党制，争取反对党的活动和生存权利，争取贯彻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民主交替的制度”方面，两党互相给予支持。“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就是意大利和法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

① 在1月的10天会议以后，南斯拉夫代表格尔里奇科夫对奥地利记者说，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不结盟国家的作用问题、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问题、裁军问题和对“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评价等等原则性问题上，至今没有取得协议(据1976年2月1日路透社、法新社来自维也纳的消息)。在上面的清单中显然还包含其它问题，如：对北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评价问题，或象“反苏”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一类概念性的问题。

② (意共—法共)1975年11月公报之前早已有了1975年7月的类似的意共—法共声明，而在11月下旬接踵而来的是法共—西共公报。



的标志,而且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会得到“保证和发展”。声明继续说:“这就需要努力争取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示威的自由,争取国内外移居的自由,争取私生活不受侵犯的自由和宗教自由。”声明又保证:“对于一切哲学、文化潮流和艺术见解有陈述自己意见的绝对自由。”两党不仅在国内范围,而且在涉及地区性的问题时,也表示要坚决促进“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西)欧一切民主和进步势力的共同行动”。<sup>①</sup> 我们对于两党信奉多党制和信仰自由的诚意也许可以打上问号(在法国更引起了广泛的怀疑)。然而,目前的问题是,法共一意共的宣言体现了对东欧政权的含蓄的挑战(法共立即明确表态的挑战)。法国共产党早就开始对苏联在对待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谨慎批评的方针。11月1日的《人道报》社论对据说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列昂尼德·普廖舍奇的命运表示关切;社论一再说,如果这是真的话,法共表示“全面反对”。<sup>②</sup> 11月12日法共政治局成员让·卡纳帕在《人道报》的专栏文章里,对苏联拒绝发给安德烈·萨哈罗夫出境签证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金一事表示反对,他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它包括行动自由,也包括出版一切著作的自由。”12月12日,法共对苏联的镇压政策的批评又迈出了更加重要的一步,法共政治局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它对一部电视记录片中描绘的苏联劳动营深信不疑,它对此表示“正式的严厉谴责”。<sup>③</sup>

---

① 《人道报》和《团结报》,1975年11月18日。后来,“欧洲共产主义”的双边公报形式也扩大到某些欧洲小党(如英国),甚至扩大到遥远的日共。日共在1976年7月的代表大会上,所走的背离教条的路程比西欧走得更远,它不仅摆脱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取代了“马列主义”。

② 在乔治·马歇对克里姆林宫作了干预后,1976年1月普廖舍奇获得释放,并获准去巴黎。

③ 《人道报》,1975年12月13日。鉴于“苏联事实上存在着人们因政治立场问题而受到起诉的情况”,所以政治局说,它“反对一切践踏人权的行为,尤其反对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

法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问题又给论战火上添油。但是法共显然想通过对苏联的镇压政策的周期性的批评来达到兜售“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也是它在树立自己的形象的运动中的最重要的策略。“社会主义和自由是同义词”，马歇在1月7日会见记者时说，“这种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适用于任何国家……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我们和苏共存在着分歧。”<sup>①</sup>可是，任凭法国社会党人的奚落，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愿从逻辑上多迈一步，也不想断定，凡是自由遭到践踏的地方，如苏联，就不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sup>②</sup>所以，法共的这些新的立场也有它本身的局限性。

在2月初召开的法共二十二大上，马歇在开幕词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苏联的镇压政策，这时，他把法共的独立自主的新姿态顽强地表现出来了。他在谈到苏联的某些发展的时候说：“我们决不允许共产主义的理想……受到不公正和无理作为的玷污……所以我们对在五十八年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里出现的践踏人权的行为表示反对。”<sup>③</sup>

### 苏共代表大会上的事件

几星期以后，马歇通过本人不出席苏共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做法，促使人们注意两党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他在2月27日答记者问的广播节目里说，他所以作出这样史无前例的决定是“由于

<sup>①</sup> 《世界报》，1976年1月9日。

<sup>②</sup> 在1976年1月下旬发表的有关法共的“演变”报告中，社会党全国书记利奥纳·若斯平说，谴责苏联的劳动营不会成为法共—苏共关系的“真正转折点”：如果法共领导人打算“从他们确信的事实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宣布“既然自由与社会主义同义，那么凡是自由的地方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唯有在这个时候，真正转折点才会到来。载《世界报》，1976年1月29日。

<sup>③</sup> 《人道报》，1976年2月6日。同一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布拉格）发表了一篇社论，它没有提法共的名字，但是它指责说，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抱否定的态度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它说不承认这一理论的人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以及]对法国的外交政策的评价方面,我们两党之间存在着分歧。”然后,当问及他本人和勃列日涅夫会晤的前景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说:“眼下不存在这种会晤的条件。就目前而言,这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加斯通·普利索尼埃代替马歇,率领法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代表大会。2月28日他在大会上的致词是非挑衅性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相当戏剧性的挑战。会后普利索尼埃率领他的代表团来到克里姆林宫的新闻中心,他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法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不能谈判的……我们来莫斯科不是为了来谈判……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如果它已经缩小成为仅仅是各共产党之间观点上的一致性的问题,那么最好就保持这种基本形态,不要再去谈论了。法共不同意勃列日涅夫对法国外交政策所持的看法。<sup>②</sup>

另外两个大的欧洲共产主义党也利用二十五大重申它们的立场,不过它们采用了颇为令人深思的不同的方式。和马歇一样,西共的圣地亚哥·卡里略没有出席大会(由居住在莫斯科的年迈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代替他发表了一篇富有挑衅意味的演说)。相反,他却率领了一个由西班牙其它反对派领袖们组成的代表团去罗马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进行会谈,他沉着地说这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罗马,他在会见《晚邮报》的记者时,他对苏联政权以及苏联和西欧党的关系问题发表了非常坦率的意见。<sup>③</sup>卡里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原始阶段”,而西欧的社会主义一旦出现的话,

---

① 《人道报》,1976年2月28日。

② 《世界报》,1976年3月2日。值得注意的是,3月1日《人道报》的专电中对这些挑衅性的言论没有作报导,该电讯只说普利索尼埃和卡纳帕在莫斯科的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陈述了法共的观点。

③ 乔万尼·鲁索:《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晚邮报》(米兰),1976年2月26日。

会迥然不同：“在西方，只要民主和多党制受到尊重，同时，如果社会主义是以多数一致为基础，那么一旦这种多数不复存在因而甘心情愿放弃权力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当人们问到他是否担心这种观点会遭到莫斯科谴责的时候，他回答道：“他们有什么权利来谴责我们？就如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一样，他们也可以批评我们。谴责意味着革出教门，共产主义运动曾经一度是一个教派，而目前已经不再是了。”

另一方面，意共的贝林格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利用这个场合申述了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作了某些富有挑衅性的系统的阐述（不过没有批评他的东道主）。<sup>①</sup>随后贝林格会见了勃列日涅夫、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特别就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交换意见”。联合公报的内容没有透露，但是在关键性的词句上盖上了“意大利”的烙印：“双方共同表示，愿意在两党之间友好合作和相互尊重、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国际合作”，但没有提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sup>②</sup>尽管法国人似乎感到有必要引起人们对他们新近摆出的独立自主架势的注意，可是在过去二十年中，意大利人却能使他们以外柔内刚的手法逐步发展起来的实实在在的独立性得到加强。

从苏联方面来看，波诺马廖夫，尤其是苏斯洛夫，一定比勃列日涅夫更为勉强地签署意共—苏共公报；因为那时，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对于如何处理会议文件和与此有关的由欧洲共产主

---

<sup>①</sup> 《真理报》（莫斯科）全文刊登了贝林格的发言，他说意共正在制订意大利的外交政策，“这个外交政策将在我国所参加的国际结盟的结构（即北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对缓和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坚决捍卫意大利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反对任何外国干涉我国内政”；他接着说，意共正在为争取一个“多元化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这个社会将保证“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和文化、艺术、科学的自由”。《团结报》，1976年2月28日。

<sup>②</sup> 《团结报》，1976年3月2日。

义思想引起的挑战问题上，克里姆林宫内部存在着分歧意见和左右摇摆的情况。有一份报告专门研究了苏共二十五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份报告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sup>①</sup>

### 持续不断的对抗

苏共二十五大前后，在官方发言人的声明或文章中（主要是苏联、东德、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sup>②</sup>），以及西欧共产党的反应方面，忠诚派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日益发展的争论越来越表面化了。总的说来，这场争论述及了这么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法则”等问题。西欧共产党通过或联合其它势力的联盟所谋求的政治进步应该达到什么水平，这是引起争论的另一个问题。不过，在这些问题的背后还隐伏着一个基本问题：西欧大多数党日益主张把他们切身的政治利益置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之上，同时也强调通过对苏联政策的有选择的批评来加强他们独立自主的要求。这就是西欧共产党向苏联当权者提出的挑战内容。挑战正好发生在苏联不遗余力地试图在各方面加强与东欧政权合作的时候，此举主要和南斯拉夫强有力的介入有关，南在这场争论中站在独立自主的党的一边；

---

① 在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普遍法则”等问题上，在反对“对机会主义的让步”作出隐晦的警告等方面，勃列日涅夫本人并不显得特别严厉（参阅《真理报》，1976年2月25日）；可是其它苏联发言人的态度却更加直截了当，他们抨击“右翼机会主义”，抨击“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把它肢解成民族性的东西”（政治局候补委员普·马舍罗夫，援引自《真理报》，2月26日）。另一方面，在苏共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新时代》杂志（莫斯科）刊登了瓦季姆·萨格拉金的一篇文章，他主张采取有利于苏联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原则是“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社会主义，尽管形式不同，必须保持社会主义的样子。”据《团结报》，1976年2月28日。

② 捷共中央书记约瑟夫·肯普尼在一篇讲话中，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转化成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机会主义的党”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新自由报》（俄斯特拉发），1976年3月15日。

所以挑战就更具有深刻的意义。<sup>①</sup>

总的来说，在这些间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的背景下，在1976年的头几个月里，全欧共产党最高级会议的筹备工作取得了忽快忽慢的进展。在1月举行的历时十天的起草会议上，讨论了东德草案的第五稿，这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形势对独立自主派有利。2月初，意大利代表安东尼奥·鲁比为《再生》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声称，关于文件的“基本格调”已经达成了协议，“虽然还有一些遗留问题要加以澄清或讨论”。<sup>②</sup>他在批评苏联和东德的发言人的时候指出，这些发言人把与苏联或苏共的团结一致视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要方面，他们坚持“不允许存在一个反苏的共产主义或一种转向反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反对华沙条约、反对经互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产主义（鲁比援引1976年1月24日《真理报》上署名为V. 科廖诺夫的文章）。鲁比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这个方案有可能实质性地被采纳在最后的文件中），他着重指出，必须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先验的反共主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个别问题上的批评，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的自由选择权的批评区别开来。”

2月中，塞季奥·塞雷在写给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中作了更明确的说明。他说，虽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但是以12月和1月柏林会议上通过的草案文件为基础，目前似

<sup>①</sup> 这里将南斯拉夫与欧洲共产党联盟中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提一下。1976年3月中旬，莫斯科出版了一本抨击“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小册子，作者是维尼阿明·米德采夫，他是苏共中央外事部门的“匿名”合作者，他的文章针对性很强，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抨击意共意识形态专家卢恰诺·格鲁皮。《团结报》的一篇社论（1976年3月19日）轻蔑地驳斥了米德采夫的“畸形的”教条主义。南斯拉夫的反应尤为强烈。3月23日，萨加拉布和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的评论痛斥了这本小册子，指责它企图将“有限主权论”强加给其它党。

<sup>②</sup> 鲁比：《解释与现实》，载《再生》杂志，1976年2月6日。几天以前，即2月2日，在答《新观察家报》记者问时，贾·帕耶塔指出，文件草案已经“准备就绪”了，“凡是背离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和我们认为在会议中有必要坚持的观点，都没有被通过。”

乎正在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和意共自第一份草案以来所维护的立场是一致的。”他继续说，这种立场“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大家所能接受的文件只能是这样一个文件，即谈论的是大家共同一致的观点，而同时又不要求制定总路线和总策略，也不要求具有任何约束力或解决诸如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不同的立场。”<sup>①</sup>

3月16—18日举行了另一次预备会议，会后宣布，会议的结果将由“起草委员会开会去讨论”。名称的改变再次表明向一致同意的文件又迈进了一大步。可是不久有消息说，由于法国代表团在3月中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这使事态的进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从贝尔格莱德、莫斯科和巴黎来的消息大体上都是这么说的。<sup>②</sup>据报导，备忘录批评新草案缺乏“阶级分析”：它要求制定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文件，尤其应该提到“资本主义危机”和它对欧洲共产党所产生的影响。报导还把备忘录和法共最近批评苏联对法国外交政策所持的态度联系起来。最后，备忘录警告说（后来法共也进一步证实了），法共对是否参加会议尚未作出最后决定。

正如这些头头是道的报导所指出的那样，空前未有的争论正在逐步展开，而且争论时常超越了大家熟悉的“中心主义者”和“自主主义者”的分界线。因而，即使法国人在强调独立自主的问题上

<sup>①</sup> 《团结报》，1976年2月14日。比利时共产党的让·特尔夫也谈到了对独立自主党的让步问题。他在向记者提到苏共二十五大时说，苏联人“不太困难地”接受了西欧共产党可以形成一个“单一的策略”的思想，他接着说，“还有，这一点经过大家一致同意后，已经明确地写进了会议筹备过程的准备文件中了……至于苏联人是否会热情地接受这个策略，那又当别论。”《红旗报》（布鲁塞尔），1976年3月12日。

<sup>②</sup> 见1976年3月23日法新社发自贝尔格莱德的电讯。保洛·加里姆贝蒂发自莫斯科的报导，载《新闻报》（都灵），1976年3月26日；雅克·阿马尔里发自莫斯科的报导，载1976年3月28至29日的《世界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几星期后，法共政治局的声明（1976年5月2日）对法新社的报导予以否认，它否认法共在会议文件方面提出过某些“强硬”的修正案，它宣称这篇报导是“纯属虚构的”。

倒向意大利、西班牙和南斯拉夫人，法国人仍会强烈反对他们在其它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北约组织等问题)。

尽管如此，中心问题还是共同一致的新准则是否能够占优势的问题。4月底，格尔利奇科夫在由三方参加的南斯拉夫报纸的答记者问中，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坚定的看法，他说，由于取得了进展，所以“在6月召开大会的实际可能性”现在是存在的。<sup>①</sup>

在5月4—6日的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上，剩下的分歧不断得到解决：公报说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将在6月初举行，大会本身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召开。可是这时在最高级会议的问题上仍旧笼罩着阴云。5月12日格尔利奇科夫在向南共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通过“令人满意的阐述”，在协议草案的某些观点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可是，至今尚未达成协议的问题都是“原则性的问题”。<sup>②</sup>就在几天以前，他还表示在6月的会上“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是有希望的，他还说，在这一点上，他希望“其它党考虑并接受南共的观点”。<sup>③</sup>

5月下旬，通过各党之间旋风式的外交接触，包括独立自主的党的双边公报和苏联访问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揭开了这一出长剧的最后一幕。6月初卡图舍夫和南共书记斯塔纳·多兰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会谈是最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据南斯拉夫消息灵通的人士说，“勃列日涅夫的使者最终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苏联人直到那一刻还在反对的南共的全部要求。”<sup>④</sup>在大会前

---

① 《新马其顿报》(斯科普里)，1976年4月30日，5月1日和2日。

② 《战斗报》(贝尔格莱德)，1976年5月13日。据推测，格尔里奇科夫基本上指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苏”等问题上的不断争论，或许也指法共提出的难题。

③ 《政治报》(贝尔格莱德)，1976年5月8日。

④ 援引自弗拉内·巴尔别里发自贝尔格莱德的电讯，载《日报》，1976年6月20日。另见弗朗索斯·费伊托的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报导，载《日报》，1976年7月17日，它提供了被称为会谈备忘录的摘要。



夕，格尔里奇科夫进一步证实，在5月的会议上，南共提出了“七项我们绝对坚持的修正内容……”，并暗示最终都被接受了。其中有一项涉及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他指出，“把任何一个国家说成是主要因素或主力军，这是不合理的。”<sup>①</sup>不言而喻，这当然是暗指苏联了。6月10—11日举行的最后一次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上，通过了意见一致的文本（这是苏联在接受南斯拉夫的要求后提出的文本），然后宣布休会至6月24日。这样做是为了使各国党的领导机关有时间去批准最终草案，不过或许也是为了等待6月20日举行的意大利议会选举的结果，因为万一选举结果会推动意共参加联合政府的谈判工作，那么它对召开大会的时间肯定会产生影响。虽然意共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未能实现，不过在选举中意共空前地获得33.7%的选票，它在票数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才败于天主教民主党。在独立自主派和莫斯科的忠诚派对阵的情况下，这一次接近胜利的局面又成为独立自主的党加强其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选举前的竞选运动中，意共比平时更为直率地宣告了它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不同于忠诚派的立场。例如，贝林格在6月会见记者时说，他丝毫也不担心会遭遇到杜布切克那样的“不公正”的待遇，因为“我们处在地球的另一部分”；当记者问到北约组织是否能为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作“有益的后盾”的时候，他欣然同意说：“我觉得在这一边更加安全。”此外，在选举前夕，《团结报》（6月1日）刊登了由不披露身分的布拉加之春的领导人写给意共的一封信，信中赞扬了意共所信奉的以多党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信中说，意共的立场帮助了正在追求“一个不再存在不平等、特权和不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东欧人民，这一点也

---

<sup>①</sup> 贝尔格莱德广播电视台答记者问，1976年6月26日。1976年9月意共的塞季奥·塞雷在和笔者的谈话中表示，他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卡图舍夫访问贝尔格莱德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

提醒了我们，原来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竟有共通之处。

### 大会终于举行

6月24日，当代表们重新聚集起来的时候，据称大会将于6月29至30日举行。开幕式前夕，勃列日涅夫和铁托在东柏林举行私下会谈。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嘲弄，因为那天正好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把南斯拉夫“革出教门”的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如今，这位伟大的异教徒，基本上用他的话来说，回到“地方自治的共产主义”中来了。党与党之间差不多经过了近两年的对抗，新近晋升为元帅的勃列日涅夫终于被不屈不挠的铁托元帅机智地战胜了。

毋庸置疑，共同一致包括了双方的让步；然而，关于会议文件，独立自主的党差不多可以随心所欲，这似乎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了。<sup>①</sup>这个文本是以共同一致的新原则（它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所有共产党的平等和自主权）为基础的最小公分母的文本；它不包含批评中国和颂扬苏联的内容；它只涉及政治行动而不涉及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它对于参加国不具有约束力（事实上，甚至不是每个党都签字的）。由于出人意料地有第二十九个代表团（抵制所有筹备会议的独立自主的荷兰党）到会，这使独立自主的党在主要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更为突出。因此，最终唯一缺席的是抱孤立主义的冰岛人和不妥协的阿尔巴尼亚人。

文件中没有提到的问题比提到的更重要。最令人注目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习惯用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删去了，而代之以地道的“意大利式”的措词：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思想的基础上，严格坚持各党的平等和

---

<sup>①</sup> 文件全文刊于《新时代》杂志，1976年7月，第28期，第17—32页。

独立自主的原则，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在争取以进步为实质的社会变革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尊重各党自由选择不同道路，在这样的前提下，[共产党]将发展它们的国际主义的、同志式的和自愿的合作和团结。

这里又一次没有赋予苏联或苏共以特殊地位。不过文件中提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首先是针对苏联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这是对传统的唯一微小的让步；然而就连这样的内容前面也冠以意大利式的词句：“共产党并不认为那些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或对它们的活动持批判态度的人是属于反共的。”<sup>①</sup>文件也提到了“西方”重视共产党和“一切其它民主力量”的对话和合作问题，“这些力量都充分保持它的特色和独立性。”最后，在共产党一致同意的文件里首次“承认不结盟国家运动……是国际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也是南斯拉夫人的主要观点。

的确，广义地说，文件中列举的洋洋大观的政治任务和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一般地说，独立自主和保守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外交政策方面，而在于意识形态、国内政策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sup>②</sup>

然而，大会上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并不是主要起安抚作用的文件，而是会议发言中表明的“始终如一的不同”的立场。所以，忠诚派的发言人一方面勉强同意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放弃苏共或苏联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却喋喋不休地坚持说，这两个问题始终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勃列日涅夫本人比保加利亚的托尔多·日夫科夫或土耳其的约尔达斯·比伦等人更狡猾更灵活；从某种

<sup>①</sup> 这里的措词不禁使人联想起意共的安东尼奥·鲁比于1976年2月6日发表在《再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表面上它代表了非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批评，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为了证明西欧共产党对东欧政权的批评是正确的。

<sup>②</sup> 有趣的是，会议的“结算表”大致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见海因茨·蒂默曼：《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会议：结果与展望》，载《联邦东方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通讯》第28期（科隆1968年）。

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在会上的表现视为他在一再重申，他的权威是凌驾于苏斯洛夫等意识形态强硬路线者之上的。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另一端，非共产党国家的新闻记者得到了贝林格、马歇和卡里略等欧洲共产主义三重奏演讲中的最精彩的部分的“副本”。<sup>①</sup>其中最使忠诚派们恼火的是卡里略，他毫不含糊地否定了苏联的权威，他明确地提到苏联一度支持恩里克·利斯特分裂派，而且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为从外国领土上撤军作出榜样。

会上，贝林格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作了最完整的阐述，他呼吁全体与会者承认党与党之间关系上的实质性变化，“[必须]废除目前已经过时的办法。”他建议的新办法包括公开辩论，思想自由交锋，以及批评的权利（关于这一点，会上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提到入侵捷克事件——这是使前布拉加之春的领导者们伤心的事件，他们如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样，致函各代表团，抗议异国的压迫）。<sup>②</sup>贝林格强调指出，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处在“我国是其成员的国际结盟的结构（即北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中的”，他指出，现在其它西欧共产党也持有意共的观点，他们展望一个将“国家和它的民主结构本质上建立在物质而非意识形态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展望一个以多党制和由选举中得多数票的党轮流组阁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展望一个以工会自治，宗教自由，言论、文化、艺术和科学自由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sup>③</sup>

如果说东柏林会议破天荒地一回公开展示了根本分歧，那么正如法共的马歇暗示地那样，这样的会议也可能是最后一回了。他说，“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既然从

<sup>①</sup> 由于举行“公开”会议一直是独立自主党的另一个基本要求，所以采访会议的八百多名记者通过闭路电视和向代表采访，完全掌握了会议的进展情况。

<sup>②</sup> 《团结报》，1976年6月30日。

<sup>③</sup> 《团结报》，1976年7月1日。

今以后再也不能制定出一个各党都能接受的战略决策，那么只有谋求更加生动、灵活和有效的集体会晤才是合乎时宜的”，这样的会晤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现实问题，而且“在结束的时候也不必总要通过一个文件”。<sup>①</sup> 法国和其它独立自主的党都明确表示，他们反对忠诚派打算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计划，克里姆林宫早就设想把世界共产党大会作为欧洲共产党大会的续篇。<sup>②</sup>

### 评价和后果

总的说来，认为这次会上独立自主的党取得了胜利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最好也不要象东德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罗伯特·哈韦曼那样，过高地估计了胜利的影响。他认为：“对欧洲共产主义来说，柏林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一个党的霸权统治。不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全世界的共产党，包括东欧党在内都摆脱了苏共的霸权统治。”<sup>③</sup>

东欧新闻界首先出来缩小自主主义者们的“胜利”影响，他们对会议报导采取了无耻的新闻审查手段，其中对西欧共产党发言的报导控制尤严。<sup>④</sup>（唯一例外的是《新德意志报》，它作为“东道主的喉舌”，仿效 1969 年莫斯科国际会议时候的《真理报》，不得不刊登发言的全文。）同时，以苏联报刊为首的这些宣传工具，却以胜利的口气大肆渲染大会的成就，说什么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牢不可破的团结等等；保加利亚人显得

---

① 《人道报》，1976 年 7 月 1 日。

② 1976 年 9 月，意共的塞季奥·塞雷对笔者说，他认为在欧洲会议上开创的先例（如共同一致原则）也将适用于一切未来的世界性会议，他又说，他相信苏联人也是“现实主义者”，由于大部分欧洲党将不参加世界大会，因此苏联人也会悄悄地把召开这次会议的计划打消掉。

③ 《明镜》周刊（汉堡），1976 年 7 月 5 日。

④ 见 J.L. 克尔：《新闻工具和欧洲共产党会议：对有选择性的报导的研究》，载《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研究》（慕尼黑），RAD171 号，1976 年 8 月 11 日。

尤为热心，他们以辩论的形式证明苏联“必然是其它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典范”。<sup>①</sup>

南斯拉夫对“窜改柏林达成的共同观点”提出了强烈的反驳，<sup>②</sup>但是一般说来，起初，西欧党没有理会这类故伎重演的手法（虽然有一位意共发言人曾对“断章取义和歪曲的解释”提出过抗议）。<sup>③</sup>

然而，当显然由统治者授意的争论不断地展开，并开始批评“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和“反苏主义”，而且相应提出了要坚持“总的法则”的时候，法共起来反击了。10月中旬法共派遣皮埃尔·朱坎出席了一个群众大会，会上，他指名道姓地要求释放在苏联、捷克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犯，在发言中他代表他的党宣称：“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内采用践踏人权的手段。”<sup>④</sup>当匈牙利政治局委员代舍·奈迈斯分辩说，任何社会主义政权，“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必须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职能”，这时法共的让·卡纳帕以不适用于法国的具体情况为理由，驳斥了东欧的样板，而且他以进攻的语气讲了下面一段话：

如果你认为为了在法国建设社会主义，因而必须求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就如匈牙利（苏联和其它国家）实行的那样，[那么]你就有必要声明，必须取缔反对党，设立新闻审查制度，剥夺人民的部分言论、结社和示威的自由等等，你也必须告诉法国的工人阶级，“这就是共产党人向你

---

① 中央委员 N. 伊里巴扎科夫发表在《工人事业报》上的文章（索非亚），1976年8月11日。

② 弗拉多·特斯利奇发表于《战斗报》上的文章，1976年8月14日。见扎登科·安蒂克：《贝尔格莱德抨击东欧关于柏林共产党会议的观点》，载《自由欧洲电台研究》，RAD180号，1976年8月18日。

③ 安·鲁比：《柏林，超越了论战》，载《再生》杂志，1976年7月30日。

④ 《人道报》，1976年10月22日。法国数学家的一个委员会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掀起要求释放两名苏联的，一名捷克的和三名拉丁美洲的政治犯的运动。朱坎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苏联和捷克指责他参与了“这一肮脏的勾当”（塔斯社），为了反击苏联和捷克的指责，法共把他的发言印行了七百万份。

推荐的后果之一”，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论什么形式，就是(不完全是，但就是)这个样子的。①

非常清楚，在这些争论交锋的背后隐藏着各不相同的政治利益。从法国的角度出发，卡纳帕和奈迈斯的对阵表明法共打算通过和共产主义政权的不得人心的做法决裂以确立法共对选举的信赖，同时在和社会主义党的同盟或对手对抗时，加强它的地位。从东欧的角度来看，极权主义政权显然担心，西欧共产主义思想的“颠覆性”影响会对他们本国人民发生作用。这也是他们展开论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这种影响早就发生了作用，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如苏联的安德烈·萨哈罗夫，罗伊·麦德维杰夫，东德的罗伯特·哈韦曼和沃尔夫·比尔曼以及波兰的爱德华·利平斯基和亚当·米赫尼克等都对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和立场表示欢迎。在东、西方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唯有西共的卡里略直截了当地提到了这个不仅敏感而且重要的因素。他在答(挑衅性地)意大利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报纸《宣言报》记者问时说，认为苏联对欧洲出现的多党制的社会主义政权“不会关切”，那纯粹是幻想。这些政权“不是苏联的附庸，政治结构也不同于人民民主的结构。如果我们做到那一点的话，毫无疑问苏联将越来越注意[西]欧式的社会主义。”②

由此可见，西欧共产主义思想对苏联的权威和利益提出了明显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挑战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倘若欧洲共产主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欧洲共产党有影响的区域性的社会政治的现象(这已经由1974年1月由十八个党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和1973年下半年以来经常举行的专题会议所证明)，那么直率的挑战也仅仅来自一部分党。当然站在最

---

① 《新法兰西报》，1976年10月5日。卡纳帕对奈迈斯作了回答，后者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西欧共产党应该从匈牙利经验中吸取教训。

② 《宣言报》，1975年11月1日。

前哨的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大党”，1977年3月，三党的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发表了一个表明观点的联合宣言。至于其它西欧党，就没有它们走得远。<sup>①</sup>

其次，即使西欧党中最独立和最“修正主义”的党在政治上谋求同社会民主党联盟，但它们仍旧打算维持其共产党的身分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的身分。一方面它们力图扩大自己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它们力求避免同莫斯科发生公开决裂；<sup>②</sup>这一点反过来也使它们的关键性的独立自主原则带有局限性。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如法国的罗热·加朗迪或奥地利的弗兰茨·马雷克也许会敦促西欧共产党对东欧政权作彻底的剖析，并得出它们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不过这种敦促只能是徒劳无益的<sup>③</sup>。此外，西欧共产党的批评也存在着质的差别，这就削弱了所谓的原则性批评的分量：我们不妨把意共支持被监禁的布拉加之春的领袖和对1976年7月在东柏林墙枪杀一名意共卡车司机作出的窘迫的反应对比一下；也不妨把意共对苏联处置政治犯的批评和1976年6月在乌尔索斯—拉德姆骚动后迫害工人而未作出反应对比一下，问题就非常明显了。而且还应该看到，针对这些政权的最全面的批评所涉及到的问题都不是当前的问题，而是过去的，尤其是早已过时的斯大林时代的问题。<sup>④</sup>

<sup>①</sup> 例如，丹共在1976年9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效法葡共两年前的做法，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然而，这两个党都不愿步法国的后尘，以此来作为和执政的共产党进行争论的基础。

<sup>②</sup> 最明显的例外是冰岛共产党，多年来它和苏共或其它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事实上的联系。

<sup>③</sup> 由意共的出版社出版的最激烈地指控东欧政权的书籍是由一名（流放中的）持不同政见的波兰共产党人撰写的，这倒颇为耐人寻味。见弗洛德齐米耶兹·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特点》，罗马1974年。

<sup>④</sup> 出于某种兴趣，最近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人作家以极为客观的笔调编写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历史。见朱塞珀·博法：《苏联历史》，罗马1976年；让·厄莱斯坦：《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巴黎1975年；四卷本《苏联历史》，第二版，巴黎1972—1975年。



1977年6月下旬，当苏联攻击西共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时候，西共所作出的反应恰当地表示了西共打算同世界革命运动保持联系的深切愿望。<sup>①</sup>西共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了一项公报，宣称支持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立场，驳回了苏联的批评，公报还谴责苏联的评论家以“逐出教门”的手法取代“对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同时，公报指出，对卡里略的攻击不仅仅是针对西共的，也是针对“所有赞同以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共产党的。”<sup>②</sup>此外，卡里略和西共表示，他们无意把对抗推向与苏共决裂的地步，而且他们还同意为缓和两党的紧张状态作出努力。1977年11月初，言行一致的卡里略亲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纪念（虽然后来他发现，在整个庆祝活动中，苏共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演）。

此外，就如早先提到过的那样，一般来说，独立自主的西欧共产党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抱支持的态度，这一点对苏联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因为苏联显然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的利益之上的。可是，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注意某些背离这个格局的地方。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对北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采取了颇不寻常的路线。自1975年3月意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意共一直正式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西方力量均衡的做法，这一主张毫不含糊地适用于参加北约组织的意大利，而且也适用于不结盟的南斯拉夫。至于西共方面，它的外事发言人马努埃尔·阿斯卡拉特曾经这么说过：“只有在解决东西方集团的过程中，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他又说，加入

---

<sup>①</sup> 虽然在此期间苏联新闻界的好些文章都批评了卡里略，可是在一篇评论性的文章里集中了对他的指责。评论批判了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巴塞罗纳1977年）。这篇社论发表在莫斯科《新时代》杂志上，1977年6月第26期，第9—13页；塔斯社1977年6月29日转发了电讯。

<sup>②</sup> 《工人世界》，1977年6月29日。

欧洲共同市场是民主的西班牙“唯一的抉择”。<sup>①</sup> 最后一点，法共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苏联对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外交政策所采取的宽容态度）上，公开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在上述三个例子中，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成分占了相当的比重（其实，在大部分外交政策方面，三个党习以为常地支持苏联的路线<sup>②</sup>），但是，西欧共产党为了在前进的道路上适应社会和政治环境，他们倾向于把本身的政治利益放在首位，这也可以看作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一种倾向性。

正是出于这种倾向，西欧共产党（处于严重分裂的芬共例外，它正在设法消除由苏联政权的地理、政治阴影的影响所造成的内部倾轧）正在努力谋求维持和尽可能地扩大对苏联的独立性。关于这一点，从它们对毛泽东逝世反应上也可以看出来。《团结报》和《人道报》都用了四个版面来报导马歇所称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去世。<sup>③</sup> 直到毛逝世前不久，法共对毛主义的批评一直相当激烈。<sup>④</sup> 现在，法国人关心的不仅是减少过去的那种敌对情绪，而且表示愿意和中国人恢复友好关系（西班牙和意大利党早已采取的行动）。<sup>⑤</sup> “这些分歧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此

---

① 1975年10月在科隆举行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秘密会议上通过了这篇声明，笔者当时也在场。我们也应该看到，或许由于西一意一南的抵制，欧洲会议的文件中删去了对美国和北约组织的例行攻击。

② 最近，迈克尔·莱迪恩和“意共的决策者”谈话时，他“请他们谈一下意共和苏联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冲突，如果存在的话。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存在这样的冲突。”见他所写的《苏联的团体》，载《评论》杂志（纽约），1976年11月号，第51—54页。

③ 见1976年9月10日的两报。

④ 在1976年2月举行的法共二十二大上，尽管马歇强调法共要摆脱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同时也批评了苏联的镇压政策，但是他仍然谴责北京的政策是“极为反动……昏庸和危险的”。载《人道报》，1976年2月5日。

⑤ 1971年9月，总书记卡里略率领西共代表团前往北京，力求与中共恢复正常关系，结果这一尝试没有成功。毛逝世前一个月，贾·帕耶塔透露说，那时，卡里略也为意共带去了讯息，以便“让中国人了解我们希望在意大利或在中国会见中共领导人的愿望”（《团结报》，1976年8月11日）。这一建议如同意共通过罗马尼亚和越南向北京作出的姿态一样，都没有被理采，不过帕耶塔明确地声称，意共的立场是不会变的。

我们深表遗憾”，法共中央委员会在给北京的唁电中说。“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且历来也不是我们的愿望。”<sup>①</sup>

中国人拒绝接受他们的唁电，意共，尤其法共对此作出了宽厚的反应，这也同样意味深重。让·卡纳帕说，“这也改变不了法共的深切信念，不论我们之间的分歧多大，也决不应该导致关系的恶化……将来，两党之间将会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关系——和缓的、全面的和友好的关系。”<sup>②</sup>这么宽厚的反应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法共和意共基本上并不是指望和中国恢复关系才发出这样的“信号”，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存心为了让苏联看看意共和法共的独立自主的立场——总之，向北京靠拢的一步比离开莫斯科的一步要小。但是当有人向塞季奥·塞雷问到这件事时，他对意共仍旧和“莫斯科保持着特殊的、至少是优先的关系”的说法作了驳斥，他说，“如果在发展关系方面有什么重点的话，目前的重点显然在本地理区域内，重点应放在和意大利党面临类似问题的党的身上——不仅共产党，也包括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sup>③</sup>

不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上，还是通过西欧共产党对东欧发生的有损于形象的事件的反应上，人们可以预期，西欧共产党和东欧政权之间的断断续续的论战将会继续下去，而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无疑地会加强这种倾向。可是，正如先前表明的那样，欧洲的共产党不想和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党断绝关系。所以，它们绝不会超越零星的、分散的批评，也不会去彻底分析东欧政权失败的原因。<sup>④</sup>

① 《人道报》，1976年9月10日。

② 《世界报》，1976年9月17日。

③ 《晚邮报》，1976年9月15日。见1975年12月14日圣地亚哥·卡里略答《新闻报》记者时的声明：“与东欧执政党的联系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也存在着合作关系；但是重点在西方。”

④ 小小的英共也许对于和这些政权的公开辩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1976年1月，英共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月刊（伦敦）刊登了一篇由前总书记约翰·高兰写

另一方面，虽然苏共深为关切西欧共产党思想对东欧集团所造成的动乱的影响，不过看来它对加深与这些党的关系恶化也不感兴趣，尤其因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挑战并不仅仅是、或首先是针对苏联的权威的，因此，它更不会去做这样的事。<sup>②</sup> 因为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南欧诸国的作用不断扩大，这使欧洲共产主义会成为日益增长的、即使很大程度上还是潜伏着的因素，这种重要性也许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它最终会使敌对的北约联盟日益趋向于有节制的动荡。不过这些这里就不谈了。

---

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文章，文章长达 27 页，并欢迎读者“投书讨论”。从 3 月号起开始了公开辩论，辩论一直延续了好几期，一般说来，每期以“限额的方法”发表两封批评苏联政权的来信和一封支持苏联的来信。

<sup>②</sup> 见海因茨·蒂默曼：《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载《德国文献》（科隆），1976 年 12 月号，第 1276—1298 页。

## 人名译名对照表

### A

Aalto, Arvo 阿尔托, 阿尔沃  
Aaltonen, Aimo 阿尔托宁, 艾莫  
Acquaviva, Sabino 阿奎维瓦, 萨比诺  
Agius, Paul 阿吉乌斯, 保尔  
Albright, David E. 奥尔布赖特, 戴维  
Alegria, Manuel Diez 阿莱赫里亚,  
马努埃尔·迪埃斯  
Alenius, Ele 阿莱纽斯, 埃莱  
Alfonso XIII 阿尔丰索十三世  
Allardt, Erik 阿拉德, 艾里克  
Allende, Salvador 阿连德, 萨尔瓦多  
Almond, Gabriel A. 阿尔蒙特, 加  
布列尔  
Altan, Carlo Tullio 阿尔坦, 卡洛·  
图利奥  
Alvarez, Santiago 阿尔瓦雷斯, 圣地  
亚哥  
Amalric, Jacque 阿马尔里, 雅克  
Andreotti, Giulio 安德雷奥蒂, 季乌  
利奥  
Antich, Puig 安蒂奇, 普伊格  
Antunes, Ernesto Augusto de Melo  
安图内斯, 埃内斯托·德·梅洛  
Appel, Gotfred 阿佩尔, 戈特弗雷德  
Areilza, Jose Maria 阿雷尔萨, 何塞  
· 马利亚  
Ariza, Julián 阿里萨, 胡利安  
Arnalds, Ragnar 阿纳尔兹, 拉格纳  
Aspaturian, Vernon V. 阿斯帕图伦,  
弗农

Averoff-Tossizza, Evangelhos 阿韦  
罗夫-托西扎, 埃凡格洛斯  
Azcarate, Manuel 阿斯卡拉特, 马努  
埃尔  
Azevedo, Jose Pinheiro de 阿泽韦  
多, 何塞·平埃罗·德

### B

Baillet, Louis 巴约, 路易  
Barbieri, Frane 巴尔别里, 弗拉内  
Barnes, Samuel H. 巴恩斯, 萨缪尔  
Barrillon, Raymond 巴里翁, 雷蒙  
Belda, Rafael 贝尔达, 拉斐尔  
Beneyto, Jose Vidal 贝内托, 何塞·  
维达尔  
Bergquist, Mats 贝格屈斯特, 马茨  
Berlinguer, Enrico 贝林格, 恩里科  
Biermann, Wolf 比尔曼, 沃尔夫  
Bilbao 比尔鲍  
Bilen, Yoldas 比伦, 约尔达斯  
Bilić, Jure 比里契, 尤莱  
Billoux François 比尤, 弗朗索瓦  
Birch Reg 伯奇, 雷格  
Blanco, Louis Carrero 布莱科, 路易  
斯·卡雷罗  
Blin, Roger 布兰, 罗热  
Boccaro, Paul 博卡拉, 保尔  
Boffa, Giuseppe 博法, 朱塞珀  
Bolaffi, Angelo 博拉菲, 安杰洛  
Bon, Frederic 邦, 弗雷德里  
Borg, Olavi 博尔格, 奥拉维  
Borga, Cesário 博尔加, 塞扎里奥

Borkenau, Frank 博克瑙, 弗兰克  
Brabo, Pilar 布拉博, 皮拉尔  
Bravo, Gregorio Lopez 布拉沃, 格  
雷戈里奥·洛佩斯  
Brezhnev 勃列日涅夫  
Brus, Wlodzimierz 布鲁斯, 弗洛德  
齐米耶兹  
Bukovskii, Vladimir 布科夫斯基, 弗  
拉季米尔  
Burks, R.V. 伯克斯  
Busquets, Julio 布斯克茨, 胡里奥

### C

Caciagli, Mario 卡恰利, 马里奥  
Caetano, Marcello 卡埃塔诺, 马尔  
塞洛  
Camacho, Marcelino 卡马乔, 马尔  
塞利诺  
Camunas, Ignacio 卡穆尼亚斯, 伊  
格纳西奥  
Cano, Inista 卡诺, 伊尼斯塔  
Capecchi, Vittorio 卡佩基, 维托里奥  
Cardiel, Victor Diaz 卡迪埃尔, 维克  
托·迪亚斯  
Cardoso, Antonio Lopes 卡多索, 安  
东尼奥·洛佩斯  
Cardoso, Mario 卡多索, 马里奥  
Carlos, Juan 卡洛斯, 胡安  
Carrillo, Santiago 卡里略, 圣地亚哥  
Carvalho, Otelo Saraiva de 卡瓦  
洛, 奥特洛·萨赖瓦·德  
Carvalho, Saraiva de 卡瓦洛, 萨赖  
瓦·德  
Castellanos, Pablo 卡斯特拉诺斯, 帕  
布洛  
Castronovo, Valerio 卡斯特罗诺沃,  
瓦莱里奥  
Cavazza, Fabio Luca 卡瓦扎, 法比  
奥·卢卡  
Cépède, Denis 塞佩德, 丹尼斯

Chao, Ramon 乔, 拉蒙  
Chambaz, Jacques 香巴士, 雅克  
Chiaromonte, Gerardo 基亚罗蒙泰,  
杰拉尔多  
Cornner, Walter D. 康纳, 沃尔特  
Cornell, Richard 科内尔, 理查德  
Cortezo, Jaime 科尔特索, 海梅  
Cotteret, J. M. 科特雷  
Cousin, Alexis 库森, 阿历克西  
Coutinho, Antonio Rosa 科蒂诺, 安  
东尼奥·罗萨  
Cunhal, Alvaro 库尼亚尔, 阿尔瓦罗  
Curiel, Enrique 库列尔, 恩里克

### D

Dahl, Robert A. 达尔, 罗伯特  
Dallin, Alexander 达林, 亚历山大  
Davidshofer, William J. 戴维肖弗,  
威廉  
Décaillot, Maurice 德凯洛, 莫里斯  
Denis, Jacques 德尼, 雅克  
Devlin, Kevin 德夫林, 克文  
Dimitriou, Takis 季米特里乌, 塔基斯  
Dogan, Mattei 多甘, 马特  
Dolanc, Stane 多兰茨, 斯塔纳  
Dominach, Jean-Marie 多米纳奇, 琼  
—马里  
Doriot, Jacques 多里奥, 雅克  
Drakopoulos, Haralambos (Babis)  
德拉科波洛斯, 阿拉拉姆波斯  
Dubček, Alexander 杜布切克, 亚历  
山大  
Dupoirier, Elizabeth 迪普瓦里埃, 伊  
丽莎白  
Dupuis, Marc 迪皮伊, 马克

### E

Eanes, Antonio Ramalho 埃阿内  
斯, 安东尼奥·拉马洛  
Einaudi, Mario 艾瑙迪, 马里奥

Elleinstein, Jean 厄莱斯坦, 让  
Elvira, Carlos 埃尔维拉, 卡洛斯  
d'Estaing, Giscard 德斯坦, 吉斯卡尔  
Eudes, Dominique 埃夫泽斯, 佐米  
尼克

## F

Fabião, Carlos Soares 法比亚奥, 卡  
洛斯·索亚雷斯  
Fabre, Robert 法布尔, 罗贝尔  
Fagerholm, K.A. 法格霍姆  
Fajon, Etienne 法戎, 艾蒂安  
Fallaci, Oriana 法拉奇, 奥里亚纳  
Farakos, Grigorios 法拉科斯, 格里  
戈里奥斯  
Falber, Reuben 福尔伯, 鲁本  
Fallacci, Oriana 法拉西, 奥里阿纳  
Fejto François 费伊托, 弗朗索斯  
Fields Rona, M. 菲尔兹, 罗纳  
Florakis (Yotis) Harilaos 弗洛拉基  
斯(约蒂斯), 阿里拉奥斯  
Foa, Vittorio 福阿, 维托里奥  
Franchi, Paolo 法朗基, 保洛  
Franco, Francisco 弗朗哥, 法朗西斯  
科  
Franco, Nicolas 弗朗哥, 尼古拉斯  
French, Sid 弗伦奇, 锡德  
Furubotn Peder 富鲁博滕, 佩德  
Fusaroli, Gaetano 富萨罗利, 加埃塔  
诺

## G

Galli, Giorgio 加利, 乔尔焦  
Galvan, Enrique Tierno 加尔万, 恩  
里克·铁尔诺  
Garandy, Roger 加朗迪, 罗热  
Garcia, Cipriano 加尔西亚, 西普里亚  
诺  
Garcia, Javier 加尔西亚, 哈维尔  
Garcia, Lopez Antonio 加尔西亚,

洛佩斯·安东尼奥  
Garcia, Trevigano Antonio 加尔西  
亚, 特雷维哈诺·安东尼奥  
Garimberti, Paolo 加里姆贝蒂, 保洛  
Garosci, Aldo 加罗斯西, 奥尔多  
Ghini, Celso 吉尼, 切尔索  
Giannaris, George 吉安纳里斯, 乔治  
Gilberg, Trond 吉尔伯格, 特龙德  
Gimenez, Joaquin Ruiz 希梅内斯,  
霍阿金·鲁伊斯  
Giovanni, Biagio de 乔万尼, 比亚乔  
·德  
Glistrup, Mogens 格利斯特鲁普, 莫  
根斯  
Gollan, John 高兰, 约翰  
Gomes, Francisco da Costa 戈梅  
斯, 法朗西斯科·达·科斯塔  
Gonçalves, Avelino 贡萨尔韦斯, 阿  
韦利诺  
Gonçalves, Vasco dos Santos 贡萨  
尔韦斯, 瓦斯科·多斯·桑托斯  
Gontikas, Dimitris 贡蒂卡斯, 季米  
特里斯  
González Felipe 贡萨雷斯, 费利佩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奥  
Grapin, Jacqueline 格雷平, 杰奎琳  
Graubard, Stephen 格劳巴德, 斯蒂芬  
Grayson, George W. 格雷森, 乔治  
Greene, Thomas 格林, 托马斯  
Grevet, Patrice 格雷弗, 帕特里斯  
Griffith, William E. 格里菲思, 威廉  
Grimau, Julian 格里毛, 胡利安  
Grlickov, Aleksandar 格尔里奇科夫,  
亚历山大  
Gruppi, Luciano 格鲁皮, 卢恰诺  
Gylling, Edvard 居林, 爱德华

## H

Hagberg, Hilding 哈格贝格, 希尔丁  
Hagel, Rolf 哈耶尔, 罗尔夫

Hakalehto, Ilkka 哈卡莱赫托, 伊尔凯  
 Halperin, Elaine P. 豪佩林, 埃莱茵  
 Hamilton, Richard 汉密尔顿, 理查德  
 Hancock, M. Donald 汉科克, 唐纳德  
 Hansen, Arvid 汉森, 阿维德  
 Harris, Jonathan 哈里斯, 乔纳森  
 Hassner, Pierre 哈斯纳, 皮埃尔  
 Havemann, Robert 哈韦曼, 罗伯特  
 Hazelrigg, Lawrence 黑兹利格, 劳伦斯  
 Hegge, Per Egil 黑盖, 佩尔·埃伊尔  
 Helo, John 黑洛, 约翰  
 Hentilä, Jorma A. 亨蒂莱, 约尔马  
 Hermansson, Carl-Henrik 赫尔曼松, 卡尔-亨里克  
 Hermet, Guy 赫梅特, 吉  
 Hilt, Christian 希尔特, 克里斯蒂安  
 Hitler 希特勒  
 Hlivka, Ivan 赫利夫卡, 伊凡  
 Hoagland, Jim 霍格兰, 吉姆  
 Hodgson, John H. 霍吉森, 约翰  
 Hodnett, Grey 霍内特, 格雷  
 Høglund, Zeth 赫格龙德, 塞特  
 Hottinger, Arnold 霍廷格, 阿诺德  
 Hotzeas, Iannis 奥齐阿斯, 伊安尼斯

## I

Ibárruri, Dolores 伊巴露丽, 多洛雷斯  
 Iliou, Elias 伊利乌, 伊利阿斯  
 Inbeni, Renzo 因贝尼, 伦佐  
 Inglehart, Ronald 英格尔哈特, 罗纳德  
 Ingrao, Pietro 英格劳, 皮耶特罗  
 Ioannidis, Dimitrios 伊奥安尼季斯, 季米特里奥斯  
 Iordanidis, Issak 伊奥扎尼季斯, 伊萨克

Ipsevich, Giaemilio 伊普塞维奇, 贾埃米利奥  
 Iribadzakov, N. 伊里巴扎科夫  
 Iribarne, Manuel Fraga 伊里巴尔内, 马努埃尔·弗拉加

## J

Jaakola, Antti 亚科拉, 安蒂  
 Jacoviello, Alberto 雅科维耶洛, 阿尔贝尔托  
 Jean-Jacques 让-雅克  
 Jespersen, Knud 耶斯珀森, 克努德  
 Johnson-Smith, Kimberly 约翰逊-史密斯, 金伯利  
 Jonsson, Bjorn 荣松, 布荣  
 Josefsson, Ludvik 约塞夫松, 吕德维克  
 Jospin, Lionel 若斯平, 利奥纳  
 Juan, Don 胡安, 唐  
 Juquin, Pierre 朱坎, 皮埃尔

## K

Kabas, D.P. 卡瓦斯  
 Kanapa, Jean 卡纳帕, 让  
 Kappos, Konstantinos 卡波斯, 康斯坦丁诺斯  
 Karamanlis, Ahileus 卡拉曼利斯, 阿伊莱夫斯  
 Karamanlis, Konstantinos 卡拉曼利斯, 康斯坦丁诺斯  
 Karjalainen, Ahti 卡尔亚莱宁, 阿赫蒂  
 Katushev, Konstantin 卡图舍夫, 康斯坦丁  
 Kekkonen, Urko 凯科宁, 乌尔科  
 Kempny, Josef 肯普尼, 约瑟夫  
 Kendall, Walter 肯德尔, 沃尔特  
 Kerr, J.L. 克尔  
 Keto, J.W. 凯托  
 Key, Jr. V.O. 小凯伊



Khrushchev 赫鲁晓夫  
 Kilbom, Karl 奇尔邦, 卡尔  
 Kitsikis, Dimitri 基齐基斯, 季米特里  
 Kjartansson, Magnus 基亚坦松, 马格尼斯  
 Knudsen, Martin Gunnar 克努德森, 马廷·贡纳  
 Koivunen, Matti 科伊武宁, 马蒂  
 Kolliyanis, Kostas 科利亚尼斯, 科斯塔斯  
 Korionov, V. 科廖诺夫  
 Koskiahio, Tapio 科斯基阿霍, 塔皮奥  
 Kosola, Vihtori 科索拉, 维赫托里  
 Kriegel, Annie 里克格尔, 安妮  
 Kuusinen, Hertta 库西宁, 赫塔  
 Kuusinen, Otto 库西宁, 奥托  
 Kyrkos, Leonidas 基尔科斯, 莱奥尼扎斯

## L

Labini, Paolo Sylos 拉比尼, 保罗·西洛斯  
 Lambrakis, Grigorios 拉姆布拉基斯, 格里戈里奥斯  
 Lane, Robert E. 莱恩, 罗伯特  
 Lange, Peter 兰格, 彼得  
 Langfeld, Knut 兰菲尔德, 克努特  
 Lapalombara, Joseph 拉帕隆巴拉, 约瑟夫  
 Larsen, Aksel 拉森, 阿克塞尔  
 Larsen, Reidar 拉森, 雷达  
 Lavau, Georges 拉沃, 乔治斯  
 Lecanuet, Jean 勒卡纳, 让  
 Ledeen, Michael 莱迪恩, 迈克尔  
 Lehen, T. 列亨  
 Leskinen, Vaino 莱斯基宁, 韦纳  
 Libertini, Lucio 利贝尔蒂尼, 卢乔  
 Linderot, Sven 林德罗特, 斯文

Lindhagen Carl 林德哈延, 卡尔  
 Linz, Juan 林兹, 胡安  
 Lipinski, Edvar 利平斯基, 爱德华  
 Lipset, Seymour Martin 利普塞特, 赛摩·马丁  
 Lister, Enrique 利斯特, 恩里克  
 Littunen, Yrjö 利图宁, 伊尔耶  
 Livolsi, Marino 利沃尔西, 马利诺  
 Llopis, Rodolfo 洛皮斯, 罗多尔福  
 Longo, Luigi 隆哥, 路易季  
 Lopez, Antonio Garcia 洛佩斯, 安东尼奥·加尔亚  
 Lourenço, Vasco 洛伦索, 瓦斯科  
 Louro, Vitor 洛罗, 维托尔  
 Lövlien, Emil 勒夫利恩, 埃米尔  
 Lowenthal, Richard 洛温撒尔, 理查德

## M

Macaluso, Emanuele 马卡卢索, 埃马努埃莱  
 McInnes, Neil 麦金尼斯, 尼尔  
 McLennan, Gordon 麦克伦南, 戈登  
 Maitan, Livio 马伊坦, 利维奥  
 Markezinis, Spyros 马凯齐尼斯, 斯皮罗斯  
 Mammarella, Giuseppe 马玛雷拉, 朱塞佩  
 Mannerheim Gustaf 曼内尔黑姆, 古斯塔夫  
 Marchais, Georges 马歇尔, 乔治  
 Marcos, Alejandro Rojas 马尔科斯, 阿莱汉德罗·罗哈斯  
 Marek, Franz 马雷克, 弗兰茨  
 Maridis, Roy 马里迪斯, 罗伊  
 Marin, Francisco Romeo 马林, 弗朗西斯科·罗梅罗  
 Marradi, Alberto 马拉迪, 阿尔贝托  
 Martinas, José Inacio da Costa 马蒂纳斯, 何塞·伊纳西奥·达·科

## 斯塔

Masherov, P. 马舍罗夫  
Matteucci, Nicola 马泰乌奇, 尼科拉  
Matthews, George 马修斯, 乔治  
Mavros, Georgios 马夫罗斯, 乔治奥  
斯  
Maxwell, Kenneth 马克斯威尔, 肯尼  
思  
Medvedev, Roy 麦德维杰夫, 罗伊  
Meisler, Stanley 迈斯勒, 斯坦利  
Mellado, Manuel Gutierrez 梅利亚  
多, 马努埃尔·古铁雷斯  
Mendivil, Fernando Santiago Diaz  
de 门迪维尔, 费南多·圣地亚哥·  
迪亚斯·德  
Menduni, Enrico 门杜尼, 恩利哥  
Metaxas, Ioannis 梅特克萨斯, 伊奥  
安尼斯  
Meyendorff, John 梅恩多夫, 约翰  
Meyriat, Jean 梅里阿, 让  
Micaud, A. Charles 密考德, 查尔  
斯  
Michnik, Adam 米赫尼克, 亚当  
Midtsev, Veniamin 米德采夫, 维尼  
阿明  
Miettunen, Martti 米图宁, 马尔蒂  
Mitsotakis, Konstantinos 米佐塔基  
斯, 康斯坦丁诺斯  
Mitterand, François 密特朗, 弗朗  
索瓦  
Molière 莫利哀  
Mollet, Guy 莫勒, 居伊  
Mujal-León, Eusebio M. 穆哈尔—  
莱翁, 欧塞比奥  
Muñoz, Federico Silva 穆尼奥斯,  
费德里科·西尔瓦  
Murialdi, Paolo 穆里阿尔迪, 保罗  
Murterria, Mario 穆特里亚, 马里奥  
Mussi, Fabio 穆西, 法比奥  
Mussolini 墨索里尼

## N

Nasarre, Eugenio 纳萨雷, 埃乌赫  
尼奥  
Navarro, Carlos Arias 纳瓦罗, 卡洛  
斯·阿里亚斯  
Nefeloudis, Pavlos 内费卢季斯, 帕弗  
洛斯  
Nemes, Desö 奈迈斯, 代舍  
Nerman, Ture 内曼, 蒂勒  
Newmann, Sigmund 纽曼, 西格蒙  
Nissen, Johan Egede 尼森, 约翰·埃  
格德  
Noguiera, Aldo 诺古耶拉, 阿尔多  
Nolleau, Henri 诺洛, 亨利  
Nousiainen, Jaakko 瑙西艾宁, 亚科

## O

Osorio, Sanches 奥索里奥, 桑谢斯

## P

Paasikivi, J.K. 帕锡基维  
Paasio, Rafael 帕西奥, 拉斐尔  
Pajetta, Gian Carlo 帕耶塔, 贾恩·  
卡洛  
Palamas, Saint Grigorios 帕拉马斯,  
圣·格里戈里奥斯  
Pallach, Josep 帕利亚奇, 霍塞普  
Palma, Giuseppe di 帕尔马, 朱塞佩  
·迪  
Pansa, Gianpaolo 潘萨, 贾恩保罗  
Papadopoulos, Georgios 帕帕佐普  
洛斯, 乔治奥斯  
Papandreou, Andreas 帕潘德雷乌,  
安德雷斯  
Papandreou, Georgios 帕潘德雷乌,  
乔治奥斯  
Papanestasiou, Alexandros 帕帕纳  
斯塔西乌, 阿列克桑德罗斯  
Parisi, Arturo 帕里西, 阿尔图罗

Parma, Carlos Hugo de Borbon 帕  
尔马, 卡洛斯·乌戈·德·博尔邦  
Partsalidis, Dimitris 帕察利季斯, 季  
米特里斯  
Pasquino, Gianfranco 帕斯基诺, 贾  
法朗科  
Pato, Octavio 帕托, 奥克塔维奥  
Pavolini, Luca 帕沃利尼, 卢卡  
Pearson 佩阿尔森  
Pekkala, Mauno 佩卡拉, 毛诺  
Penniman, Howard 彭尼曼, 霍华德  
Pesonen, Pertti 佩索宁, 佩尔蒂  
Pessi, Ville 佩西, 维莱  
Pieralli, Piero 皮拉利, 皮耶罗  
Platone, François 普拉托纳, 弗朗  
索瓦  
Plissonnier, Gaston 普利索尼埃, 加  
斯通  
Plyushch, Leonid 普廖舍奇, 列奥  
尼德  
Ponomarëv, Boris 波诺马廖夫, 博  
里斯  
Pors, Anicet 波尔, 阿尼塞  
Praeger, Fred 普雷格, 弗雷德  
Prandi, Alfonso 普朗迪, 阿尔丰索  
Price, David Lynn 普赖斯, 戴维  
·林恩  
Psaroudakis, N. 普萨鲁扎基斯  
Pulkkinen, Terho 普尔基宁, 特尔霍  
Putnam, Robert 普特南, 罗伯特

## R

Räkkönen, Erkki 雷克宁, 埃尔基  
Rallis, Georgios 拉利斯, 乔治奥斯  
Ramadier 拉马迪埃  
Raney, Austin 兰尼, 奥斯汀  
Rantala, Onni 兰塔拉, 奥尼  
Rasmussen, Joergen 拉斯马森, 乔  
尔金  
Raufer, Xavier 劳费尔, 萨维尔

Rego, José Chao 雷戈, 何塞·乔  
Reid, Jimmy 里德, 吉米  
Reis, Antonio 雷斯, 安东尼奥  
Rice, George W. 赖斯, 乔治  
Ridruejo, Dionisio 里德鲁埃霍, 迪  
奥尼西奥  
Rintala, Marvin 林塔拉, 马文  
Robles, Mario Gil 罗布莱斯, 马里  
奥·希尔  
Rochet Waldeck 罗歇, 瓦尔德克  
Rodrigues, Avelino 罗德里格斯, 阿  
韦利诺  
Rogger, Hans 罗杰, 汉斯  
Rohde, Peter P. 罗德, 彼得  
Rokkan, Stein 罗康, 斯坦  
Romanos, Th. 罗马诺斯  
Rosa, Giuseppe De 罗萨, 朱塞佩  
·德  
Rouleau, Eric 鲁洛, 厄里  
Rousos, Petros 鲁索斯, 佩特罗斯  
Rubbi, Antonio 鲁比, 安东尼奥  
Russo, Giovanni 鲁索, 乔万尼  
Ryti, Risto 吕蒂, 里斯托

## S

Saarinen, Aarne 萨里宁, 阿内  
Sacristan, Manuel 萨克里斯坦, 马努  
埃尔  
Safraan, William 萨弗朗, 威廉  
Sakharov, Andrei 萨哈罗夫, 安德烈  
Salazar-Caetano 萨拉查—卡埃塔诺  
Salmaa, Erkki 萨尔马, 埃基  
Sani, Giacomo 萨尼, 贾科莫  
Sankiaho, Risto 桑基阿霍, 里斯托  
Santuccio, Mario 桑图西奥, 马里奥  
Sartori, Giovanni 萨托里, 焦万尼  
Sartorius, Nicolás 萨托里乌斯, 尼  
古拉斯  
Scheel, Walter 谢尔, 瓦尔特  
Scheflo, Olav 舍弗洛, 奥拉夫

Scocozza, Benito 斯科科萨, 贝尼托  
Sebastiani, Chiara 塞巴斯蒂阿尼, 基  
亚拉  
Segre, Sergio 塞雷, 塞季奥  
Serer, Rafael Calvo 塞雷尔, 拉斐埃  
尔·卡尔沃  
Sèrge, Henri 塞热, 亨利  
Servan-Schreiber, Jean-Jacques 塞尔  
旺-施雷贝, 让-雅克  
Shipley 希普利  
Shipley, Peter 希普利, 彼得  
Sierra, Tomas Centeno 西埃拉, 托  
马斯·辛特诺  
Sillen, Hugo 西伦, 许戈  
Sinisalo, Taisto 西尼萨洛, 泰斯托  
Skog, Emil 斯科格, 埃米尔  
Smith, James 史密斯, 詹姆斯  
Soares, Mario 索亚雷斯, 马里奥  
Sobolov, Aleksandr 索博洛夫, 亚历  
山大  
Sofoulis, Themistocles 索福利斯, 塞  
米斯托克莱斯  
Solaro, Antonio 索拉洛, 安东尼奥  
Solzhenitsyn, Aleksandr 索尔任尼  
琴, 亚历山大  
Sorsa, Kalevi 索尔萨, 卡莱维  
Sparring Åke 斯帕林, 奥彻  
Spinola, Antonio de 斯皮诺拉, 安东  
尼奥·德  
Sprefico, Alberto 斯普雷阿菲科, 阿  
尔贝托  
Starr, Richard F. 斯塔尔, 理查德  
Stefanopoulos, Konstantinos 斯泰  
法诺普洛斯, 康斯坦丁诺斯  
Stefanopoulos, Stefanos 斯泰法诺普  
洛斯, 斯泰法诺斯  
Stöstad, Sverre 斯特斯塔德, 斯韦勒  
Streiff, Gerard 斯特雷夫, 热拉尔  
Stringos, Leonidas 斯特林戈斯, 莱奥  
尼扎斯

Suarez, Adolfo 苏亚雷斯, 阿多尔福  
Sundic, Milika 松迪奇, 米利卡  
Suonpää, Leo 苏翁佩, 莱奥  
Suslov 苏斯洛夫  
Svolos, Alexandros 斯沃洛斯, 阿列  
克桑德罗斯

## T

Tamamesn, Ramon 塔马梅斯, 拉蒙  
Tamburrano, Giuseppe 坦布朗诺,  
朱塞佩  
Tanner, Väiö 坦纳, 韦纳  
Tarradelias, Josep 塔拉德利亚斯, 霍  
塞普  
Tarrow, Sidney 塔罗, 西德尼  
Tarschys, Daniel 塔斯奇斯, 达尼尔  
Tato, Antonio 塔托, 安东尼奥  
Teodori, Massimo 泰奥多里, 马西莫  
Terfve, Jean 特尔夫, 让  
Teslić, Vlado 特斯利奇, 弗拉多  
Theodorakis, Mikis 塞奥佐拉基斯,  
米基斯  
Theotokis, Spyros 塞奥托基斯, 斯比  
罗斯  
Thøgersen, Thøger 特格森, 特格  
Thorez, Maurice 多列士, 莫里斯  
Tiersky, Ronald 蒂尔斯基, 罗纳德  
Timmerman, Heinz 蒂默曼, 海因兹  
Tito 铁托  
Togliatti, Palmiro 陶里亚蒂, 帕尔  
米罗  
Tökes Rudolf L. 特凯斯, 鲁多夫  
Tranfaglia, Nicola 特朗法利亚, 尼科拉  
Tranmael, Martin 特兰梅尔, 马廷  
Trapezountios, Georgios O. 特拉佩  
宗蒂奥斯, 耶奥尔吉奥斯  
Trevijano, Antonio Garcia 特雷维  
哈诺, 安东尼奥·加尔西亚  
Tsimokos, Elias 齐里莫科斯, 埃利  
阿斯

Tusell, Xavier 图塞尔, 萨维尔  
Tzannetakis, Bas 特扎内塔基斯,  
瓦斯

## U

Uliassi, Pio 尤利厄西, 皮奥  
Upton, A.F. 乌普汤  
Urban, Joan Barth 厄本, 琼·巴思

## V

Vafiadis, Markos 瓦菲阿季斯, 马尔  
科斯  
Valdimarsson, Hannibal 瓦尔迪马  
尔松, 汉尼巴尔  
Valle, Raniero La 瓦莱, 拉涅罗·  
拉  
Veiga, Pita da 维加, 皮塔·达  
Velouhiotis, Aris 韦卢伊奥蒂斯, 阿  
里斯  
Venizelos, El 韦尼泽洛斯, 埃尔  
Venizelos, Sofoklis 韦尼泽洛斯, 索  
福克利斯  
Verba, Sidney 韦尔巴, 西德尼  
Verlet, Martin 韦莱, 马丹  
Vlantas, Dimitris 弗兰塔斯, 季米特  
里斯  
Vogt, Jürgen 沃格特, 耶根

## W

Wahrner, Lars 韦尔纳, 拉斯

Walden, Rudolf 瓦尔登, 鲁多夫

Weber, Eugen 威伯, 尤金

Weiner, Myron 魏纳, 迈伦

Weiss, Ignazio 魏斯, 伊尼亚齐奥

Wiik, K.H. 维克

Willenz, Erik 威伦兹, 埃里克

Williams, Philip M. 威廉斯, 菲利普

Wilson, Frank L. 威尔逊, 弗兰克

Wright, Bob 赖特, 鲍勃

## Y

Yannou, Mina 娅努, 米娜

## Z

Zagladin, Vadim 萨格拉金, 瓦季姆

Zahariadis, Nikos 扎哈里阿季斯, 尼  
科斯

Zampetti, Enrico 扎姆佩蒂, 恩里科

Zangheri, Renato 赞盖里, 雷纳托

Zarifian, Philippe 扎里菲昂, 菲利普

Zarodov, Konstantin 扎罗多夫, 康  
斯坦丁

Zdenko, Antic 扎登科, 安蒂克

Zhdanov, Andrei 日丹诺夫, 安德烈

Zhivkov, Todor 日夫科夫, 托多尔

Zincone, Giovanna 津科内, 乔万纳

Zorbalas, Stavros 佐瓦拉斯, 斯塔夫  
罗斯